

目 录

中国东北的红胡子·····	马克·曼考尔, 乔治斯·吉达柯夫 (1)
	麦志强译
满洲的区域开发·····	罗纳德·苏勒斯基 (12)
	王学良译
战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	
中国东北地区经济·····	山本有造 (24)
	刘晶辉译 赵连泰校
孙文与满洲问题·····	藤井昇三 (48)
	李吉奎译 马宁校
中国人民的领袖孙中山	
永垂不朽·····	吴永清译 (59)
宋教仁和同盟会资料·····	迟云飞译注 (66)
黄兴同俄国驻汉口领事馆秘	
书沃兹涅先斯基的谈话·····	严昌洪 朱福枝译 (75)
	张贯益校
邓演达与国民党理论体系中	
的民众革命思想·····	J·肯尼思·奥林尼克 (94)
	郭根山译 丁则勤校
1913—1914年的沙皇俄国与蒙古·····	黄鸿钊译 (132)
	郑厚安 康右铭校
关于俄共(布)华人分部代表	
与中共组织的联系问题·····	A·И·卡尔图诺娃 (160)
	郭兴仁译

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思想斗争的

社会前提和社会基础..... A. B. 潘佐夫 (166)

郭兴仁译

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对取消

派的斗争..... 卡尔·拉狄克 (185)

吴永清译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与国民党..... 杰柳辛 科斯佳耶娃 (198)

曾宪权译

国外对五卅运动的研究..... 董进泉 王建华 谈春兰 (237)

中国东北的红胡子

马克·曼考尔

乔治斯·吉达柯夫

红胡子的起源——白马张的13条帮规——热尔图加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状况——欧洲人对共和国的看法——红胡子的特点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流域到19世纪中叶已经成了介于俄国西伯利亚和中华帝国东北地区的边境地带，从拓殖这个地带的最初日子起，北满的居民就由不同的社会群体混合组成。有些社群得到官方支持或批准，作为移民定居下来，另一些社群则对北满的自然资源从事非法开采或干打家劫舍的勾当。起初，无论是否获得官方批准的社群，基本上都是由俄国人组成。然而到19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清朝为了开发经济和抵御俄人不断扩大的领土蚕食，而把前此一直对汉人封闭的满洲正式对汉民开放以后，北满的上述两类汉民迅速增加。在中国其他地方专指贼帮的“红胡子”，成了所有未经清朝官方批准而在北满落户谋生的汉人的通称。虽然在各帮红胡子当中偶尔会有俄国人、蒙古人和满族人，但他们基本上是山东和直隶两省移居满洲的移民。①

在地域分布上，红胡子差不多遍布满洲的大部分地区，面积几达两个法国之大。在东部，乌苏里江流域和山区②都有他们的

① 索科夫宁上校：《满洲的红胡子》，载《军事文集》，1903年第12期，第195页。

② 关于这个地区的红胡子，参看纳达罗夫：《在南乌苏里边境的红胡子》，载《军事文集》，1896年第9期，第183—204页。

踪迹；在西北部，他们活跃在远至额尔古纳河和阿穆尔河上游；在北部，他们集中在阿穆尔河一条支流热尔图加(Zheltuga)河周围，和在阿穆尔河沿岸的漠河地区；在中满，尽人皆知他们分布在中东铁路沿线。他们并不把活动范围局限于交通要道、森林和乡村。诸如盛京（沈阳）、吉林、大连和旅顺等主要居民点，都受到过红胡子的攻击，或者曾经在此时或彼时成了他们的活动中心。我们无法精确断定红胡子的活动始于何时，但早在1866年就知道有红胡子帮攻掠城池，而晚至本世纪30年代，还有红胡子帮在推动抗日游击活动。^①

最著名的红胡子帮活跃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北满金矿区。依照大清律，下层土和土中之物皆属帝产，因此，北满的金矿业由朝廷开发和管辖。金矿工作条件十分原始，且由腐败无能的官僚维持着这种状态。结果，招募来做工的华北农民都逃亡了，朝廷发觉无法再找到自愿来的农民顶替，就转而利用流放的犯人和“反社会”分子来充当劳动力。但这些人也很快弃矿而逃。有些逃亡的人私自採金，于是犯了逃亡和偷窃双重罪过；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大多数红胡子就是这两类人。还有另一种人，特别是那些首领人物，则由清朝官员构成，他们或因种种原因遭贬谪来北满，或因逃避内地的追查。最后，还有些西伯利亚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不过他们的人数总是很少。^②

在历史文献和报刊文章中，通常用“贼帮”这个普通名称来称呼红胡子，很容易掩盖了他们极不相同的社会来源。例如，在一帮红胡子的成员中，包括有：一个破产的商人，因欠债而被官府逮捕，买通了看守逃出来；一个其父因与红胡子有来往而遭到官府残酷杀害的人；一个被人行骗而破产的农民；一个在偷窃时杀了人的人；一个木匠，因在家乡受不了压迫而逃亡；一个中东

^① 前引索科夫宁文，第196页；让·谢诺，〈19、20世纪中国的秘密会党〉，（安阿伯，1971）第43页。

^② 弗朗西斯·米里：〈在满洲和红胡子在一起的一个月〉，载《世界旅行》，1912年4月第18期第183页。

铁路的工人，追求铁路当局不允许的个人自由；一个自华南逃亡出来的爱国的国民党分子，因为反清，官府悬赏5000两银子收买他的头颅。^①这使人想起中国著名的“反贼”小说《水浒传》中不同的角色。可以想象得到，这帮人和其他类似的社群，所干的远远不止是打家劫舍的勾当。日、俄和中国的企业、官府和臣民都是红胡子的目标，正是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给他们的活动带上了政治色彩。^②

这种政治性质，在约束一个红胡子帮的13条帮规里明白地表现出来，13条帮规是由人称白马张^③的这个帮的首领制订出来的。新入帮的人最少得有20个帮中兄弟介绍。要成为帮里正式的成员，就要公开宣布愿意接受首领的领导，通过由首领主持的一个帮仪式，并且参加一次出征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成员。

帮规要求帮中人在需要时要援助其他伙伴，要保守帮内机密，要执行分派的任务，还要行为正直。帮中任何人如果有（帮中认为的）反社会行为，就要遭到严厉惩处。显然，白马张帮中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强盗。

帮规更进一步把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分成两类：其职业能为社会所接受和不为社会所接受。前者在入帮以后仍可继续操业，后者特别是算命占卜的人，则遭到禁止。此外，帮中人若迷于此类“寄生职业”者，不能担负领导工作。这一点是认真对待的，从一条帮规就可以清楚看出来：被公推出来而不能履行领导职责者处死。

帮规还区分谁是帮里认为当然的敌人和劫掠对象，谁则应当受到保护。老人妇孺和单身旅客不在攻击之列。官吏和官府的差役，不论清廉贪墨，只要通过该帮势力范围，都是当然的攻击

① 鲁多科波夫：《红胡子》，载《历史公报》，1910年6月号，第923—954页，特别见第933—941页。

② 前引谢诺书，第132—134页。

③ 孤航：《红胡子的生活观》，载《东方杂志》，1927年7月，第24卷，第13期，第73—77页。

对象。不过，贪官则夺其全部财帛，而有好名声的清官则只夺其财帛之半。另一类名义上不受攻击的是外国人，他们甚至还会被“慎加”保护，以免与订约大国发生纠纷。这一条如果存在过，看来也不过是仅仅属于礼节性而已。^①在行动时侮辱妇女要处死；缴获归己而不归公也要处死。

白马张的帮规搞了两套促进帮内团结合作的方法。一是认同程式：一种特别的吸烟方法使红胡子帮成员彼此可以认同，一旦身分明确以后，任何红胡子，有义务提供帮内另一个人要求的一切援助；二是恪守对帮的忠诚高于私人关系的规定。违反帮规者得由帮内人抽签来执行处决。抽中者如不执行任务，本人就要被处死，即使要处决的是他的骨肉至亲也不例外。

帮内每次行动所得都要平均分成九份：两份归公以备各种需要；一份给为这次行动通风报信的人；四份由帮内各人分摊，一份由参加行动的人分配；一份由因公伤亡者的家属分配——一种原始的社会保险制度。

通过这13条帮规，显然红胡子（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帮）不仅仅在他们本身与帮外人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而且在帮内树立了某种社会和道德价值作为行为准则来施行。此外，他们自认为是“应运而生”的一个帮，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补充和增加成员的仪式上和他们以钱物抚卹因公伤亡人员的家属上清楚地看出来。虽然这些性质看起来是原始的，但表明了这是一种超越了中国普通贼帮所具有的那种观念的“红胡子观念”。^②

这种红胡子观念，即意识到自己有别于仅仅是中国社会的法外之人，在所谓的热尔图加共和国（Zhelituga Republic）的历史上得到了最清楚的表现。这个热尔图加国，是在19世纪末叶在北满沿热尔图加河金矿区建立起来的，一个高度自觉和具有原始性

^① 雷华德：《和中国贼帮在一起的十星期》伦敦，1927。

^② 白马张的帮规以摘要形式首次在1927年发表。这些帮规可能是在热尔图加共和国灭亡后制订的。

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上一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到满洲的欧洲旅行者，特别是那些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把热尔图加国看做是他们的信念正确的证明，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社会或无政府主义社会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而且因为热尔图加国的发展看来并没有受过西方的政治或思想影响，更足以证明这一点。正如亚历山大·乌拉尔（Alexandre Ular）评论说：

“这些可以让人描写成反社会、跟斐济的食人种族差不多的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叫人想起让-雅克（卢梭）视为理想的制度……说实在的，共和国是由严格执行一面威吓、一面掌握经济条件的两手策略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应当注意到，那里找不到一个欧洲社会主义者所描写的不快乐的人，这种人认为有权离开一种社会秩序而到他认为更好的另一种社会秩序中去。相反，共和国公民是活跃的人，勇敢地起来反抗社会，解放自己（是包含各种不同意义的“解放”），并且自愿成为自行运转的机器里的一个齿轮。”^①

虽然我们并不确切知道热尔图加共和国建立的日期，^②但它显然是同流动性更大的红胡子帮同时兴盛起来的，也是对同样社会状况作出的反应。迫使逃亡的矿工订约结成原始的合作社群的是两种状况：需要在一个个人极难独自存活的地区生存下去；需要共同防卫以反抗中国官府和对付新到矿工要求入伙的压力，这些新到的人如果入伙，就会耗去他们的资源而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有大约2.5万人口^③（绝大多数是男性）的共和国必须创立

① 亚历山大·乌拉尔：《满洲被放逐者的共产主义史诗》，载《白色杂志》，1910年202页。

② 前引米里文，第186页。

③ 据米里的说法，热尔图加共和国在1865年建立，那时已有三四千居民。他说，到1880年，人口超过2万。（见乌拉尔文，203页，）但从未超过2.5万人。

一种社会组织来向它的公民——被原有国家政权排除在外的法外之徒——提供某种行政服务，同时与周围的居民达成某种临时协议。热尔图加红胡子虽然比外面的红胡子帮人多势众，武器更精良，但他们力图避免冲突；因为冲突不可避免会引起中国和俄国当局的注意。因此，共和国的首领开始跟周围的红胡子谈判，在热尔图加西部很远的松花江河源附近建立一个定居点。

由于缺乏粮食，气候恶劣和有吃人的野兽出没，使松花江流域的金矿未被开发。但看来显然只要有一支武装和给养齐备的人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农业和商业组织，足以提供生活必需品。因此，共和国作为对周围红胡子帮允诺不加干犯的回报，答应派出到松花江金矿区的向导，并提供六个月的给养，使这些人马能够在那里建立一个定居地。第二个矿工共和国在松花江上游适时地建立起来，并且显然日益兴旺。它效法第一个矿工共和国，但人口少得多。正如亚历山大·乌拉尔所说：

“确实异乎寻常的是，两个集团之间生死攸关的对立从未导致公开战争，即使在初创时期也如此。没有什么比这些罪犯——或者象那些无知的人所称的堕民——的富有活力的逻辑更卓越、更令人钦佩了。这些人在这个严格地非此即彼的时代里懂得思考。”①

热尔图加共和国的制度大部分建立在两个原则上面：普遍选举和一种绝对共产主义。其立法权由一个民选的30人议会行使，议会的工作就是制定国家的总政策。②然后由议会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有两名主席，两名法官，一名管供应的官员、一名管生产的官员和一名管贸易的官员。

两名法官负责执行一部严厉的法典，但他们执行时要和地区

① 前引乌拉尔文，第202页。

② 同上，第203页；米里文，第188页。

委员会商议，跟法国的仲裁法庭（conseils de prud'hommes）相似。杀人者处死；打人者处体罚，有许多其他种种不法行为者驱逐出境，而在北满那种严酷的环境下，驱逐就跟处死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偷窃也要处死，据乌拉尔说，这是因为偷窃违背了国家本身的根本性质。

管供应的官员是经济部长，他负责农业、渔业和运输，以及粮食的贮备和分配。粮食集中在国家仓库里。管生产的官员监督国家的金矿业、基础工业及其他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特别注意国家的技术发展。贸易官员负责国家的对外贸易，也即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出售他们的黄金产品。他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能对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地方当局施加影响，因为这些地方官自己往往私下对共和国的黄金买卖感到兴趣。^①共和国的整个政府机构，还包括一支约200人的武装警察部队，这些警察由生产官员统率。^②

共产主义原则主要在分配方面发挥作用。大众从事采金、耕作、运输和其他职业。担任行政工作的人由地区委员会选出。全体共和国公民，从金矿工人到两位政务过繁的主席的收入都一样。此外，作为防止人民通过储蓄积累财富的预防措施，所有支付都使用每年年底结算一次的信用券。这样一来，由于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使用自己的信用券，没有人能在社会经济上比别人优越。

旧物显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交换，但是新商品，不论是国内生产的还是由出售黄金从外地购买的，只能在公营商店出售。对外贸易出现盈余就存在国库中，定期以国家年度信用券方式在全民中分配。这些信用券既不能用黄金也不能用外币兑换，因此没有人可以把钱财带出这个社群。乌拉尔报道说，由于清朝官府对共和国的暴力镇压，这些财富不可能全部分给大众，以防落到清朝官员手上。

① 前引乌拉尔文，第204页。

② 前引米里文，第189页。

共和国严格的经济共产主义对社会生活方面也起作用。由于妇女相对稀少，她们大都从事农业和渔业，在公民地位和社会活动方面与男人完全平等。据法兰西斯·米里（Francis Mury）说，有些妇女是自愿入伙，其余是被红胡子在她们的家乡抢来的。那些被抢来的虽然是共和国自由平等的一员，却不许脱离这个国家。自由恋爱是这里的惯例，没有家庭法也没有婚姻法。结婚并非大事，既不用举行什么仪式，国家行政当局也不介入。因为至今还未弄清楚某种原因，孩子非常稀少。显然有单一男性家庭存在，乌拉尔说道：“一般认为，由于在普通中国人当中，同性恋关系仅仅是对正常两性关系的补充，男人有没有女人共同生活，都同样能够过得很好。”①

米里宣称，共和国的共产主义严格得不近人情：

“这些法外之徒生活在普通人类社会之外，面对着接踵而来的艰危厄困，在他们当中没有人能逃避劳动才能生存的法则。同情和怜悯是谁都不懂的感情，一个人因病或遭到意外而失去劳动力的话，休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如果他有远见，留起一些作为这个联盟的工资的信用券的话（金子只能用作跟外部世界交换的手段），他也许可以休养几个月。即使这样，他赋闲时间也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因为信用券从发行之日起一年后结算，到期未曾支用，其所值由国库收回……。病人没有积蓄工资，或者信用券已经花完的话，知道没有人会提供帮助，只能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等死。怕遭到同样命运的同伴不敢帮助他们。”②

尽管米里对共和国生活无情的一面感到惋惜，他却不由自主对这种生活羡慕得感到嫉妒。他在1912年写道：

① 前引乌拉尔文，205页。

② 前引米里文，第186页。

“这个联盟是迄今实施过的最奇妙的共产主义试验。由于它组织得完美而简单，尽管坚持严酷对待个人，或者正因为如此，它达到了异乎寻常的兴旺发达。我们欧洲的集体主义者们，能在这个小小的共和国作短暂逗留的话，无疑会学到许多东西。他们会注意到，每个公民都尽其所能为国效力，在一切财产共有的环境下，共产主义决不会损害社会来迁就个人的怠惰。”①

约11年以前，乌拉尔在1901年甚至更热情、更富同情心地写道：

“这个从无到有的共和国，开展了一项集体主义的试验，其规模远较欧洲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是那些移居国外并或多或少掌握了科学理论的人——迄今所能进行的试验大得多。它在一片不毛之地，在据说是致命的恶劣条件下，没有外援而取得了相当的繁荣和令人惊奇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证明了仍然不为欧洲人所知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天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甚至最缺乏教养的中国人都具有，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为他们自愿效忠的组织效力。共和国简单的立法，干练的政府，以及最令人感兴趣的、对公共财产的管理，看来确实证明了，只要有数量严格限制的人口和最低限度的必要的立法和政府机构，共产主义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同时又能为它的每个公民提供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

因为热尔图加那些亡命之徒的生活条件是那样的原始，他们的经验跟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沾不上边。然而，最低限度看到了一群人类社会最悲惨的成员，白手起家创造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社会，不能不令人感到鼓舞。从科学观点来说，

① 同上。

这个自发的社会主义试验中心的毁灭，令人感到无比的痛惜”^①

热尔图加共和国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起来，到1883年开始繁盛，^②并一直延续到两个世纪更替之后一段短短的时间为止。那时候它的领土对建筑中东铁路的俄国变得重要起来，而它的影响的扩大，终于惊动了清廷。北京政府获悉当地许多清朝官员只是遵照红胡子的旨意出巡和办事以后，终于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俄国当局封锁了西伯利亚，截断了红胡子可能的退路，清朝军队得到这种合作，很快就打散了共和国的保卫者。许多红胡子遭到杀害，其余的（也许多达半数）逃到松花江共和国，还有一些参加了已有的或自行组织的帮会。^③

白马张的13条和沿着热尔图加河建立起来的国家组织雏形有两个共同特征。首先，两者都在清朝社会的边缘地带。热尔图加共和国和它在松花江的兄弟国名副其实地处于清朝军队、政权和法律统辖范围之外；白马张帮和类似的帮会虽然是在清朝政府政治边界之内活动，却置身于中国社会正常的法律和社会组织之外。流动的红胡子帮跟中国内地的秘密会社大致相象，他们的人帮规矩，他们的行动准则和他们维护对本帮忠诚的方式都相似。另一方面，热尔图加共和国则类似于在地理边缘地带建立了永久性社会的帮会，那些边缘地带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是敌对的。

两个红胡子帮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明显的社会觉悟。由于没有传统社会形态，两者都建立了人帮规则，建立了获取和分配财富的制度，以及长期维持社群的方式。相信白马张可能受到从解体了的热尔图加共和国逃出来的红胡子的影响。但两个行

① 前引乌拉尔文，第203，205页。

② 前引米里文，第186页。

③ 热尔图加共和国灭亡的准确日期无法确定。这里所述来源于米里文第201—202页。

帮显然既没有受欧洲乌托帮社会主义的影响，看来也没有发展中国秘密会社所特有的那种政教合一的象征主义和开展象太平军那样的群众运动。红胡子那种原始平均主义看来是适应当时北满地区那种特殊环境而产生的，特别是适应经济边缘地区混杂居民那种法律上和地理上的孤立状态而产生的。热尔图加共和国和白马张帮从任何常规定义来说，都不是反抗中国社会的贼帮。两者都建立了一种法律和组织的雏形，跟他们的成员所脱离或被排除在外的那个社会的法律和组织相对应。他们的生活在经济上与清朝社会有联系，但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则独立在其外。红胡子产生于对晚清不公正和无能状况的反对，但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反抗上，而且进一步向前发展了。

译自让·谢诺编《1840至1950年中国的群众运动和秘密会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ed. by Jean Chesneaux, Stanford Univ. Pr. 1972) 第125至134页。

袁志强 译

满洲的区域开发

——本世纪20年代的移民劳动者与省官员

罗纳德·苏勒斯基^①

本世纪上半期，一个大规模的人口运动终于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图。这个人口运动是汉族劳动者每年向称之为满洲的东北三省的移居。由于移民劳动的结果，到本世纪下半期，满洲成为中国农业最丰产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汉族劳动者进入东北的大规模运动始于19世纪末，当时满洲被看作是一个具有会造福于国家的肥沃的待耕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地区。由于满洲人烟稀少，人力成为开发该地区的无价之宝，于是清政府开始发布推动汉族人向满洲迁徙和鼓励他们开发该地区财富的法令。汉族劳动者进入满洲的运动在整个清朝末期历久不衰。清朝倒台之后，中国进入以国家政治和经济四分五裂、各地军阀割据和军费剧增为特点的军阀时期。在这一时期，对开发满洲经济的人力的需求如果不是大于清朝统治时期的话，也决不在其下，但是，极为缺乏中央政府的经济援助和行政指导。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汉族劳动者川流不息地到达满洲，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为满洲有大量的工作和较高的工资所吸引。满洲的各省政府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援助的情况下，系统提出了由奉天省政府于1923年指导制订的具有广泛基础的《移民和开发计划》。该计划准备通过鼓励劳动者在满洲定居来改变他们的移民

^① Ronald Suleski——密执安大学博士。本文是他1971——1974年在东京的研究成果。自1975年以来，他一直在阿林顿德克萨斯大学教授中国史，并任该校亚洲研究会主席。

性，并使他们为该地区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从两个方面考察本世纪20年代的满洲汉族移民：第一，评论这些移民的性质，并指出他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所做出的一些贡献。第二，讨论满洲各省官员对移民流入具体经济部门的反应，说明清末开始的满洲经济变化在军阀时期继续迅速发展，论证各省官员（通过《移民和开发计划》）与移入该地区的汉族移民都为本世纪20年代发生的满洲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 《移民和开发计划》

1923年通过的《移民和开发计划》的基本目的是，通过鼓励来自中国内地的劳动者在满洲安居一年以上，来改变年度移民的极端无常性。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每年都有移民浪潮涌入满洲。这些人是贫困的汉族农民，他们一般都是在严冬逝去，大地冰消雪融的初春三、四月份来到满洲。消融的雪水使一些道路变成泥海，运送货物的马车速度大大放慢。但是在农业这个经济部门，农民们正在准备春耕，此时他们需要帮手。矿山和工厂也欢迎移民到来。来到满洲的那些移民很少带有像样的财产。有些人带一个衣箱，但只是如此而已。无论是乘船到大连或营口登陆，还是乘火车由北京和天津出发，大多数移民劳动者都直奔沈阳。它是奉天省首府，满洲的最大城市和铁路中心。移民们在沈阳挤上开往长春和哈尔滨的列车。

大部分移民来自华北的直隶省和山东省。在本世纪20年代，两省都苦于军阀混战，并且周期性的灾荒使大多数农民难于谋生。持续的苦难生活使许多劳动者离开家乡移往满洲。在整个军阀混战时期，华北的这些问题一直存在，部分地是由于这些问题，汉族劳动者在本世纪20年代不断移往东北。同当时华北的苦难生活相比，满洲犹如一座天堂。例如，满洲的工资相当高。在1921年，在沈阳干活的零工（外国人通常称之为苦力）每月能挣

18元。一个木匠干满30天每月可挣36元之多。尽管这些工资并不特别高，但比华北的工资高。例如，在本世纪20年代初，农业劳动者（构成满洲汉族移民的绝大多数）在山东省每天挣0.13元，在山西省每天挣0.14元，而他们在满洲的日工资在奉天省达到0.42元，在吉林省为0.36元。^①更为重要的是来满洲找工作容易，许多移民在农场，矿山或工厂找工作都遇不到麻烦。因此，移民浪潮逐年高涨。在1921年至少有208,940名汉族移民劳动者进入满洲，在1922年，其数目大约达到35万人。^②

移民虽然来到满洲，但是他们生活所用的一切都是临时应付的。^③人们只要看一下拥挤在火车站里的移民就可略知一二。除了很难看到他们随身携带东西外，在他们之中几乎看不到妇女和儿童。他们大多数是准备把劳动的汗水洒到满洲，而后回到华北家乡的男性青壮年。在初春到达之后，劳动者经过植物生长季节的夏天和秋天，然后在11月、12月或来年1月份，当冰封大地，冬天降临之时，开始登上南下的火车或轮船回到直隶和山东。大多数人设法及时赶回家里过春节。

一些移民在满洲呆的时间稍长些，或许住上一、二个整年，但即使他们也不准备永久定居。他们来时两手空空，在满洲也不置什么财产。他们把工钱积攒起来，住在租来的或者由雇主提供的宿舍和临时住房里，回家时就携款而归。1921年进入满洲的移民为208,940人，但是回到华北的是109,780人。^④随着本世纪

①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满一蒙农业经济研究》，（大连1924年出版），第173—174页；朱悛：《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年6月25日，第18页；《1925年中国年鉴》，天津1925年出版，第535—541页。

② 赵宗富（音）：《1920——1930年代的东三省移民》，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6月，第330页。

③ 当然，满洲一些地区的生活费用高于华北。但是移民来到满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生活费用较高，他们仍能节省一些所挣的钱，以备回到华北家乡使用。迈尔斯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满洲的一些移民劳动者渴望利用满洲机会增多的有利条件来改善他们的状况。他的看法支持了上述的基本论点。

④ 同上。

20年代的继续发展，更多的移民决定多住些时间。在1924年，有384,730名移民进入满洲，回去的有200,046人；而在1926年，有⁵66,725人进入满洲，回去的有323,694人。

在满洲，以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为首的中国官员认识到，流入的劳动者是一直被省政府普遍忽视了的人力。他论证道，汉族移民能够被调动起来，在系统开发满洲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例如，不让他们在人口已经稠密的南满地区互相争夺工作，鼓励大多数移民劳动者到需要人力的腹地去开垦新的农田和发掘新的矿藏，可以指导他们选择诸如林业工作之类的职业，以使一些经济部门均衡发展。此外，王认为，省政府应努力通过鼓励移民在满洲永久定居来制止劳动者的每年大量外流。把移民留在满洲，能开发生产用新土地，建立新社区，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并能开拓省政府的税源。王认定，为做到这一点，省政府必须使满洲能吸引移民，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尤其是身强力壮的儿子）带来，这样，他们就能同妻子儿女一起在满洲的腹地建立新社区，成为永久性居民。^①

尽管有消息说，中央政府不会提供任何援助，奉天省政府认为，它自己有足能的能力贯彻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综合计划。在1923年春，它制订了一个《移民和开发计划》。省长王永江让省政务厅长王镜寰主要负责贯彻这个新计划。尽管这对于王镜寰是一个新职位，但是他特别熟悉本省的农业（绝大多数移民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因为自1918年以来，他就任东丰县县长。东丰县位于沈阳东北大约150英里，是盛产红豆，烟叶和大麻的中心。他曾在1921年任沈阳水利灌溉和防洪处处长。^②

① 田部修二郎：《东三省官绅录》，第79页，大连，1924年；日本外务省：《中华民国与满洲名人录》，第448页，东京1931年；太原高义辑：《清末和民国初期中国官绅录》，第30页，东京中国史研究会出版，1918年。

② 日本外务省：《中华民国和满洲国名人录》，第110页，东京，1931年；日本外务省：《当代中国人民名词典》，第457页，东京，1924年；《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案卷（1910—1929年）》，华盛顿国家档案和案卷服务中心（缩微胶卷），第44卷，第6400条；《满洲日日新闻》，1925年6月5日，1927年10月9日，大连。

《殖民和开发计划》具体制定了关于移民劳动者的一些规定，例如《难民救济规定》和《新入境的难民救济规定》。^① 奉天省政府同吉林和黑龙江省政府合作，给按新计划招入的移民劳动者一些特殊福利。这些福利的具体项目根据地方的安排有所不同，但内容基本相似。给大部分移民购买必需品的救济金现款，以解决安家落户的第一道难关。不论移民被分配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是按计划招入的，都给救济金。该计划的着重点是鼓励移民留在满洲组成新社区。省政府为那些定居在政府土地上的人提供建房资金。为使那些建房者永久住下去，省政府许诺，在政府土地上建房并连续居住5年以上的移民将获得全部所有权。吉林省的一些地区给移民分配了许多政府土地，这些土地的一半直接给移民，剩下的一半可在以后购买。

无论是政府土地还是私人土地，前几年都免收地租。一般是前5年免租，从第6年开始根据土壤质量和土地离市场的远近计算地租。通常是根据占用3年之后最好的收成交付地租。在土地免租期间，省政府也取消土地税。一些移民从省政府和私人土地所有者那里得到牲畜。^②

二 贯彻计划

1923年初春，开始根据《移民和开发计划》招收汉族移民劳动者，奉天省政府开始利用他们的劳力有计划地发展满洲经济。在贯彻该计划的第一阶段，省政府派代理人到满洲的主要火车站和渡口宣传这个计划。一些代理人到华北的城市（例如天津），但是大多数人到大连、营口，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满

^① 东亚经济调查局：《满洲年鉴》，第290页，东京，1931年；大连《满洲日日新闻》，1926年5月1日，1928年2月23日。

^② 大连《满洲日日新闻》，1925年3月27日，1926年5月1日，1928年2月3日；富兰克林，L.雷：《中国东北边境的人口运动》，第19章，第42—43页，中国太平洋关系学院，上海，1931年。

洲城市招人。他们在那里向新来者解释这一计划，并鼓励他们加入该计划。代理人给决定加入的移民发放特别身份证，并帮助车站站长为他们安排交通。^①

根据奉天省政府的命令，满洲的所有汉族移民，不论是否根据计划招人，在满洲中国人经营的铁路上享受减价待遇。中国人的减价迫使日本人拥有的铁路，尤其是南满铁路也实行同样价格，对汉族移民劳动者实行特殊票价。铁路给移民劳动者提供的条件极为简陋，移民劳动者所乘的通常是空货车、或者四边低矮不遮风雨的平板车厢，在车上常常连草蓆都没有，车厢过于拥挤屡见不鲜，有些人甚至冒险坐在车棚上面。坐在车棚上真是苦不堪言。但是移民的票价低，减价的范围在女乘客三等票减价15%到男乘客三等票减价30%和50%之间。从长春到哈尔滨的中长铁路（在20世纪20年代由中国人管理）长149英里，但是，移民劳动者的车费只有1.92元。^②

《移民和开发计划》不仅鼓励汉族劳动者来满洲，而且进一步设想把他们引导到选好的本地经济部门。按计划招入的移民劳动者有些被允许在奉天省就业，但是其中的大多数由省政府的代理人送到满洲腹地选好的地区。在计划开始阶段，其目标是把招入的移民的70%送到黑龙江省，他们在那里被要求帮助扩大甜菜生产。招入移民的20%—30%被送到吉林省。那些根据计划送往北方的人，一半被鼓励建立农场，或者开垦农田及在适合饲养马牛的地区从事畜牧业。另一半被引导从事林业，以扩大本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木材、纸浆和造纸工业，或到供应日益发展的满洲工业部门原料的矿山就业。^③

① 前引《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案卷（1910—1929年）》，第24卷，第35条、41条；第28卷，第4161条；《满洲日日新闻》，1923年4月4日。

② 《满洲日日新闻》，1923年4月4日，1924年5月18日，1926年5月1日；富兰克林前揭书，第4—8页；王艾收（音），《1923—1940年的满洲的汉族移民》，在亚洲研究协会西方讨论会上的发言，第8页（未公开发表），圣地亚哥，1921年10月。

③ 《满洲日日新闻》，1923年4月4日。

该项计划的成就之一是给满洲经济引入一个全新的部门。奉天省政府成功地建立了繁荣的棉花种植业和棉纺织工业。由于汉族移民劳动者的不断流入，这些部门从来未苦于人力缺乏。在每年来的移民中都有一小部分被留在奉天省南部，省政府正在那里施行一项增加棉花生产的计划。满洲的投资者们都知道，棉花与棉织品在国际市场上总是易于售销的。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亚洲的棉花需求量无疑增加了。奉天省政府决定在本省鼓励种植棉花，以给该地区经济增加一个新的有潜力的和十分可行的部门。奉天的一些县适合种植优质棉花。多年以来这些地区的个体农户就为自己使用而种植少量棉花，甚至棉花早已做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尽管规模不大。^① 1920年进行的可行性研究说明，在所勘定的大多数地区扩大棉花生产是有利的。在1920年到1921年冬天，省工业厅通过给地方农户提供关于棉花种植的技术资料，以及给打算增加棉花种植的农户提供低息贷款，开展了扩大棉花种植面积的大规模运动，并派一些代理人去美国考察和购买各类棉种。^②

在实施《移民和开发计划》的同时，奉天省政府还开办了东三省纺纱厂。当时在满洲出售的许多棉织品是日本纺织厂的廉价产品，纺织业是一个为日本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使日本贸易公司获利的工业。东三省纺纱厂计划通过生产比日本纺织厂便宜的棉织品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满洲的一些棉布市场。纺纱厂在1923年1月开始部分运转，同年6月开始全部投产。此时，当年流入的汉族移民劳动者已经到达了。该厂位于沈阳城外，是一个占地近4英亩，拥有高大建筑物的大联合企业。纺纱厂效率很高，所使用

① 朝鲜银行：《满洲经济史》，第167页，汉城，1920年；东亚经济调查局：《满一蒙政府和经济提要》，第67页，东京改造社，1932年；东亚经济调查局：《满洲年鉴》，第112—113页。东京，1931年。

② 前引《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案卷(1910—1929年)》，第23卷、第3354条；第24卷，第3541条；第26卷，第3975条；《满洲日日新闻》，1923年6月22日。

的国内外制造的机器至少耗电1,000千瓦。该厂装有生产16支粗棉纱的锭子2万个,织棉布的织机200台。平均日产每捆重400磅的纱55捆,每卷重11磅的棉布350卷。纺纱厂产品的商标是双喜牌和双鹤牌(鹤是长寿的象征)。在1924年2月,该厂在沈阳增设一个印染厂,并计划在辽阳县建一座分厂。^①

纺纱厂在所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功。首先,它开辟和维持一个大规模的棉花种植业给该地区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的经济部门。在1926年,纺纱厂消费7,609,800磅以上棉花,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当地种植的。购买这些棉花的费用为12,256,432元。其次,大量移民劳动者(尽管在满洲移民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在纺纱厂及其周围的棉花种植场找到工作。纺纱厂最多雇用大约1,864名中国工人。到1928年它每年大约生产723,527码棉布和10,541捆纱。纺纱厂在财政上取得成功,为省政府挣得收入。在1927年(投产4年之后),纺纱厂收入15,978,000元。在扣除生产费用3,515,160元,偿还股东款项,贷款利息等之后,奉天省政府实现了为金库赢纯利2,741,805元,事实上,纺纱厂的成功是如此明显,以致日本在南满开设了三个棉纺厂与之抗衡。这三个厂在1924年到1926年之间投产。日本纺织厂用高产量和竞争价格对中国棉织品发动了经济战,但是中国人的纺纱厂实际上没有受到日本人竞争的任何影响。中国人的纺纱厂继续保持高产量,财政上仍然安全无恙。^②

绝大多数移民劳动者被送往满洲腹地,他们在那里经受不到人口比较稠密的南满存在的工作竞争,并能开发未被开发的自然资源。奉天省政府通过省工业厅在黑龙江省建立了一座政府制糖

① 《满洲日日新闻》,1923年10月4日,1923年11月4日,1924年2月12日,1924年2月23日。

② 《满洲日日新闻》,1923年6月22日,1923年12月27日,1924年8月8日;东亚经济调查局:《满洲年鉴》,第113页,东京,1931年;前引《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案卷(1910—1929年)》,第31卷第4647条;前引东亚经济调查局:《满—蒙政府和经济提要》。

厂(东三省制糖厂)。制糖厂位于松花江南岸的呼兰县,那里由河水冲积成的肥沃土地是种植甜菜的理想地区。制糖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生产,省政府有兴趣利用移民劳动者的劳力增加糖产量。如《移民和开发计划》所设想的,新来移民的70%被引向黑龙江省种植甜菜。到1928年,制糖厂每年购进27,049磅甜菜,产糖4410磅。①

在本世纪20年代,成千上万的移民进入采矿业开采煤及其他矿藏,极大地推动了满洲铁路网的发展。许多煤矿位于吉林省和奉天省北部。早在1920年,奉天省政府就给189座金矿,158座煤矿,57座铅矿,25座铜矿,21座铁矿和16座银矿发了经营许可证。②修筑沈阳到海龙铁路雇用了数以千计的移民。铁路计划开辟一些最为肥沃的满洲土地,以建立一些新的移民社区,最终使沈阳和吉林省南部直接连系起来。该铁路修筑始于1925年,投资1万元,股票由公众购买。1928年铺设铁路线120英里。同年,有1,089,000名移民进入满洲。该铁路在疏导移民方面取得很大成功,甚至在整条铁路运营之前就已开始赢利。在1929年,计运货1,140,405公吨,运旅客878,071名,赢利5,379,848元。③

满洲经济的其他领域也从涌入该地区移民劳动者的劳动中获得利益。在贯彻《移民和开发计划》的初年,满洲的制材工业几乎翻了一番。在该计划付诸实施之前的1922年,吉林原始森林木材生产为6,500,000立方英尺。第二年,积极把移民送到原始森林工作,产量就上开到7,570,000立方英尺,1924年暂时下降到6,040,000立方英尺,然而1925年又上升到12,140,000立方

① 赵宗富《1920—1930年的移民与东三省北部的农业开发》,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第613—614页,1973年;前引《满洲年鉴》,第129—130页。

② 前引《满洲经济史》,第162—167页;前引《满—蒙政府和经济提要》,第242—247页。

③ 《满洲日日新闻》,1922年11月26日,1925年5月19日,1927年10月22日,1928年2月28日,1928年3月10日;前引《满洲年鉴》,第149页;小乌幸吉:《满蒙铁路概览》,第179—180页,沈阳大阪屋号书店,1928年;前引《1920—1930年代的东三省移民》,第339页。

英尺。^①当然,大量的移民被引导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把成千上万亩生地变成良田。尽管本世纪20年代满洲出现的农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可由较为先进的机械化和提高了农业技术来解释,但是绝大多数农业用地完全是由人力——满洲移民所普遍适应的艰苦的体力劳动——开垦的。在1924年到1929年间,耕地由2000万英亩增加到3500万英亩左右。^②

三 结 论

在1923年初步实施该计划之后,在2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奉天省政府继续以每年补助大约30万元推行该计划。^③对该计划的实施一直延续整个20年代,以前的目标得到实现并有所超过。例如,政府代理人每年都能保证使按计划招收的新移民的数目不断增加。在1923年,省政府为自己确立的目标是招入10万名移民,这个目标实现了;到1925年,目标已经增加到20万户,或者至少40万人。^④

省官员在改变移民在满洲临时居住的观念方面成效不大。尽管在20年代每年有成千上万汉族劳动者移入满洲,但是许多人似乎是为了逃避华北的暂时困难,因为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回到他们在华北的家乡。当然,在每年来的成千上万的人中许多人没有回去,而是决定在满洲住较长时间。1923年,100,803名移民决定在满洲住较长一段时间;1925年其数目增加到235,232名(占总数的49.7%);1926年决定住更长时间的有2,243,031人(占总数的42.9%)。不仅决定住在满洲的人数更多,而且其逗留时

① 前引《满—蒙政府和经济提要》,第107页和《满洲年鉴》,第86页。

② 前引《1923—1940年的满洲的汉族移民》,第9页;赵宗富,《近代东三省移民问题之研究》,载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第658—662页,1974年12月。

③ 《满洲日日新闻》,1925年2月17日。

④ 同上,1925年8月27日,1926年5月1日,1928年2月23日。

间在缓慢延长。到20年代末，住3年的移民大约占总数的40%，而且有15%至少呆4年。^①

随着在满洲住较长时间的移民的日益增多，一些新社区开始形成，这就发展了该地区的经济。新社区不仅为经济提供了新产品，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商品和服务的新市场。由于新社区的产生，各省政府都扩大了税源。例如，由决定在腹地安家落户的移民引起的人口增加推动了在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设立新县。1923年，吉林省在中东铁路沿线的一个大豆丰产区新设立一个马球县。同年，黑龙江省政府在省政府所在地以北70英里出产玉米和高粱的地区新设立了两个毗邻县明水县和依安县。^② 岁人的增加（部分地是由于赋税者增加所致）使奉天省政府将其年度预算由1923年的17,615,453元提高到1925年的2550万元。^③

不幸不是，20年代末期是以混乱结束的，1928年冬天经济的近乎崩溃使满洲的经济发展放慢了。经济混乱同张作霖的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个统治满洲的军阀首先把资金大规模地移出满洲，以支持其在中国关内的军队，然后开始不计后果地发行纸钞。到1928年2月，随着物价不断高涨，满洲的许多企业被迫关门，停业和破产。新来寻找工作的移民首当其冲受到伤害。许多人穷困潦倒在铁路两旁，去寻找再也不复存在的工作，他们随身携带的现金由于通货膨胀已失去价值。省长王永江已于前一年（1927年）去世，前政务厅长王镜寰已被取而代之。这两个曾成功地处理了移民问题的人再也不能掌权了。但是，满洲经济混乱的消息可能很慢传到华北，因为在1928年和1929年继续有大批移民来到满

① 前引《1920——1923年的东三省移民》，第330页；前引《满洲年鉴》，第90页；前引《中国东北边境的人口运动》，第9页。

② 山田久太郎：《满—蒙地名全史》，第2卷，第161页，第306页，第321页，中国事情社，东京，1926年。

③ 当然，省政府享受到较大的预算也是由于税收的增加。此外，预算的增加也是由于满洲当时出现的缓慢的通货膨胀。

洲，因此，他们对于满洲的经济发展仍然是重要的。^①

总而言之，本文已经说明，在清朝末期开始，满洲区域经济的经济变革在本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稳固向前发展。尽管在可应用的数据的基础上，不可能用数字来表示汉族移民劳动者的贡献。但是很清楚，满洲的汉族移民劳动者提供了发展该地区农业，采矿业，制材业和制造业所需要的大量人力。在中央政府陷于混乱之时，奉天省政府官员制订了利用移民劳动者劳力的计划，并将此计划直接用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奉天省政府的《移民和开发计划》把移民劳动者的体力和智慧导入具体的发展部门，并开始鼓励他们在满洲居住较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省官员和汉族移民劳动者的贡献，在军阀混战时期之末，满洲就已踏上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工业区之一的道路。

译自（美国）《现代中国》季刊，

1978年10月号，第419——434页。

王学良 译

^① 《满洲日日新闻》，1927年4月7日，1928年2月17日，2月18日，2月19日，2月23日；松月正我和渡边泰里司？《近三十年中国和满洲事件史》第145—146页，东京新法评论社，1938年；前引《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案卷（1910—1929年）》，第182卷，第3条。

战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的中国东北地区经济^①

山本有造

一 战争结束与中苏接收东北交涉

1945年8月9日零点，苏联声明对日宣战，当日拂晓前，“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初次遭受空袭。

苏联三个方面军越过“苏满”边界开进“满洲国”。由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领的华西列夫斯基军，渡过黑龙江，乌苏里江南下；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率领的外贝加尔军，兵分两路，一支越过满洲里、海拉尔向齐齐哈尔挺进，另一支柯瓦廖夫军团经外蒙攻陷新京，由四平街进攻奉天（沈阳）。梅列兹柯夫元帅率领的梅列兹柯夫军，由滨海省攻入哈尔滨。大连、旅顺则由苏军伞兵部队占领。

日苏开战时，关东军本部与“满洲国”政府决定转移至通化，但由于苏军意外的快速进攻，以致来不及采取充分应付措施而陷入崩溃境地。8月17日，关东军向前线发布停战命令。13日，

① 本文参考以下当事人手记、记录等文献资料，高崎达之助：《满洲终焉》（1953年，东京实业之日本社）；成田精太：《满洲瓦解始末纪》（1950年东京北隆馆）；梅震：《战后满洲四星霜》（1958年）；满铁会：《满铁最后一任总裁山崎元幹》（1973年）；满蒙同胞后援会：《满蒙终战史》（东京河出书房，1962年）；姚崧令：《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社1982年）；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据东北折冲纪要》（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5年）；加藤丰隆译：《苏军进驻满洲》（东京原书房，1982年）；斯坦福大学哈佛研究所文书室藏：《张公权文书》；香岛明雄：《关于满洲的战利品问题》（京都产业大学论集，第9卷第1号，1980年）；石井明：《有关中国东北工矿资产的中苏交涉》，《战后内战时期国共两党与苏联的关系》，载《中国政治与国际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

“满洲国”皇帝宣告退位，“满洲国”灭亡。

8月20日，苏军进驻长春。同日，柯瓦寥夫大将会见关东军司令官山田大将，接收了关东军司令部。8月30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搭外贝加尔列车进入长春。当然进驻满洲各地的苏军均掌握了军事权，但民政依然保持伪“满洲国”的机构，由伪“满洲”人（中国东北人）进行管理。长春由曹肇元任市长，赵万斌任公安局长。总之，“满洲国”解体后，即使东北由国民政府统一，若排除伪“满洲国”官员，维持正常管理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伪“满洲国”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对上述苏军动向的反应是相当迟缓的。

8月30日，重庆国民政府公布了《东北接收处理办法》，其要点为：设立作为接收、管理伪“满洲国”的中央派出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后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营），其下设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将原东北三省重新划分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9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熊武辉中将为东北行营主任兼政府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号公权）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长春铁路公司（中长铁路）中国代表。

10月12日，熊式辉、张公权以及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等国府代表，始进入长春，就有关接收东北问题开始与苏联交涉。但是，与苏军以压倒的军事力量控制东北全区相比，国民政府方面，当初仅进驻数十名接收人员。因此，必须谋求通过外交交涉途径对伪“满洲国”进行接收。

此前，当年8月，于莫斯科通过王世杰、莫洛托夫会谈达成协议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14日签字、8月25日批准、12月3日生效），有关当时中苏交涉的部分，概括为如下三点。^①

^① 有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中苏交涉，参照香岛：《满洲战利品问题》、石井：《论国共两党与苏联关系》。

1、为同日军作战而进驻“满洲”之苏军，于战争结束后3个月以内撤退之；

2、日俄战争时，俄军在“满洲”拥有之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设立中苏合办之中国长春铁路公司；

3、旅顺定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为自由港。但该两地之行政权属于中国。

10月13日，举行第一次中苏代表（熊式辉、马林诺夫斯基）会谈，国府方面，首先向苏方提出如下四点协助要求。^①

1、希望苏联方面，对建立东北政权与接收各省市行政机构予以协助；

2、希望苏联方面，对接收日本及伪“满洲国”在东北拥有的工业机构及设备予以协助；

3、希望苏方对国军的进驻给予海路输送上的协助，尤其准许利用大连港；

4、希望苏方对于苏军撤退前，中国为维持治安向沈阳、长春空运少数中国部队，予以准许与协助。

熊式辉主任委员于召开会议时表示：“东北行营的任务，在于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迅速恢复东北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希望作为盟军的苏方予以善意的协助。”实际上，国府方面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以双方达成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依据，并没有预想到苏方会采取与此相违背的太大行动。

苏方对国府方面的上述四点要求的答复是，对于国军登陆的问题实质上予以拒绝；有关经济接收事项，表示有待今后通过协议确定，这是意想之外的冷淡态度。另外，同双方代表人员会谈相并行的，关于军事问题及经济问题，决定分别选派负责人员召开个别会议处理。军事方面，由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与苏联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巴布罗夫斯基中将负责，经济问题由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公权与苏军总司令部经济顾问

^① 董彦平：《苏军进驻满洲》，第31页。

斯拉德柯夫斯基大校负责。另外，根据条约规定的有关中长铁路问题，由中国代表张公权与苏方卡尔金中将负责进行交涉。

二 “中苏合作工业公司”计划

苏军在进驻东北的同时，就接收主要工矿业设备，并将其一部分拆卸运往苏联，这使国府方面大为震惊。因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并不拥有此类权利。

有关国民政府东北行营进驻之前，苏联大规模拆迁“满洲”设施、资材的情况，从伪满重工业总裁高崎达之助的如下报告可以一目了然。^①

“一、根据其后的状况（迄至9月22日）判断，苏军对满洲各地的重工业设施重要部分，正火速加以包装，并向本国拆迁，奉天住友三菱电线、满洲汽车的各种机械，满洲数百车厢，正向北方运送。据悉，苏军因不享有对日索取赔偿权，故采取席卷一切战利品而去的方针。由于重庆方面迄无正式代表前来，虽有代办人员对苏军的掠夺流露出反对意见，但并未采取加以阻止的方针。据观察，重庆领导层似乎对苏军的掠夺采取公认态度。此种情况对日后解决赔偿问题，决定支付对华赔款时会成为问题。但日本始终主张应以8月15日当时为准，8月15日以后，对因苏军掠夺而出现的降低估价，有必要明确指出，应由联合国方面负责。”

尽管重庆国民政府，并非“公认掠夺”为合法，但事态是在他们尚未接管的情况下发生的，何况当东北行营进入长春后，苏军更进一步对主要设施进行有组织的接收，如下所述，苏方在同国府进行经济交涉时，甚至将此类接收的设施做为“人质”加以利用。

^① 高崎达之助：《满洲终焉》，第225页。

10月20日，苏联首先对伪满洲重工业总裁高崎达之助提出移交伪满重工及其属下企业全部财产的要求。10月27日，高崎提交了移交书，至此，伪满洲重工业直属的72个企业，150个小会社一举为苏联所接收。

9月22日，伪满铁在中长铁路苏方代表卡尔金中将到任后，即归属于其管理之下，至11月19日，伪满铁接受将其全部财产移交苏联的命令，不得不按9月25日当时的计算日期，向苏联提出了“关于向苏联移交满铁财产管理权备忘录”。本来伪满铁财产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除其中一部分应移交中苏合办的中长铁路外，苏联是无权提出其他权利要求的，尽管如此，伪满铁的全部财产却一举为苏军接收。

在上述形势背景下参加中苏谈判的苏方代表，在10月27日的第二次中苏代表会谈中，竟公开宣称，日本人所有的工厂全部应视为属于苏军所获得的“战利品”，致使国府方面大吃一惊。其后，苏联方面再三主张的“战利品”逻辑，大致是以过去东北是反苏根据地，因此，在其属下的全部日本工矿业，均应视为从事反苏军事活动。因而，东北现有的主要工矿业应视为此次苏军对日作战所获得的战利品。^①

在东北地区工矿业如同笼罩一层大网的前提下，苏联在张公权斯拉德柯夫斯基会谈中，便提出了在东北地区中苏经济合作的提案。经过数次预备会谈之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德柯夫斯基大校于11月20日正式提出了“中苏合作工业公司”提案。^②

苏联方面，以经营伪满重工业株式会社及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所属的企业为目的，形成了组织一个中苏合作公司的想法。上述两会社虽原属关东军所有，但苏联政府出于对中国友好，希望在中苏双方拥有平等所有权的原则上，共同经营该两项企业。财产

① 苏军所谓“战利品”问题的主张原型，在1945年8月7日协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在对宋子文的谈话中已有所流露。参见《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第524—525页。香港：《有关满洲战利品问题》。

②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第546页，台北传记文学社、1982年。

由双方平均分配，苏方与中方各占50%。另外，在企业管理上，组织中苏合办公司的条件如下：（1）公司按平等原则组成，公司资本各占一半，此项比例在公司继续存在期间不变；（2）苏联以若干经济组织，即伯力煤业公司、远东动力公司、远东银行等作为该公司的参加者，中国方面也可以自然人或法人资格参加；（3）苏方以上述两企业（满重工、满电）的日本人所有资产的50%作为该公司资本。中方也应缴纳与苏方相等的资本，以日本人所有及其他所有的残留资金充当资本；（4）苏联为该公司提供必要的专家，技术援助，以谋求该公司所属各项事业的恢复与发展；（5）前述两企业所属的事业、土地、地下矿藏的所有权均移交给新成立的公司；（6）中苏双方人员共同参加管理公司事务，公司双方干部具有平等的表决权，中方代表任公司总裁，苏方代表任副总裁；（7）在具体执行公司事务中，由苏方指定总经理，中方指定副总经理，负责办理之。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就国军进驻东北所进行的中苏交涉陷于僵局，而东北的共军（八路军），在苏联暗中援助下抵制国军进驻，国府方面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甚至东北行营也处于正要暂时向山海关紧急撤退的状态。中国方面认为，在任何政治问题均未解决的阶段，难以协商此类经济问题，苏联方面则主张，只要经济合作得以顺利进行，政治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苏联与中国围绕东北问题的关系的确是极其微妙的，苏联作为联合国的成员，一方面支持重庆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作为正式对手而承认国民政府，但是在伪“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为取代日本而扶植自己的势力付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以所接收的主要工矿业设施为“人质”，向国民政府提出中苏经济合作要求，同时援助中共势力，此乃达到这一个目的的代替手段。因此，在不择手段达到目的之前，根本没有撤军的打算，以致原定1945年11月下旬撤退的苏军，一再延期，最后拖到1946年4月才撤军。

在得知中国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将伪满重工、伪满电所属全部企业移交中苏合办工业公司的第一次提案后，12月13日苏方提出一份缩小了范围的第二次计划表，同时提出一份可以归还中国的工厂一览表，以迫使中国方面让步。其中（I）表示应属中苏合办工厂，（II）表示可归还中国的工厂，概括如下。^①

（I）应属中苏合办工厂

- （1）煤矿：9处（瑛珲、三姓、西安、本溪湖、密山等）。
- （2）发电厂：丰满水力发电厂及其发电线路、变电所各地涡轮机发电厂14个，另加鸭绿江水力发电厂。
- （3）钢铁：钢铁厂3个、选矿厂3个。
- （4）铁矿：3个。
- （5）砖瓦厂：2个。
- （6）有色金属，轻金属工厂：19个。
- （7）机械工厂：6个。
- （8）化学工厂：8个，包括石油精炼厂2个、油页岩厂2个。
- （9）制盐厂：1个。
- （10）水泥厂：4个。
- （11）民用机场：8个。

以上，合计工矿企业73（应为71）个，民用机场8个。

（II）可归还中国政府的工厂

- （1）发电厂：17个。
- （2）煤矿：26个。
- （3）钢铁厂：1个。
- （4）机械工厂：23个。
- （5）电机工厂：11个。
- （6）其它制造工厂：6个。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593页以下各页；石井：《有关中国东北的中苏交涉》，第178—179页。

- （7）水泥厂：7个。
- （8）石油精炼厂、煤炭厂：各1个。
- （9）纺织厂：12个。
- （10）食品厂：41个。

以上，合计工矿企业147（应为146）个。

根据苏方的主张，属于中苏合办企业的价值约为38亿元，归还中国的企业价值约22亿元。计划将前者按产业组成11个合办公司，这与第一次提案相比，企业数目有相当减少，但又补充要求，（A）民用机场合办；（B）钢铁等五个主要合办公司，苏方要求持股51%，董事长、总经理两项职务均由苏方选任。

对于苏联执拗而强硬的上述要求，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公权，反复与国府中央协商，等待训令。1946年1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派经济部东北特派员孙越崎到长春，传达中央经过讨论的指示：^①

（1）中国东北领土内的原日本工矿资产均属中国所有。但出于中苏友好考虑，对具体工厂，我方准备与苏联政府就合办事宜进行协商。

（2）如东北所有苏军撤退，中国政府可立即与苏联政府就合办工厂法进行协商。

（3）在苏军撤退以前，委托中国方面的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参加预备会谈。

（4）东北电力事业涉及较广，不属于合办之列，应由中国单独经管。

（5）东北矿业亦应极力避免合办，如苏方强硬要求，可只限少数予以认可。

（6）可以合办的为本溪湖钢铁厂与一部分机械制造厂。但所有合办公司的董事长均应由中国人担任，总经理职务亦必须保留由中国人担任。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第625—629页。

关于（5）、（6）两项，可暂时同意设立如下三个合办公司。

（A）中苏合办煤矿公司（由伪满洲制铁本溪湖支社经营的本溪湖煤矿、伪浑春煤矿经营的浑春煤矿，伪札赉诺尔煤矿经营的扎赉诺尔煤矿组成）；

（B）中苏合办钢铁公司（由伪满洲制铁株式会社の满洲制铁金属总厂、本溪湖制铁厂、本溪湖铁山组成）；

（C）中苏合办机械制造公司（由伪满洲自动车制造株式会社の沈阳、安东、哈尔滨三厂，及伪满洲机械制造株式会社の金州重型机械制造工厂组成）。

根据以上中方对苏方提案的对案，终于使交涉趋向具体化，但双方主张仍相差悬殊。苏方的要求过大，中方的对应则又嫌过小。

在双方如此反复讨价还价过程中，此项中苏交涉又为美国闻知。1946年2月9日，美国向中苏两国发出照会，声明东北工业的共管违反“门户开放原则”，以致使中苏经济合作问题被提到国际外交舞台，苏联被拖入与美国相较量的境地，另外，与此项经济合作交织在一起，一再拖延的苏联撤兵问题，进入2月后也发展成为国际问题。这迫使苏联不得不做出最后抉择。

结局是在3月之后，决定重新在重庆举行“中苏经济合作”谈判。3月27日，苏联再将其要求大为缩小，提出第三次提案，4月6日，中方提出对案。中苏重庆交涉延续至4月16日，中方派经济部次长何淬廉、外交部次长刘一锴取代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公权，使交涉又从头开始了。^①

三 苏军撤退后的东北经济状况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军从伪“满洲”即东北

^① 苏联第三次提案，除《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第699—701页，还可参照香港，〈有关满洲战利品问题〉。

地区撤兵，其全部撤完期限应为1945年12月3日。1945年9月2日，苏联在日本投降书签字时也曾言明此事。然而，由于政治经济两方面的中苏接收交涉遇到种种障碍，进展迟缓，苏军撤退日期也再三被拖延下来。但进入1946年后，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对苏压力加强，中国国内的反苏运动也日趋扩展。在这种形势下，8月上旬，苏军突然从东北开始撤退，3月12日已从沈阳，13日已从四平街撤完。继而，3月23日，苏联大使向中国外交部发出通知，苏军将于4月末撤完。其后，撤兵大体进行顺利。4月14日由长春撤退，4月23日，苏军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通知中方，5月8日苏军将从东北全境撤退完毕。

至此，除旅顺外，整个东北完全归还给中国。但苏军的撤退，促使国共两军对立趋向表面化。东北的共军势力，与日本战败的同时，退守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以冀东、热河地区为根据地的“八路军”，分两路进入伪“满洲”，同苏军同时进驻各地。从而使欲进入东北地区的国民政府军，在各地与苏方发生了冲突。在苏军与中共军联合抵制下，在大连、营口等海港登陆失败的国府正规军，1945年11月11日，进攻山海关，突破了八路军的长城防线而开进东北。其后，国府军一方面与苏军交涉撤兵，同时向沈阳、长春等“南满”各主要城市进驻少数保安部队，以保护其外交、行政特派人员的安全，但在拥有雄厚实力的中共军的再三攻击下，并未能维持其稳定的统治。

1946年春，在苏军正式撤兵的同时，“南满”各城市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对象。3月12日，当苏军撤兵国军正欲进入沈阳时，中共军已捷足先得地进驻了。至3月18日，国军始击退接收沈阳的中共军。战线徐徐向北扩展，3月17日在四平，4月14日在长春，国共双方交战，越往北方交战越激烈。国府军增强兵力后，5月20日夺回四平街，23日夺回长春，至此，“南满”的接收大体完毕。4月5日，东北行营本部由锦州迁往沈阳，成为经管东北的据点。

由美国提供新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军，4、5月份进攻神速，一时大有短期内控制“全满”之势，但在长春、吉林一带受挫，其势突然锐减。林彪将军率领的共军，改变其游击战术，采取诱敌向北深入，从南方击溃的方式，此时主要战线在长春、哈尔滨之间的沿松花江广大地区，成为实质上国共双方占领区的边境线。在东北，国府新设的几个行省中，国民政府所接收的只限辽宁、安东、辽北、吉林各省，其余五省即松花、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则处于苏联和中共控制之下，国府未能染指。

1946年初夏的东北，形成国共对立南北割据局面，长春、吉林以南地区，由国民政府接收，行政机构趋于完备，暂时呈现某种稳定局面。以张公权为主任委员的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也于沈阳设本部、长春设分会，开始正式接收与重建东北的经济设施。

国民政府重建东北经济的起点，涉及搞清东北的经资产状况，进而如何具体评估经济设施被苏军拆迁、破坏的情况。

1946年6月1日，美国政府派遣的日本赔偿问题鲍莱委员会一行抵达沈阳，调查苏联撤兵后的情况，特别是被苏军“拆走”的工矿设施情况。据该调查报告统计，“苏军对满洲各种工业设施造成的直接损失，约8.9亿美元，如把苏军占领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包括在内，可达20亿美元。”^①

实际上，早在1945年末，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就委托沈阳的日本工业会，对遭受苏军破坏的情况进行过初步调查。因此，当鲍莱委员会进行调查时，这份日本人的预备调查就被作为参考。^②

1947年2月，东北行营再次委托东北日侨善后联络总处、东

① 成田：《满洲瓦解始末记》，第244页；《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第776页。

②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第765—766页。

北工业会，正式进行损失调查。该组织以历任抚顺及阜新煤矿长的“满洲”煤矿开发权威久保孚为主任，总共动员210人，调查涉及铁道、电力等12个部门，最后提出一份名为《苏军进驻期间东北产业设施损失调查书》的详细报告书。其结论如表1所示，兹将其调查方针备考摘录如下：①

调查方针

(a) 苏军驻在期间发生的拆迁、掠夺及破坏造成的损失，有可能被认为是八路军所为，但一律视为苏军造成的。

(b) 损失程度按恢复原状估算之。

(c) 损失全额均换算为美元。

(d) 对美元汇率为1:4.25、即每100日元为23.53美元。

对美开战的昭和16年即康德8年前数年4.25汇率略为稳定。

(对美元汇率表省略)

(e) 为了将损失全额换算成美元，首先应对比开战前的物价(物价指数表省略)。即损失额相当于开战前指数时，即以4.25除以该数。根据战争结束前的指数算出者，先将其一分为二改为开战前，然后以4.25除之，即可得出换算之美元金额。

(f) 除特殊会社之外，根据战争结束前物价异常腾贵算出者，可分别按前述要领加以调整之。

(g) 本调查如机械类不采用总计重量乘以每吨价格的方法，应根据各工场会社的财产台帐，进行实际情况调查。

备 考

对苏军拆迁工厂设施的日期及且的(即打算重新利用，还是实行破坏)，拆卸人名、捆包状态及运往地点等，应列出明细表，另外在末尾注明工业会取得情报的来源。总之，苏军之目的

① 《张公权文书》第9盒收藏的东北日侨善后连络总处、东北工业会编：《苏军进驻期间东北产业设施损失调查书》(油印小册子)。

表1

被苏军破坏的东北工矿设施推定数

	鲍莱调查团推定		日本技术人员推定	
	拆迁数额 (千美元)	能力减退 (%)	拆迁数额 (千美元)	能力减退 (%)
电 力	201,000	71	219,540	60
煤 炭	50,000	90	44,720	80
钢 铁	131,260	50—100	204,052	60—100
铁 道	221,390	50—100	193,756	(50—100)
机 械	163,000	80	158,870	88
液体燃料	11,380	75	40,719	90
化 学	14,000	50	74,786	33
			食品业其他	
			59,056	50
水 泥	23,000	50	23,187	51
有色金属	10,000	75	60,815	50—100
纤 维	38,000	75	135,113	50
纸浆、造纸	7,000	80	13,962	80
无线电、电报 电话	25,000	20—100	4,588	30
合 计	895,030		1,233,164	(银行关系未算)

资料：东北日侨善后联络总处，东北工业会：《苏军进驻期间东北产业设施损失调查书》，1947年2月《张公权文书》第9盒。张成达：《东北经济》上，1954年，第7—8页。西村成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1985年，第453页。

无疑在于供其本国重新利用，同时不难看出企图削弱东北地区的产业实力而加以破坏。每当选定拆卸各地发电设施之前，苏方均向奉天电业会社提出其自订的计划书，探问该设施拆卸到如此程度能否影响过去的供电，不言而喻，实际上被拆卸后不可能再

进行安全供电。

苏方在拆迁设施时，均由专门技术军官任指挥，多使役日本人进行有组织的拆卸，征用附近的木材加以包装，运送至其所控制下的大连、元山、清津、罗津各港口，或集中于哈尔滨再运往东西边境黑河等地，经由结冰的黑龙江用汽车运往对岸，但对其数量及品种难以做出正确报道。

。 本调查书，仅记述损失已判明的日本陆军直属工厂如南满航空厂、南满兵器制造厂、锦西燃料厂及南满燃料厂四个厂的情况，对损失不明的其他陆军直属工厂及仓库予以省略。

本来，在战争结束前，整个东北除农业外，伪满洲国政府和伪满铁路占整个经济的2/3，其余1/3属陆军所有，对其规模大体有所了解。本调查书只限于计算属于伪政府及伪满铁的数字。

。 此项调查以日美开战前的1941年（昭和16年，康德8年）前后的汇率换算成美元金额，主要可以掌握伪“满洲国”及伪满铁所属工矿资产的损失状况。各部门的损坏率在30%至100%之间，平均有50%—80%的设备遭受损害。当时“按中国方面的推定，满洲各种设施有40%被迁走，40%被拆卸，只剩下20%无损伤。”①

。 1946年12月13日，获悉鲍莱报告书详情后，张公权在其日记中写了如下感想：②

。 “鲍莱报告所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在满洲建设的此项庞大工业机构是日本经济一个很大的支柱。假如此项工业机构未被苏军摧毁，保留占领时期原样，假如中国国内维持了和平局面，此项满洲工业机构，与中国正在成长中的工业相结合，将可加速整个工业发展的步伐。何况具有大量生产能力的满洲基本工业，不仅可以充做日本赔偿中国战时的损失，同时也可以构成削弱日本战争能力的重要源泉。

① 《时事年鉴》昭和22年版，成田：《满洲瓦解始末记》第238页引文。

②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第776页。

如果如此，中国可以填补战败国日本经济造成的空白，降低日本的生产能力，促使日本成为和平的国家。’

以上说法，完全描绘出了欲负责管理东北经济工作的我个人的一个梦想。不过，如今这已处于绝望的阶段，不胜感慨。”

四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东北产业复兴计划

到1946年初夏，东北地区大致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4月5日，东北行营本部迁至沈阳，6月8日，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也于沈阳设本部、长春设立了分会，正式着手东北经济的重建工作。

以张公权为主任的经济委员会，当时面临两大课题，其一是整顿因种类繁多发行量大的纸币流通而导致崩溃的金融财政；其二是尽快接收因苏军占领与内战而被破坏、搁置的铁路以及工矿设施，制定相应的计划恢复生产。

经济委员会在制定、实行此项计划时采取的方针是，重视伪满时期在经济管理中处于中枢地位的日本人，积极利用并重视他们的意见。

为此在战争结束的同时，便开始了征用日本人的工作。苏军在接收伪满重工、伪满铁、伪满中央银行等主要部门时，强烈要求当时负责经营的日本旧职员的协助。以处于前述中苏合办工业公司核心地位的伪满重工为例，担任最后一任伪满重工总裁的高崎达之助的回忆，颇为意味深长：^①

“1945年11月8日，我被斯拉德柯夫斯基大校召见，前往其办事处原大兴公司大楼。他对我说，经与中方交涉的结果，为了筹备不久将成立的中苏合办的“中苏工业公司”（暂名），在这栋大楼内将设置办事处，因此接受了提出调查资料的命令。

调查的对象除钢铁、煤炭、矿山、轻金属、机械外，又说明也包括电力、化工、水泥、造纸、纺织、食品工业。但后来又

^① 《满洲终焉》，第240—241页。

告知，因轻工业由中方单独经营应予除外。于是从11月12日开始，便成立了总务班（主任奥村慎次）、煤炭班（主任前岛吴一）、机械班（主任武田俊彦）、化学班（主任足立长三）、水泥班（主任北林惣吉）、电气班（主任冈雄一郎）、钢铁班（主任梅根常三郎）、矿山班（主任大草正司）等机构，约有80名日本人分别担当不同职务。

然而，中国方面也以另外的途经命令进行同样的调查。为了对此提出同样的报告，乃委派前述八木闻一氏为主任，于中方活动的中央银行楼内设置办事处，整理有关钢铁、煤炭、机械工业、纺织、造纸、食品加工等调查报告。

斯拉德柯夫斯基说，与中方交涉设立合办公司即将达成协议，事实上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交涉似乎相当麻烦，无何进展。”

同样的活动，在伪满铁、伪中银有关人员中也存在。但在此阶段，除中苏对立之外，八路军方面有时也介入，结果三方面都争夺日本技术人员，以致不可能对东北经济的将来计划产生积极作用。东北南部地区，也是在1946年夏季以后，此类组织才实现一体化，在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始工作。张公权在整个工业及重化工业方面邀高崎达之助、八木闻一、石田芳穗（伪“满洲国”经济部兵器司）长，轻工业方面邀永井正夫（伪满洲纤维公社理事），铁道交通方面邀山崎元幹（伪满铁总裁），金融方面邀长谷川长治（伪中银理事）、森恒次郎（伪中银理事）等为顾问，试图投身于重建东北经济。

1946年8月，接受东北行营技术顾问重任的高崎达之助，组织过去的伪满重工技术人员约90人，于长春设立办事处，从事东北产业复兴计划。其所提出的基本构想，按高崎的记述大致如下。①

“1、产业复兴的第一步在于安定民生，首先应以调整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为目标。

① 《满洲终焉》，第311页以下。

2、为此，应优先复兴第一交通、第二煤炭工业及电力、第三钢铁业、第四机械工业。

3、这四项产业，当前可将收支计算置于第二位，应急速由国营企业加以推行之。

4、其他纺织、水泥、造纸、食品工业、化学工业，应下放给民间有能力的经营人员，通融一部分资金，以期发挥经营人员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优先发展的四个工业部门，由于苏军的拆迁及中共军的占据北部五省，到1946年10月，其可能利用的能力大略如表2所示。以表2为前提，做为应急复兴计划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包括以下各点的提案。（仅限优先发展四个部门，纤维、农产品等部门省略）^①

1、（铁道）

（1）确保实际运行机车700辆，客车800辆，货车10,000辆。

（2）为此，与其新造不如以维修现有车辆为重点，动员铁西、鞍山工场制定综合计划。

2、（煤炭）

1947年的月产量，抚顺13.3万吨、阜新12.3万吨、北票2.9万吨、本溪湖3.8万吨、西安7.5万吨、烟台1.4万吨，合计月产量41.2万吨为目标。

应排除万难，确保运输与资材。

3、（电力）

（1）丰满发电厂新补充7.5万瓩。

（2）阜新、抚顺等煤矿火力发电厂为使用二类煤炭，再补充10万至20万瓩设备。

4、（钢铁）

（1）开始以库存成品、半成品，供应民用必需，如铁丝、针、铁道用道钉、铁管、各种机械用铸件、锻件等。

^① 高崎：《满洲终焉》，第311页。

(2) 改变从矿石生产成品的一般工序, 采取焦炭炉—平炉—鼓风炉的工序着手恢复生产。

(3) 第一期复兴计划(1947年中完成), 暂以生产生铁20万吨、钢锭34万吨为目标。原煤由抚顺, 本溪湖供应, 电力自己发电1万瓩外, 由外部供应1.3万瓩。

5、(机械工业)

(1) 重点恢复民生必需的机械供应、交通、煤炭、电力部门的机械修理及车辆维修。

(2) 对政府各机关接收的工场, 制定综合计划。

(3) 蒐集、利用遗留的机械、资材及半成品。

上述由日本技术人员制定的计划方案, 究竟实际付诸实行到何种程度, 如今虽不了解, 但根据散见于《张公权文书》、《张公权日记》的记述推测, 自1946年12月左右开始, 已经缓慢地付诸实行。

另外, 上述工厂, 办事处, 于1946年5月末至7月末由“统一接收委员会”加以接收, 其后陆续委托给政府各机关管理。^①在工矿业办事处的管理方面, 应注意重化工业部门归中央直属的“资源委员会”统辖, 轻工业部门归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的下属单位东北生产管理局统辖。

五 东北产业复兴实际情况

1946年5、6月至1947年4、5月, 在政治、军事上虽可视为“相对稳定时期”, 但从经济复兴的点考察, 可将此短期间, 以1946年12月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复兴计划的制定、充实机构、筹备工作时期, 后期是正式着手产业复兴并取得一定进展时期。

现根据保存于《张公权文书》中的英文报告书, 东北行营经

^① 《张公权文书》第8盒中, 有此表《接收各事业单位分类表》。

表2

主要重工业部门保存的能力 (1946年10月)

部 门 \ 能 力	战争结束时	1946年10月	备 考
1、铁道			○战争结束前铁路总公里数中应属中长铁路约3,600公里, 其他为7,800公里, 1946年10月中长铁路为595公里, 交通部2,103公里。
(1) 公里	11,392.9公里	2,698.5公里	
(2) 机车 (总数)	2,403辆	808辆	
机车 (实运)	1,983辆	422辆	
(3) 客车 (总数)	3,049辆	658辆	
" " (实运)	—	404辆	
(4) 货车 (总数)	39,523辆	7,917辆	
" " (实运)	29,137辆	6,381辆	
2、煤炭 (月产)			○战争结束前全满主要煤矿除左列外, 尚有密山、溪城、南票、鹤岗、琿春、扎赉诺尔等, 煤产量2570万吨。
(1) 抚顺	380,000吨	100,000吨弱	
(2) 烟台	27,000吨	4,500吨弱	
(3) 本溪湖	80,000吨	5,000吨弱	
(4) 阜 新	366,000吨	50,000吨弱	
(5) 北 票	100,000吨	8,000吨弱	
(6) 西 安	170,000吨	36,000吨弱	
(7) 营城子	30,000吨	—	
(8) 合 计	1,153,000吨	203,000吨弱	
3、电力 (实发)			○战争结束前发电设备为170.8万瓩, 苏军拆迁设备后为65万瓩 (水力34万瓩, 火力31万瓩)
(1) 水丰 (水力)		140,000瓩	
(2) 丰满 (水力)		120,000瓩	
(3) 西安 (火力)		8,000瓩	
(4) 抚顺 (火力)		20,000瓩	
(5) 北票 (火力)		少 量	
(6) 鞍山 (火力)		少 量	

续表2

部 门 \ 能 力	战争结束时	1946年10月	备 考
(7) 合计		300,000吨	
4、钢铁(设备能力)			
(1) 生铁	252万吨	65万吨	
(2) 钢锭	133万吨	58万吨	
5、机械工业			
(1) 全设备投资额	10亿元	3.35亿元	

资料：高崎达之助：《满洲终焉》，第142和第311页以下各页；《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第777—780页。

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1946年5月至12月东北经济发展总结报告》，可以了解前期经济复兴的概要。^①本报告书一开始就列举1946年5月至12月的经济复兴指标，指出其实际成绩（参照表3），并就面临的课题记述如下：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负有恢复经济秩序与恢复各经济机构职能的两项任务。在后者当中，最主要的部门是交通运输、基于工业、金融机构及农业。

（交通）

战争结束以前，东北拥有4万辆货车，现残存约10%，不过4000辆。关内也需要大量补充车辆，美国的补给至少在两年内无可指望，因此，补充车辆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为打开这种局面，当前应尽快改善维修能力，并有效地利用库存品，谋求采取多方面配车的方针。

（基于工业）

东北的最主要产业是煤炭、钢铁、电力，这三个部门构

^① 《张公权文书》第9盒收集。

表3

东北经济复兴主要指标

部 门	指 标	实 际 数 额			指 数 (1946年5月=100)		备 考	
		1946年5月 (a)	1946年12月 (b)	1947年4月 (c)	(a) → (d) (d)	(d) → (c) (c)		
〔铁道〕								
通车里程 (公里)	935	3,159	3,097	338	331	○以1946 年11月代 替12月数 字		
旅客运送 (人)	794,641	2,153,716	3,008,091	271	379			
货物运送 (公吨)	186,143	538,406	715,101	289	384			
〔电信〕								
报话线路 (公里)	11,200	15,361	22,761	137	203			
局 所	38	85	93	224	245	○1946年 12月指数 为100		
电话用户	16,867	21,791	26,151	129	155			
市区电话 (区数)	25	21	79	140	527			
〔邮政〕								
邮 局	168	229	189	123	102			
代办所	645	292	639	45	99	○1946年 12月指数 为100		
通汇处所	145	129	148	81	102			
〔煤炭〕								
产量 (公吨)	172,054	385,119	434,545	224	253			
〔电力〕								
发电量 (瓩)	100,000	185,000	212,000	185	212	○1946年 12月指数 为100		
〔复兴工厂〕								
资源委员会		14	19		136			
东北生产管理局		59	80		136			
省市其他经营			84					
民营		(沈阳)180	879		488	○1946年 12月指数 为100		
〔农业〕								
耕种面积 (陌)		6367,480						

续表3

部 门	指 标	实 际 数 额			指 数 (1946年5月=100)		备 考
		1946年5月 (a)	1946年12月 (b)	1947年4月 (c)	(a)→(b) (d)	(a)→(c) (e)	
生产量(公吨)			6,896,903				
〔银行〕							○以1946年
行 数		43	102	125	237	291	7月代5月
存 款(亿元)		27.92	82.55	143.37	299	513	数字
贷 款(亿元)		3.00	14.20	76.04	473	2,535	
〔物价〕							○战争结束
主要物价指数							时指数为
	沈阳	407	837	2,461			100
" "	天津	1,803	3,751	8,481			
" "	上海	1,382	2,613	8,497			

资料：《一年来东北经济复兴进展表》（《张公权文书》第8盒）

成整个产业的基干。下半年度煤炭产量，计划提高至年产500万吨。鞍山及本溪钢铁厂的恢复，必须下最大努力。第一阶段可将现存的钢铁原材4—5万吨，最后加工成钢铁制成品，同时，预定修建具有年产20万吨能力的高炉。

（电力）

将现在的18万瓩提高至20万瓩。

（银行）

国营及商业银行，鼓励在各要地设分行、分理处。各县设县银行，目前正培训县行主要人员，预计明春开办第一家县行。

（农业）

从日本接收的农业试验场，预定最近开业，并已进口良种。整个东北预计形成协同组合及农业改良组网络，所需要

人员已培训完毕。振兴农产综合计划已制定完毕，预定最近召开的各省重建主任会议上进行研讨。（中略）

最后，由于主要机器被苏军拆迁，继而又遭共军的破坏，东北经济已丧失原有生产能力的六、七成。因此，恢复生产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艰苦奋斗过程，几乎完全与苏联着手实行第一个五计划时的情况相当。因此报纸应广泛宣传以下原则，希望国民把它为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接受下来。

（1）所有国民应毫无例外地少消费多劳动，将国家的资金和人力资源，集中到唯一的“生产”目标上去；（2）应充分尊重专门技术人员，不分国籍及关内关外，按政府需要登记，给予优惠待遇；（3）必须使经济开发计划合理切实可行。应从整个经济领域清除不切实际的计划，以及不必要的人力、原料浪费现象。”

报告书以后即“后期”的经济实际成绩，如表3所示。

从《张公权日记》中可以了解，进入1947年以来，政府机构正在进行整顿，如表3所示，铁道、通信、邮政等所谓社会资本及经济基础部门的复兴已初见端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较之中国关内（天津、上海）的物价上涨率，东北物价还算稳定。然而，由于各生产部门尚未开工，工厂复兴、扩大农业生产、促进物资交流仍然是急待解决的大课题。

无论如何，1947年春夏之交，东北经济理应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7年7月，拟定了“东北工业综合复兴五年计划”，有关其概况，可从《张公权文书》保存的一份计划表（表4）窥见其一斑。可是，为此留下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了。

六 终 结

1945年10月，张公权就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致

力于中苏交涉与东北复兴工作，1947年2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转任中央银行总裁，将主任职务让给关吉玉而离开了东北。2月27日，当告别沈阳时，张公权在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述。^①

“今告别东北，胸中感慨无量。去年11月（应为前年10月）前来东北赴任，曾怀有极大之抱负，甚望能以东北既有的工业丰富的资源，重建战后关内的经济，并期以此取代日本在亚洲所占的地位。然而，中苏交涉受挫，国共两军于四平街爆发战祸，一时被视为安定的东北，如今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共双方的战场。去年5月，蒋主席曾委嘱重回东北，自沈阳归任以来，终日忙于恢复运输，解决当地群众日用品供应。然而，中央发行的通货一再膨胀也波及东北，加之当地军需日愈繁忙，随之增发流通券，火上加油。此时虽不得不设法抑制物价，因千疮百孔，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国民政府政权所及之处，仅恢复生产已是难事，更谈不上新的建设。今赴中央就职之际，不胜忧愧交加，愧在担负东北经济工作16个月，一事无成，实无颜以对东北三千万同胞，忧在东北关系国家全局，万一东北没救，则国家全局亦将无可奈何了。”

张公权的忧虑，恰好为其后的历史所证明。

1947年春以来，中共军发起攻势，4月进入四平，将北自范家屯南至开原的铁路加以破坏，使长春陷于孤立。1948年，中共军发动的春季攻势更加激烈，先后攻占辽阳、鞍山、四平，入秋10月，攻陷长春、沈阳，10月26日国民政府军开始从整个东北撤退。

译自日本亚细亚经济研究所《中国东北地区经济调查报告》（1986年3月版），第2章。

刘晶辉译 赵连泰 校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第800—801页。

孙文与“满洲”问题

藤井昇三

前 言

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中日关系中，日本对所谓“满洲”的中国东北，一直存有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的野心。在九一八所谓“满洲事变”以后，它公开实行军事侵略，扶植傀儡国家“满洲国”。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满洲”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凶暴侵略的最主要对象。

本稿以说明下列诸点为目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文，是如何考虑中日关系中的“满洲”问题的？孙文对“满洲”问题的态度，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有过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它与孙文的反对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

我在1964年《国际政治》第26期上，曾以《孙文与“满洲”问题》^①为题发表过一篇论文。这篇文章，由于当时可供利用的资料缺乏（现在也还不能说十分充分），所以存在不适当或不正确的论述，有必要对其加以订正。

其中之一如下：

“在日本，屡有传说，孙文曾赞成将“满洲”割给日本（从而并联系到孙文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非常妥协的观点）。这种说法，一方面是从记有孙文持有此种想法的《东亚先觉志士记

^① 拙文《孙文与“满蒙”问题》，（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26期〔日本外交史的诸问题〕），第22—35页。中译为《孙中山与“满蒙”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第148—164页。

传》等书流传出来的；另方面则是从部分具有侵略思想的‘大亚洲主义者’幻想或试图建立‘满洲国’的精神基础上产生，他们希望革命家孙文也存在这种妥协思想。”^①

我的上述记述，应予订正如下：

“不仅根据《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等的传说，而且根据最近发现的可靠性较高的资料，认为孙文在革命运动初期，在“满洲”问题上确实有与日本妥协的事实。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文对“满洲”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个要订正的地方是：

“二次革命期间，三井财团的森恪征得元老桂太郎的同意，向孙文提出建议，即以割让‘满洲’给日本为条件，对处于军事上财政上劣势的革命军提供两个师团的武器装备和2000万日元现金，从而试图将日本方面所谓的‘收买满洲计划’付诸实施。……但结果‘收买满洲计划’并未实现。”^②

上述记述，是根据山浦贯一着《森恪》一书，但现已判明《森恪》^③的该处记述多系误记，故应按本中后述的森恪致益田孝的书简，予以订正。

一 从革命运动初期至辛亥革命时期

孙文在1895年最初的武装起义计划事前被发现，遭受挫折以后，开始亡命日本，其后到欧洲北美旅行，1897年再次访日，到1903年止一直居住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

第二次亡命日本期间的1898年，孙文在东京，与当时高唱对俄开战的大陆浪人内田良平初次会见。其时内田就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与日俄开战的必要性，作了如下叙述：“中国虽有革命之必

① 拙文《孙文与“满蒙”问题》，第22页。

② 同上，第23页。

③ 山浦贯一：《森恪》（高山书店，1943年），第402—403页。

要，但也必有革命之先决条件。先决条件即日俄开战，如日俄不开战则不能挫败俄国东侵的势力。如不能挫败俄国东侵势力，则恐它将乘革命动乱之机侵占中国领土。殷鉴不远，中日甲午战争之结果可见。回忆英法联军刚攻陷北京，而俄国则要割让乌苏里江一带之地。”^①

对此，孙文作了如下的答复：

“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收回俄国侵占之地，此事容易，不足忧也。何况有中日提携！”^②

孙文对领土问题的这种观点，是由于他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革命成功乃是比任何事情都更优先的先决条件，即使部分领土被俄国占夺，但如果革命派掌握政权，再加上与日本合作，那么，暂时失去的领土仍可容易收复。这里不仅表现出孙文对中国革命成功的强烈自信，而且，更稍为夸大点说，可以认为，孙文有着通过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推翻满清王朝，继而夺取政权来修改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不平等条约，恢复主权的极为乐观的列强观或对外观。而且，孙文这样的对中国革命成功的强烈自信与乐观的对外观，其后仍继续存在，经过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基本上持续下来。

其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方面，清朝政府在处理义和团问题上越来越失去其对内对外的威信；另一方面，革命派于1905年在东京通过革命三派的大联合成立了作为统一革命组织的中国同盟会。虽说接连的武装起义尝试均遭失败，但国内的政治状况已逐渐朝有利于革命派的方向发展。

1907年2月13日，内田良平与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会谈，伊藤告以从清朝庆亲王那里收到要求将孙文驱逐出日本的密函。对此，内田答以“自前年以来，孙文曾对我朝野人士反复陈说，如果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则将以满蒙让渡给日本，恐怕此种情报已送至

①② 内田良平：《硬石伍拾年谱内田良平自传》，（苇书店，1978年），第52页。

北京，故庆亲王方致此书于阅下。”^①

孙文其后谈到“满洲”问题，是1911年7月16日发给宗方小太郎的函件。孙文叙述如下：

“弟之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独惜近日吾国少年志士，每多误会贵国之经营满洲为不利于支那，此种輿情殊非将来两国之福也。弟每辩解，莫释疑团。”^②

在这封函件中，孙文对日本“经营满洲”是承认或肯定，是明确的。但是，孙文所说的“经营”所含内容，是意味着获得完全的主权呢，抑或是其他意思呢，则未必明确。

孙文正面谈关于“满洲”问题，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1912年初。

1911年10月10日开始的武昌起义扩大到全国范围，由于1912年1月1日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新的中华民国诞生。孙文等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因为财政窘迫与内部对立，通过北伐以覆灭清朝这件事出现了困难。这样，不得不由南北和谈会议予以妥协解决。

1912年2月3日，孙文与前来南京访问的三井物产社员森恪就“满洲”租借问题达成协议。除孙文与森恪之外，参加者还有病中的黄兴的代表、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与作为森恪日后必要情况的见证人宫崎滔天与山田纯三郎。森恪所以要宫崎与山田作为证人，原因是防备孙文日后变心。

在这次孙文与森恪的会谈中，森恪基于接受元老桂太郎旨意的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发来的密令，向孙文提出了租借“满洲”的建议。森对孙文提出的租借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保全满洲”对日本的安全与对东洋的和平是必要的。由于南京临时政府不能实现独力“保全满洲”，如果把满洲完全交给日本，日本作为其代价将予以“特殊援助”。如果有意执行，则

① 《硯石伍拾年譜內田良平自傳》，第52頁。

② 《宗方小太郎文書》（東京大學明治新聞雜誌文庫藏）。

希望孙文或黄兴前来日本与桂公会谈。日本可派遣军舰，接孙文直航九州的三池港，转特别列车赴京都。桂公从东京赴京都，与孙文会谈。^①

对森格的这个提议，孙文作了如下答复：

“《前略》不仅桂公有这种决心，我本人也久已苦心为支那、为黄色人种忧虑。为东洋和平计，自应坚持满洲保留于东洋人之手中。故当此次举事时，我等请求在发动之初置身日本，且希望日本援助我革命，为此作为代价将满洲完全交给日本，但日本官宪不许我入境，（中略）尤其是最近革命政府的财政穷乏到了极点，军队的供给已经没有财源，已达完全破产的境地。万一此数目内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则多数军队将离散，革命政府或将遭瓦解之命运。（中略）军队的穷困日逼，作为最后手段，即在军队离散之前，革命政府崩溃之先，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抑天下大乱，而后徐图军资供给，再行举事，以武力扫除北京方面，提出革新天下的方针。近来逐渐与北方频频开始议和，（中略）我等现犹以苦心对获得财源抱一线希望，若幸而此次得到足够资金防止军队离散，我等将延期在年后与袁和议，筹集更多资金，然后考虑实行当初计划坚持以武力扫除南北的异己分子，排除袁世凯，树立共和政体，完全斩断他日内争之根，从过去至今日的经历看，最终得到金钱已经无望，不幸而此5日至9日间，迄旧历新年前（旧历年末为2月17日——引者注）如无获得1500亿日元资金的希望，则万事皆休矣。在革命政府未倒之前，制敌机先，完成南北和议，则政权必将暂时落入袁世凯之手。政权一旦移到袁世凯手中，则今后必将顿时不断挑起事端，而与日本订立秘密条约殆将成为不可能之事。（中略）即已失去机会，万一桂公同意我等的心事，相信我等有意断然为日本推行其所

^① 1912年2月8日发，森格致益田孝书简（三井文库所藏《山井上候爵家交附书类》），又，这篇书简的全文介绍与解题，见拙文《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孙文关系资料——“满洲”问题森格书简——》（《亚细亚经济研究所所内资料》，1982年3月），第1—21页。

志，无论如何，为防止革命军队离散，需提供至急的现金，我等今日的情况，如有钱即可使军队安定，得到军队之信赖，军队问题得到解决，则按你所望，我与黄兴之中一人可赴日，与桂公相会，决定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大计。此事乃我等必须尽快决定之方针，若今犹有多少机会即应着手处理之先决问题。”^①

孙文的回答，是同意由日本提供资金，并将“满洲”租借给日本作为交换条件。对此，森恪回答说：“万一日本方面决意就满洲问题订立密约，立即给予援助，贷予军费，五日内如有内部通知，阁下应延长和议，处理完军队事宜，立即赴日本。”孙文答以“无论如何，如得到资金贷款，我将立即着手处理军队问题，处理完后，随即出发”，^②再次表示应诺。

森恪整理出这次会谈的中文大意，并经孙文、胡汉民删改后，森恪又译成密码电报，发给益田孝。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孙文与森恪合作的电稿内容如下：

“财政贫乏，中国新年前，如不能得到1500万日元，将不能进行战争，革命政府会陷于混乱。日本邮船会社与汉冶萍公司由招商局担保的500万日元债款成立（原文如此——译者），与英德美1000万日元债款在交涉中，若五日以内无希望成立此债款，则万事皆休，孙黄将与袁世凯缔结和议，将政权交给袁氏。孙文应允租借满洲，故日本为防止解散革命，应在汉冶萍公司500万日元之外立即借（原文如此——引者）1,000万日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孙文或黄兴则赴日本，处理满洲的秘密契约。如不能得到金钱，势恐军队解散、南京动摇。孙文如此答复。如愿坚决执行满洲之事，则应在四日以内来电答应借款1000万日元，以中止与袁世凯的和议。有要事明日赴上海。森。”^③

2月3日孙文与森恪会谈之后，孙文于2月5日打电报给森，催森去电日本方面要求回答，^④森于2月6日去电称“与袁世和

① 《森恪致益田孝书简》，第16—18页。

② 同上，第19页。

③④ 同上，第20页。

议延至9日止，故到期应有确切答复。”^①

所以，孙文以租借“满洲”为条件与森恪等的借款交涉是非常积极的，但由于得不到日本方面桂太郎、井上馨等的允诺，故孙文迫切希望尽快得到的1000万日元借款，结果未能实现。

二 二次革命后至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

其后，因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而流亡日本的孙文，开始准备发动打倒袁世凯的三次革命。孙文为获得财政军事援助而试图接触的有日本军部、实业家，民间人士等多方面人物。

从1915年底到1916年初，孙文在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住宅，与陆军总参谋长上原勇作进行了绝密会谈。这时，孙文对上原谈到，日本如能以至少三个师团的预备役官兵与武器装备协助中国革命，则以“满洲”的特殊权益让渡给日本，承认日本移民与开拓的优先权，但是，“满洲”是中国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②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后，北京政府的主导权掌握在段祺瑞等北洋军阀手中，1917年孙文等革命派集结广东，8月组织第一次广东军政府，从而开始了南北两政府对立的局面。孙文在9月10日就任军政府大元帅，9月15日会见了经犬养毅介绍前来广州的驻美日本记者及社会活动家河上清。

在这次会谈中，孙文谈及“满洲”问题如下：

“假如日本立即向我们贷款数百万美元，送来数艘船只的武器，我们将很容易把北京派打垮。”^③我取得政权之后，将乐于把满洲交给日本统治，“我们当然想把满洲保持在我们自己手中，

① 《森恪致益田孝书简》，第21页。

② 山中峰太郎：《实录亚细亚的爆光——三次革命的真相》（文艺春秋新社，1963年），第235—236页。

③ 卡尔·河上清：《日本与世界和平》（纽约，麦克米伦，1919），第126页。

但是，我们并不像你们日本那样需要满洲。我们同意你们急切需要一个能够容纳你们不断增长的人口的自由行动范围。”中国具有尚能大量容纳人口膨胀的亚洲南部的余地。数千万的大量中国人，过去或现在，都在前往苏门答腊、爪哇、西里伯斯、婆罗洲、海峡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暹罗和缅甸等地，他们每年可以将剩下的数百万美金汇回家乡。“这些南亚的广大地区，当然是亚洲人的，而且，对中国来说，是比满洲有更大希望和前景的地区。”①

在这次谈话中，孙文倡言“亚洲的复活”，并提出了“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在叙述亚细亚主义主张的同时，并表述了将来“满洲”可以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意思。这件事表示出，这个时期的孙文有着颇为强烈的亚细亚主义的志向；②同时，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已经达到完成期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未抱有足够的警惕心，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的现状与未来仍持乐观的态度。

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1918年11月16日，孙文接受了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的访问。孙文对松永谈到，现在的南北抗争是日本助长起来的，南方派对北方派打仗也就是与日本打仗，如果日本停止援助北方派，北方派将自行消灭。由于南方派不象北方派那样需要“满蒙”，所以如果日本援助南方派，孙文等南方派同意日本占有“满蒙”。③

从辛亥革命前到这个时期为止，孙文在“满洲”问题上曾向日本提出了承认租借权、让与特殊权益、给予移民和开拓优先权、委任统治权、承认“满蒙”占有权等各种各样的让步或妥协。孙文的这些言论，都是在革命运动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以日本方面提供援助为交换条件而提出来的。

① 卡尔·河上清：《孙逸仙的大亚洲主义，当代日本，日本事务评论》第4卷，第2期，1953年9月（东京，日本外交协会），第245页。

② 拙文《孙文的“亚细亚主义”》（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汲古书院，1985年），第413—438页。

③ 松永安左卫门：《支那我观》，（实业之日本社，1919年），第122—126页。

孙文指望中国革命成功，为使革命派夺取政权，在可能范围内不惜以各种手段，不断采取所谓“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态度，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使从日本取得了援助，达到了由革命派建立中央政府的目的，如果考虑为此而必须付出丧失主权的高昂代价，从长远的观点看，应该说这对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是极其危险的赌博。

三 1919年以后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孙文的对日态度起了很大变化，6月，他称呼日本军部为帝国主义，开始对它进行公开批判。这表明孙文改变了历来对日本的依存态度，直至向日本，主要是向日本国民要求理解与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可以说，在孙文的反帝国主义路线中，开始了一个转变。从此以后，孙文对“满洲”问题的态度，也从迄1918年为止的妥协态度转变为基本上不妥协的态度。

在1912年11月开始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孙文等的广东政府方面在12月7日向列强代表团致送的要求内容中，包含了：“废除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中日条约和换文，并将南满与北满各铁路收为中国的国有财产”的要求。^①这意味着，孙文已经要求日本放弃在南满既得利益的重要部分。

此外，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的1923年5月，在与来访的鹤见祐辅的谈话中，孙文讲到，日本过去20年来的对华政策都是失败的，即使日本停止援助北京政府，从“满洲”撤退，不论日本施行什么政策，中国人都将以深深疑惑的眼光注视着。^②

1924年11月，孙文北上途中，在神户停留之际，于25、26两

^① 《中国评论》（纽约，1921年12月）第1卷第6期，第342页。

^② 鹤见祐辅：《广东大本营的孙文》，载《改造》（1923年7月号），第122—133页。

日与民间右翼巨头头山满进行了会谈。当时，对头山询问关于“满洲”既得权益之事，孙文回答说，目前尚无收回大连旅顺的要求，也未考虑日本放弃“满蒙”既得权益问题，仅希望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一切列强收回关税自主权与废除领事裁判权二项。^①

进而在11月29日，孙文在神户会见了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日本编年史》记者，谈到“日本在满洲的既得权益与香港、澳门的地位相同，目前尚未考虑要求它们归还。所有列强，应以苏俄为先例，归还中国主权，日本与其他列强相比没有特殊待遇。”^②

如上所述，孙文在1919年以后，有关“满洲”问题，基本上没有显示妥协的态度。1921年12月后更加明确化。必须注意的是，孙文对“满洲”问题态度的这种转变，是与孙文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从基本形成，到其完成，是同时期开始的。也就是说，孙文在1919年6月以后，开始了从正面批判日本帝国主义，进而到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之际第一次公开要求帝国主义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

还有，孙文关于“满洲”问题态度的转变，也是孙文的亚细亚主义发生质变的时期，须知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③

结 语

孙文在“满洲”问题上的态度，从革命运动初期到1918年止，对日本是妥协的。考虑一下其理由，第一，是为获得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判明有必要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或“满蒙”的统治权极为强烈的野心；第二，对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的

① 1924年11月27日《东京朝日新闻》。头山满：《孙文。蒋介石。汪精卫》（《改造》1940年5月号），第363页。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1935年，第769页。

② 《日本编年史》，神户，1924年12月2日。

③ 拙文《孙文的“亚细亚主义”》，上引书，第421—438页。

中国来说，可以认为保持“满洲”未必是绝对必要的；第三，对形成过程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尚不十分充分，过低估计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性；第四，孙文认为，即使将“满洲”或“满蒙”暂时置于日本统治之下，但将来若革命成功，革命派控制了统一的中央政府，则自信并乐观地预见可以收回“满洲”的主权乃至统治权。

在直至1918年左右的时期里，孙文关于“满洲”问题的对日本的妥协态度，以及孙文的以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为中心的反帝认识尚未明确，是与孙文对外认识尚未形成核心紧密相关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与以黄白人种斗争观及中日提携论为中心的孙文的大亚细亚思想密切相关。但是，1919年以后，一方面，孙文的反帝认识，在他开始公开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孙文的亚细亚主义，伴随着其重要构成要素的黄白人种斗争观与中日提携论实质上的开始崩溃，而开始了根本的质变，因而孙文对“满洲”问题的态度也起了根本转变，否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直至提出日本应从“满洲”撤退等项主张。

但是，孙文等人充分明白，日本方面官民绝对不会放弃在“满洲”的权益，作为现实问题，要想过早地收回日本在“满洲”的既得权益，是非常困难的。1924年11月孙文最后访日之际，曾表示目前尚不要求日本归还“满蒙”的既得权益，鉴于日本方面狂热的宣传将在“满洲”保持既得权益看作理所当然的精神状态，他判断急于解决“满洲”问题为不得策，故考虑徐图设法转变日本国内舆论，将此事作为悬案留下来，待将来予以根本解决。

译自1986年11月5日至9日“孙中山
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修订稿。

李吉奎 译 马宁 校

中国人民的领袖孙中山

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失去了自己的优秀儿子。唤醒中国人民的革命旗手孙中山与世长辞！受尽灾难、业已觉醒的中国广大民众，无不为之深切哀痛。一度赞誉孙中山为伟大改革家的资本主义报界，却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他是空想家，是晚年受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空想家。可是，苏联无产阶级及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把他视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他告别。孙中山根据他40年的革命经验懂得，要拯救东方各族人民，只有与革命无产阶级结为联盟。不久前，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因列宁逝世而和我们一样深感悲痛。这一事实证明，孙中山不是孤独的，中国各界广大民众已经懂得，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盟友。因此，我们得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深为震惊。我们垂下共产国际的旗帜，以表哀悼，我们和战斗中的中国人民一道，为失去他而悲痛。我们要象中国革命分子力图了解列宁象征着什么，代表什么阶级力量那样，研究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孙中山的生平和著作，以实现列宁的遗愿：竭力使战斗中的国际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族人民联合起来。

国际资本的侵入中国和变法的尝试

孙中山是贫民的儿子，1866年出生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中山县。在他出生前3年，正值英国侵略军军官戈登统领“常胜军”，

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孙中山降临人世时，战火仍在燃烧，零星的起义部队仍在进行战斗。其时，中国已屈辱于外国资本，听任其摆布。只是欧洲不久出现经济萧条现象，中国才未被迅速瓜分。资本主义掠夺者在中国到处抢劫财富，研究中国的资源和习俗，选择以后进攻的目标。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在中国日渐扎根，当时他们还只占据沿海城市。清廷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深为不安。在人民群众中间笼罩着消极悲观的情绪。民众已丧失信心，不认为凭借自身力量能摆脱外国霸权势力的压迫和清廷的统治，而清廷已把国力耗尽。法国人和英国人从南方，日本人从北方步步进逼。然而，在那些洞察国际形势，目睹国家日渐衰落的有识之士中间，产生了只有维新才能救国的思想。1888年，康有为首次上书清帝。他在奏折中指出，中国官员庸碌无为，国家被瓜分豆剖。他写道：“当今进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他列举日本的维新并宣称，只有走变法兴治之路才能救中国，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这三个政治主张。康有为的奏折遭宫中检查机关的阻挠，未能送到皇帝手中；他的变革思想被视为异端邪说。不久，中日交战，中国不仅大败，且把清帝国的衰弱无力暴露于世。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此，来京应试的举人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1895年5月29日，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光绪帝，要求变革中国政制。在奏折中，他建议发展当代工商业、鼓励中国工商业，要求确立保护关税制度，振兴农务。清廷检查机关迫于战争失利，便把这一奏折递到了光绪手里。光绪帝立即命令誊抄分送各省督抚，以便他们实施变革；他想亲自召见康有为，结果受阻，因康无相应的官职。但康有为已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有权接连不断地呈递奏折，向清帝痛陈国家危亡之情。他指出，沙俄和日本威胁中国北方，法国威胁南方，德国强占胶州湾。只有组建现代化军队才能救中国。光绪帝把康有为当作自己的谋士，急切实施维新。于是，光绪颁布的变法诏

令由宫廷很快送达各省，命令办报馆，兴学堂，改组军队。这次自上而下的变法尝试仅仅持续100天。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将年轻的光绪帝幽禁于瀛台，信仰康有为学说的光绪帝病死于此。历史又一次证明，统治阶级不可能自行变革，没有民众的压力，它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政权。康有为逃往国外，而中国作为官僚的牺牲品，作为外国资本的牺牲品，进一步衰败。慈禧太后看到人民群众的不满日渐增长，为把矛头引向外国人，便资助义和团运动。结果，义和团运动遭到八国联军惨无人道的镇压。20世纪是以外国列强瓜分中国为开端的。19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经济高涨，驱使英、美、法寻找新的市场。沙俄唯恐落后，急忙占领朝鲜和满洲，一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终于爆发。很显然，中国已无力自救。

孙 中 山 和 以 革 命 暴 动 救 国 的 尝 试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南方，非但出现了改革家康有为，还有革命家孙中山。孙中山早年读过私塾，后赴香港，在一所英国人开办的西医书院攻读医学。年轻而富有同情心的孙中山，怀有一颗炽烈的爱国心，不满足于研究科学，经常考察周围的一切，思考祖国的命运。太平天国人民起义使他大失所望。没有文化的中国人民，怎样与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欧洲列强进行斗争呢？他认为，首要的，是应当让人民有机会提高文化，学习科学，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与文明的西方人平起平坐。可是，怎样解救中国民众呢？他不相信掌管朝政的旧官僚所采用的变革方法能拯救中国。他坚持认为，应当推翻清王朝，因为这是野蛮的满人的朝廷，他们于16世纪侵占了中国。他主张暴动，但他的好友中只有3人愿跟他走这一冒险道路。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创立兴中会，在军队中进行宣传，购置军械，策划暴动。不料事泄失败，1895年9月9日战友陆皓东惨遭杀害，孙中山被迫逃亡国外。

孙中山漫游日本、英属殖民地、美国和英国，潜心研读学术著作，结交在国外留学的中国青年和旅外华商，仔细考察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幸福掩盖着人民群众的穷困。他本人出身贫寒，对人民群众的疾苦颇为关注。因而他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但他认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为时过早，因为中国没有无产阶级。他认为，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理想的国家制度。但要实现这种理想制度必须进行暴动，首先是武装暴动。康有为的经验教训使他彻底放弃了在清廷统治下进行和平变法的想法。靠谁来革命呢？只有靠懂得民主、革新的年青一代才能完成革命。只有靠大学生和青年军人，因为青年军人研究军事并懂得不与旧制度决裂就难以拯救中国。于是，孙中山把受其宣传影响的留学生派往国内，且力图与当地驻军建立联系，来往于各城市之间，进行宣传鼓动。他十分了解国际形势，寻找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着手在日本建立种种关系，指望在日本找到帮助，因为日本本身也是通过国内的彻底变革才摆脱外国资本的。他在日本，甚至在日本政界中找到了一定的支持，在美国，也得到了某些人士的支持。美国在经济上相当强大，不怕其他列强的竞争，当时它反对瓜分中国，主张“门户开放”政策，即主张外国在华资本权利均等。

孙中山及其战友们的工作在军队中获得了成功。他们象十二月党人首先在青年军官中得到响应那样，在受过欧式教育的部分中国青年军官中得到了响应。青年军官了解威胁中国的危险，纷纷投入革命阵营。国家财政崩溃，连年灾荒，这引起了军队的骚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声势迅速扩大，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孙中山急忙由美国经伦敦归国。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后即清王朝被推翻后，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在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但孙中山的胜利竟然是他的全面失败。清王朝虽被推翻，但它赖以存在的整个统治机构、各省官僚和军队将领原封未动，因为这仅仅

是军队起义，人民群众只是开始参加运动。在参议院中只是得到知识分子的响应。不以贷款支持腐朽的清廷的外国列强，也不给孙中山贷款，它们害怕中国经过彻底改造后会强大起来，害怕中国革命会影响印度、法属亚洲殖民地，认为中国革命本身就是受俄国革命影响的可怕例证。于是，国际资本与中国的官僚、将领们联合了起来。袁世凯是这一联盟的代表人物。当时，孙中山无任何实力与袁世凯相抗衡，不得不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袁世凯。武装暴动曾以足够的力量摧毁了腐朽透顶的清王朝，但无力涤除全国的反动势力，除尽腐蚀国家肌体的寄生虫。外国列强相继向袁世凯贷款。

从武装暴动到人民起义

孙中山再度流亡国外，开始他沉痛思考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把德国从中国领土上驱走，占领山东，企图进一步占领整个中国。欧洲帝国主义强盗忙于欧战；美国刚刚建立强大的海军和陆军，无力对抗日本在华的扩张势力，于是，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大使石井在华盛顿交换照会，即所谓“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这样一来，日本掐住了中国的咽喉，提出所谓“二十一条”要求。而孙中山只是进行宣传，仅与中国南方保持着联系，未能找到出路。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对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孙看到，在俄国大地上，一支敌视世界帝国主义的力量已经出现。他密切关注来自俄国的消息。苏维埃俄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激发无穷的力量，苦战两年半，终于战胜了协约国。他坚定地认为：他从俄国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盟友。

最初，苏维埃俄国对孙中山来说只是表面上的盟友。他还不明白俄国革命力量的源泉所在。他在南方即广州取得政权后，并没有联系人民群众，而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他只是一位伟大的

爱国者，争取中国独立的卫士。他总是幻想通过外交途径、军事讨伐来解放中国，以为在他取胜后，外国列强为避免战争会放弃瓜分中国的野心，会给予他以经济援助。红军战胜了高尔察克，这等于摧毁了横在中苏之间的壁垒。更为确切的消息从俄国接连不断地传到中国，俄国革命者纷纷前往中国，中国人也来到俄国。孙中山日以继夜地学习。他发现他所依靠的是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改革的广州商人，可是离开了他们就难以成为民族革命的领袖。而中国离开民族革命就无法铲除军阀势力，军阀们在推翻满清后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国家处于各省自治的局面。鉴于这一情况，孙中山渴求与苏俄结盟，他认为这种结盟不局限于政治和军事的联合，于是，他投入工人（在中国，如果指工厂工人的话，现在只有300万）运动，发动农民。工农运动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开始组织起来，在广州武装反对孙中山。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调动革命军队对付资产阶级。他不仅在广州，而且在全国各地着手组织人民力量，但遭到了党内某些反对组织人民革命的人的抵制。当时，孙中山已下定决心。英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分裂党的任何威胁都没有阻止住他，他选定了自己的道路，尽管这是异常艰难的道路。他沿着这一道路勇往直前，直至他离开人间。

孙中山的遗产

我们认为，业已载入史册的孙中山的一生，是世界上伟大人民觉醒的崇高象征。我们面临着孙中山所开创而未竟的伟大事业。被孙中山唤醒的中国工农、劳动知识分子正在完成这一事业，他们把孙视为自己的导师。孙的一生的伟大，就在于始终奋勇向前，失败了重新站起来，总结经验教训，学习新鲜事物。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已不是当年太平天国那种情景。太平天国起义所以遭到镇压，是因为它未能得到欧洲工人群众的任何支持。而

今，中国革命运动已得到俄国革命和日益壮大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有力支持。欧洲帝国主义已不可能征服革命的中国，因为他们害怕本国发生动盪。中国自身的力量当前大大增长。外国资本现在要控制中国，就得动用数以百万计的兵力。所以，孙中山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中国人民还会遇到难以计数的灾难，中国革命者还应更多地学会寻找中国人民群众的支持，孙中山所播下的革命种子不会死亡，而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早在1916年，即世界大战正炽烈进行的时候，在伯尔尼召开的一次小型布尔什维克会议上，在讨论民族自决问题时，列宁提出了关于俄国革命武装力量与未来中国革命统一行动的思想。这是美好的设想。其他布尔什维克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俄国无产阶级将和千百万中国民众共同战斗！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我们应当等待实现这一设想的时刻到来。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社会革命党人和高尔察克把我们和中国阻隔开，彼此无法往来。当时列宁就向大家征求意见：能不能从流落俄国作苦工的、由于十月革命而觉醒的中国工人中挑选一些勇敢者，前往中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现在，我们与中国人民群众的联系已经建立。我们和中国革命者的任务是，务必使这种联系扩大为俄中两国千百万民众之间的联系。届时，世界无产阶级将会取得完全的胜利。现在，我们向孙中山告别，我们可以坚定地宣布：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一定会实现。

列宁最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之一，是把欧洲无产阶级与东方被压迫各族人民的结盟视为阿基米德定律，即革命力量愈联合则革命愈易成功，遵循这一定律就能使世界推向前进。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中国人民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孙中山是东方人民最伟大的领袖，他懂得列宁的这一思想并付诸实现。这使他在众多非常伟大的历史人物中占有荣誉的席位，永远铭记在所有被压迫人民的心里。

节译自《真理报》1925年8月14日

吴永清 译

宋教仁和同盟会资料

迟云飞译注

译者按：这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的原日本外务省政务局文件，由林增平教授访问日本时搜集。第一部分反映了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同盟会的情况。第二部分记述了1910年底1911年初宋教仁回国筹款及以后任《民立报》主笔的情况。文件中有确切的日期，可补中文材料的不足，记述也相当详细，且有宋教仁等人的谈话、信件，有重要价值。原文均为近代文语（文言文），书信为候文（一种旧式书信文体）。除书信外，均译为现代白话文，并酌加注释。其中各篇标题均为原有的。

清国革命党员及留学生动态

1908年11月17日

前已就清国革命党及留学生对清帝及西太后去世的反应作了报告。其后得到的情报如下：

革命党员章炳麟、黄兴、宋教仁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宫崎虎藏^①、平山周等人，尚未采取任何行动。

如前次所述，革命党员无不财政困难，毫无余资。因此，尽管他们遇到了如此好的活动机会，却连派人和孙中山商议都做不到，以至难以采取积极行动。目前只是在观望形势。

^① 宫崎寅藏原名宫崎虎藏。

平山周声称不日将往他处旅行。平山近日在同人中失去声望，势成孤立，曾试图恢复他的形像，但毫无进展，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目前正设法把一种印刷品强行推销给有关方面，预备把此项资金作为旅费，到手之后，马上出发。其目的没有告诉任何人，别人也无从得知。〔要之，由于前述状况，从乘此机会，让孙逸仙起事来考虑，平山不是要依靠孙而到新加坡，就是去设法筹款。孙逸仙目前注意云南的一个地方。〕^① 机会虽好，但资金毫无，因此，除了利用法国或英国或我国（指日本——译者）的外交关系得到援助，否则难以有所作为。

又，留学生中，官费生只关心今后能否继续留学，虽然在互相熟悉的人来往的时候略见不安之色，但尚未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

此外，观察该国此次政治变动，一般反应冷淡，只是谈论皇帝的崩逝是被毒杀还是病歿。未见混乱。

清国革命党员的其他谈话

1908年11月23日

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说：

此次事变（指光绪和慈禧去世——译者）发生前，孙逸仙从新加坡出发，曾经得到通知。但是去什么地方，其后没有得到消息。因此，不知道他现在的住处，不过近日也许会弄清楚。

章炳麟不通社会大势，采取过激行动，但如他的檄文（张贴在早稻田大学清国学生部入口），声称是在《民报》社印刷，行文拙劣，而且有意思不通之处，可以证明不是章写的。^①

^① 括内号原件字迹不太清晰，暂按此译。

^② 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下令禁止发行《民报》第24号，并禁止《民报》以后刊载革命言论。《民报》因此停刊。章太炎曾三次致书日本内务大臣表示抗议，措辞激烈，又曾散发油印传单《请看东胡、倭奴封《民报》之恶劣手段》，并于11月13日早晨贴在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入口处。当时黄兴、宋教仁都在日本，为争取日本人民和朝野人士的同情，他们不同意章太炎的做法。

此次事变，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失望了。不过，他们是由于触怒西太后而流亡的，现在西太后已死，他们也许会被清廷召回。但是康派与革命党是不容易接近的，即使将来接近了，也除非是康派投降革命党之时。

象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到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革命党认为，章炳麟采取那样的行动，会失去日本朝野的同情，因此我们认为最好是让章离开日本。

革命党可以在中国北方起事。所以，为研究中国北方的情况，上年我和张继等人曾到该地秘密旅行。^①不过，在中国北方发起革命，是革命党的秘密。

一个有革命思想的清国人对他的亲密朋友的谈话

1908年11月23日

我虽不是革命党，但抱有革命思想。目前在东京的革命党领袖章炳麟、宋教仁、黄兴等人，与我有最亲密的交往。关于革命党人的状况以及清国国情的真相，可以断言，即使本国人也没有完全了解的，何况外国人呢？据我的观察，所谓革命党，如果脱离了表面来看，就是政府党；而政府党，如果脱离了表面来看，也就是革命党。目前在日本的革命党员或拥护其主义的，无不经过五、六次改换姓名，有的甚至十余次改变姓名。这有什么必要呢？原来，按不同的姓名，可以分别成为革命党和政府党。倘若别国人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不胜惊讶，但这确实是清国目前的状况。

不论居住在国内还是国外的清国革命党人都是信赖日本的。例如对于广东、香港等地的抵制日货问题，他们或以个人或

^① 张继1906年去过东北，宋教仁1907年去过东北。见张继《回忆录》和《宋教仁日记》。

以团体的名义致书彼地，私下或公开地为事态的平息而施加影响。但是日本政府的方针如何呢？清国革命党人就不用说了，视留学生为蛇蝎，停止《民报》、《衡报》、《四川》等发行。^①《民报》和《四川》目前正在审理中，不管结果如何，《民报》已决定到新加坡，《四川》已决定到上海发行。

革命党不会因日本政府的压迫而改变宗旨。倘若今后日本政府进一步施加压迫，那么，即使离开日本，对于革命党来说，也无关痛痒。革命党员都是忧国志士。如果清国的将来由于革命而发展、进步且依赖革命来维持的话，那么，必须承认，革命实为目前清国必不可少的急务。今天的革命党员将来必位居要职，主持国政。对于日本现在对待革命党的政策，我深为疑惑。

《民报》及其他杂志的停刊，是宪政考察大臣李家驹及唐绍仪向日本政府请託的结果。但是，革命党人大为激愤。企图加害上述两人的说法，可以说，实在是出于想像。假使革命党对他们加以危害，对革命事业有什么益处呢？倘若如此轻举妄动，会造成将来的一大困难。这一点，即使三岁童子也清楚。

孙逸仙现在在新加坡，由于资金缺乏，在时机到来之前难以有所活动。另外，张继到北京的说法也是虚传。张仍然在巴黎苦读，并加入无政府主义团体。

清国革命党员的谈话

1908年11月27日

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作了如下谈话：

我们革命党谋求中国政治的根本改善。为达到这一目的，革命是必须的。因此，我们努力宣传，大声疾呼。目前在北京设立本部的宪政公会试图推行立宪政体，为政治的改善进行活动。但

^① 《衡报》，是继《天义报》的无政府主义刊物，1908年4月由刘师培创办，10月出版至第11号，日本政府禁止发行；《四川》是四川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创办的刊物，1908年1月创刊，只出3号；到1908年秋被日本政府查禁。

是，他们缺少伟大人物，可以称为领袖的也不过是杨度一类的人物，不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

宪政公会的主张亦即其目的，是革新中国弊政，与我们革命的主张只有急渐之差，因此，两者的关系也不太隔阂。反之，同样亡命的康有为以及梁启超则图谋扩张皇权。比如他们组织的保皇会，不仅宗旨和目的与我们革命党完全不能一致，而且互相敌视。

清帝及西太后之死，对于我们革命党来说，确实是千载一遇的好机会。但是既然已经册立了新皇帝，我国革命党人可以利用的机会已经失去。然而以九年为期施行立宪政治的诏勅，难保不反古。所以，我们必须一力宣传革命，寻求根本的革新弊政的手段。

附言^①：听说袁世凯计划收买宋教仁。上月中旬，曾派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会见宋教仁进行交谈，但宋没有允诺，拒绝了。^②

二

关于宋教仁的行动

1911年1月4日

上年腊月31日（1910年12月31日）午后3时许，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从住处出发。他在新宿（东京地名——译者）火车站上车，声称是去神户旅行。由于黄兴没有汇款，宋非常拮据，甚至不能交付寒香园（宋教仁的住处——译者）200元左右的帐款。因此，宋曾流露出黄兴不体贴困难的怨言。此次出游，据说是为了避开贺年的客人，同时筹措款项。

火车途中，宋向住所（指寒香园——译者）寄了一封“请邮

^① 这是向外务省作报报告的人加的附言。

^② 为保卫祖国领土，宋教仁著成《间岛问题》一书，当时任外务部尚书的世凯得此书后，准备调宋教仁参加对日谈判，并借此收买宋教仁，但因故未成。宋曾致信驻日公使李家驹、胡惟德，说明原委。参见杨天石：《宋教仁佚文钩沉》，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一封‘4日到’的信给清国上海蓬路虎家中崎政次”内容的信，因此，昨天即3日，在住所已经用挂号的包裹把它邮出了。

出发时携带正在翻译的原稿三册，或许是为把这些书稿交付上海书肆而到该地旅行的。预定本月十七、八日左右回来。

关于宋教仁

1911年1月10日

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上年腊月31日突然向神户出发的事，本月4日已经报告。宋果然从该地赴上海。现正调查其旅行的目的。

作为黄兴离日后在日清国革命党首脑的宋负责一切事务。从各地来的书信并不寄到他的住所淀桥町寒香园，而是先发 to 居住在千駄谷町8—2—8的他的好友、公司职员串户真佐树（波多野兼五郎之弟）处，再由串户携带直接交宋。仅仅作为在日本的革命党的中心，宋就需要种种费用，而且去年孙中山来日时的费用全由宋负担，自然负债不少。目前所借最多的，是牛込区内的高利贷者姓冢本的，约4000元。上年除夕，已到了得不到600元左右现金就过不了关的境地。因此，筹款应是这次到上海旅行的目的。宋曾为筹措旅费而奔走，但没有得到资金。最后，串户不忍看其窘状，借给他300元。有这笔钱作旅费，宋才得以到上海旅行。

宋一到上海，就去前已报告的蓬路虎家投宿。他卖了携带的原稿，同时会见曾为端方秘书官的上海《民声》^①记者孟某等人，进行了种种策划。

宋曾对串户真佐树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象对革命运动绝望那样，还听说资政院议决给予康有为及梁启超一派亡命者以特赦。不久他们将得到此项恩

^① “民”字模糊不清，疑即《民声丛报》，1910年5月由陈其美、陈匡创办，目前仅能见到两期。

典。另外，到宣传五年召开国会时，不知道我们革命党是否会被特赦。

宋回日本的时间如前次报告，预定在十七、八日。

关于清国革命党员

1911年1月22日

宋教仁（改名桃原次郎^①）现住在上海敬武公司。10日在上海寄给本地（指东京——译者）友人一封信。信中说，归来时会在长崎拍电报，到京（东京）是在3月4日或5日左右。

关于清国革命党员

1911年2月16日

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原预定本月三、四日从上海回来。由于清国人年末岁始之际要聚会，而在筹款方面并不如意，因此靠串户真佐树的帮助到了上海。一到上海，就派罗某（原端方秘书官——原注）到广州，调查牛皮等的价格以及向我国（日本）输出的情况，需费时日，其结果，自然拖延了归期，本月末或下月上旬会从上海出发。现住上海松本旅馆。

清国革命党员的行动

1911年3月21日

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仍住在上海法租界，与在东京的好友串户真佐树时常通信。宋滞留上海的原因，是要把湖南省黄州产的锑卖给伦敦尼克尔斯辛迪加^②，已与该公司的分公司物町区八重洲町一丁目一番地的基尔商业公司缔结特约^③，该商会的负责人

① 这是尚未见过的宋教仁用的名字。

② 按湖南省无“黄州”。湖南盛产锑的今邵阳地区冷水江市锡矿出，清代属宝庆府新化县。

③ 丁目，街以下的区划单位，相当于条或弄。番地，门牌号。又，“基尔”按日文音译。

姓西尾的也已赴上海。宋回东京的时间未定。

关于清国革命党员

1911年4月13日

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目前在上海法租界《民立报》社兼任总编辑。但主要是为把湖南省黄州产的锑卖给麴町区八重洲町的基尔商业公司。目前正在洽谈、奔走。锑的所有者张镇衡曾经约定出售，但是又让南京的报纸刊载锑每吨涨价约10两的消息，要求增价6两。已经到中国的商业公司负责人西尾丈次郎愤张之卑劣，于上月19日从上海出发回东京，张极为狼狈。同月22日，由宋教仁署名，委托友人串户真佐树帮助恢复商谈。最近串户与西尾交涉之后回信说，寄到上海通义银行或汉口江西银行的担保后，西尾到上海，次日到矿物存放地考察后，再完成洽谈。^①

另外，宋在信中说，在洽谈没有完成时，他不能回日本。

关于清国革命党员

1911年6月6日

在香港的宋教仁于上月24日发出的致本地（东京）友人串户真佐树的信已经收到。信中说，次日即25日从香港出发赴上海。在上海的住所仍为从前的同一个中国日报社。^②

① 关于宋教仁等人利用新化锑矿筹款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革命先烈传记》中的宋教仁一节记述，在日本议组织中部同盟会后，“当时教仁并提议，湘省新化锑矿最多，由他与日人交涉，全数售与日本商人，博取手续费应用。其中每100两银，可得手续费5两，是每年可得手续费一百数十万两，即以此办理长江机关进行事项。众以为矿商多是邹家亲友，遂推永成、镇衡返国组织广惠矿务公司，以便内外接洽，又由人凤去香港，向诸同志传述。可是到时，黄兴、赵声已准备再攻粤垣，就不及实行。”《邹永成回忆录》说，1910年在东京议定组织“中部同盟会”作策动机关，只因没有经费，便由邹代藩献策公推宋教仁向日本交涉，把新化的锑矿专卖权卖给日本，公推我和张斗枢回新化与矿商接洽。我们回国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广惠矿务公司，交张斗枢主持，……我回到了新化已是庚戌年的除夕了。”（《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3页）。

② 1911年4月，宋教仁应黄兴之召赴香港策划黄花岗起义，这个文件记载了宋返回上海的日期。

清国革命党的动态

1911年6月14日

清国革命党领袖宋教仁现住上海三洋泾桥《民立报》馆。近日给本地（日本——译者）债权人寄来如下的信。

以上密报谨供参考①

拜启：

前者先生道经上海，未尽地主之礼招待，失礼之甚。前日华函已拜读，知先生已平安抵东京。当此初秋残暑之际，愿先生更加康健。托先生之福，敝人目下平安无事，消磨时光而已，请勿挂念。赴日之事，因事耽延，九、十日或可成行。前事一日不完②，一日难忘。今有诸种计划，不拘多少，筹到即以报命。尚望谅解。谨先复。

桃原

① 以下是宋教仁的信，全用日语候文写成。

② 指宋教仁欠收信人款事。

黄兴同俄国驻汉口领事馆秘书

沃兹涅先斯基的谈话

(1912年6月8日下午1时至4时)

译者按：本文译自《辛亥革命文件资料集》（莫斯科，1968年）。关于黄兴与沃兹涅先斯基（А·Вознесенский）的谈话，在《黄兴集》中载有译自贝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一书的几段记录摘要，所注日期（1912年6月21日）和谈话地点（上海）均误，且把一次谈话误为两次。现在译出的谈话记录全文，不仅可以订正上述舛误，而且可以让读者了解黄兴对当时中国国情和一些重要事件的精辟见解，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史和黄兴思想颇有价值。原标题为《汉口领事馆秘书А·沃兹涅先斯基关于同黄兴谈话的报告：同南京留守将军黄兴的谈话》，材料出自《俄国外交档案》，中国档，第357卷。这里的标题是译者所拟。为了保持译文的一致性，我们利用了《黄兴集》中的部分译文，谨向原译者致谢。朱福枝同志参加了部分初译工作，一并致谢。

1. 问：将军，尽管您很操劳却精力充沛。

答：不，我很累了。形势在不断地恶化并且非常混乱。对时局的严重性谁也不清楚，而随时都会有动乱发生，特别是在北方。我的安抚南方的任务是不轻的。最近以来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做，致使我未能安睡一晚，连愉快地接待外国人、记者甚至领事的机会也放弃了。

最近一次是几个星期前会见《泰晤士报》记者福来萨先生。

2. 问：到处都听到对您可能离职的真诚惋惜。黎元洪将军告诉我，人们不让您离开南京？

答：情况表明，我留在南京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还会有害于全国的事情。因此，当我的辞呈被接受的时候，我立即就电告苏州程德全都督，请他接替我的职务。他答复说，身体有病，并且不能离开苏州，因为预料会有风潮。而您知道，程德全的名字在苏州是受欢迎的，他的离去或许会被误解。至于说到他的病，那是慢性的，他常有病。我这样回答他，请至少接受暂时主持民政事务，使我在最后的日子能够处理军队事务。

3. 问：假如军队挽留您呢？

答：我的军官和我亲如一家，这一点您在此已经有所见闻。但问题不在这里。是本地商人甚至袁世凯本人都请我留在南京，直到形势明朗化和程德全或者另一位将军熟悉情况的时候。因此您现在还能在衙门会见我。一俟解散军队的事宜结束，我就离开，我一定保证将完全守纪律的军队交给我的代理人。

4. 问：大家都说军队崇拜您。它目前的规模如何？

答：我全身心地关注我的军队，并为建立了这支军队感到自豪。我将解散它。此地上兵的表现已向您证明我们取得了进步。要知道花费了多少钱啊！我认为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自然，人民和军官的爱国主义起了巨大作用。但是主要的是要改善军饷的支付。我们总是竭力贯彻生活中的这个原则。士兵们每月得到8—10元钱，可能把其中一半存起来。我确信，如果您去问一下，就会发现很多人不愿离开这里回家，希望重新被征入伍。

然而也有志愿入伍的军队。他们就在你们汉口。这是些广东人。他们共有1万人左右。每个人的装备和开拔费要花几百两，而这一切，包括几百挺机枪都是自己出的钱。这支军队，大部分是来自爪哇、婆罗洲、新加坡的富家子弟，受爱国主义情感激发，他们大公无私地作出了牺牲。关于这支军队的情况也许您还要听到的。

5. 问：这些精锐的军队也将被解散吗？

答：是的，如果有必要并且目的已经达到的话。要知道他们同满人进行了斗争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6. 问：其他军队呢？对于它们的人数有许多争议？

答：在有正式消息将要发布的时候，为什么要争论和猜测呢。我不隐瞒它们的秘密。人数是这样的：关键时刻听我指挥的军队能超过20万，达到24万。部分解散以后，它们的人数应该在9万到10万之间。

7. 问：一位本地的外国领事断定您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总共只有15万人。

答：领事们有什么样的消息呢？他们又不是军人。当然，我们有一部分军队是流动的。今天在这儿；明天如果需要，他们会去帮助黎元洪将军并加入他的军队。一般说来欧洲人未必能随时对我们的全部调动跟踪调查。我重说一遍，我们太喜欢这些军队了。可是物资呢！难道我们的人还少吗？至于他们的品质和他们的武器，那是另一回事。也许只有15万军队，但却是标准的军队，——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同这些人争论。

比如，现在我在南京有4.5万人，但是在解散一部分以后将不多于3万甚至2.5万人。程德全都督请求全部军队仅保留三个师。

8. 问：那么，您的师不同于我们的编制吗？

答：现在统计很混乱。一般说来，我们采用欧洲编制，但是编制暂时还不完美，有些师编制小些，只有8000人，甚至5000人。

9. 问：这要依靠您或者您的部下称夺吗？

答：当然这不靠我。我怎能在各地方都亲自过问一切。现在正在点验各部队人数，准确数字有待查明。目前在南京有4.5万人。

10. 问：是在南京和浦口吗？

答：是的，在南京和浦口。但是两周以前，仅仅是这里的军队就有5万。

11. 问：常有这样的情形吗：在一些个别的部队里，将军们报告

的士兵数目要比实有的多些？

答：是的，有这种情形。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遵照中央政府的意见，我对此进行严格的监督。

12. 问：将军们说有整团整师人，而事实上只有他们的一些司令部，有过这种情形吗？

答：我不知道这类新发现。这是一种太陈旧的手法。

13. 问：传闻真实可信到如此程度，说王芝祥将军的检查证实在扬州不是所说的2.5万人，而总共才15人？

答：我尚未获悉这样的事实。也许您听说了关于他被派驻南京是为了监督解散蒋作宾次长的军队。

14 问：没有，我还没有见到他。但是关于舞弊行为的情况大家都已知道。

答：在个别将军和整个军队之间确有竞争。迄今为止我还有湖南和湖北的军队。而您知道汉阳发生过什么事？

（注：黄兴将军暗示保卫汉阳时的情形，当时，由于自己人之间的争执，湖南的军队离开共和军而回家去了。）

15. 问：这里还有广西的军队吗？

答：我正式命令把他们大部分解散、解雇和遣送回乡。但是我知道，他们很多人没有离开，继续滞留城内；当然，他们的人数没有统计。

16. 问：他们可以要求发饷吗？

答：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要求。然而这是很少几个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为要消除类似的临时观念，我们打算只从本地的士兵中组织地方军队。在这方面黎元洪将军在武昌走在了前头，他差不多有了一支类似的军队；因而，大概他今后有指挥同乡士兵的权。一俟财政状况允许，我们就将把所有的外省士兵遣送回乡。蒋次长统率本地军队也是暂时的，以后要把它移交给新的指挥官王芝祥，他正从汉口到这里来。

17. 问：是否意味着由于缺乏经费而延缓遣散军队？

答：我们没有经费，我不否认。但是不应该将匮乏的程度夸大。当然我没有象富裕的苏州那样的财源，可是需要的时候，我能够筹集到款子给军队发饷。本地商人的爱国主义和健全的理智提示他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已经采取了一种措施，它带有小额内部公债的特殊性质。至于说到解散军队的进程，我坚决声明，只要我在场，军队的解散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以正常的秩序和完全和平的方式进行；军队将得到应该给他们的东西。再过几天任何一位表示好奇的外国人就将随时有检验我的话的机会，他将看到返乡士兵沿南京主要街道开拔。他们大家不会空着手离开，而是带着某些财物回家。就我所知，暂时没有发饷的主要是驻扎在长江对岸浦口的军队。

18. 问：您现在从北京得到钱来支付士兵的薪饷吗？

答：关于从北京得到的全部款项，我最近几天将提出详尽的报告。我有钱给我的卫队发饷。我不期待来自北京的更多的钱，我想我的代理人在紧急时刻不要北京的财政援助也能够对付得了。我个人认为不可能用在国内不受欢迎的外债来支付我军队的开支。

19. 问：将军的辞职正遇上南京的危急关头。这是当地的危机还是更广范围的危机？

答：各地情况都是乱糟糟的，不仅是在长江一带。要知道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生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未来的幸福和存亡将取决于目前危机的解决（准确地说，取决于它的解决办法）。在南京和长江一带这种危机也许较轻一些：我们比北方富裕，共和国在这里比较自觉和巩固地确立起来了。

20. 问：将军指出的危机是什么？它的原因何在？

答：我所说的危机在于，在已知的不利条件下，在中华民国所由建立的所有因素都无法逆料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即新的制度将不仅在外国人心目中，而且在本国人心目中变得威信扫地。

新政府那时比清政府还要糟糕，最终将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把独立各省统一起来的全部努力将是徒劳的。这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开始。

造成目前形势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三点，第一是财政状况，第二是人际和省际关系，第三是政治原因。也许，还应该加上外部的影响，坦率地说，外国干涉和外国觊觎的危险目前对于统一的中华民国的事业是一种肯定的促使其团结的兴奋剂。在这方面我暂时还没有看到特别的危险。不过，一个国家刚一从消极等待转为较积极的活动，危险也就会立刻出现。

21. 问：显然，财政原因在于政府没有找到日常需要的经费？

答：不仅是这样。政府甚至已经无力使自己的债权人满意。共和国的统一只是表面现象，在此情况下，政府当然首先力求军队指挥的集中，这就立刻需要用北京国库来维持军队；在目前的财政状况下，它甚至不能用自己的经费来养活自己的军队。暂时为避免垮台，它认为急于举借外债是恰当的，即使在国内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共和国掌握在外国银行家手中，也在所不惜。决定解散军队是万不得已的办法，这种办法动摇着刚建立的制度，并有可能使它遭受颠覆的危险。要知道，我的军队的全体军官每个月就需要约60万元经费，然而解散军队并不是到处都一样迅速而成功。我们解散了军队的2/3，无论是我还是黎元洪，我们都把自己的军队缩编到最小规模：在南京和武汉各有三个师。这时在北方，解散军队大概进行得慢条斯理。如果知道那里军队甚至在继续加强以防不测，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在政府不巩固的情况下，对我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同样的事实也许会被不知情的人往坏的方面解释。

22. 问：财政困难严重到不能给士兵发饷了吗？要到什么期限呢？

答：在我这里，士兵的薪饷部分地支付了，在这方面还作了结算报告。五月份尚欠一个月的饷。然而寻找新的财源时总要拖延发饷期限。而在士兵养成按时领饷习惯的地方，拖延无意

地在他们中间引起不安。不过，我重说一遍，在长江这一带，财政情况比较令人感到宽慰，因此我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不应急于采取举借外债之类的极端措施。我坚信，在此地不会有骚动、混乱和抢劫。

南方的风潮将发生在其他领域并出自根本性的完全政治性的其他原因。我所就心的就是这一点。

23. 问：风潮会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

答：我说我就心这一点，说的是我个人的看法。首先必须自己认清形势。共和国的很多活动家和革命领导人已经或将要部分地会集北京，他们将等待事变，以便进行总结，看现在发生的事情与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否相符。很多事情要靠他们来决定。然而事变不会来得那么快。在国内大家都忙于有关土地的工作，任何人都知道，现在夏天里的稍微一点火星，都会使国家濒于经济完全破产的境地。因此应该认为，等待的时期会继续到秋天。我重说一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24. 问：作为引起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将军所说的人际与省际关系是什么意思？

答：它们在于，从革命胜利之时起，在共和派里面，也就是说在政府、军队和行政机关的现有成员当中，混进了异己的，甚至是敌视新制度的分子。革命由中国的年轻的新生力量搞成功，他们尽可能地把西方的伟大思想运用到中国的生活中去。有人说这大概是不可能的。我想，在实践中，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最简单的学说会以比欧洲更快更和平的方式在中国付诸实现。因此，我个人拥护我们党的纲领中的社会主义色彩。这对于中国的统一是必要的。如果那些在革命胜利后混进共和派里面的人能象我一样以同一个最初的宗旨为出发点就好了，我就认为新制度确立了。可惜，事情是另一种样子。

当国内普遍地看到旧制度已穷途末路（这是去年十一月前后），少数清兵不管怎样挣扎已无法阻挡事物的自然趋势之时，

清朝的大臣们就接二连三地开始转向共和国一边来了。他们纷纷背弃自己的政府。这类大臣的大多数都是行将就木的人了。我以为，他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要断了自己的生财之道。一些比较薄情寡义的人，打算勉强顺从新制度，把自己衙门上边“大清”这两个字抹掉，照旧当官；而另一些死心塌地沽名钓誉的人，则希望凭借他们的统治经验，在不久的将来把新潮流扭回到旧轨道。事情很清楚，没有行政工作阅历的青年不能忽视那些人的国务才干，尽管那是旧制度的才干；军队应该留下一批行家，尽管他们先前为满人卖过命；外交方面需要在欧洲有影响的人物，尽管他们的活动与清朝有联系。无论制度的破坏是怎样合理，我们没有旧制度留下的有经验的官员却是不行的（姑且这样说吧）。我对他们的作用很清楚，无论什么时候在怎样微小的方面也不能信赖他们对新制度的忠诚。

遗憾的是，事情经过了连最温和的人也无法预料的逆转。不仅共和国国家机器的特别部门，而且新制度的实施、新思想的培植和中国行政生活的全部领导都落在这些被革命宽恕了的官员手中。

难道您认为，五十岁以上的人，能够改变他从娘胎里带来的，从童年学步的第一天起就灌输给他的思想吗？不能！如果他是一位象任何中国人那样有良心的官员，具有应变的能力，他就能适应我们的观念，服从我们的要求。这已经算不错的了。然而无论何时我也不能假设（任何一个合乎逻辑思考的人也不能假设）那些官员能够成为共和原则的捍卫者，能够领导中华民国。因为如果是这样，那就等于说“朽木可雕”，“狗嘴里能够长出象牙”。

我个人认为，可能当我感觉到革命组织内部不够统一和团结时，这个问题就存在了。这些人以为是时候了，可以慢慢地、小心地把国家机器转向，使我们走回头路，打着共和国的旗号恢复旧制度，照旧专横地、不受监督地任用某些人，照样

卖国。起初仿佛出乎意外地振作起来的中国整个国家生活，在最近两个月内就悄悄地偃旗息鼓了。今后怎么办？如何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祖国？对这样普通的问题有人不去理会，而忽然对伟大的民族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官员要穿什么样的服装？如何用欧洲的借款来给官员支付薪俸？

这就是某些当权者给您的改革方案。使新生共和国在人民和你们心目中威信扫地的最大危险就在这里。

可是您知道，在中国，人们都与自己的省份联系密切，处于某些部门首脑或总督地位的官员经常引荐任用自己的同乡。比如说，我这里有纯粹由广东人组成的（对共和国的事业是很好的）整个机关（我的交涉局），因此我派去领导它的是一位广东人。到处都是这样。于是，有时整个省的利益与著名人物密切相关，全省的、整个地区（按照面积和人口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情绪的安定或者骚动，与这个人的升迁或者垮台很有关系。假如说今天我掌权，我是生在湖南的人，整个湖南“国”就支持我的观点，湖南就安定并相信政府。当我向湖南表示要求帮助时，相信我将会得到。明天我不在政府里面了，这个省对国家本部的信任就会被破坏。政府成员间的意见分歧会导致中国各个省之间的意见分歧，并出现危险的分裂。

25. 问：将军的辞职不会成为政府和政党里面的纷争的原由吧？

答：我没有想过。我有确定的任务：安抚半个中国和整理军队。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安抚南半个中国，说服居民相信现行制度及其活动家是符合人民愿望的。在近几个月内，这里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平静，南方居民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变好了，尽管本地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比我们讲的要激进得多。如果在革命最激烈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全中国各省统一在北京周围是不可能的话，那么现在这种统一是一种现实的趋势。最敌对的省份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消除了关于共和国可能解体的任何想法。我没有把南方情绪的这种转变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

我的功劳限于我以自己的威望使南方人认识到自然的现实秩序和也许不完全符合南方人愿望的政府的必要性。然而还是袁世凯的功劳大些，他吸收我作为参加地方管理的象征，表明本地居民的政治要求得到了优先考虑。

26. 问：那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危及南北方的友好关系，大概在中国历史上，各省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完全的和平吧？

答：是的。在当前这段时间里相互关系由于共同的危机感而巩固起来了，但是共和国的统一将建立在一方开始忘了另一方的利益和感情的时候。那时，南方的历史性主张会以对北方而言是命中注定的形式复活。

27. 问：那么，袁世凯政府现在获得了对国家、对所有的省份和所有的将军的完全控制吗？

答：这是毫无疑义的。不同点仅仅在于，你们欧洲人习惯于将暴力的管制，即每个与政府见解不一致的官员可能被召去北京杀头，说成是“中国政府保持着对国家的控制”。这样的控制再也不会出现，也不可能出现了。政府的权力如今在于同共和国一部分地方的主持者的精神联系，只要能在人民的意识中增强全中国意志的共同性，这些人便准备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名位，有时甚至要放弃他们所管辖的地方的利益。在长江这边，您将遇见武昌的黎元洪副总统——一位人民的英雄，以及共和国另一策源地广东的胡汉民都督。我们三人都持有一样的思想，在长江及其以南地区统一意识无论何时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强烈过。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发现自己个人的观点与肩负着国家命运的那些人的观点不一致，我们每个人就会甘愿放弃自己的观点。

28. 问：将军，您同袁世凯是否志同道合？

答：袁世凯坚决不同意我辞职，然后邀请我参加政府机构，这很好地向你们证实了我们的团结一致。但是因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我决定挂冠而去，致力于自己的社会活动，向袁世凯

说明国内事情和情绪的真相，以便他能够同我们一道，不仅朝着同一个目标，而且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

29. 问：将军，您怎样看待山东的张勋将军所采取的特殊立场？

答：（不耐烦的手势）我或许不会回答您的问题。您应该知道，雇佣的反动分子在各国都有，把这些人象狗一样放出来，是为了阻止懂得了自由的年轻人的不可遏制的狂热冲动。然而这些雇佣者在我们这里要比在任何地方的危险性都小些。让张勋今天为“拯救”王朝，为“拯救”打着王朝旗号的人到这里来吧。我不否认，有1·4万人的、供应良好、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有勇敢的将军率领的军队是一支重要力量。但是，这支军队在敌视这位将军的国家里又能够做什么呢？您想一下，他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甚至能得到钱吗？张勋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共和观念在山东还不巩固；他只能在那里呆下去而不能离开。

前些时派到张勋那里去的黎元洪将军的使者，连张勋想干什么的答复都未能带回来。张勋维护清朝的安全和不受侵犯！可是现在，当袁世凯在北京当政的时候，那些异族人感到在我们这里比他们自己统治中国的任何时候都要安逸和满意。

30. 问：显然，关于清朝复辟企图的所有传闻只是捕风捉影？

答：诚然，习惯于世代掌权的家族任何时候也不会放弃复辟的希望，但是它既没有物质力量，也没有精神依托。在享有盛名的中部大都会里您当然能经常听到一些有关政变企图和谋杀事件的特别消息。我们确信，事态的发展与其说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复辟愿望，不如说政变企图来自那些掩盖其名声，以便在人民中散布混乱并混水摸鱼的人和政党方面。这些人不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小人。甚至连温厚仁慈的副总统黎元洪对这些人也不能容忍。我把张勋也列入他们之内。您可以到张勋那里去同他谈话，您至少会发现他是一个狂人。我唯一遗憾的是，在汉口和汉阳打了那么大胜仗的袁世

凯、段祺瑞和冯国璋的模范军队没有能够制止为所欲为的人，致使外国人认为政府不是国家的主宰，甚至不能指挥自己的将军。

31. 问：无论如何，这种情形显然是一种例外，只不过证实了你们确定的关于政府控制国家的原则。在财政问题上存在这种共同的观点吗？比如说在将军提到的外债方面？

答：您提的是个大问题，在意见分歧尚未找到大家应该服从的最后解决办法的时候，您抓住了它。南方居民比北方居民的觉悟要高些，他们知道中国的力量和财富所在。他们的民族意识比北方强烈些。他们深信，我们没有那种会使中国受到外国银行家的奴役的外债也可以过得去，那些银行家把我们看作是永远供人役使的苦力；同样，没有侮辱我们民族自尊心的外债，我们也应付得了。在中国，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也不会为这种办法而感到高兴。

如果中央政府不顾我的反对，继续进行大借外债的谈判，那就意味着它对全国准备作长期牺牲的情绪缺乏足够的了解。

您不知道社会舆论在中国这里的力量；如果欧洲人了解我们的人民在想什么，准备做什么，那么他们也许就不会幼稚地感到惊讶，为什么在革命时期黎元洪将军没有破坏铁路，没有炸毁北方军队开往汉口的道路上的桥梁；为什么我们那么轻易地放弃了汉阳；为什么我们给退却的清军保留了退却用的各种手段，尽管我们有消灭它的可能性。这些事情是外国军人难以理解的，而你们却讥笑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知道到这里来的军队大部分迟早将是我们的，无须流中国人的血，这些血迟早要发生作用。国家获得胜利不是靠武器，而是靠觉悟，必须这样。这是中国人的正确思想。现在它又重新提醒政府：“提高警惕”。我的反对不是意见分歧，而仅仅是提醒。当我离职以后，我的部下也将做这件事。

32. 问：这是否等于说，事实上危机或许并不存在？

答：如果政府不理睬人民的呼声，危机就将到来。

33. 问：将军是外债的原则上的反对者吗？您在南方的同事也支持这种意见吗？

答：我并不在原则上反对外债，就象黎元洪将军一样，只要这些借款不妨碍我们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就行。

然而我坚决反对把我们当作永久债务者的勾当，到那时候我们完全能够使用自己的资金。我这样想，在采取象外债之类的极端措施之前，趁爱国主义还能够对人民发生影响，严重的危机在普遍意识中也能起作用的时候，应该先试着向自己的人民筹款。

我仿佛觉得国内的普遍情绪是这样。为了革命，为了从满人那里解放国家，我们所花的巨大代价比我们所拥有的要多得多。这样一来，结果是每个自由的中国人在祖国面前欠了债。任何人都明白，他的自由的巩固性是以其还债的紧迫性为转移的，每个人应该为还债而交付自己的部分。这是普遍的意识。

我知道，或许有人会讥笑我的方案。四亿人民每人交一元钱，对你们来说就是四亿元必要的资本。这是在亿万老百姓一生未必能看到一两银子的国家里！同样，金融家们会对其他方法——诸如价值一元的零星的内债债券表示怀疑，因为技术上不可能百分之百按照它来支付。我的方案由两个办法构成。一个办法是开源。它是由各省和新加坡、美洲、荷属殖民地的华侨实行自愿认捐。有关的设想还来不及广为宣传，象在湖南和四川两省一样，正是在那坚决反对过外国人控制中国铁路的省份，募捐工作已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诚然，在中国已经有过两次同样的，但是无成效的旨在摆脱外国资本控制的尝试。然而那是在满清时代，无论人民首领的抱负如何伟大，老百姓，还有我们自己无论何时也无法相信募集到的款项的去向。因此，只有失败。

相反，您大概不知道吧，有时候千百万穷人怎样迅速而广泛

地集合起来投入革命，富人们又是怎样毁家纾难的。而我们党的筹饷机构就在广州！我已经跟您说了，欧洲人没有关于中国人团结程度的概念和舆论在中国的力量的概念，在我国，“应该这样做”的觉悟本能地推动人民群众参加伟大的事业。这就是构成国民捐的一部分。请注意，自愿性应是它的必备条件。它的技术部分也许要委托地方当局加以研究。

另一个办法是节流。第一，减少官员的薪俸；第二，撤销所有可有可无的政府机构。君主时代的所有余毒，如都察院，各种腐儒和陈旧的制度，寄生的宫廷机构等等都应该立即取消。第三，简化中国官场和官僚阶层的生活。这种意思已在黎元洪将军向自己部下发表的演说和有关这个问题的多次命令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武汉的朴素生活您也许知道得很清楚。

烟酒在我的衙门里已完全被禁绝，请相信我，如果说我能够为了革命的成功捐献自己的两个手指头的话（我们有许多这样的事情），那么，舍弃美味佳肴，甚至一半薪水，对于我来说自然不会是什么大的困难。军队里的简朴生活您当然是知道的：任何一位将军（不要说军官了）的生活水平与我的士兵都没有一点差别。这就是我给您说的国民捐的第二个部分。

我着手的事情，不会比准备革命还要简单和省力些，对于国内的情绪必须做一段时间的工作，甚至要采取非常手段。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梯也尔一呼募捐，就募到几十亿法郎，把国家从德军的占领下解救出来。

就象革命的意外成功曾使你们感到惊异一样，也许中国的全民认捐还会使你们持怀疑论的银行家们感到吃惊。

请不要忘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比中国更多的宝藏，共和国可以在将来把它们变成资本；因此，即使我今天由于精疲力竭而作最后的挣扎，并牺牲自己的财产，那我也依然相信，我的后人将得到我剩下的成果。这告诉我们中国人很多事情。简直应该说是一桩聪明的买卖。

从用钱的观点看一定能够说，在国内募集到的资金花起来要比轻易得来的外国高利贷要谨慎得多。尽管从中国人民那里收集银两和铜板是困难的，然而这种募集愈是困难，呼吁人民的爱国心和唤起人民麻木感情愈是费劲，国人自己在使用这铢积寸累的金钱时就将愈加慎重。

然而您也许没有想到的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简单地说，就是因为银行家无论何时也不是国人。您从长远来看就会深信，那种代替外债的基金，即使从欧洲的观点来看也是比较合理的。外债的大部分要用来偿还我国从前的债务（当然，你们将决定这一点）和赔偿由于中国革命被欧洲人攫去的战费。我已经发现有75万马克拨付给德国国会作为与中国事变有关的费用。要知道，我们或者另外的人，付钱让你们的航海家在中国探险。我们勉强得到慷慨贷款的小部分，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全部需要；而且象经验告诉的一样，成问题的是外国钱必须节省地花。往后怎么办？过两年、三年，最多五年，我们将全部花光你们提供的钱，在我们面前将摆着新的贷款。我不怀疑，我们会象现在一样轻易地得到它。但是，自然，我们必须重新放弃一些主权。须知你们如此慷慨，是因为伴随着每一笔借款，你们越来越觉得在中国就象在家里一样。然而中国人难道没有看出这一点吗？如下事实什么也没有告诉您吗，为了免除外债，妇女们拿出自己的珠宝首饰，经济遭受破坏的省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税收。你们忘了，什么是革命的最终的和决定性的推动力！因为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也许会富起来，但是你们却在有意地剥夺我们的资产，剥夺我们在自己家里的合法权利。

你们靠金融奴役我们，从而迟早会教育千百万群众，把每个外国人都看作是粗暴的剥削者、高利贷者。金融方面的专横行径比异族王朝的桎梏还要令人忍无可忍。我不想，也害怕成为预言家，但是你们和你们的追求高额佣金的短视的银行家一道，拿你们的钱作这种贷款，就是要酝酿第二次更可怕的义和

团运动。不过那时请别抱怨政府恶意煽动人民。

34. 问：全中国国民捐的方案应该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军的主张当然受到了总统的热烈支持？

答：袁世凯作为自己祖国的爱国者，能够拥护我们的主张。尽管关于借款的谈判仍在继续，我的计划没有遇到来自政府方面的任何阻碍，这种情形很好地说明了政府是赞成的。

袁世凯已经给我发来拥护我的倡议和表示确信人民响应我的号召的电报。移交职务后，我马上就要带着我的同事到上海参加会议，大概休息两个月以后，我将着手在全国宣传。不过报纸的宣传运动和借助传单推广我的主张的工作已经开始。

35. 问：将在哪方面进行宣传？

答：您从报纸材料中已十分熟悉这个问题了。

36. 问：报纸材料中常常披露中国遭到来自外国人的危险。所指的是这种材料吗？

答：完全不是。我诉诸人民的爱国主义。相反，外国人在革命时期曾经对我们是有用的，不过我指出不许外国操纵我们的财政，是理所当然的。

37. 问：某些省份的居民由于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而被号召捐款。比如说，在湖南，有人宣传为蒙古问题而同俄国打仗。事实是确实的。

答：国内宣传的全部动向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从来也不采用您所说的那类危险的不道德的方法。如果您听说湖南省的居民被号召担负爱国捐款，以对付俄国将对中国发动的侵犯，说俄国似乎想从中国手里夺去蒙古，那是一种误会。我派出的人都是严格奉命行事的。在中国边远省份，俄国的名字甚至很少有人知道。

38. 问：传教士证实存在这类宣传。不会有将军的特使对人民进行残酷勒索的情况吧？

答：既不是我，也不是我的特使在募捐。我是宣传这种主

张。钱由政府募集。

至于说到在蒙古问题上的对俄关系，我认为必须彻底澄清我的观点，驳斥强加给我的不实之词。在激烈的革命时期，在革命成败未卜的时候，在共和派中间就存在过为了革命的胜利竟要牺牲中国某部分领土的思潮。我不主张作这样的牺牲。也许俄国政府获悉了革命者的计划……

在我看来，俄国的活动与任何一个国家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活动没有丝毫区别。我说甚至还厉害些；你们在蒙古正在做和企图做的那些事情，不仅在满洲、西藏、云南和山东正在发生，而且在中国腹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正在汉阳发生。不是今天，明天就会把手伸向中国最好的一些工厂，伸向大冶的丰富的矿山，而把厂矿转移到外国人手中的这一切做法，据说……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和幸福。这就是区别之所在。有人善于在你尚未察觉时进行掠夺。他们把我们的心脏攥在自己手里挤压，而我们却没有感到疼痛。你们对脚指轻轻一触，我们就会感觉象沉重的一击。区别在哪里，你们自己应该明白。

我认为，对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来说，俄国不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危险。辛亥革命期间你们的领事在长江一带的活动是非常同情共和派。我们充分估价你们给予我们的那种帮助，你们的商人和茶叶商会注意到这种有利于俄国的社会舆论。历史将记下它。您只要读一下《共和民报》（黎元洪的机关报）中我的同志孙武为你们的一位总领事而作的送别演说，就会了解我们对你们的关系。您要知道，这样的消息在人民中会不胫而走，它会使也许是外国传教士散布的敌视你们的所有传闻得以止息。

无论如何请相信我，尽管中国南方共和派联省将来与北方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纠葛，而根据这些共和派的观点，俄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影响如果仍将具有从前的善良性质，则是合乎愿望的。您作为一位公正的观察者，必定会看到这种现象。

我只是不知道，俄国在中国的所有代表，包括在北方港口的代表，是否都对我们持有同样的见解，抱有同样好感。

39. 问：所有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代表都遵守给他们的训令，使自己的观点与训令保持一致。将军有怀疑吗？

答：这是清楚的。正好像我们跟中央政府的观点一致那样。

40. 问：将军，假如说，由于巧妙的宣传，您得到史无前列的成功，您能用国民捐使国家摆脱财政监督。

答：如果我获得了成功，那也仅仅是因为正确理解了民心。我是人民的工具，这种觉悟对我来说是一种最高的奖赏。

41. 问：然而在人民心目中，您个人是完全特殊的人物，您的名字如此响亮不会引起共和国正式首脑方面的竞争吗？

答：中国是那樣的辽阔和人口众多，以致可以同时有不止两个、三个人民的偶像而互不妨碍。只是他们必需有团结的觉悟而不是独裁癖。

42. 问：在津浦铁路的正常运行开通后，政府打算建立欧洲人的租借地或者租界吗？

答：我不容许有这种想法。租借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43. 问：将军所作的声明很重要，我希望借助于我的记录和南京外国人办事处主任温先生的帮助丝毫不差地把它复制出来呈报上海总领事。

答：我从不认为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必要的，我不是在秘密状态下同您谈话。然而您到我这里来，按照您的说法，不是以俄国官方代表的身份来的。要是官方代表，我就不会谈及他的公事以外的事情。对外国政治家和记者，我就不会说这么多。您作为黎元洪将军的朋友来到这里，同样也是我个人的朋友，我对您讲了所知道的一切，并随时准备阐明自己对目前问题的观点。因此，我们谈话的内容，不是什么秘密，至于谈话的形式，请您不要滥用我的信任。在自己离职之前，我希望再多次见到您，尽管我曾预先通知过温先生，我不亲自接待任何一位

外国领事。全部补充说明，您可以从温先生那里得到。如果您会见了中国的某些高级官员，如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苏州的程德全都督和王芝祥将军，他们对形势都有自己的见解，那就劳驾把他们对您作的声明转告我。

译自《辛亥革命文件资料集》，莫斯科，1968年版。

严昌洪 朱福枝 译 张贯益 校

邓演达与国民党理论体系中的 民众革命思想

J·肯尼思·奥林尼克

在1923——1924年改组以前，中国国民党的革命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已往的军事、政治势力的垂死联合。与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合作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并使国民党以前的策略发生了变化，从此，国民党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并在中国民众中形成一套崭新的民众政治基础。^①

孙中山把组织与动员群众的政策视为国民党改组的中心问题，这种政策结果却成为带有双刃的剑。^②由中国共产党和激进主义者推动的群众运动广泛地支持了1924——1927年的军事斗争，然而，也正是这场运动导致了他们的自杀。工会和农民协会的运动危及国民党员社会经济地位的稳固，危及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军事同盟。为了对付由这种激烈的社会革命带来的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无法摆脱的恐惧，国民党领导人在蒋介石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在1927年4月发动了一场旨在清除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运动，并把这场运动的理由说成是为了反对在中国出现的由社会革命和群众暴动而引起的社会动荡。^③

这场清洗运动的结果是，国民党在组织与动员群众方面的工

① 见奥林尼克的博士论文：《国民党左派之激进主义：邓演达与中国的第三党运动》之第1章《分歧之渊源：国民党从“一大”到“二大”的转变》，纽约康那尔大学，1973年。

② 国防研究院编：《国父全书》，1960年，第936—939页。

③ 见蒋介石：《告全国人民书》（1927·5）之一章：《宁汉争潮之思想背景》，载《国闻周报》，4卷28期（1927·7·24）第1—6页。

作让给了其竞争对手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到30年代初，国民党中的两个派系继续倡导组织群众的运动。这两派是由汪精卫及其追随者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者有时称为“第三党”，以邓演达为领袖。1931年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达成了妥协，准备进行一场复兴中国的运动，从此，国民党改组派成员对组织与动员群众的运动就不再有任何兴趣了。^①与此同时，1931年邓演达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失去了领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就丧失了与南京政权抗衡的力量。^②

到1931年，国民党已经不再提倡组织与动员群众之事了。至于邓演达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有选择性的史料编纂差不多已经把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给忘却了。为了粉饰南京政府以非革命方式进行的复兴中国的运动，国民党历史学家把大约1923——1930年间国民党改组的这段历史说成是一场混乱，^③把中国共产党及其一小部分同情者在此期间所倡导的组织与动员群众的工作说成是一场旨在破坏国民党革命目标的阴谋活动，并把那场消灭共产党及其同盟者、反对民众革命纲领的大清洗描述为国民党的“净化运动”。^④这种说法留给人们

① 关于国民党改组派，见a、山田辰雄文章；b、埃里弗·德里克(Arif Dirik)：《国民党左派之群众运动》，载《近代中国》杂志1卷1期(1975·1)第46—78页；c、詹姆斯·R·谢利(James R. Shirley)：《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1932年以前的汪精卫》，加州大学，1962年。

② 参见奥林匹克博士论文中关于邓演达生平之章节(注①)；杨逸棠：《邓演达先生遗著》，1949年版第1页；郝华德等编：《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词典》，4卷本，卷8，260—264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67—1971年版。

③ 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有两部论著比较有名而精僻：

a、蒋永敬：《鲍罗庭与武汉政权》，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版；

b、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两卷本，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

④ 除上注列举的之外，关于国民党对于清党的论述见：《清党运动概论》，上海中山书店1927年；《清党实录》（无出版地点）1928年版。

一种假象，即国民党的复兴中国方案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众革命的方式在20年代和30年代就已经是泾渭分明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年间是意识形态的大动荡时期，所有革命者都力图把西方社会思潮与他们的革命经验和传统的观念融为一体，而由孙中山主义者与共产党共同成就的这种折衷主义的和不同意识形态联合的革命方式并非是混乱无章的。

邓演达在多方面都表现出他是一位这种理性革命环境产物的代表。他总结了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忠诚于国民党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并竭力将理论付诸实践。所有这些就是邓演达在20年代后期的主要活动。在邓演达的革命活动中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他的革命“风格”与纲领和毛泽东的非常相似。邓演达给国民党的理论增添了民粹主义与唯意志论的色彩，始终坚持把农民作为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中心，并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还非常厌恶孔教官僚主义的传统观念。邓演达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激进部分进行一个变革，创造出一种新的革命方式，以便使国民党与中国人民更加接近。如果把争夺民众的支持看作是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争斗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邓演达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是非常有趣的。由于没有动员广大民众对自己的支持，国民党受到了严重的惩罚，这一点是为世人所公认的。国民党根本没有看到广大民众那种正在觉醒的潜在力量，这使得它成为一个闭关的官僚主义机构，不能对民众最迫切的要求作出反应，而日趋腐败没落。^①

那么，邓演达是怎样看待国民党的理论呢？与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相比较，邓演达的理论是怎样变得更加合理的呢？是什么样的环境使邓演达产生了民粹主义，理性主义和以农民为基础的革

^① 关于此点论述，可见最新的两个研究成果：a、劳依德·依斯特曼（Lloyd Eastman）：《畸形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哈佛大学1974年版；b、詹姆斯·E谢尔丹（James E. Sheridan）：《分裂的中国：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1912—1949年》，纽约自由出版社1975年版。

命策略呢？最后，他这些观点同他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中的对手的观点有何区别呢？

邓演达，1895年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他之所以会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文诌诌地说上一句，是因为其家庭和社会环境把他哺育成为一个革命家。^①邓演达的父亲是个农民，几经奋斗进入了清代上流社会的最低层，他支持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大约在13岁时（1909年14岁——译注），邓演达进入广东省陆军小学堂学习，这个学堂表面上是为清廷培养新式军官的，但实际上是一个革命的训练基地，该学堂校长邓铿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因此，邓演达所受的军事教育就成为他加入革命洪流的序曲。他在年轻时就与孙中山交往，并从事革命活动。^②

与孙中山的初步交往并投身革命运动，这在邓演达选择终身事业的时候成为决定性的因素。1919年，邓演达毕业于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结束了军事教育，于1920年返回广东，来到孙中山身边加入革命者的行列。1920——1923年间，由于坚决支持孙中山，邓演达在革命阵营中确立了一个稳固的地位。在1923年的国民党改组中，他始终忠于孙中山，^③他是改组国民党的积极倡导者，同孙中山、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一道鼓吹联合苏联、联合中国共产党和建立民众政治基础的国民党改组政策。由于参与改组国民党的工作，邓演达成为20年代决定国民党政策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他还利用改组国民党的机会，加强了同国

① 关于邓演达成长的物质与精神环境之分析，见：a、唐·C.普拉依斯（Don C. Price），《俄罗斯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65—1911年》第4—5章，哈佛大学1975年版；b、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190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加州大学1976年版；c、哈罗德·Z·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加州大学1970年版，第225页。d、杨逸棠：《邓演达先生遗著》第1—25页。

② 杨逸棠：《邓演达先生遗著》第1—25页；另见《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词典》第3卷第254—257页，邓铿的传记。

③ 《邓演达先生遗著》说明了邓的地位；关于改组与派别斗争的问题，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卷1；关于汪精卫的地位，见山田辰雄的文章。

民党中的中共新成员的联系。就这样，邓演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①

国民党的改组给邓演达的政治生涯以决定性的帮助，同时也加强了他在革命军队中的地位。由于他对革命的忠诚，孙中山任命他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1924年，邓演达进入了黄埔军校的领导层，成为教练部副主任。在黄埔的交往使得他在新的革命军队中形成一个同志网络，同时也使他进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周围年轻军官的圈子之中。^②

说来奇怪，邓演达在黄埔军校的地位只保持了几个月。他离开黄埔军校的原委虽还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如何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与同僚们发生了冲突，黄埔军校中大多数领导人在限制共产党的问题上意见趋于一致，而邓演达却依然站在倡导民众行动自由的少数人的一边。^③他那直率的性格显然引起了主张反共的教育长王柏龄的反对，与王发生公开冲突之后，邓演达觉得离开黄埔军校更合适些。

到1924年，邓演达在革命阵营中已成为一位知名人士了。作为一名忠诚支持孙中山而且富有才干的年轻军官，邓演达受到了人们的尊敬。由于同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主张改组国民党的势力的关系，还由于同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的关系，邓演达树立起了权威。总之，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之下，邓演达成为国

① 邓演达尤其与1923年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亲近。他与共产党的关系的最早证据可以追溯到黄埔时代或1924年，见：a、刘天：《黄埔系的形成与没落》，载《社会新闻》10卷7期（1935·8·1）234页；b、王柏龄：《黄埔军校开创之回忆》，载《传记文学》16卷5期（1970·5）94页；c、杨逸棠：《邓演达先生遗著》，9页；d、王沛槐（Wang Pei-hai译音）：《革命的保证》，庐山1936年版，223页。

② 刘峙（Liu chih译音）：《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8页；关于蒋对邓的钟爱，见《蒋介石生平》，265页，台北，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该书断言，蒋把邓视为“门徒”。

③ 王柏龄：《黄埔军校开创之回忆》；王雄：《王柏龄在黄埔》，载《社会新闻》1卷9期（1935·10·25）203页；王为廉（Wang Wei-lian译音）：《现代史料》，上海海天出版社1935年版，4卷本，卷1，268页；《邓演达先生传略》，见《邓演达的道路》12页。

民党中一名后起之秀。

邓演达在德国度过了1924——1926年（1924年年底到1925年底，邓演达在国外——译注）。在那里，他研究了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理论以及国际关系问题，并试图与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建立联系。他尤其注意提高自己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的认识。1926年，他取道苏联回国，在那里，他考察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①

邓演达回国以后刚好赶上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二大”是邓演达离开中国期间，国内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的产物。1925年的“五卅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全国范围的激情把反帝爱国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强烈的民族义愤使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加入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去。由于受到了屈辱的、腐败的北京军阀政府的压抑，国民把自己的热情转向南方的革命阵营。

对于邓演达来说，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国民党内部的变化。1925年3月，孙中山的逝世揭开了国民党内部派系冲突的序幕。在此之后的斗争中，主张改组国民党的人联合共产党以图加强对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控制权。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这一事件为加强国民党改组政策持犹豫态度的胡汉民及其追随者的控制提供了契机。因而，在国民党“二大”前夕，汪精卫、蒋介石和共产党三方共同取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②

主张改组国民党的一派之所以会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可

① 见《邓演达的道路》和《邓演达先生遗著》10页，另见：a、张国焘：《我的回忆》两卷本，香港明报月刊社1973年版，卷2，第548页，张谈了邓在德国的情况，他认为邓在研究军事；b、云五（Yun Wu译音）：《邓演达和国民党左派》，载《掌故》月刊第11期（1972·7·10）；c、汉口档案，档号15061、17903；d、《党务月报》第1期（1926·5）7—8页。

② 对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权力结构的研究有很多，诸如：

a、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卷1；b、山田辰雄的文章；

c、杰根·杜米斯（Jurgen Domes）：《使人眼花缭乱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27年》（德文）柏林，瓦特德鲁依特出版社1969年版，83页。

能在于其纲领的成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都表现出了由国民党的改组而带来的革命力量，以黄埔军校为主力的国民党军队联合工农粉碎了强大的地方军阀势力，统一了广东、广西，并把它们纳入国民党的领导之下。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国民政府，与北京政府相对抗，并向它提出了暗示：在不远的将来，一场旨在统一中国的革命战争就要展开。^①

1926年7月的形势对邓演达非常有利。尽管孙中山已经过世，但国民党内主张改组的势力及其改组政策在革命阵营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和邓演达关系密切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仍然十分巩固；他还同蒋介石以及革命军队中心的黄埔军校保持密切的联系；最后，民众运动的成就使他坚信，动员群众对革命取得成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②

国民党“二大”前夕，邓演达受委托在大会代表的党内高层人物的聚会上发表了讲演，^③这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公开阐述他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方法与特殊性的见解。他这次演讲及其以后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的基本论点都集中在要让广大民众参加革命：

各位同志都明白，本党改组以后，党的面目和党的工作都比之从前有大大的进步。但这个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能把我们奋斗的目标向着大多数痛苦的民众。此目标既

① 关于东征中群众支持的重要性，见：贺迎新和刘平翠(Ho Yin-hsin, Liu Ping-tsui译音)合著：《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实战记》中山书店1928年版，关于对于在将来斗争中得到民众支持的期望，见《黄埔潮》第8期(1926·8)；关于蒋的主张，见《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告将士书》，载《蒋总统志》，台北，国防研究院1964年版，两卷本，卷2，第2044—2047页。

② 关于国民党“二大”，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编，另见《政治周报》第8期(1925·12·20)；《中国国民党第一、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刊》“二大”部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34年编；邓的发言的原稿见国民党档案，档号5678。

③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刊》第217—222页。

定，党的组织工作和方法，便都和从前不同，这就是本党改组的根本意义。①

邓演达继续致力于促进革命发展的工作，以期提高民众的觉悟，并使民众广泛地参加到革命中来。革命运动是一所大学校，在这里，中国人民将学会怎样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来。邓演达坚决反对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流行的希望中国革命行将流产的论调，他认为，这种说法简直是荒诞不经的：

（这些人）不知革命之发生实有环境的需要。革命乃是客观的事实，并不是忽然而生忽然而灭的。除非是西方的被压迫的民众已经解放，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也已经解放，否则，革命的运动，任谁也不能把它停止。……我们的革命运动也只有天天高涨，再没有跌落的。②

在论述到国际局势的时候，邓演达把国际社会划分为两大阵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中国革命不可能指望从西方帝国主义政府那里得到帮助，而只能依靠世界上革命的民众。在革命的进程中，中国的被压迫民众与世界上被压迫民众有着天然的同盟关系，这场革命将遍及世界各地：

我们不知中国国民革命在世界革命上的位置；不知外国革命党人和革命民众联合，是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策略；不知革命的成功全靠拿下层的民众做革命的基础。③

邓演达的演讲尽管强调了民族特色，但实际上是提出了他对于国民党革命的哲学以及长远战略的见解。孙中山已经使其信徒

① 同上，217页。

② 同上，221页。

③ 同上，222页。

们对民众运动的重要性树立了新的信仰，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国际人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观点很早就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理论之一；他认为，中国与世界上被压迫者应该联合起来，这个观点也已经在同共产党的联合战线策略以及国民党组织民众的政策中得到了体现。^①邓演达在讲话中对民众运动表现出了过分的热衷，这些可能使他那些温和派的同僚们感到不安。他把国民党指导之下的民众运动视为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与孙中山观点不同的是，邓演达建议组成一个新的国民党领导核心，国民党应当扩大到民众中去，并成为民众利益的维护者。邓演达认为，国民党的首要使命就是组织与教育，其职责就是让民众获得知识并组织起来，以便使他们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去变革中国。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民众而不是国民党。邓演达始终都在呼吁要求国民党人放弃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与民众的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民粹主义已经成为邓演达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

我们很有理由认为，邓演达的演讲内容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基本精神。这次大会重申了“一大”的改组政策，驳斥了这项政策的反对派，并决定把国民党的全部力量都放在组织与动员民众上面。^③

在国民党“二大”期间，邓演达进入了国民党领导机构的中心层次，他被选为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该委员会被紧紧地操纵在以汪精卫、蒋介石为首的主张改组政策的国民党领袖人物手中。同时，邓演达又回到黄埔军校

① 见《国父全书》940页，1923年至1925年逝世之前，孙中山不断申明这一观点，见《俄罗斯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常见于当时的文献中，如：《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上海长江书局，1926—27年版；另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刊》。

② 在这方面，邓同意共产党的观点，主张从下层进行革命的策略，见张国焘：《我的回忆》卷2，第618页。

③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刊》，“二大”部分。

取代了宿敌王柏龄，当上了教育长。在重返黄埔军校的几个月之中，他与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建立了友好关系。^①就这样，邓演达在军政机关中成为主要人物。此外，他还在由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共产党人及蒋介石军事势力三方会聚的狭小圈子中谋得一席之地。

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使革命的联盟开始出现解体的征兆。这一事件的结果是，蒋介石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个人权力，因而，汪精卫和中国共产党两支力量的联合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但汪精卫由于其政治上的虚弱而受到打击，在中山舰事件之后不久就离开中国前往欧洲，这样就削弱了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也因渴望维持统一战线而实行了战略退却。^②

邓演达试图避过“三·二〇事件”的冲击波，并试图改善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在受到短暂的软禁——这可能是蒋介石对于他公开与共产党人表示友好这一事实的警告——之后，邓演达被释放出来，并于1926年6月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虽直接受到蒋介石的节制，但邓演达仍有很大的权力和很多的机会对革命的方针施加影响。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他负责组织、动员民众并用政治思想教育民众的工作，他的威信扩大到军中各个阶层和军队所到之处的平民百姓之中。在北伐过程中，邓演达还充任蒋介石和中路战场前线指挥官之间的特别联络员。最后，他还亲自指挥军队作战。换句话说，邓演达完全有力量影响革命的政治与军事方针。^③

① 邓演达在黄埔军校的生活与交际情况，见：a、刘天：《黄埔系的形成与没落》，载《社会新闻》10卷7期，234—237页；b、王柏龄：《黄埔军校开创之回忆》，c、徐克余（Hsu Kai-yu音译）：《周恩来：中国老练的领袖人物》，铁锤图书公司1968年版，42页；d、左翠芬：《黄埔政治部的花花絮絮》，载《社会新闻》1卷11期（1932·11）、12期（1932·12）249页；e、国民党档案，454—22号。

② 李之龙：《汪主席被迫离职之原因、经过与影响》，载（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1927·5印发，22页。

③ 有关这一时期邓的主张与个人权力的叙述，见：

a、左翠芬：《总政治部野史》第1章，载《社会新闻》1卷10期（1932·11·12）

在邓演达接到新的任命之后不久，国民革命军出师远征北方军阀。1926年10月，经过激烈的战斗，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长江上的战略要地武汉三镇，北方军阀统治的最后崩溃看来已经为期不远了。1926年11月——1927年7月间武汉新的国民革命政府力图聚集力量并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结果，这两个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姑且不说聚集革命力量这一点，就连革命阵营本身也出现了分裂。国共两党间的合作首先在1927年4月由于蒋介石的派别活动而出现裂痕，几个月之后又由于汪精卫的分共而再次分裂。到8月份，汪氏武汉政府破产，中国开始走向新形式下的革命内战。^①

国共联合为什么会出现破裂？为什么继续与共产党合作是不可能的？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权力问题。蒋介石和汪精卫都力图阻止革命阵营内部共产党势力的增长。在缺少独立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共产党的主要策略就是渗透并控制现成的军事力量，并掌握民众运动，当时这两项政策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共产党人遍及军队中的政工部门，并在组织农工方面处于领先地位。^②

民众运动以不曾预料的速度向前发展。在武汉政府时期（1926年12月——1927年7月），民众运动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会和农民协会要求国民政府履行其政治宣传中所许下的诺言，要求实现三民主义，要求政治上的权利与经济上的改善。当共产党人发现民众力量达到惊人的程度时，他们并不十分清楚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到1927年，任何人都可以看

808页（14—15期——译注）；

b、《支那周报》（日本）6卷2期（1927·2）24—42页；

c、郭沫若：《革命春秋》，上海海燕书店1947年版，两卷本，卷2，289页。

① 也就是说，代表现代意识的两个对立的武装集团间的战争，比如，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

② 马丁·威伯（C. Martin Wilbur）和夏莲荫（Julie Lien—ying How）合编：《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与苏联顾问档案，1918—1927》，第4—7章，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56年版。

得出，中国社会中一支新的力量正在迅速地崛起。^①

在开始反共之后，汪精卫、蒋介石不得不向支撑他们自己权力的基础——民众运动——发起攻击。蒋介石觉得他能够非常容易地证明反对民众运动是顺理成章的事。民众组织有利于动员广大民众对国民革命军的支持，是实现国民党既定政策的工具，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仅仅起到辅助作用而已。他总认为，国民党是革命的主导力量，与国民党政策相左的民众组织必须予以取缔。^②汪精卫和武汉政府中曾经主张改组国民党的人士发现，他们如果急转直下进行反共，反对国民党的改组政策，这似乎难以令人置信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们毕竟曾经公开倡导过国民党的改组政策。在演讲及著述中他们差不多是如渗水一般一点一滴地逐步地表达其对民众运动的忧虑。^③

在对武汉政府进行研究时，山田辰雄把国民党左派分为互不相容的两派，一派是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另一派是邓演达。^④根据山田氏的观点，武汉政府时期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是集中在南京的蒋介石派和武汉的汪精卫派之间的。由于自己缺乏支持权力的基础，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便调和他们赖以存在的两支力量——共产党领导的民众运动和唐生智为中心的武汉政府的军队——之间的冲突，以图巩固他们的权力地位。1927年春天，民众运动迅速发展，唐生智的部下与农民协会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武汉派权力的基础开始崩溃，汪精卫不得不面对现实，寻求与国民党领导人中唯一有真正实力的蒋介石和解，结果，汪精卫放弃了与共产党的合作和以民众为基础的政策。汪氏通过采取强调革命纲领中反帝的内容，使其反对国民党改组政策的行动在理论上有依

① 同上，457—467页，罗伯特·C·诺斯与辛尼亚·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1927年的国共分裂》，加州大学1963年版，见该书前言部分。

② 蒋对此问题的最早主张，见《校长留别全体长官学生书》，载《黄埔潮》第3期（1926·8·7）11—12页；关于清党期间的言论，见他在1927年春夏间的演说集《宁汉争吵的思想背景》，载《国闻周报》4卷28期（1927·7·24）1—8页。

③ 见汪精卫的演讲。

④ 下面的论述是以山田辰雄的文章为蓝本的。

据。根据这一新的策略，国民党扮演了调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冲突的角色，反帝的民族斗争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基本目标。既然国民党已经成为各阶级间的和事佬，那么，它就不可能支持共产党的斗争策略。

与上述相反的是，山田氏把邓演达描写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激进主义者。邓演达的激进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他相信反帝民族革命的同时，必须进行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倡导激进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并且站在与汪精卫及其同伙相反的立场上，支持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便不会与蒋介石或汪精卫同流合污去分共。他继续倡导激进的农民运动，即使是这一政策变得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他也坚持不变。汪精卫认为，民族革命的基础是所有阶级的联合，而邓演达看起来是认为，革命的力量将在有组织的民众之中产生，因此，他鼓吹必须让“民众”尤其是农民与社会上的封建势力作斗争，进行社会革命。

山田辰雄氏这种分析正确地反映了邓演达与汪精卫及其追隨者在理论上的分歧，同时有趣的是，他把邓演达的激进主义说成是其革命积极性作用的结果。在北伐过程中，邓演达实地考察了民众组织的力量，那时他认为，国民党已经找到了革命的重要力量，必须支助与加强民众组织。他认为，要赢得民众，尤其是农民并保持同他们的密切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把革命的宣传化为实际的行动，民主和民生不能是空洞的许诺，这两者就是立即行动起来的纲领。^①

① 关于北伐期间总政治部与群众运动的关系，见：《支那周报》11卷2。（1927·2）29页；杨逸棠：《邓演达先生遗著》15、85页；《邓演达的道路》12页。邓演达的观点集中在他的《国民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载《汉口民国报》，1927年4月2日。邓的演说以及他对于群众工作和把理想付诸实践的执着，表明了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邓演达无疑受到了鲍罗庭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见鲍氏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演说，载《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215—216页。李昂：《红色舞台》，北平，胜利出版社1946年版，119—121页。

在短暂的武汉政府时期，他具有地位与权力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作为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他负责该省所有民众组织工作；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他领导了全国的农民运动（当时直接受武汉政府管辖的只有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这里的“全国”系指武汉政府辖区而言——译注）；另外，他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系候补委员——译注），国民革命军总政部主任，还担任其他许多委员会的委员或主任。曾和邓演达一同在农民部工作过的陈克文曾经认为，邓演达是武汉政府最有权力的人。^①

邓演达用自己的权力努力扩大民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并在理论上加以引导。在革命运动中，他开始系统地搜集全国农民状况的资料，以便形成一套更切合实际的政策。他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国民党在农民运动中的工作人员（讲习所有将近1000名学员）。他开始探索多种途径以扩大农民运动并使之成为推行革命政策的工具（他希望农民协会成为行政单位，以此形成一个新的地方自治的政府体制）。基于以上策略，邓演达鼓励政府进行一系列的对土地所有权转化问题的研究，以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②

这一时期，邓演达所形成的这些主张以及所采取的行动都以国民党改组政策的总纲领和国民党的决策为基本依据。^③受大多数领导人全力支持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它为邓演达所进行的果敢的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保证。^④如果说邓演达真的背离了国民党先前的政策的话，那或许是因为

① 见云五 (Yun Wu)：《邓演达与国民党左派》；蒋永敬：《鲍罗庭与武汉政府》。

② 奥林尼克的博士论文第3章《武汉时期的国民党左派》，详细描述了邓演达的活动。

③ 杰斐逊·兰姆 (Jefferson Lamb)：《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与土地立法，1912—1930》(英文)，北平燕京大学1931年9月版。

④ 蒋永敬：《鲍罗庭与武汉政权》48页。

他准备将农民协会作为新的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激情所致。为此，他坚持认为，国民党必须对农民解放与自治的要求作出反映，既然农民协会已经证明自己是实现这种要求的有用工具，那么，国民党就有责任与农民协会共同合作。邓演达如此强调农民协会的作用，这就说明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就是一个把人民的要求付诸实施的过程。因此，他强调，一个革命者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大业和实现民众要求的实践活动中：

“革命是伟大的群众要求，是伟大群众的痛苦呼声，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整个的人类社会进程中一个小小的工具，都不过是在某个时代中整个社会的一点微尘。……个人的思想如果不能代表群众的要求便是自私；个人的行动，如果违背了群众的实在性，就必定陷于孤立，走到绝路。

革命是大家的事，是痛苦民众们大家的事。革命固然不是几个人所能造起，革命尤其不是一定要由当事的人们自己成功。人人都是时代的工具，自然，革命的同志们都是革命群众的工具。……每个革命的人们，都应该把他的生命与群众的生命与社会的生命打成一片，能够这样，才可以去拼命革命，去拼命同残酷的社会奋斗。……每个革命者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群众，交给社会、交给党，才能够把生时的工作不当是自己的工作，才能够把死后的生命寄托在整个的社会，寄托在后来繁荣发育的社会群众身上，那么，自己的成功和失败问题就不成问题了，更用不着说一切事。革命的功业，要由自己成功。”^①（见《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译注）。

在下面一段中，邓演达略述了“服从民众”的内容：

^① 邓演达：《国民革命之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

“在那些重大的使命里头去行动的同志们，应该是个个都带着、接受着农民的性格：简单、质朴、康健、直率、慷慨、勇敢；或者更加入一些工人的性格：活泼、聪慧、进取、乐群。大家如果是有革命的需要，如果是接受革命的使命，自己就得先检阅自己，和上边所讲的农民工人性格远近怎样。老实的说，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应该都带着那种性格才行的。”^①（见《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译注）这一时期，邓演达为国民党下了更明确的定义：

“（国民党）是中国被压迫人们当中最觉悟、最进步的分子底集合体，是被压迫的群众的先锋队。他的责任是代表着他所立脚的被压迫的民众，农、工、商人去要求解放，去为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自由解放而奋斗。如果有人要问：

‘党在哪里？’那我们应该答复：党在被压迫民众里面，党在民众的呼声里，党在革命民众觉悟分子团集的地方，简单地说一句：党在需要的地方。”^②（《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译注）。

武汉政府时期，邓演达革命主张的要点就在于他认为革命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已积极投入斗争，把国民党的纲领付诸实施，形势进入一个新阶段，它要求国民党重新明确其使命。在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国民党人必须在思想上发生转变才能适应群众的要求，邓并不是要求国民党员们都成为贵族老爷，而是要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③

这一时期，国民党的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很引人注目的。毛泽东在1927年2月的《湖南农民运动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邓演达认为，革命者必须是道义上的“豪杰”，这种观念在中国革命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见《俄罗斯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7章《革命者的天职》。

考察报告》中所阐明的观点与邓演达所倡导的思想基本上一致。象邓演达一样，毛泽东经常告诉愿意听取他意见的人说，中国革命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农民组织和农民运动为依托的民众革命新阶段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军事斗争时期。^①

毛泽东和邓演达的建议都遭到了各自党的否决。^②革命的新时期充满着血腥的清党与内战，然而，邓演达初步总结了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国民党理论的实质。他在武汉政府时期的立场是，国民党应当采纳共产党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策略，以实现国民党的政纲。这时，邓演达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试图弄通中国的需求以及与现时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策。他接受了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把现时社会视为“封建时代”的理论，认为中国民众必须反对“封建压迫”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为国民党民主主义原则而奋斗的必要性，并且，还从他的共产党朋友那里认识到广大民众在现代革命中的动力作用。一头钻入马克思主义原理之中，邓演达仍认为他是忠诚的孙中山主义者。他还为其理论上的这种明显的矛盾性辩解说，由于与世界各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必须有自己独特的革命方式。孙中山已经明确地阐释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要求，而且三民主义正是这种特殊性的产物。邓演达认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为了歪曲孙中山的思想，而是为了使三民主义更“科学”、更合理。^③

然而，邓演达对孙中山主义的忠诚与他从共产党人那里借来的动员民众的策略并不十分吻合。孙中山坚持社会的非暴力演化，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而赞成阶级合作；而动员民众的

① 见毛泽东的考察报告英译文。

② 尤丁与诺斯：《罗易赴华使命》，另见《中国共产党近五年来的政治主张》。

③ 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来否认一个政党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适应性，这在当时几乎是每个国民党员的通则，尤其是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参见汪精卫的演说词，载《国闻周报》4卷28期（1927·7·24）9—21页。

理论则认为，历史本身就是由阶级斗争推进的过程。邓演达试图把阶级斗争的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以解决这样一对矛盾，在武汉政府的最后一段时间内，他试图找到某种办法使民众留在革命阵营内，同时限制社会斗争的激烈性，结果证明这是枉费心机的。^①

在1927年夏天的几个月中，邓演达发现其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悄然消逝。在反对共产党、反对武汉政府的运动中，蒋介石与邓演达断绝交情，并向邓在总政治部的职位发起了进攻。^②攻击群众组织的潮流在滋长以及7月汪精卫对武汉共产党的大清洗，民众力量的弱点在这时暴露出来。武汉的国民党左派跟随着汪精卫背叛了革命，坚持统一战线和国民党改组政策的只剩下邓演达一人。最后，5—6月间武汉对河南的远征使邓演达在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军队元气大伤。^③毛泽东回到了农村；汪精卫寻求与南京方面和解，这时，邓演达不得不离开中国流亡到欧洲。

在离开中国之前，邓演达已经开始为新的政治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PAC）奠基。^④他曾别出心裁地希望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可以容纳拥护国民党改组政策，尤其是拥护组织民众、动员民众政策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对这一策

① 在这方面邓演达和毛泽东一样处于极度的煎熬之中，进退维谷。邓坚信，革命要求国民党帮助农民开始向地方自治过渡，并要求它保护农民，但邓不得不服从武汉的普遍要求——把限制农民运动放在首要地位；在下列著述中可以看出邓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地位与作用，见蒋永敬：《鲍罗庭与武汉政权》48，250页；李昂：《红色舞台》119—121页；汉口档案也证实了这样一点，邓演达希望深化革命，但他也顾及到要求缓和民众运动的压力。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14卷，632页。邓演达继续主管新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下的总政治部，这一机构，成立于1927年3月的二届三中全会上。

③ 汉口档案，13630号；另见国民党档案484—71—14号。

④ 郭冠杰：《中国革命史的发展与中国农工民主党》，载李伯球编：《邓演达殉难十七周年特辑》，香港中华论坛社，7页；另见：a、施存统：《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上海现代中国社1928年版，50—126页；施存统：《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上海复旦书店1929年版，10页；b、陈公博、周佛海：《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60年版，70页；c、《第三党时论》。

略的浓厚兴趣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这样一个新颖的建议中，即建议中国共产党自行解散，让其所有的成员都加入到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一新的组织中来，用共产党的民族革命策略继续进行实现三民主义的斗争。^①邓演达曾经向中国和莫斯科的共产党领袖们提出过此建议，双方都回答他说这种建议是荒唐可笑的。之后，邓演达便打消了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合作的念头。在此后的著述中，邓演达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滥用民众的力量去追随莫斯科的空想。这时他同蒋介石、汪精卫一样愿意放弃联共，联苏的改组政策。这时，邓演达仍坚持他在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中的观点，他那时候是这样说的，“从现在起，我们党将在群众中建立起革命的基地。”

组织民众以及认为国民党只是代表民众利益的机构，这两者成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思想体系中的基本内容。这一点可以从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最早的声明中看到，该声明在1927年11月发表，有邓演达、孙中山夫人和陈友仁共同签名：

“……革命的民众，由希望解放的空想而进行实际斗争，由依靠‘好政府’盼望‘真命天子’的残梦中惊醒。他们必然的要去进行解放自己的工作。”^②

邓演达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看作是组织并激发群众积极性的机关，他认为，革命的实践要靠平民百姓来进行。这项声明继而请求国民党领导人尽快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回到群众中来，重新执行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制订的政策^③。

① 施存统：《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128页；筱林：《邓演达印象记》，载《社会新闻》7卷8期（1934·4·9）39页。

②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载《革命行动》1卷1期（1930·9），31页。

③ 同上。

希望通过一个代表大会就能解决重新统一革命阵营的想法，简直和先前那种让共产党自行解散来维持统一战线的想法一样不切实际。国民党“三大”并没有使这种建议成为现实。1928年，邓演达和一部分追随者与谭平山和一部分前中国共产党党员联合在一起，以图扩大并巩固他们的组织。^①

当然，实现这样一个计划是有种种阻力的。第一次统一战线破裂以后，中国出现了三角鼎立的军事阵营，蒋介石率南京政府同摇摇欲坠的军阀同盟进行决战，同时也向中国共产党发起进攻。军事集团间的武力争斗加剧了国民党的宗派主义倾向，国民党从本质上趋于衰败。^②主要的派系斗争发生在汪精卫及其所谓的国民党改组派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之间。为了向蒋介石发起进攻，国民党改组派继续鼓吹组织民众的工作，他们指责蒋介石践踏了国民党的民主原则，建立起了个人的独裁，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以民主为武器向蒋介石展开了政治攻势，这足见他们对蒋的攻击不是做做面子而是真真切切的。^③汪、蒋两派都坚持反对任何带有斗争性质的民众组织，都赞成保守观念并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与建设。也正是这种保守与一党专政的信仰成为南京政府无情镇压共产党以及象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那样的其它政治对手的理论依据。

国民党对于组织与动员民众已不再有丝毫的兴趣了，这一工作就留给了共产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革命政策进入实际斗争阶段，^④包括邓演达在内的国民党领导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毫无意义的暴动中牺牲群众，组织群众斗争好象是一场

① 谭氏虽然愿意与邓氏一道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但他反对解散共产党。见陈公博：《中国革命的危机与我们的错误》，1928年，10页。

② 山田辰雄在文章中对这场斗争在军事问题上作了分析。

③ 德里克：《国民党左派之群众运动》。

④ 关于中国共产党政策大变化的描述，见詹姆斯·宾克尼、哈里森（James Pinckney, Harrison），《夺取权力的长征：1921—1972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纽约1972年版，91页。

毫无建设意义的破坏运动。因而，邓演达赞同反共的舆论，把共产党说成是第三国际——他认为，这一组织必须予以消灭——的盲目破坏的工具。^①

根据邓演达的观点，中国人民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或屈服于南京的专制，或屈服于共产党的毫无意义的暴动。因为只有两种选择，所以邓演达觉得他必须致力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工作。

从1928年到1931年邓演达被捕并在11月份被杀害期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从总体上来看是他个人的组织。^②

即使是邓演达在1928——1930年旅居欧洲期间，其同志们也保证他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在这几年当中，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并在各主要城市中建立了支部，党员们在广大农村活动，在江西、福建和东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员增加到数千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主要成就在于组织民众方面的工作，在福建农村，作为建立自卫的农村基地总方针的一部分，邓演达在总政治部时的老同事江董琴组织了数千名的武装农民。^③

邓演达本人所作的努力，尤其是在1930年回国以后的工作，是非常卓越的。^④他长途跋涉，力图在全国吸收党员，而且显然他对东北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利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众多关

① 《第三党前身的社会民主党》(TSTCS), 33页，提供了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分歧的更多细节。

② 关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或第三党的历史，见《第三党时论》和TSTCS；台北行政院情报部门的报告，这些报告肯定上述邓及其追随者操纵PAC的事实。PAC全国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陈友仁，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并未加入第三党——译注），彭泽民，黄琪翔，李济琛，黄慕颜，杨逸棠，陈琪瑗，李烈均，程潜，陈浩洁（Chen Hao—ku音译）。有说还有张发奎和陈诚也在其中。

③ 同上；另见：琨琳：《第三党之在福建》，载《社会新闻》8卷4期（1933·4·12）；《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段活动概况》，1933·2·9，载TSTCS。

④ 同上；另见杨逸棠：《邓演达先生遗著》和《邓演达的道路》中的传记部分。

系，在下级军官中建立了一个支持其活动的阶层；他从事大量的著述工作，在《革命行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的政论文章；他本人亲自授课，培训干部，以便在群众中尤其是农民中开展工作；为使年轻的学生们能明确理解革命生活的要求，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与上海普通工人在同一物质水平上生活。为了总的斗争纲领，邓演达在这几年中所做的工作正是他把革命看作是民众工作而努力的真实写照。他认为，既然革命是一场自发的行动，国民党就必须满足公众的需求并代表平民的利益。①

在1930—1931年之间，邓演达联系1927年以来的中国历史，阐明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理论体系。他强调指出，随着国民政府在南京的确立，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

“自从1927年（民国16年），在南京的反动统治下，人民的痛苦加深了。……人民被饿死的千万计，被杀戮的百万计，现在还生存的不知死所！”②

“民国16年（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产生了南京统治。……甚么是南京统治的性质呢？这个问题的答复，在两三年以前或者是很难正确。……到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至于那天天受捐税剥削，官兵的掠夺屠杀，……吃草根的农村贫民们，老早就晓得，统治他们的是向来所未有的屠手，向来所未有的剥削与压迫。”③

邓演达继续指出，这些痛苦使人民的革命觉悟得到提高：

“我们不知道失败经过了多少次，但是，每一次失败随

① 同上，另见Chang Cuch—Ch'u,《往事》，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年版，100页。

② 《20年4月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见《邓演达先生遗著》208页。

③ 《中国到哪里去？》，见《革命行动》1卷1期（1930·8·10）3页。

即得着一次新的胜利，人民的觉悟力量即增加一分。……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物质的解放，更主要的是在于精神的解放，如果意识的觉悟未能达到相当的程度，则物质的解放决难做到。如果奴隶们不是自己有解放的力量，则外来的‘恩惠’及援助只是偶然的不可‘靠的怜爱，绝不是自由独立的保障（后半句英译文为：‘我们绝不能希望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译注）。牺牲流血不是革命的损失，不是革命的失败。”①

从上面的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邓演达认为革命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自觉行动变革着历史，同时，革命行动又促使人民觉悟得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必须唤起人民：

“不但我们自己要要求认识与理解，并且要把我们的认识理解扩充，传布给青年的劳苦民众，使新时代的发动力量底蕴蓄强大起来，准备好下次的决斗与胜利的前途。……我们现时失去的是许许多多牺牲了的青年同胞，要得到的是人的觉悟与解放！”②

平民革命斗争的直接敌人是南京政府。为什么南京政府是如此卑劣？为什么它不能够完善它所信奉的革命纲领？为什么是它加深了大众的痛苦？邓演达回答了这些问题，他抨击南京政府抛弃了农民和工人，指责它的个人独裁和官僚主义。他认为，南京政府根本无能力领导中国进行一场有益的变革，他力图从意识形

① 《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载《邓演达先生遗著》，83页。

② 同上，125页。

态上、文化上以及经济上解释南京政府的所作所为。^①

邓演达论证说，南京的国民党领导人不会理解平民的要求，因为巨大的经济与意识的障碍把他们与平民分隔开来。他进而得出结论说，南京统治的渊源在于封建主义，它代表着社会上的封建势力——诸如，土豪劣绅、买办、高利贷者、新旧军阀及其政治代言人，还有满清帝国遗留下来的官僚等——的利益，它还代表着中国新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及其在买办阶级中的同盟者构成了南京政府与中国革命主要外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的纽带，南京政权包罗了军事专制主义与官僚主义最卑劣的成份。西方帝国主义从文化上在南京政府与广大平民百姓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

“现在南京统治是在革命力量内部斗争中诞生的，它自然包含了旧社会势力的因素，……但它也包含了基督教徒和与美国相勾结的成份，……它在本质上实与太平革命时代的满清统治无异，所不同的只是：有众多的买办及银行家做它的基础，及反映这个基础的基督教意识。”^②

通过对经济的分析，邓演达获得了透视南京政府的方法，但是，他更加关切的是中国新政府与平民的关系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从社会分析的角度着手，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心问题上，邓演达得出结论说，尽管现代意识在形式上是非常的错综复杂，但南京政府集体意识化身的蒋介石

的灵魂是孔教，蒋氏的政治认识是维新后日本的典型。

① 这些观点贯穿于邓演达的著述之中，下面列举几处资料：

a、《邓演达先生遗著》，b、《邓演达的道路》，1946年上海；c、《邓演达先生殉难十七周年特辑》香港中华论坛社；d、《邓演达先生遗稿》，1932年；e、《邓演达先生遗著选集》，上海春潮书店1941年。

② 《中国到哪里去？》，见《邓演达先生遗著》，4页。

蒋氏的情感是中国的家族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蒋氏的意识是中国式的……最近他接受了耶教洗礼，虽然这件事在中国现时的历史阶段里是一件大事……但他的灵魂始终是孔教的。^①

以上这些基本的论述使用在包括戴季陶、胡汉民、李石曾等南京政府主要的理论家的身上真是再也真切不过了，同时也适用于象蔡元培那样的元老。至于基督教派的宋子文，张静江及其他人，他们只有“虚伪而浅薄”的社会意识。这就使得他们不能够把民众的需求当作他们自己的需求。^②

邓演达接着论证说，南京的国民党领导人是把传统的儒家观念作为社会准则的，他们之所以反对民众运动是因为儒家道德观念是主张杰出人物的统治和反对革命的，儒家思想约束了南京政府的政策的开明性与影响力。实际上，儒家思想与国民党民生、民主和民族主义（即反对帝国主义）的党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一方面，儒家思想认为，专制主义与官僚主义是永恒的，而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则与民众的民主参与意识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南京现在的经济目标是资本主义，这就需要一个有生气的意识与竞争精神，这又与儒家思想中和谐、合作精神唱了反调。没有普遍的民主作后盾，没有经济的变革，民族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南京政府只能把自己更加束缚于帝国主义的罗网上。这种革命目标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矛盾的解决，只有依赖于国民党现领导人意识的变革，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意识的变革只能是领导层的全盘改换。邓演达认为，只有已经认识到革命理想与儒家意识之矛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能领导推翻南京

① 《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同上书，59页。

② 同上，邓演达对“意识的形式”及行为中主意识很感兴趣，这显然是他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结果，虽然他反对韦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韦伯的分析只局限于文化方面，是不确切的，但他对韦伯讨论文化意识行为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统治的斗争。①同时，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必须立即进行斗争以图对自己本身的价值保持清醒的认识。革命需要出于自愿的最高行动，并对自身作出不断的估价：

一面有自己了解自己的觉悟，一面有了解新世界新时代的觉悟，一面对封建社会——传统的中国旧社会的解放，得着个性发展的自由，一面又须紧束自己，对残酷反动的中国孔教和基督教的联合统治及世界资本主义斗争：这种批评的奋斗工作就是我们党的神圣的工作、神圣的任务，也就是全中国青年劳苦民众的任务，也就是新的启蒙运动。我们现实失去的是许许多多牺牲了的青年同胞，而要得到的是人民的觉悟与解放！打倒孔教！打倒偶像崇拜主义及工具主义！打倒基督教！打倒孔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联合统治！……②

既然南京政府由于其思想体系的矛盾性而变得瘫痪无力，不可救药，邓演达得出结论说，只有民众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他继续鼓吹进行一场民众的革命——平民革命。他所说的平民是指：

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如直接参加生产的各种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以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③

邓演达民众大联合思想的敌人包括“土豪”、劣绅、资本家、官僚以及一切靠剥削而生存的人。平民革命的策略主要建立在组织群众，尤其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协会的基础上。这些由工会、妇

① 参见《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同上书，24页。

② 《中国到哪里去？》，同上书，82页。

③ 《革命行动》第1期，98页；另见《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同上书，143页。

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职业组织参加的协会，将建立一些组织机构并通过此机构向平民会议各机构选派代表。^①平民会议将从乡村一级建起一直扩大到全国一级。根据邓演达的设想，在渐次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这种会议将享有全面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邓演达认为，只要放权给生产协会中组织起来的平民，就能够在平民百姓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且防止重新产生专制主义与官僚主义。^②

邓演达全部革命纲领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建立民众组织即各种各样的职业组织。这种民众组织将取代现存的政治机构，由占劳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支配的平民会议将会满足广大平民对表决权的要求。这样，由平民直接参与政治，传统政府与封建残余将被消灭，新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将会诞生，随着社会政治与经济秩序趋于和谐一致，中国将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以便同帝国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一旦平民掌握政权，中国将能够实现现代化与工业化。^③

因此，邓演达摒弃了国民党传统的保守观念，主张立即并直接实现让平民参与政治、经济决策的纲领：

……在这里，我们要预先明白的是，过去及现在国民党的失败全在于空谈及行动与宣传相反。我们为着确立革命的基础，为着群众相信我们，必须立刻把我们的政纲在群众面前实行。同时，我们必须很迅速切实地抓住群众，要群众了解新的政权是他们的，要他们竭力地去保护（英文最后一句

① 《革命行动》第1期，90页。

② 邓演达：《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要取得的国民会议》，见《邓演达先生遗著》，83—103页；试比较邓演达对国民会议的设想与实际上由南京政府于1930年5月5—13日召开的国民会议的会议记录，参见《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及宣传词》，1931年版，着重看153—156页。

③ 《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见《邓演达先生遗著》，156页；另见《革命行动》第1期，53页。

为：“了解我们将竭力保护这个政权”——译注）。①

邓演达认为，革命有赖于民众的直接参加。他建议，要推翻南京政府就必须首先夺取一省大的地盘作为基地，要夺取政权就必须深入到现有的军队中去，取得中下级军官们的支持，必须取得与友好的军事力量的暂时合作，必须动员民众并把农民武装起来。民众的支持与军事力量的联合将会使人们联想起过去国民党的改组策略并且这将保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一省实行的控制。继军事准备之后，邓演达计划在政治与社会方面作如下的准备：

1. 组织革命委员会以临时接收政权及全权处分革命时期中人民会议成立前的政事；

2. 立刻进行组织该省的省民会议于首府或附近地区，以接收省级的政权，此省民会议即按照本党平民政权原则组成之，各县及乡村的新政权亦即行新组；

3. 立刻由革命委员会及省民会议颁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按本党预定的纲领实行之；

4. 立刻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由革命委员会及省民会议重新按照本党规定新的税率（原著如此——译注）；

5. 立刻由省民会议决定各职业团体抽丁入伍办法，构成新的人民武装。此种新入伍的士兵应在党的武装干部领导下，一切军队应改称平民革命军；

6. 立行设立以下各种训练班：

- a. 平民革命干部训练班；

- b. 政治管理训练班；

- c. 民众运动训练班；

① 《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及以后应该做什么？》，这是邓演达在被捕前刚刚草拟的手稿，见《邓演达先生遗著》，253页。

d. 农业改造训练班。^①

发动一省为基地的观点是邓演达同南京政府斗争总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从上述方案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基地的巩固有赖于政策的立即付诸实施，从一个省开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可以发动一场全国范围的运动。

邓演达认为，如果平民会议中的平民掌握政权，那么，中国就可以实行按计划发展经济。邓氏的纲领力图避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痛苦，而采纳民众参与制订政策的机制。他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应于现阶段中国的发展状况，但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因而象孙中山一样，邓演达建议实行一个他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中，中国的经济将由现在的封建主义农业经济过渡为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中国将发展一种适应人民需要的计划经济，在农村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在城市中实行有节制的资本主义，这些形式将逐步为完全的国有化和社会化所代替。邓演达基本上坚持了孙中山所设计的经济方案，但不同的是，他坚持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全过程中要让人民享有决策权。邓演达同南京政府在观点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主张立即进行在党的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复兴。^②

邓演达纲领中的最后一点就是，他要求实行土地革命，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③他总认为，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以农民为主的民众革命。在走向土地国有化的过渡阶段中，出于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的考虑，都必须重新分配土地。分配土地给农民将赢得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同时也将部分地实践国民党减少民众痛苦的

① 同上。

② 南京关于训政时期党的任务的主张，见罗伯特·E·彼德斯基(Robert E. Bedeski)：《训政时期与国民党思想体系中的国民革命》，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46期(1971·4—6) 308—331页；邓演达的经济政策，见《怎样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载《邓演达先生遗著》，156页；《革命行动》，第1期53页。

③ 同上。

许诺，归还农民自己的土地将有助于农业重新恢复活力，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有了自己的土地，同时得到政府信贷与技术的援助，农民将会充当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运动的先锋。这种政策——而不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加深民众的痛苦——将会改善平民的生活条件。因此，邓演达没有避开重新分配土地的问题，这正是他所坚信的国民党政纲中的要旨。^①然而，他非常反对没有节制的没收与诉诸武力，因为这样会破坏中国经济复兴的机会：

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反对采取无条件的没收土地的方法。我们认为，共产党现时所采取的手段不过是代表极端情感的暴烈，……它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否定”色彩。我们认为，政治运动及社会运动——特别是经济制度的转移，绝不是用单纯否定消灭的方式可以做到；而是要用有组织的争斗程序，才能向前进展，否则只有灭亡与销毁，得不到什么。

邓演达继续说：

……共产党所实行的无条件的没收政策，不但会妨害农村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而且根本和封建残余及前资本主义时代中的中国经济不相适应。如果乡村的农地无条件的没收，则城市中的生产工具非同样没收不可，如果共产党光是没收土地，而不没收城市的工厂，则似厚于工业资本而薄于地主及自耕农；城市及乡村的生产工具，如果一齐没收，则结果必陷于自杀，因为中国现实需要的不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是平民革命。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成熟时期才能实行，而平民革命，则由前期资本主

^① 邓演达在世期间，国民党从未全面阐释过其土地政策，邓的土地政策基本上是国民党“一大”到二届三中全会（1927·3）之间形成的（此言值得商榷，邓演达的土地纲领是前后两个时期，尤其是后期——1930年5月回国后的土地纲领较为完备——译注），土地国有与土地再分配一贯是国民党的基本政策。

义时代达到社会主义的枢纽及杠杆。不从整个经济组织上去打算，以解决农民问题，以解决土地问题，光是从一时的狭隘的报复情感着手，则解决了的只是“性的”发泄，而不是社会问题及经济问题（英译文最后一句为：“不从整个经济上去打算，去解决农民问题，则土地没收只不过是暂时的、附属的工具而已。”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译注）。①

邓演达反对在革命政府领导下的经济恢复时期无节制地土地没收。这是他与共产党观点上相区别的唯一一点，他从未专门论述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差别，然而，他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充当苏联的工具。最使邓演达困惑的是，共产党对第三国际的盲目崇拜。他认为，中国人自己能够建立一种适应他们特殊需要的革命模式：

三年以来，南京的极端反动的政权，使人民的痛苦日益加深。同时，第三国际工具的中国共产党亦不顾客观的事实，想用盲目的方法毁灭中国的一切，使中国变为第三国际的附庸，苏联的属邦。②

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工具，它的目的是口头标榜的所谓世界革命。它的实际手段是牺牲中国革命以保护苏联，它是中国民族解放的障碍。它一面利用工农，而实际陷害工农、牺牲工农。……广大的平民群众要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要真实得到自己的解放，应该自己起来，消灭妨害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中国共产党势力。③

① 《邓演达先生遗著》，25页。

②③ 《19年9月15日对时局宣言》，见《革命行动》第1期第1页。（该文刊登在第2期上。——译者）

他要求在中国建立独立的革命形式，反对共产党依靠暴力没收的策略，反对瞿秋白、李立三和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搞的农民暴动，因而邓演达没有能够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尽管如此，他仍然同意其对手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继续借助马克思主义以形成中国革命的模式。他这种实用主义的、注重于中国的革命观念，取代了以前所持的国际主义理想。在其著述中，一个最普遍的观点就是，中国人民必须自己进行革命，而且必须是一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①

是民族主义意识使得邓演达与谭平山的合作出现了分裂。1928—1930年间谭平山曾与邓演达合作手创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以后，谭氏离开了这个组织。这两个人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多大的分歧，但在制定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指导方针的问题上他们却出现了明显的分裂。^②谭平山主张继续寻求这一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盟，希望以此来协调它的活动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关系。^③至于邓演达，我们已经知道，他自己设计了中国平民革命的模式，反对同第三国际继续合作，而继续倡导他1927年的建议：共产党不适合中国现时的需要，具有破坏性，最好应予以解散。邓演达是这样说的：

共产党纯粹是国际的，而我们是带民族性的。共产党以中国革命为手段，而我们的目的就是中国革命。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的革命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而我们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还是以小农及手工业的生产为主的组织，

① 国民党领导人包括邓氏在国民党改组派中的对手们都持有这种观点，参见汪精卫：《到汉演说概要》，载《国闻周报》，4卷28期（1927·7·24），9页。

② 谭平山：《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1928年；另见倪国昌：《第三党的从前》，载《社会新闻》，7卷11、12期（1937·2），147页；《第三党时论》（为国民党改组派出版的小册子——译者）。

③ 同上。

是被本国的高度租佃、高利贷、商业资本剥削及其他政治的掠夺并帝国主义所窒塞妨害而日就崩溃的经济组织。我们以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不是资本主义，而且在中国还未形成近代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胁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使农工的利益都确实得到保障，使农工利用能够平行的发展，用这种办法去建立平民政权。共产党只盲目地追求未来的空想；我们却要把历史现阶段上的要求得到解决。因此，共产党在目前要使中国社会更贫乏混乱化，我们却要使中国新社会秩序早日形成。①

邓演达否认在同南京政府的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同时排除了与武汉时期的旧盟友汪精卫、陈公博及国民党改组派合作的可能性。1928—1931年间，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向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已建立稳固统治地位的蒋介石发起了不断进攻。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以后，面对共同的敌人，派别斗争减弱了，因而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斗争也就搁置了起来。在抨击国民党改组派的时候，邓演达把其上层与下层进行了区分，上层指的是汪精卫、陈公博及其他一些高层领导人；下层是指改组派的少壮派，他们很可能对平民革命及组织民众的策略持同情态度。国民党改组派上层与蒋介石及其南京同党是一样没有希望的，因为，拿邓演达的话来说：

他们是一大群旧社会的统治或半统治的集团，他们只是因为偶然的一时的利益而共同合作。……他们的政策忽左忽右，忽而投降南京，忽而反对南京而投降北洋系和西山派。

① 《政治主张》，载《革命行动》第1期，62—63页。

他们的工作对象只是勾串及依附旧势力，他们无决心实现社会革命的主张，他们只是反蒋而不反南京统治，所以结果至多是取蒋而代之，或去一蒋介石而产生多数蒋介石。我们和改组派不同，我们不但要和现存的一切统治势力绝缘而且要坚决地进行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势力。我们认定，只有抱稳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而继续不断的和一切叛徒们战斗，才能克服伪善和凶恶，而使中国民众历年所受的痛苦羞辱一齐摆脱洗涤净尽。^①

因此，邓演达指出，国民党改组派的言辞乍听起来跟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一样的激进，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假面具而已，他们倡导民主与组织民众的诚意和实际行动完全是两码事。汪精卫及其追随者正在寻求与军阀以及准备反蒋的旧统治势力圈子中的每一个成员进行合作。因而，在争取赢得改组派中少壮势力的时候，邓演达抨击了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伪善。^②

邓演达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受到众多敌人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选择受到了限制。邓演达继续吸取并训练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新干部，把他们培养成为无私的革命者，号召他的信徒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普通工人与农民，自己置身于组织与动员群众的工作中。^③另外，他还继续扩大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联络并寻求对建立一省基地的工作有所帮助的政治与军事的同盟。很明显，邓之插手国民党军队使得蒋介石向他发起攻击，蒋亲自布置在1931年12月（1931年11月29日——译注）杀害了邓演达。^④随着邓演达的逝世，中国国民党临时行

① 同上。

② 山田辰雄和德里克都同意邓演达的分析。国民党改组派中许多年轻成员都与邓的主张一样，见杨汉晖(Yang Han—hui音译)：《现代中国政治教育》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

③ 《邓演达先生遗著》中“传略”部分；另见《第三党时论》和TSTCS。

④ 同上。

动委员会失去了组织的凝聚力。宋庆龄、彭泽民和其他一些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领袖人物都没有能力消除其中的派系争端，而派系活动则破坏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团结。没有了邓演达，他所领导的运动在历史上便不再占有重要地位了。^①

回顾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本身存在有好多缺陷，光靠邓演达的热情是根本无法克服的。首先，这场运动缺乏有效的组织。邓演达本人凭感情行事，在其著述中忽视了组织问题。他认为，一场革命运动主要依赖于对投入战斗的成员个体进行思想教育，把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看作是无私的革命者的集合体。这种缺乏组织的现象使人们联想起国民党早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一缺陷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长期生存下来的可能性。^②

紧接着的是，这场运动缺乏领导层。简单地说，就是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缺乏足够的、愿意为邓演达所倡导的思想献身的、有资格作为领导者的人物。而南京和国民党改组派以及中国共产党都给有理想的年轻人以抉择道路的机会。对追随者的争夺始终是一个问题。

最后一点，这场运动缺乏必需的基本力量，缺乏财政、军事甚至是民众的支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纲领大部分尚在筹划阶段。没有牢固的基础，起码也得有自己的组织及其成员的忠诚。作为掌握政权的主要条件，这些显然不足以保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生存。拿邓演达自己的话来说，革命是民众的运动。但是，光有民众本身证明还是不能行动的。

在关于革命理论的著述中，邓演达显然试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孙中山的学说揉合起来。他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工具以图

① 邓演达死后第三党的情况在以下文献中有所论述：a、王沛槐(Wang Pei-huai音译)，《革命的保证》，237页；b、《往事》，12页；c、《第三党产生的社会基础》，行政院调查局图记馆，台北。

② 组织的重要性这时已为年轻的活动家所广泛理解，见施存统：《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127页，另见陈公博：《国民革命的失败与我们的错误》，55页。

形成中国革命的模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国革命的幻想。对于邓演达来说，这种幻想的纲领已经存在于孙中山的民权、民族和民生三民主义原理之中了。因而，邓演达运用他所知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孙中山主义具有“科学的”、“国际的”或者说是普遍的基础。换言之，他试图使孙中山主义现代化。如果说中国革命是各社会形态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进程之一部分的话，那么，中国就应当用历史的科学去衡量她自身的经验。正是这种科学的方法论使得邓演达能够用经济的眼光来分析中国，使他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作出估计并预见到将来可能的发展道路。

在论述中国的现状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邓演达从马克思那里获得了一个分析事物的方法。正是这种透视事物的方法以及邓演达对中国历史所做的仔细分析，使他在后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不切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加以抵制。是马克思帮助邓演达增强了这样一种信念：孙中山已经为中国现阶段的斗争制订了一整套客观的奋斗目标。

邓演达制订这些行动纲领的目的在于加速国民党原理的实现。国民党无视革命的前途，只顾维持现状，对老百姓的痛苦置若罔闻，这些现象无时不在袭扰着邓演达的心绪。南京政府不是努力把人民从帝国主义、军阀以及政治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是和各种反动势力相勾结，革命前途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化为现实的恶梦。

在论及悲剧性的现时环境时，邓演达综合了以下两点。首先，他分析说，南京政府的所做所为在于集中力量建立集权的体制或者说是以利益的驱动而决定其信仰。其次，邓演达坚信民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有重新发展起来的潜在力量。邓演达在制定自己的革命模式的时候，把这两点同时都考虑在内。一方面是南京克服不了自己意识中居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南京政府以革命，民主和社会主义（原文如此Socialism——译注）作为号召，但这些号召又为其自身的官僚主义和专制者的利益所践踏；对立

的另一方面是平民百姓的潜在动力，由于社会动荡而遭受磨难和史无前例的痛苦，农民、工人以及所有的从事社会建设的力量正在觉醒，他们的政治觉悟已经达到起来进行革命的程度，这些平民百姓是行动起来实现国民党革命目标的唯一的真正希望。

在其革命战略策略中，邓演达试图把这两种因素都考虑在内。只有在其成员通过自检和教育不断焕发出个人的斗争精神，并体现出个人的价值的时候，国民党才能重新担负起革命的使命。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邓演达才强调进行教育的意义。邓演达所说的教育并非对平民百姓而言，而是指用民众对党员进行教育。只有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思想并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才会有真正的革命教育。一个人只有和群众打成一片，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

邓演达的纲领的着重点就在于实践。他认为，革命就是实现既定目标所付出的实际行动，一个革命者必须时常检验自己的信仰与意识是否与群众的利益相抵触，必须发动群众参加新的政治、经济组织并取得进步。邓演达认为，儒家意识使领导人沾染了专制主义、官僚主义、损人利己的恶习，使平民百姓忍受无尽的痛苦，打破这一桎梏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传统的行为方式。在实践这个大学学校里训育就成为必要。

要邓演达与南京国民党各派言归于好，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国民党虽然派系林立，但在一党专政和训政这方面却取得了惊人的一致。邓演达认为，革命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向平民学习，代表平民的利益，开辟提高平民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渠道。邓演达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政策对平民生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他反对任何给平民生活造成痛苦的权宜之计。

前面已经说过，邓演达反对共产党诉诸武力及没收土地造成经济崩坏的危险。对共产党的批评刚好说明了邓演达本人思想中的矛盾性，这也是其他孙中山主义者所共有的矛盾心理。也就是

说，他虽然提倡渐进主义与有条不紊的变革，但他想把国民党的纲领立即付诸实施，这就不可避免斗争和冲突带来的弊害。或许这种矛盾性是根本无法解决的。邓演达与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走得更近，只是他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邓演达同意毛泽东人民群众的、自愿参加的、尊重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还同意毛泽东反对盛行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观点，因此，他试图通过扩大民众行动机会、让达官显贵深入平民、加强教育、实践和进行斗争等方式，寻求一座弥合政府与平民之间鸿沟的桥梁。

邓演达和毛泽东在观点上趋于相似，这绝非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这种相似之处说明，对五四运动以后的整个中国历史需要进行一个反思。国民党民粹主义、自发主义以及动员民众的传统有着悠长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同盟会的初创时期。国民党的理论家从朱执信到孙逸仙（中山）在革命著作中都运用了这种方针。五四运动显然为这种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马克思主义激发了李大钊及其学生——包括毛泽东在内——思想意识中的中国民粹主义、自发主义和注重农民的新观念。邓演达作出了巨大努力试图在其纲领中体现出西方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全面繁荣资本主义的思想），以解决现时中国的诸多问题。邓演达独具一格的革命理论在他自己看来是指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总方针，是合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一体的革命思想，他希望这个综合思想能够适合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环境。

译自《亚洲思潮与社会》杂志第8卷（1978年）第8、9期
（Asian Thought & Society, Volume III, No. 8-9）

郭根山译 丁则勤 校

1913—1914年的沙皇俄国与蒙古

黄鸿钊 译 郑厚安、康右铭 校

译者按：这里刊出的37份俄国政府文件（文件前的编号是译者加的），译自《1913年—1914年沙皇俄国与蒙古》（Царская Россия и Монголия 1913—1914г.г.）。它登载在苏联的《红色档案》杂志（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上。这些文件，记载了沙皇俄国当年对中国外蒙地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活动情况，对研究这段历史有重大价值。译此以供参考。

原编者按：下面公布的文件是根据保存在革命和对外政策档案馆（外交部存档，第9政治部分）的原件复制的。所公布的文件全文，由阿·斯·叶鲁萨利姆斯和阿·勒·波波夫备好付印。

一、1913年11月1日（10月19日），驻蒙外交代表的紧急报告。

第277号

今年9月24日，我曾发第249号密电致宫廷大臣涅拉托夫，现补奏一事如下：

当我向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呈递委派我为俄国政府驻蒙外交代表及总领事的国书时，我受到了库伦从未有过的、非常隆重的欢迎。

我呈递这封国书，系在9月24日下午2时，这天也是呼图克图的生日。以前，这种接见多在呼图克图的夏宫举行（那座建筑系仿照总领事馆的大楼建造）。而这次却为了纪念蒙古人独立以来就日夜想望的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接见指定在库伦建筑得象

大蒙古包一样的一座大宫殿里举行，大门前有几个大帐篷作为前厅。

在接受国书之前，因适逢呼图克图生日，纳焦日内上校还率领蒙古旅的军官以及库伦部队的各级官员举行了一次阅兵礼。

在我方军官祝贺之前，我和总领事馆的官员受到了专门的接见。

中午12点前，全体代表身穿大礼服，集合在一起。我佩带了呼图克图赐给我的、只有郡王（二级王公）才能获有的瓦奇里勋章。刚过1点，蒙古外务部付大臣车林多尔济在许多身着大礼服的王公、官员的簇拥下来到，接我一起前往呼图克图的宫殿。

一队庄严隆重的马车行列，由外贝加尔第二营哥萨克骑兵随同，在前面给呼图克图派来接我的富丽堂皇的轿子开道。按照蒙古人的习惯，轿子由四个骑马的人抬着，走得很快。轿子上有两根长杠，杠的两端札有横木。横木的四端由四个抬轿子的骑马人放在他们马鞍的前面，随着马向前飞奔。蒙古的随员和领事馆赤塔第1团的20名哥萨克，骑着马在前后左右簇拥着。

当我来到宫前时，宫内官员迎接了我，并把我、总领事馆官员以及军官一起，引进了那个帐篷，在那里用砖茶招待我们。

不久，外务大臣杭达亲王来，接我和总领事馆的官员以及西伯利亚第20步兵团的两位军官（护卫队及特务队的队长），和他一同进入宫殿。那里，蒙古人的君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庄严地端坐在高高的、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宝座上。宝座前的台阶上站着蒙古内阁总理三音诺颜汗及代理内务大臣达尔罕亲王。右边一排站着身穿礼服的喇嘛，左边一排站着大臣、王公和贝子以上官员。

当我走上第3级台阶时，我就按照当地习俗献上了哈达（一条蔚兰色的长丝巾）和装在金色锦缎大信封里的已译成蒙文的国书。我接受了呼图克图回赠的哈达，站在宝座前的台阶上，宣读了祝贺他生日的祝词，并向他转达了皇帝陛下对他的问候以及派我为驻蒙外交代表和总领事一事。我向他表示：我一定遵照陛下

的旨意，尽一切努力来发展和巩固蒙俄之间的友好关系。我祝蒙古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进一步繁荣昌盛。

呼图克图听了我的祝词以后，对陛下的好意表示非常满意。他请我将他的这种心情转告俄国政府。

此后，纳焦日内和萨维利也夫上校也代表全体官兵，当着我的面，向呼图克图表示祝贺和献了哈达。蒙古旅及库伦部队的军官，穿着各式各样的制服，站在宝座前，呈现出一幅美丽的图画。

接见结束以后，我们来到了外务部。在那里，外务部和财政部的副大臣热情地招待我们喝茶，吃糖果及烤羊肉。4点过后，我仍然乘坐那台讲究的轿子，以同一方式返回总领事馆。在这里，呼图克图的亲信喇嘛，代表他给我送来了特制的西藏甜面包、其他甜食及礼品（一段西藏呢子、一段绸料及一张黑貂皮）。

另外，还给纳焦日内和萨维利也夫上校每人一段中国绸和一段西藏呢，给全体军官每人一段呢料。赠送西藏呢子是呼图克图的特权。

对抬轿子的骑手和陪送的蒙古官员，我慷慨地给了他们很多赏钱。

次日（9月25日）早晨，我赶往恰克图迎接伊尔库茨克总督，并参加了他领导的俄蒙贸易会议。宫廷狩猎官克尼亚泽夫于9月28日到达特罗茨科萨夫斯克。由于蒙古当局的特别关照，我于昨日傍晚顺利到达该地。

兹特附带说明，这个报告的副本将送给帝国驻北京的公使。

米勒尔

二、 1913年11月3日（10月21日）外交纪事

11月初，蒙古总理大臣三音诺颜汗率特别使团到达圣彼得堡。他带来了呼图克图给皇帝陛下的亲笔信及一枚成吉思汗勋章。

毫无疑问，三音诺颜汗希望，他在俄国将会受到不低于去年杭

达多尔济受到的礼遇和接待。后者当时作为宫廷的客人受到了皇帝的接见，并由宫廷担负其在圣彼得堡的一切费用。

三音诺颜汗受呼图克图的委托以及他作为蒙古头号政治家及成吉思汗嫡系子孙所处的地位，都使他享有这样的权利。不这样接待他就意味着对他的极大侮辱，从而使我们疏远了当前最有影响的蒙古官员。这位官员已向我们确切证明，他是忠实遵循我们的指示的。

三、1913年11月5日（10月23日）驻北京公使的 密电。第703号

袁世凯今天发布三道命令，在三天内消灭“国民党”。凡参加了这个党的议员，将失去代表资格并遣送还乡。这项措施的官方理由，是这个党参加了南方的革命运动，反对善后大借款，拒绝有关蒙古问题的俄中协议的第三次草案，并力图推翻现政府。袁世凯用这种办法来铲除议会中的反对派。从此，他将不会受到任何反抗。

克鲁平斯基

四、1913年11月10日（10月28日）代理外交大臣致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3075号

参考克鲁平斯基的第714号 ①电报。

请坚决劝告蒙古政府停止在内蒙的军事行动，因为如果中国派军去攻击蒙军，蒙军就会遭到歼灭，而中国人之所以尚未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担心俄国干涉。由于俄中两国签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声明，这种担心已经消失。

涅拉托夫

① 在1913年11月7日（10月25日）的电报中，驻北京公使克鲁平斯基转达了中国外务部请求俄国政府促使蒙古人停止在内蒙敌视汉人的行动。

五、1913年11月10日（10月28日）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的密电。第3076号

我已通知驻库伦的外交代表。

第714号电报收到。

中国公使已将督促蒙古人从内蒙撤军的请求转给了我们。

我们回答说，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建议蒙古政府停止反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并愿为此再作一次努力。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建议一定会起作用。要他们停止与中国对抗，最好是尽快签订俄中声明里提到的俄、中、蒙三方协定。

涅拉托夫

六、1913年11月10日（10月28日）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290号

参考克鲁平斯基的第714号电报。

蒙古政府（我曾要求它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今天通知我：中国军队在昭乌达盟巴林旗和内蒙其他地方大批屠杀蒙古人、察哈尔人和土默特人。对于这一问题，我指出，蒙军撤回喀尔喀边界以及将其军事行动停止得越快，对内蒙古人及库伦政府就越有利。

米勒尔

七、1913年11月10（10月28日）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291号

参考我第290号电报。现致电北京：

呼图克图在下令撤军及停火以后，请求中国人不要再骚扰内蒙古人。

米勒尔

八、1913年11月10日（10月28日）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293号

收到你3034号电报。^①

蒙古政府送来了呼图克图关于停火的命令，同时坚决要求立即从蒙古旅拨20万发子弹给他们，以供境内的需要。其中一部分是供给撤回到边界上的部队的，以便他们不至因为没有子弹而叛变并跑到中国人那边去；其余部分则保存在库伦的武器库里，俾内部敌人知道蒙古政府是有子弹的，因而不敢轻举妄动。外务大臣在向我转达这些请求时，做了最真诚的保证。他说，这批要求的子弹，他们决不用于内蒙，因为那里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我知道，蒙古人确实没有子弹了，所以同意他们的这项请求。纳焦日内上校也未提出异议。

米勒尔

九、1913年11月13日（10月31日）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296号

致北京电。

蒙古政府通知我：土谢图王带着呼图克图停火并撤军的命令到南方部队以后，由于接到中国人对蒙古土默特人使用暴力的报告，便又向中国军队方面前进。我告诉蒙古人：这类消息都是中国人的诡计，目的是要谴责蒙古人发动新的进攻。我建议立即再派人去前方，要他们服从呼图克图的命令。这一建议已付诸实施

米勒尔

十、1913年11月13日（10月31日）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的密电。第3107号

通知驻库伦的外交代表。

^① 1913年11月7日（10月25日），涅拉托夫致米勒尔的第3034号密电说，俄国外交部不同意蒙古政府打算再要一大批武器的计划。自从俄中签订关于蒙古的声明之后，蒙古人还在进攻，最近给他们的200万贷款，都被他们用在内蒙的“狂妄的冒险”上了。

参考米勒尔的第291号电报。

第1号

鉴于米勒尔给你的第2号电报所指出的中国军队大批屠杀内蒙古人的情况，我们认为必须提请中国政府严重注意，这类行动是不可容忍的。它使我们无法要求蒙古政府同意以外蒙的边界为边界。内蒙王公不止一次地要求我们，保护他们不受中国人的伤害。我们拒绝了这些请求。但是，如果中国继续执行残酷的镇压政策，我们就很难加以拒绝。另一方面，对内蒙古人的镇压，将会激起外蒙古人的敌对。这样，蒙古地区的安定就难以实现，而这种安定对中国政府以及对俄国在蒙古的贸易都是很需要的。

由于昭乌达盟为日本势力范围，因此可以要日本公使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合作。如果他拒绝这样做，你仍须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建议，但要针对整个内蒙和南蒙。

涅拉托夫

十一、1913年11月15日（11月2日）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303号

已收到第3105号电报。现致电克鲁平斯基：

10月28日，外务部和兵部大臣来访时，我私下向他们介绍了俄中双方已经互换的、关于蒙古问题的共同声明，同时指出，大概在恰克图还要举行三方会谈。我提醒他们，帝国政府深信，要使喀尔喀完全脱离中国，是不可能的；库伦政府要吞并内蒙（这点我们并不赞同），也是办不到的。我并且告诉他们：中国政府有必要在蒙古拥有自己的代表，来处理为数众多的中国人的问题。我答应，我将把承认现有边界内自治蒙古的细节，通知蒙古的大臣。蒙古大臣开始时显得很不安，可是后来由于寄希望于三方会谈，才逐渐安静下来。今天或明天，我准备将详细情况通知蒙古人。他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蒙古问题的声明的消息。

米勒尔

十二、1913年11月15日（11月2日）驻北京公使的密电。第733号

已收到第3102^①及3107号电报。

我担心，要日本公使注意我们就中国军队在内蒙进行镇压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的企图，会对我们十分不利。山座园可能与我合作，也可能拒绝这样做，并利用这事去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相信我们正努力使日本干涉内蒙事务，而这正是中国人非常害怕的。他还会说，我们看上了北满，不过，出于对中国的友谊，日本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我深信，日本人随时都会玩弄这类把戏。他们一遇机会就要挑拨中国人，说俄国处处与中国为敌，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投靠日本。因此，给这类阴谋提供口实很不恰当，特别是在目前，中国人希望与我们接近，以免为野心勃勃的日本所垄断。鉴于以上情况，我请求受权向中国人解释，而不至为日本公使的……所打动。^②根据米勒尔第290号及291号电报，我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它的军队在内蒙的活动方式。我深信，我的忠告将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我准备将这点告诉外交总长，并通过可靠的人通知大总统。敬候指示。

克鲁平斯基

十三、1913年11月16日（11月3日）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304号

电克鲁平斯基。参考我第303号电报。

今天我机密地让蒙古外务大臣了解了俄中之间就蒙古问题交换的联合声明及照会。杭达亲王不顾我提出的中国宗主权只是有名无实的一切理由，还是坚持己见，说即便是这样的从属关系也会使中国把外蒙重新变为它的一个省。蒙古人宁愿要俄国作它的

^① 涅拉托夫的第3102号电报，是米勒尔用第290号电报转达给北京的。

^② 原文省略。

宗主国。杭达亲王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蒙古没有必要参加三方会谈。他临别时非常激动，说作为抗议中国宗主权的一种方式，蒙古部队将不予撤回。我指着 he 转交给我的呼图克图撤军的命令表示：我有责任警告他，蒙古政府不得采取这种轻率的举动。

米勒尔

十四、1913年11月18日（11月5日）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的 密电。第3143号

第733号电报已收到。

鉴于你所说的顾虑，我们不反对撤开日本公使，甚至不通知他，就把中国军队在内蒙古的行动通知中国政府。你在告诉中国政府时，可以采用我们在第3107号电报结尾部分所提到的那种普通的方式。

同时，还请敦促中国政府，特别注意齐齐哈尔针对呼伦贝尔的备战活动。这些活动是阿法那西也夫先生在第2459号电报①中报告的。我们没有把呼伦贝尔纳入自治蒙古，而且原则上也同意中国在这里恢复主权。但是，这只能以我们为中间人的和平谈判来实现。以武装力量来迫使呼伦贝尔归服中国，将会影响到俄国的利益，对此我们是不能坐视的。

要记住，我们没有把恢复中国在呼伦贝尔的主权和它在北满的武装力量一事联系在一起。

萨佐诺夫

十五、1913年11月18日（11月5日）驻北京公使的密电。第74 2号

收到11月5日的电报。②

我已将来示所说的意思通知了外交总长。他答应我，他将立

① 阿法那西也夫是俄国驻齐齐哈尔的领事。

② 第3143号。

即严令内蒙和南蒙的中国军队指挥官，不得对当地居民采取镇压手段；而且，在公布声明全文之后，还将由大总统向全体官员发布命令，尽可能地给内蒙居民以合作和保护。於此，总长还通知我，在归化城附近又出现了一支相当数量的库伦政府军队，并再次请求我们协助撤回。在我谈到齐齐哈尔的军事准备时，总长回答说，不存在讨伐呼伦贝尔的问题。中国政府希望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恢复那里的权力，并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调停深表感谢。不过，这位总长同时也表明：中国在呼伦贝尔不能放弃派遣官员和军队的权利。对于他提出的我们将以什么为基础和如何就呼伦贝尔问题进行谈判，我回答说，在这方面我还没有接到帝国政府的训令。

克鲁平斯基

十六、1913年11月19日（11月6日）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的密电。第3152号

我已将此电通知驻库伦代表。

最近，俄国商队将一批外国货从中国内地经张家口运往库伦。这些商人似乎用的是天津领事馆发的护照。这对贩运俄货去蒙古的莫斯科商人带来了损失。

如果你没有异议，请速电令天津以及所属各地的领事，不要再按1881年陆路通商条约第10款发放护照。这个命令可以用自治蒙古业已建立（由于10月23日的中俄声明）、而它还没有来得及根据此声明制订商品运输条例来解释。

请电告：你是否还有其他办法，阻止货物从中国运往蒙古。

涅拉托夫

十七、1913年11月20日（11月7日）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310号

副本已送克鲁平斯基。

参考第304号电报。

蒙古大臣情绪已好起来了。外务大臣要求，给他一份中国政府不再伤害内蒙古人、察哈尔人及土默特人的保证书。我向他指出，三方会谈将是同中国就此问题及其它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的最好方法。杭达多尔济说，将派三音诺颜汗作为这次会谈的首席代表。他的助手是车林多尔济。财政大臣及各旗王公毫不掩饰他们对结束这场战争的高兴情绪。这场战争已花空了蒙古的国库及国家资源。

米勒尔

十八、1913年11月21日（11月8日）代理外交大臣致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3197号

为了阻止从中国把外国货运往蒙古，我们已向驻中国各地的领事提出，不再给经张家口运送货物的商队发放护照。这项命令，可用自治蒙古业已建立（由于10月23日的声明），而它的商品运输条例还没有制订出来作解释。

请电告，你是否找到阻止俄国商人，经张家口和海拉尔，把货物从中国运往蒙古的措施，例如在外蒙境内抽税或其他办法？

涅拉托夫

十九、1913年11月21日（11月8日）驻蒙外交代表的紧急报告。第312号

从1913年10月23日俄中两国关于蒙古问题的共同声明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库伦政府将怎样来维持自治外蒙的内部体制以及保持它的权力。

内部体制的改革及维持一支虽然不大、但组织和纪律良好的军队，都需要用钱，而蒙古政府目前却没有这笔钱。

库伦当局漫无目的而又耗资昂贵的进攻政策，把国家搞得民穷财尽。各旗都对它们的日益贫困而怨声载道。

蒙古大臣和各旗王公，尽管在独立以后蔑视汉人以及了解在经济上依赖汉人的坏处，但仍然不断地向汉族商人和商行随便借款，丝毫不考虑偿还的日期。他们甚至相信，这种借款可以不还，因为蒙古已脱离中国，它与这个国家的一切旧账也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蒙古政府欠大清银行库伦分行的债，本利共约150万卢布。该行行长在要求偿还这笔债款时所得的答复是：既然中国人已经推翻了清朝政府，那么蒙古政府认为，它和大清银行的债务也就取消了。

此外，北京的许多商行，要从王公、官员以及老百姓等蒙古债务人那里，讨还几十万卢布的债款。中国商行也打算要蒙古政府赔偿蒙军在内蒙及科布多造成的损失。

不容置疑，随着中国政府代表来到库伦，上述财务上的要求将会更为坚决，而蒙古政府被这些要求所陷入的困境，又将由于官兵的不满而更为复杂起来。这些不满是由于财政匮乏、库空如洗，以至不能发放工资而引起的。

随着中国政府代表到达库伦，蒙古政府自汉族商人的货物以及居民那里所征得的各种税收（每年总共约100万卢布），也将停止。在这一点上，蒙古人当然要归罪于承认中国对外蒙拥有宗主权的俄国。

中国政府代表来到库伦以后，中国、日本、美国和德国的企业主也可能会到库伦来。他们以中国或者他们自己的名义，建议在蒙古发放诱人的、条件似乎十分优惠的贷款。到那时，就不可能阻止蒙古人，去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易和协定了。其结果，将使整个外蒙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中国和外国人。

此外，我们不能指望由蒙古政府拨款来维持俄国军官指挥的蒙古旅，而我国军队遵照共同声明第三款，将要撤离外蒙。为了支持这个仍然虚弱的蒙古政府以保持其权力，蒙古旅应该予以扩充。

鉴于上述情况，从我国在蒙利益出发，再给蒙古政府300万卢布的新贷款，看来是适当的。蒙古政府已经提出了这种申请。此外，我们还应在库伦赶快开办蒙古银行。该行和计划设立的俄国财政顾问一道，可以帮助蒙古抵制中国和外国的经济压力。

上述贷款的一部分应用作扩编后的蒙古旅的经费。

蒙古人对于中国的压迫开办出现了一种恐惧的气氛。兵部大臣达赖王和达尔罕和硕亲王旗的执政王公，已要求我给他们20万卢布贷款，以偿付中国债主。

特别是在这个时刻，给予及时的财政援助，将会增强蒙古人对我们的信任。这种信任，由于我们在今年10月23日的共同声明里承认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似乎放弃了它在外蒙的影响，因而正在动摇。

米勒尔

二十、1913年11月25日（11月12日）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

第321号

电告克鲁平斯基：

蒙古政府要求我把它决定参加三方会谈一事通知帝国政府。一旦得知开会日期，它就立即把代表名单通知我。它再次要求我们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使其停火和撤军。呼图克图关于这事的命令已发给蒙古军队。外务大臣、兵部大臣及活佛的亲信苏伦达木定拜访了我，并再次提出拨给他们100万发子弹的要求。这些子弹将用现金支付。他们保证：这些子弹只是境内所需，决不会用于喀尔喀境外。在上述子弹运到以前，我请求从蒙古旅拨给他们20万发子弹。

米勒尔

**二十一、1913年11月26日（11月13日）的电报。第2767号
第31790号电报^①已收到。**

关于中俄两国商人从中国运入蒙古货物的建议，我只应用了一次，因为他们的中国伙计给蒙古海关已乖乖地交纳了关税。但是，我却断然拒绝了一个俄国大商行与中国商行所订立的、把中外货物运往乌里雅苏台的契约。为了阻止货物从满洲经海拉尔及张家口运往蒙古，我与工商部代表认为采取下列措施是有利的：

1, 经上述路线运输外国货物的人，即令自称是俄国人，在这笔交易中没有中国人参与，也要运用我建议的办法；

2, 采取措施，把堆集在上乌丁斯克指定要运往蒙古的货物，经上乌丁斯克至恰克图的路线，加速运走。为此，除了贝加尔轮船公司及恰克图驿站之外，必须立即把保护关税扩大到把货物运到恰克图的那些马车主身上。这些货物必须与铁路运货单在恰克图海关一起呈交。海关根据运货单检查以后，再开具运往蒙古的证明。这证明与铁路运货单一起，作为享受保护关税的证件。我们的和中国的商人，把在上乌丁斯克到恰克图之间积压的中外货物，沿上述路线运往库伦。由于积压货物很多，经恰克图至库伦的车运费也大大地提高了。同样内容的电报也发给了工商部大臣以及对蒙古市场感兴趣的俄国商行。

米勒尔

**二十二、1913年12月2日（12月18日）驻蒙外交代表
的紧急报告。第333号**

在今年11月8日所发第312号密电的同时，我还向阁下提供了一份以我名义写的秘密报告的副本。这个报告（第317号）是工商部代表11月8日送到总领事馆来的，内容是蒙古王公所欠库伦和乌里雅苏台原大清银行的债务情况。

根据博洛班先生所列举的情况，蒙古人欠上述中国银行的借款，光本金就有100万卢布，若连同利息则达150万卢布。

^① 系副本上的错误，本文是根据它复制的，应为“3179”号。

在这些大债务人中，有呼图克图及他的两名大臣：杭达亲王及三音诺颜汗。其余的大臣和王公只是一些次要的债务人。

蒙古外务大臣的不满，是由于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而产生的。据我所得情报，杭达亲王确曾表示，蒙古要完全脱离中国。这意味着废除对中国银行的一切债务。

很难设想中国政府会要求蒙古人立即偿还一切债款，但是可以肯定，它会坚持：只有偿还部分欠债及支付未清债款的利息，它才肯发放新的贷款，以便套住蒙古人，从而不断找到借口来干涉蒙古的经济事务。

我认为有义务补充说明，并将报告的副本、附件，提交帝国驻北京公使。

米勒尔

第333号文件附件

1913年11月21日（11月8日），工商部驻蒙代表以帝国外交代表及驻蒙总领事的名义所提交的情况报告（第317号）副本。

我有幸通知阁下，蒙古王公对库伦前大清银行及乌里雅苏台支行所欠债款总数共为库平银68.8万两，约合100万卢布。偿还期分别为1910年、1911年及1912年，但已偿还的只有1/4。银行至今还在讨债。

该银行最大的债户是：(1)土谢图汗盟——库平银148,212两；(2)替博克多汗（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译者）管理沙比和财产的商卓特巴——库平银138,100两；(3)外务大臣杭达亲王——库平银39,627两；(4)三音诺颜汗——库平银33,061两。详细报告我已于不久前送交工商部贸易局了，同时，遵照指示，还将送财政部总办公室。

已核实。

总领事馆秘书：希奥宁

二十三、1913年12月2日（11月19日）驻蒙外交代表
的紧急报告。第336号。

6月30日我国政府的对华声明，我已及时通知了蒙古政府，并对俄中谈判的指导原则的真实含意作了说明（7月6日的密电以及7月9日和27日的报告。第105号、106号①及132号②）。

蒙古大臣不理睬我的说明和保证。我说，外蒙古无论如何不能立即从中国的一个省变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并列举了巴尔干国家作例子。但他们仍然顽固地坚持不现实的“完全脱离中国”及吞并内蒙的想法。他们坚持说，随着满清王朝的被推翻，一切蒙古人都独立了，不再承认汉人有什么统治权，因为汉人过去也和蒙古人一样受满人统治。既然蒙古人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那么他们就有权建立自己的包括内蒙在内的独立国家，就像汉人在袁世凯领导下所建立的共和国一样。

蒙古政府把实现这些天真古怪的想法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三音诺颜汗特使身上。

我在收到敦促蒙古政府停火及把蒙军撤回喀尔喀境内的指示以后，立即和库伦当局进行了谈判，并在今年10月28日将俄中互换共同声明一事，通知了来访的外务部和兵部大臣。我没有向他们介绍细节，只是重复了上面所说的那种想法。

蒙古大臣认为，这些想法对他们完全脱离中国以及吞并内蒙的要求，并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10月28日我收到了外务大臣关于呼图克图发布的撤军

① 在1913年7月9日的紧急报告中，米勒尔说：他已将俄国政府6月30日向中国提出的声明全文交给了蒙古政府；达喇嘛反对自治蒙古一词不包括内蒙，并反对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

② 米勒尔在寄上1913年7月27日第132号报告时，还附有蒙古外务大臣1913年7月14日照会的译文及7月21日对此照会的复文副本。

命令的照会和译成俄文的这份咨文^①。

在11月1日与杭达亲王签署降低电报价格的补充协议以及收到外务部11月2日关于撤军的照会以后，我向杭达亲王开诚布公地介绍了俄国和中国承认自治外蒙的详细情况（我今年11月2日的密电。第304号）。

尽管蒙古人不顾阁下提醒的上述情况，他们对我们与中国的谈判还是作了一些准备。我的通知使杭达亲王十分苦恼，并第一次看到他是如此激动。

这事导致了蒙古政府11月4日的照会。该照会表示：（俄中）两国政府“决定”使外蒙服从中国的宗主权，是蒙古政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不是共同商讨的结果，而是（俄中）两方所制定。

对此照会，我未予回答。我在等待训令，以便在共同声明及照会公布后，将它们通知蒙古政府（我今年11月15日的密电。第324号^②）。

当我把11月7日从蒙古各地长期旅行回来的工商部代表介绍给蒙古大臣时，我发现，杭达亲王及其同僚的情绪已大为好转。财政大臣则毫不掩饰他对结束这场耗尽蒙古国库资金而又未带来任何明显好处的战争所感到的高兴。

根据我所获资料，从今年11月2日以来，蒙古人对俄国人的关系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改善了。各旗王公、居民对俄中“五条”声明表示赞同，因为他们以后可以不再出兵和为任何军事演习出钱了。

这种情绪对我们无疑是有利的，库伦当局对此也很清楚。它由于担心内部而不敢公然反对。这迫使蒙古的大臣坚请发放已答应给它的4000支步枪及2000〔Sic!〕发子弹——只有100万发子弹。

^① 即我们发出的这份文件。

^② 密电第324号，米勒尔询问，是否公布1913年10月23日关于蒙古问题的共同声明及照会，以及他是否能将这些文件通知蒙古政府。

以使居民们看到，政府是有储备的弹药的。蒙古大臣为了请求发放这些子弹，一再向我保证：这些弹药只是用来反对内部敌人，决不会用于境外的军事行动。

杭达亲王在头一次发怒时对我说，由于承认了中国对喀尔喀的宗主权，蒙古人参加三方会谈是无益的。在情绪安定下来以后，他又改变初衷，和兵部大臣达赖王及呼图克图的代表苏伦达木定一起，请求我正式通知帝国政府，说蒙古政府希望参加三方会谈（我今年11月12日的密电。第321号）。我提醒他们，蒙古政府的这项愿望已于今年8月30日的照会通知我了（共戴三年中秋月12日），我当时并没有忘记报告帝国政府（我9月6日及9日的秘密报告。第216号、218号^①）。

杭达亲王问道：三方会谈能否对蒙古政府认为重要的问题加以重视。我回答说，共同声明和照会所叙述的原则，是三方会谈的基础。我建议他将所有蒙古政府认为重要的问题拟成提纲，只要不超出上述文件的范围，我将给他帮助。

蒙古对中国的关系，在俄中互换共同声明和照会以后，没有任何变化。

总之，此地的生活目前太平无事。

在报告阁下上述事件的同时，此报告副本已送交帝国驻北京公使。

米勒尔

二十四、上沙皇的纪录稿^②

抵达此地的蒙古特别使团团团长三音诺颜汗，将库伦呼图克图致陛下亲笔信的译文本交给了我。这就是呼图克图呈给陛下成吉思汗勋章、皇太子拉奇里勋章的国书。

^① 米勒尔在1913年9月9日给外交部第218号报告同时，附上了他8月29日致蒙古政府的照会及蒙古政府8月29日、30日的两个来照。

^② 纪录稿没有标明日期。蒙古代表团于11月12日离开圣彼得堡去里发几亚。

谨将该译文本伏呈大慈大悲的陛下过目，并奏陈如下：

三音诺颜汗已经知道了今年10月23日驻北京公使所签关于蒙古问题共同声明的内容。他在得悉这个声明承认自治蒙古不包括内蒙以后表示：鉴于这项事实，呼图克图在信的结尾部分提出的、给蒙古武器以抵抗内蒙汉人的请求，请予以删去。

二十五、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科科夫措夫的信稿^① 秘密。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先生阁下：

到达圣彼得堡的蒙古总理三音诺颜汗，是现在最有威望的蒙古官员。这一点，可由他出身的门第、个人的才智及在蒙古政府中所处的地位，得到说明。三音诺颜汗不认为他是蒙古宣布独立前俄国的拥护者。但是，由于被召到库伦，他担任了政府首脑，对待俄国利益的态度十分积极。我们在库伦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解决的。此人与蒙古内务大臣达喇嘛不同。他完全没有沙文主义者那种极端的不信任态度，也不像蒙古内部许多亲华分子那样，为了个人私利来阿谀奉承。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利用三音诺颜汗在圣彼得堡逗留的机会，把他完全拉到我们这边来，使他支持我们在蒙古的一切活动。

正如阁下所知，三音诺颜汗的使命是要得到我们在财政和军事两个方面的帮助，而这正是蒙古政府的弱点。库伦政府力图把所有的蒙古人都纳入它的统治之下，因而把它的军队派到了内蒙的和南蒙。对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的轻易取胜，使它对此事的实现满怀希望。为了进行这场战争，它需要武器，于是坚决请求给它步枪和大炮。不言而喻，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支持蒙古的帝国主义，只能有节制地给它一小批武器，以免它责备我们不支持蒙古，同时也是为了不让它被强大得多的中国所消灭。自从签署

^① 在扉页上有附注：“11月23日（星期六）致弗·恩·科科夫措夫的信，是格·阿·科札科夫发的第98361号急件。”

了10月23日共同声明以来，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支持蒙古人的领土企图了。我们必须赶快结束蒙中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给蒙古政府所想要的大批武器。

同时，如我奉告你的，支持三音诺颜汗，不让他空手回去，对我们在蒙古的总的地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第二个要求——贷款。否则，他回库伦以后，就会因为不能完成使命而受到责备。他的威信将会下降，从而不再愿意为我们的计划和利益服务。

我们上次给蒙古人的200万贷款，已几乎全部被蒙古政府用掉了。这次贷款，大约有1/4是留作在蒙古组建由我们教官指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我们政治服务的蒙古旅之用的。其余的钱，则用于蒙古政府的当前需要及购买武器。这些武器我们很难拒绝，因为我们要求蒙古人参加保卫他们的领土，以防中国进攻。现在蒙古依然像以前一样库空如洗，没有钱着手组织国家。在蒙古，唯一能做这事的人，只有三音诺颜汗。

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蒙古以及我们自己的利益，应该承认，给蒙古政府一笔二、三百万卢布的新贷款，是必要的。当然，这项贷款可以而且必须用一些条件加以限制，以保证它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看来，在蒙中之间建立正常关系及聘请俄国顾问到蒙古工作，必须作为贷款的条件。顾问合同应该明确规定顾问的作用，要让他着手组织蒙古正规的税收体系。

也许，阁下会认为，在给蒙古的新贷款中，还需要提出另外一些条件。但是，我认为，贷款原则上应该肯定是有需要的。这是因为，它可以使蒙古政府整顿其经济组织，即使没有俄国的进一步贷款，也能自立。同时，这也是为了支持三音诺颜汗。他的合作，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

二十六、1913年12月9日(11月26日)代理外交大臣致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3326号。

中国特使在要求敦促蒙古人停止反华战争的同时，指出在蒙古军队里有俄国人，并要求将其召回。

我们回答说，在蒙古军队中确实有一些俄国冒险分子。他们在铤而走险，我们无法将他们召回。

如果可能，请你就此事通知蒙古政府，要在蒙军中作战的俄国人停止军事行动。

涅拉托夫

二十七、1913年12月13(11月30日)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的密电。第3385号。

通知驻蒙外交代表。

库伦条约第二款规定：俄国臣民可以免税运货到蒙古。我们认为，对我们最有利的就是将此款解释为：只限于通过俄蒙边界运货，才得免税。在蒙古边界的其他地段，我们只消要求，俄国贸易须与其他最惠国的贸易平等相待。

商务大臣希望，未来的俄、中、蒙协约，要能使蒙古政府有权向从中国(运来的货物)征税，而对从俄国(运来的货物)免税。无疑，这样的安排是符合俄国在蒙古的贸易利益的。不过，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会同意这样做，这样做是否会引起其他强国的抗议？特别是德国外交大臣在议会声明：德国只承认我们与中国条约上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不违背机会均等的基本原则。

请将你对上述事件的结论电告。

萨佐诺夫

二十八、1913年12月16日(12月3日)蒙古特使内阁总理大臣致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的信(译文)

尊敬的大臣阁下：为了配合俄中两国用三方会谈的方式来解决蒙古问题，并结束对中蒙两方都有害的战争，蒙古政府已下令停火并召回自己的军队。请俄国政府将上述情况通知中国政府，

并敦促它也尽快召回在内蒙古地区作战的部队，从而给和谈创造良好的气氛。

如果阁下认为可能，请促其实现。谨致崇高的敬意。

蒙古特使、内阁总理大臣三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

共戴三年中冬月18日，1913年12月3日

二十九、1913年12月16日（12月3日）蒙古特使、内阁总理大臣致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的信（译文）

伟大的俄国外交大臣先生

大臣阁下：我荣幸地得悉今年11月7日阁下转来的、俄中两国政府关于蒙古问题的共同声明以及互换照会的内容。

我已就上述声明、照会与我国政府进行了联系。根据11月25日收到的博克多格根及敝国政府的指示，我认为有责任通知阁下，蒙古深深感谢俄国为维护它的自主所做的一切。

蒙古政府在了解共同声明和照会的内容以后，确信：俄中两国将会维护蒙古现在的体制，承认它在处理贸易、铁路、电报及财经等内部事务以及在与其它强国的关系方面，享有自主的权利。

俄中两国保证不干涉上述事务，不派遣和雇用军队，不在蒙古设置任何行政机构和进行移民。蒙古政府把这一切看作是维护蒙古自主的最好保证。

但是，与此同时，蒙古政府也认为有责任重申，像它曾经多次提醒俄中两国的那样，它已与中国彻底断绝了联系，不承认未经它同意的任何依附关系。它保留对待共同声明及照会中有关蒙中关系部分的权利。它还坚决要求承认它在这块自古以来就属于蒙古的土地上的权利，并以此来确定它的边界，把一切想要加入的蒙古人都包括进来。

蒙古政府高度评价了俄国的友好调停，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它宣布已做好充分准备，参加声明及照会里所说的三方会谈，并坚信在会谈期间，俄国将会大力支持我们，以使呼

伦贝尔、哲里木、锡林郭勒、昭乌达、乌兰察布及伊克昭等盟以及察哈尔等地归入蒙古。

谨告阁下，蒙古政府准备通过友好的三方会谈来解决问题，并真诚地希望结束这场对双方都有害的战争。它已下令停止反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并从前线撤军。

请将上述情况转呈沙皇陛下和俄国政府。

顺致崇高的敬意

蒙古特使、总理大臣(签字)

共戴三年中冬月18日，1913年12月3日

三十、1913年12月17日(12月4日)驻柏林大使的紧急报告。

第75号。

补充我今年12月9日(11月26日)第294号^①秘密报告，谨寄上这份剪报，内叙民族自由党领袖巴斯谢尔曼先生，在质询时提出了：最近我们(俄国)与中国有关蒙古问题的声明，可能对德国根据1861年中德商约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产生影响。对此，外交大臣作了回答。

据冯·雅戈夫先生说，我们今年10月23日声明的内容，已由德国驻圣彼得堡及北京的代表报告了柏林内阁。而这一声明，俄中两国都还没有正式公布。德国基于1861年9月2日中德商约所取得的最惠国待遇依然有效，甚至在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还没有被此声明确认以前，它就是有效的。雅戈夫先生补充说：“德国政府最近曾藉机向俄国政府表示：它遵循和维护在华贸易平等及各国臣民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不承认某一强国在中国的某一地区享有任何特权。考虑到俄国作为邻国的特殊地位，柏林政府准备承认它在中国中央政府所订条约和协定上的某些权利，只要

^① 1913年11月26日斯韦尔别也夫密电报告：“在议会质询根据1861年的中德商约德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在我们(俄国)最近于北京签署声明以后是否保留时，外交大臣回答：俄中声明签订以后，上述商约在外蒙境内仍然有效”。

这些权利不违反平等原则并正式通知了德国政府。

外交大臣的这一声明是他照着记唸录的。上述巴斯谢尔曼先生的质询及雅戈夫先生的回答，正好在帝国首相的外交政策演说之前。它没有引起议会的注意。

斯韦尔别也夫

三十一、1913年12月17日（12月4日）蒙古特使致中国驻彼得堡公使的照会副本（译文）

公使先生阁下：

今年11月7日，俄国政府将俄中两国关于蒙古问题的共同声明以及互换照会的内容通知了我。我奉命向阁下表示：蒙古政府在了解上述声明及照会的内容以后，确信中俄两国将会承认并维护蒙古现行国家体制及其对内部事务的自主权，在有关工商、铁路、电报、财经等项事务及与其它强国的关系上，享有自主的权利。蒙古政府深信：两国将保证不干涉上述事务，不派军队，不设置任何行政机构及进行移民。这就是对蒙古政治自主的最好保证。

但是，与此同时，蒙古政府也认为有责任重申，像它曾经多次提醒中国和俄国的那样，它已彻底断绝了与中国的联系，不承认任何未经它同意的依附关系。它保留对待共同声明及照会中有关蒙中关系部分的权利。它还将坚决要求承认它在这块自古以来就属于蒙古的土地上的权利，并以此来确定它的边界，把一切想要加入的蒙古人都包括进来。

为了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蒙古政府表示，它已作好参加三方会谈的充分准备。

谨告阁下：蒙古政府真诚地希望结束这场对双方都有害的战争。它已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并从前线撤军。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也应从与我们同族的内蒙境内召回它的部队。

请将上述情况转报贵国政府。

顺致崇高的敬意。

蒙古特使、内阁总理大臣三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

共戴三年中冬月19日，1913年12月4日

三十二、1913年12月19日（12月6日）蒙古特使致外交大臣萨
佐诺夫的信（译文）。 特急

外交大臣先生阁下：

今年12月3日，我曾奉命通知阁下：蒙古政府应俄国与中国的要求，同意用三方会谈的方式，来解决蒙古问题以及停止对中蒙双方都有害的战争。它已下令停止反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并撤回军队。我曾请求俄国参与缔订与中国的协定，以便使中国军队从我们同族的内蒙撤出，从而使三方会谈更易进行。

但是，现在我国政府发来电报，说我军撤回以后，中国军队立即发动了进攻，并突然在达尔罕乌拉庙、阿巴嘎大王旗以及托哈尔嘎庙等地出现。他们烧毁了寺庙，屠杀了喇嘛，抢走了一切。巴林、苏尼特和乌珠穆沁等旗，也遭到了同样可怕的袭击。照中国当局的话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的军队还准备打到约古札里哈姆博喇嘛的参谋部。

蒙古政府对此消息深为震惊。它不能坐视中国军队对自愿加入我们的内蒙各旗居民所进行的残酷镇压。

为了我们的友谊，敬请阁下采取有力的外交行动，敦促中国军队停止进攻，不再在内蒙残害我们的同族居民，并从那里撤出，以便今后用三方和平协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谨致良好的祝愿。

蒙古特使三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

共戴三年中冬月21日，1931年12月6日

三十三、1913年12月20日（12月7日）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号^①

摘自我的第354号^②电报。

呼图克图私下请我借给他3万卢布，为期两个月。我想满足他的这一请求。请将最后支付贷款的余额，即蒙古旅购买武器的20万卢布，汇到俄亚银行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分行领事馆账下。

米勒尔

三十四、1913年12月23日（12月10日）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密电。第3453号

通知驻库伦外交代表。

第800号电报^③已收到。

据米勒尔的情报，蒙古军队正在撤离内蒙和南蒙。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却占领了蒙古人撤出的地方，并进行惨无人道的活动：他们摧毁了达尔罕乌拉庙和巴托哈尔嘎庙。蒙古人所尊敬的甘珠尔格根，也惨遭杀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首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它在内蒙的军事行动。

请将此情况向外交总长说明，指出中国人正在占领蒙古人撤出的那些地方，更不用说他们在那儿的残暴镇压了。这些是不能为三方会谈提供安定的气氛的。我们不能坚持要求蒙军撤离，因为他们的撤离只是任人占领并屠杀毫无自卫能力的居民的信号。

萨佐诺夫

① 石印版的副本上没有号码。

② 1913年12月5日米勒尔的电报说，他用最近收到的贷款付给蒙古政府1万卢布，因为它十分需要钱用。

③ 在1913年12月8日第800号电报里，克鲁平斯基转达了袁世凯要求敦促蒙古政府，令蒙军停止在内蒙的掠夺。

三十五、1913年12月27日（12月14日）外交大臣

致驻蒙外交代表的密电。第3464号

从三音诺颜汗的解释中，我们得出结论：蒙古政府不认为它有权对俄国人从华北和满洲运往蒙古的货物抽税。

请向蒙古政府说明，我们认为只有经过俄蒙边界运往蒙古的货才免税，并没有说经由华北和满洲边界的货物也不抽税，那怕是比较现在更重的税。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是可以得到最优惠的待遇的。

显然，从华北和满洲运往蒙古的货物是否收税，尚有待于三方会谈的结果。

萨佐诺夫

三十六、1913年12月28日（12月15日）驻

北京公使的密电。第803号

第3453号（电报）已收到。

我曾多次提请中国政府注意其军队在内蒙的残暴行为。关于杀害甘珠尔格根一事，大总统只是从我的专门咨文中才知道。他对此深为震惊，并派两个参谋到当地去进行严格的调查。现在，我又再向外交总长说明了你的想法，并托人送一份备忘录给大总统。总长答应向大总统建议采取我们所希望的措施，但指出他们不能容忍蒙军或多伦诺尔等地人的强盗行径。这种指责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据我秘密得到的情报，蒙古官员贡丘克扎姆和乌泰王侵犯了哲里木盟的北部地区，在那里进行掠夺并使和平居民破产。我相信，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尽快使内蒙恢复平静。但是，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因为它距离太远，很难及时制止中国军队在那里的破坏。

我已通知库伦方面了。

克鲁平斯基

**三十七、1913年12月29日（12月16日）外交大臣
致驻北京公使的密电。第3478号**

第803号电报已收到。

鉴于你所说中国军队的破坏，我们认为，他们在蒙军撤出地方的表现，不可能使内蒙安定。显然，中国政府急于占领尽可能多的地方，以便在三方会谈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不过，它打算错了，这给蒙古政府找到了借口，证明不该让中国恢复在内蒙的政权。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政府最好不让它的部队紧跟在蒙军之后活动。

乌泰王在彼得堡。

萨佐诺夫

关于俄共(布)华人分部代表与中共组织的联系问题(据新发现的1921——1922年文献写成)

A. И. 卡尔图诺娃

在苏联史学中,关于国内战争年代苏俄境内的俄共(布)外籍人分部之一——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和活动问题,在学术论文、文献、书籍、回忆录汇编中已得到一定的阐述。^①

列宁认为,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机关对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在苏俄境内的华人劳动者所做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1918年,在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帮助下,在一系列俄国城市:彼得格勒、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哈、尔科、夫彼尔姆及其他城市建立了华工组织。1918年12月初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有五六万会员的全俄华工联合会。^②

1918年11月29日,列宁同中华旅俄联合会代表张玉春^③谈过话,1919年11月19日,列宁接见了华工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刘绍周(刘泽荣)。列宁同他们谈到中国革命、中国工人的生活、各联合会的活动。在同刘绍周交谈时,列宁还为他签署了外

① 见B. M. 乌斯季诺夫:《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1918——1920年)》,载《苏共党史问题》,1961年第4期;Л. И. 扎罗夫、B. M. 乌斯季诺夫:《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年代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红军国际部队》,莫斯科1960年版;H. A. 波波夫:《他们和我们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并肩战斗,中国志愿者在俄国国内战争前线(1918——1922年)》,列宁格勒1959年版;《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莫斯科1961年版。

② 见H. A. 波波夫,前引书,第28页。

③ 本文中除孙中山、刘泽荣、张玉春、安恩学、单北峰外,所有新人名均系音译。——译者

交人民委员部于1919年10月7日发给的证明书：“我本人恳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和当局给刘绍周同志以各种帮助。——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919年11月19日。”^①

完全按照苏维埃政府维护在苏俄的华人利益的政策成立了华工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中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在彼得格勒，萨马拉、萨拉托夫、叶卡捷琳堡、上乌丁斯克、乌克兰、中亚及其他地方的华工联合会分会中，共产主义支部都在发挥作用。俄共（布）八大以后，华工联合会各分会中的共产主义支部改组为党团。^②

为了领导莫斯科、彼得格勒、维亚特卡、鄂木斯克、上乌丁斯克、伊尔库茨克和远东出现的华人共产主义党团的工作，1920年6月20日成立了附属于俄共（布）中央华人共产主义组织局，作为俄共（布）外籍人团体之一。其成员如下：安恩学、赵永禄和单北峰。^③

中央华人局在中国工人和红军战士中进行广泛的鼓动、宣传工作，在各地组织华人共产主义分部，忙于出版革命书籍，十分重视把列宁的著作译成中文，印发小册子、传单、号召书。在远东为华人出版《共产主义之星》报。筹办了教育训练班、党校，在有华人服务的红军部队中创办扫盲学校。^④

因此，至少在1921年7月底——8月初举行的中共一大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的两年半，华人共产主义组织就在苏俄境内产生并作为俄共（布）外籍人分部之一在活动。

按照党章，旅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还提出了去中国活动的任务。例如，标题为《华人共产主义者在祖国的组织建设》的一章写道：

① 见《列宁生平大事年表》，莫斯科1975年版，第6卷第264页；1977年版，第8卷第40页。

② B·M·乌斯季诺夫，前引文，第109页。

③ 见A·И·卡尔图诺娃：《中国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觉醒的大体经过（1917—1920年）》，——《亚洲民族》，1977年第5期，第63页。

④ 见Л·И·扎罗夫、B·M·乌斯季诺夫，前引书，第45页。

“1、华人共产主义者认为，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并把中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是自己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直接责任。

2、在有共产党人及国内同情者的任何地方均应建立党支部。”

人所共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从另一条道路前进的：中共是在没有来自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者参加的情况下成立的。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华人共产主义者，即俄共（布）华人分部的成员同中共成立以后的党组织之间是否有过联系？

苏联史学家迄今尚未掌握这种资料，仅仅知道，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所属华人局于1920年12月6日研究了关于组织共产党支部的必要性和关于同上海、天津的青年团建立联系的问题。华人局决定批准刘同志（费奥多罗夫）立即到中国出差三个月，以便同上海、天津、哈尔滨的有关组织建立联系。这方面的活动在俄国华人共产主义组织局现有人力分配计划中也有反映。在该文件中列举了经塞米巴拉金斯克到中国出差的人员顾鸿滨、刘约瑟夫和宋瀚望。往上海孙中山处派去了金哲洪^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出差未见成效。

在苏共阿穆尔州委党务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持有中国共产党（指中国某些城市的中共党组织——作者注）党证或证明的阿穆尔州享受劳保的华工联合会党支部成员名单^②。文件原系打印件，由支部书记王仁海签署，日期1922年。它对研究人员无疑是有意义的，因为对俄共（布）华人分部的代表与中共某些组织是否有联系的问题，文件提供了肯定的依据。中共党内未必保存资料，说明北京、汉口党组织派过谁去苏俄，以及它们为哪些来自苏俄的华人共产党人开过证明。名单内总共列出持有中共证明或党证的15名共产党员，并附有简历。我们从中列举若干：

^① 见А·Н·卡尔图诺娃：前引文，第64页。至今仍然不清楚，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所属华人共产主义组织局的领导人是否知道，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及其他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已经成立和处于组织过程中。

^② 第一次提及此事的是А·Н·卡尔图诺娃的《红军战士单富相——为苏维埃政而战的中国志愿者》，载《新时代》1987年第45期，第25页。

“吕锡昌^①，23岁，工人，山东省人，出身于工农家庭。从1920年2月起住在苏俄远东。同年组织了俄共（布）分部并在其中工作……”^②继而写道，他“迄今仍然既在分部又在华工联合会工作……持有1921年12月2日北京中国共产党开的证明。由于他是俄共党员，暂时没有（中国——作者注）共产党党证”。^③

“蒋宗昌，32岁，工人，从1921年4月起在华工联合会工作，曾担任书记兼主席。1922年曾到东线出差。持有1921年12月22日北京中国共产党开的证明，第2号。为了领导和组织军务，持有1922年5月6日汉口发的第二个（证明），第17号。由于他是俄共党员，暂时没有中国共产党党证。”^④

“王仁海，25岁，党支部书记，出生于陕西省。北京大学学生，1921年在北京出版政治性报纸《社会运动》（原文如此，可能是指《社会少年运动》——作者注）。目前在分部和联合会工作。持有1921年11月第7号党证。”^⑤

“尹寿昌，40岁，中文教员兼翻译。从1921年起在州华工联合会工作。最近担任书记。持有汉口1922年4月18日发第18号党证”。^⑥

“王宝贵，47岁，工人。1921年秋季以前在华工联合会工作，后来奉派去东线华人游击队工作和联络。持有北京党组织1922年4月22日发第19号党证”。^⑦

“马春娃，33岁，克瓦斯工人，1921年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华工联合会暂时派往阿穆尔州华工联合会工作。持有北京共产党1922年3月4日发第6号党证。”^⑧

① 姓名都按文件音译。

② 《新时代》1987年第45期，第25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苏共阿穆尔州委党务档案馆，全宗11，目录1，案卷65，第84张。

⑦ 同上。

⑧ 同上。

“杨自丰，33岁，工人，参加过‘老头子’（看来是指游击兵团司令发布特林·安东·尼基福罗维奇——作者注）的部队，现在被派往联合会事务部门联络工人群众。持有北京共产党1922年3月4日发第12号党证。”^①

持北京党组织党证的还有：李保三——党证第5号，闵卓哲——党证第7号，孔绳武——党证第13号，王英宗——党证第11号，张万有——党证第9号，张蕴武——党证第10号，宋体祥——党证第14号（以上所有党证均于1922年3月4日发）和常海三——党证第19号（1922年5月1日发）。^②

这份名单列举的资料表明：

第一，1921——1922年在远东共和国领土^③上的若干华人共产党人，或系中共党组织（例如北京的和汉口的）所派遣，或从苏俄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从中共党组织取得有关证明，接受了给十月革命的祖国以国际主义援助的一定任务；

第二，参加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不仅有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在俄国的华人劳工，而且也有若干倾向革命的华人——在国内战争年代才跨越边界参加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许多华人共产主义者——俄共（布）华人分部成员——在苏俄接受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和战斗训练后回到中国。然而在苏联史学中，甚至在中国史学中，有关他们后来命运的消息为数很少。他们之中谁回国后加入了中共，做什么工作，是否参加1925——1927年大革命，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后来的事件中是否利用过、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过参加苏俄国内战争时积累的经验——对所有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看来只有中国史学家能够回答。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84—85张。

③ 远东共和国从1920年4月6日至1922年11月15日作为苏俄与日本之间的缓冲国而存在，粉碎白卫军和日本干涉者后，远东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

人所共知，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者不仅自己准备在回国后进行革命斗争，而且还在准备回国的劳苦华工大众中间进行了相当的宣传工作。

在这方面，由分部书记朱万福签署的彼得格勒华人共产主义分部1922年7月的报告所载的消息是有代表性的。例如，报告写道：

“过去的一个月中，在彼得格勒华侨区发生了一件相当大的事件，即7月16日发出了第一列载运华工回国的专车……

发车时分部在尼古拉耶夫车站组织了群众大会，分部代表和联合会执委代表都在会上发了言。所有发言者都提到的主要内容是号召回国者向诚实的中国工人揭穿全世界资本家针对苏俄散布的谎言。回国者方面也有个别同志发言，他们表示回到中国后将竭尽全力促使受西方资本家压迫的工人觉醒。工农苏维埃俄国将是他们的指路明星。列车驶离时唱了国际歌。回国者请求向苏维埃政府转达他们的诚挚谢意，感谢苏维埃政府对即将回国的华工的关心。

分部在专车驶离前安排了两个即将回国的华人的会议，会上党员同志作了以下报告：（1）革命概况；（2）新经济政策的各项原则；（3）苏俄在远东的任务。然后向每位回国者分发了书籍（主要是中文本《俄罗斯联邦宪法》）。^①

因此，历史学家面临着引人入胜的探索。此种探索将提供有关十月革命的思想及其成就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的补充资料。

译自苏联《远东问题》1988年第2期

郭兴仁译

^① 列宁格勒党务档案馆，全宗16，目录11，案卷11216，第9张。

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 思想斗争的社会前提和社会基础

A·B·潘佐夫

引 言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曾唤起千百万中国民众投入解放斗争，唤起他们的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该国的民族民主运动（首先是民族解放运动）急剧加强，逐步席卷了广大社会阶层——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产业无产阶级，以及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和失去阶级性的居民。光怪陆离的社会基础决定了进步势力营垒中思想派别和政治派别的多种多样。在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尖锐的思想冲突从未平息过。

主要斗争在两种主要社会政治思想派别——民族革命派和共产主义派的代表之间展开。尽管在20—40年代，在民族复兴运动阶段，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所宣布的目标往往很相似，两派都赞同关于对中国实行社会改造之途径的主要观点。二者的对抗归根结底反映了民族解放运动中两种倾向——社会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倾向——的冲突。各派内外在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上的争论也从未平息过。

20—40年代中国革命运动参加者的分歧的实质在苏联和苏联以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经得到深入研究，然而，社会环境对中国革命运动各个队伍（包括中共）内部思想斗争的性质和方式的影响问题迄今仍然较少研究。作者们首先着眼于对他们所划分的派别和路线的思想政治内容的评价，而对派别和路线的产生只是笼统地加以评述。本书至少是部分填补这一空白的尝试，其

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环境和中共相互影响的特点。

一 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和 人民群众的政治心理

革命前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一般特征

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进行科学评价之基础的最早的重要理论性结论，是列宁于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在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7月26日他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东方社会，其中包括中国社会，被认为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半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制农民关系，几乎没有产业无产阶级，而居民的大多数是处于半封建依附地位的农民。

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方法论，在20年代后半期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论题，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至第九次全会上指出国内土地关系是半封建性质的，存在军事封建制度，作为军事组织和特殊社会政治势力的军队和军阀起特殊作用，阶级分化不明显、没有完成，以及由此而来的基本社会政治势力的组织性不高。

作者认为，马季亚尔《中国的农业经济》一书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的最有意义的著作。该著作加深了共产国际的分析并使之具体化。马季亚尔根据自己搜集和整理的大量实际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性质不是资产阶级的。他主要根据对农业状况的分析断定，国内社会关系还不是资本主义的，只是在向资本主义发展。

格尔布拉斯和穆格鲁津的专著（《50——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莫斯科1980年版和《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土地关系》，莫斯科1970年版）对革命胜利前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作了深入研究。这些著作实际上在当代水平上发展了马

季亚尔的基本论点。

20——40年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由极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劳动分工不发达决定的。中国没有经历过原始积累时代，也未经历过工业革命时期。在革命胜利前中国的经济中存在着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经济方式，其中包括尚未达到顶峰的资本主义方式。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根本的差别，这种情况是由于中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国家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缺乏统一的货币制度。绝大多数居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囿于稳定的地区范围之内。

经济的多样性决定了历史上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处于不同阶段的前封建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半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中国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为某些地区上述关系的保守性造成了客观条件。

在西藏、新疆、云南、宁夏、贵州的某些地区，有一些尚处于原始公社制或奴隶制阶段的民族和部族。

在北方晋、陕、甘、冀、鲁、豫六省大部分农村地区，封建宗法关系完全占统治地位，生产发展水平极为低下。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税收和高利贷是主要的剥削方式。

在中南和华南大部分农村地区——苏、皖、鄂、湘、川、赣、浙、闽、黔、滇、粤、桂，已经明显看到传统的经济结构被破坏的过程，商品货币关系更深地渗入农村经济。然而，整个说来还是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优势。因此，民众继续处于种种封建宗法关系之内。与北方农村地区不同的是，地租在这里取代了税收剥削的位置。

在大工业中心周围、沿海、江河两岸、铁路沿线地区以及技术作物栽培区，半封建关系占优势。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华中、华南。显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这些地区相近的是中国的移民地区（满洲、内蒙古、青海）。资本主义成分恰恰在这些地区

获得一定的扩大，虽然整个说来早期资本主义关系暂时未能完全彻底地摆脱封建束缚。资本主义关系仅仅给上海、天津、武汉及其他一些大工业中心的生活以决定性的影响。

作者认为，主要问题在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如同东方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存在三种根本不同的极其模糊的社会阶级结构类型（换句话说是三个社会阶段）：传统阶段（前资本主义阶段）、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和现代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宗法封建阶层在居民中占最大比重，而工人以及中层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根据格尔布拉斯的资料，在1949年，现代社会阶级成分占全国居民的7%，过渡阶层约占38%，其中28%在农村，主要由封建宗法关系和家族关系维系的基本人群则占55%。

按照阶级地位，即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划分，所有中国居民大体成分如下：7%（3500万——4000万人）属于大资产阶级、高级官吏和农村大地所有者；7%（3500万——4500万人）属于富裕小业主范畴；70%（3.9——4亿人）属于贫困和最贫困的小业主；16%（8000万——1亿人）构成无产者和半无产者。

在农民经济中，主要经济特征迥异的基本阶级是：纯无产者和主要或多半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占农户的12%（5000—6000万人），其中包括所谓雇农户，根据各种资料占1—3%（500万——1400万人）；主要靠自己的小农经济为生的贫农和贫民占78%（3.7亿——3.8亿人）；不时使用数量不等的雇工（其中包括自己有份地的短工）的经济占3%（1500万——2000万人）；对农民进行封建宗法式剥削的农村财主和土豪占7%（3000万——3500万人）。这些阶级大约分别占居民总数的10%、65.5%、2.5%和6%。

至于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则为数甚少。中国文献中通常列为农村资产者的人，实际上刚刚开始使用雇佣劳动。至于农村小资产阶级，可以说仅仅存在于大工商业中心周围、沿海、江河沿岸及通衢大道个别地区，主要是华南及东南各地、武汉地区、技

农作物栽培区、中国移民区。总之，中国的富农不能称为农村资产阶级，他们还是半封建半资产阶级。

严格说来，在工厂工业中并未形成纯资本主义关系。实际上所有无产者都失去了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权利。承包人进行招募，而实际上往往是收买雇佣劳动工人。他们照例要在生产中进行严密监视，向工人榨取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工资。

凡此种种导致：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现代社会阶级组成部分之一，但由于大资本不发达和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占优势，他们注定要在许多方面带有宗法性质的剥削条件下生存。在20——4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统一的阶级。

在这个的时期，资产阶级也未能形成一个阶级。

因此，在20——40年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刚刚开始向资本主义方向进化，虽然社会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却远未成熟。

民众的基本社会利益和社会感情

流氓无产者的利益和感情由下述情况决定：这部分居民被完全排除于生产之外，对生产劳动完全失去“兴趣”。流氓无产者心理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过显著的影响，其影响表现在许多中国共产党员中，包括占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中，存在推崇掠夺行为和土匪行径的流寇主义情绪。

贫民的利益和感情与流氓无产者不同，农民中最贫穷阶层和城市小业主，像贫民一样，尚未失去通过生产劳动摆脱极端贫困的希望，尽管贫民和最贫困的劳动阶层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严格说来是不同的。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态度以及自身的物质状况实际上是相同的。这就为他们的利益一致打下了基础，其利益的核心是自发的平均主义。

贫农群众的观点曾对中共产生过影响，首先表现在主张将全部土地，不论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一律强行没收，交给工农政府，进行平均分配并禁止买卖。正如杰柳辛指出，这种观点在中共六大前夕曾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占统治地位。例如，这种观点曾在1928年底湘赣边区苏维埃政府通过的井冈山土地法中得到反映。

宗法制农民的利益和感情主要为从事自然和半自然经济的中等收入水平的劳动农民所特有。作为在中国条件下较有保障（与贫民和贫农比较）的社会阶层，这部分居民反对平分和没收土地。宗法制农民首先渴望减轻税收、地租和重利盘剥，渴望杜绝贿赂官吏和制止军阀掠夺。

宗法制农民的感情曾经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决定过中共某些党委的活动。例如，1927年底，中共采取了无偿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方针，云南省委则擅自作出限制社会经济改革的决定，仅仅减轻地租、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降低贷款利息。

小资产阶级“富农”的利益和感情在中国的代表是部分经常出售必需品……的农村居民以及被卷入市场关系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取交换价值。该社会集团的代表所渴望的首先是自由市场和交换的发展，村社的瓦解以及减轻赋税压迫，制止官吏横行和军阀掠夺，反对官僚资本的把持和帝国主义的扩张。

小资产阶级富农心理对中共的影响表现在我们涉及的时期之末。点正如格尔布拉斯指出，部分共产党员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中得出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必须长期共存的主张并将其绝对化。

无产者的利益和感情 作者断言，中国无产阶级在所考察的时期尚未完全意识到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尽管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他们的社会感情是比较不定形的。这种情形给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

主义派别在中共党内的形成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劳苦大众同业已实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先进的俄国工人阶级之间联系的可靠性和深度。与此同时，只有无产阶级，尽管有其内在弱点，才是20年代中国条件下最集中、最富组织性的、共产党能够在其基础上发展的社会力量。

成为共产党的群众基础的社会力量的多样化，决定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同政治观点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些观点的社会心理根源深植于反映不同居民阶层利益的社会感情之中，这造成了中共党内形成特殊派别的前提。同时，民众社会感情相对不发达和模棱两可预先决定了各思想派别的不定形，并且有碍于每个派别在政治上的结合，这从根本上影响到党内斗争的性质，决定了持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经常发生妥协。

二 社会环境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党员人数变化情况

在20——40年代期间，中共人数的增长是极其不平衡的。第一次增长高潮适逢1925年——1927年国民革命年代。总共两年多的时间党员人数几乎增加了64倍：从900人增到57967人。革命的失败和国内蔓延开的反共恐怖气氛造成共产党队伍的急剧缩小（约缩小到1/6）。大部分党员遭到迫害（牺牲者中有10名中央委员）许多党组织，例如湖北、湖南、广州、天津、北京的党组织被彻底摧毁。被镇压浪潮吓坏的部分中共党员离开了党，一些人投向敌人，或者由于种种原因被开除出党的队伍，相当大的一部分党组织被解散。只是由于苏区的扩大并联成一片，党员人数才有显著的增加。在1933——1934年，中共总计有30万党员，同1928——1930年比较，中共人数增长6.5倍。共产党员队伍的增长并未持续下去。在1934——1935年，由于东南部苏区的丧失和红军主力转移到西北，以及由于城市中主要党组织，首先是最大城市上

海的党组织被摧毁，中共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大约相当于原来的1/10——1/13，没有确切数字）。然而，由于国内展开了旨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反帝运动，很快就重新出现有利于中共增长的情况。从青年学生反帝行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开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都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怀有进步情绪的希望入党的代表的有力冲击。整个说来，从1937年到1945年，党几乎扩大了43倍。增加党员人数1181000多人。在国内战争年代（1946——1949），中共人数继续迅速增加，到1949年底，党员人数几乎增加了3倍。这样一来，在实际考察过的整个时期（1925——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除外），中共名义上的增长超过了自觉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战士人数增长的实际可能。大量人员加入共产党往往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赞成党的政治纲领和忠于党的理想。其实，从40年代起中共领导自己就开始区分是在组织上，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参加党。理论武装不足的中共新党员随身带来了他们所出生的社会集团的感情、情绪和偏见，从而扩大了党内思想政治斗争的基础。

党员社会成分变化的情况

党的领导用以调整党的社会成分的政策，对中共队伍的扩大产生过强有力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批追随者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中共一大召开以前未曾吸收一个工人入党。但从中共建立的最初时刻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即采取了吸引无产阶级优秀代表积极参加共产党活动的相对稳定的方针。早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对企图建立一个纯知识分子组织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等）的取消派情绪予以反击。中共后来（直到30年代中期）有关组织问题的所有指导性文件都强调工人成为党员的优先权。由于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的努力，在相当短的期限内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较广泛的工人成分。到1923年夏季，工人约占党员的40%。中共党内工人成分

的增加在1927年4月以前反映在以下数字中：工人50.8%，农民18.7%，知识分子19.1%，军官和士兵3.1%，其他成分8.3%。革命的失败使党的社会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城市中工人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当时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人的某些错误观点亦促使党内产业无产者成分的降低；国民党人在1927年反共政变后很快就实行民族改良主义的劳工政策，该政策取得一定成就也促使共产党在劳工界的影响减弱。同时，人为地扩大农村中的共产党支部使出生于农民各阶层的党员总数增长。中国共产党社会成分的改变亦同下述情况有关：中共中央（1927年）八月非常会议后成立的临时政治局以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大量知识分子来解释革命失败的原因，采取了使党的成分，尤其是工作人员在最短期内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方针。唯意志论的改变社会成分的尝试给党组织的活动带来不必要的不安定因素，而新的领导干部往往没有能力替代党的原有工作人员。党的机构的无产阶级化并未真正完成。同时，党的社会成分改变有助于有意识地吸引农民加入中共，在农村展开内战的情况下，这是比增加工人成分易于实现的。有一种理论在党内甚至从中央到基层支部都得到流行。按照这种理论，不应该使党“工人化”，而应该使党“农民化”。共产国际执委代表在中共六大评价这些观点时声称：无产阶级目前尚未觉醒，他们目前还处于被压抑状态，而农民此时正在行动。于是形成一种理论：农民优于无产者，农民更革命些。因此出现这样的意见：在党内农民代表想必优于工人代表，因为农民更革命些。根据官方资料，党的六大前夕，出身于农民各阶层的党员占76.6%，出身于士兵（其大部分是乡村贫民和游民）的占0.8%。立三路线是中共加速“农民化”的一个新因素。随着立三路线被粉碎，逐步更新中共队伍的途径已初具轮廓。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曾给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大力帮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国家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成分的共产主义政党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复杂的过程。然而，中

共存在头几年的经验表明，发展工人成分的组织是可能的。尽管中国产业无产阶级力量弱小、人数不多，它尚未完全形成一个阶级，相应地它的阶级利益亦未完全形成，它仍能从自己人中挑选出大量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战士。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实践和30——40年代初在城市中开展工人运动的困难，以及党的领导在组织建设方面的具体政策特点，使中共丧失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基础。在各个时期，尤其是1927——1945年加入共产党的大量人员的社会性与工人阶级格格不入。他们从自己人中推出表达其愿望的领导者，为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奠定了群众基础。

中共思想教育工作的若干特点

中共社会成分的改变使得组织党内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的课题大为复杂。许多人形式上成为共产党员以后并不知道或者不理解共产主义的目标，不能区分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任务。20年代末在农村起义过程中大量入党的农民和贫民往往把共产主义视为一种新的宗教学说，认为对其基本要求应该盲目服从。

在我们涉及的整个时期，中共中央采取了普遍提高党员思想水平的措施。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共产国际物质上和理论上的援助，在各个时期筹办了专门的党校和讲习所，开办了与讲授军事学同时讲授政治学科（历史学、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等等）的军官学校，即1924年5月开办的著名的黄埔军校。对广大共产党员进行理论教育的最重要手段是党的报刊。仅在1928年年中，中国共产党人就掌握了在14个省出版的不同开本和印数的69种报纸、杂志。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任务，在党的许多思想学术论坛异常尖锐地提出并切实解决了组织或加强党的教育工作和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问题。共产国际、列宁的党和苏维埃国家在

苏联建立了国际性学校网，对培养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中国共产党干部起了巨大作用。20——40年代在国外学习的总共118名中共领导人中有80人（占70%）在苏联经过训练。

客观存在的困难，加上中共年幼和社会成分复杂，相当一部分党员无文化或者缺乏文化，使党内在20——40年代期间存在一种时而隐蔽时而明显的倾向：贬低对干部，尤其对一般党员群众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意义。这种倾向在1925——1926年中共莫斯科区委书记任卓喧及其追随者的活动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

干部理论教育的薄弱和对它的曲解，降低了党的战斗力，无疑加剧思想动荡并导致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假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另一方面，中共在党员中组织思想教育工作的某些成就，特别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培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工作中的全面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共党内马列主义派别的形成。

党的组织建设特点

中共清除异己分子的困难在于，中共许多领导人多次严重破坏建设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中共党内实际上从陈独秀领导时（1921——1927年）起就形成了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本身只是到1925年1月才首次出现在中共四大文件中，直到1927年5月在五大上才载入党章。早在20年代，中共实际上就禁止党内争论，对革命战略和战术上的根本问题亦缺乏公开讨论。党内权力的僵硬集中同党内宗派主义惊人地结合起来。中共六大既强烈谴责了党内宗派主义的表现又谴责了领导人的僵硬集中意图。号召中国共产党人竭尽全力不让“组织路线上的宗法关系”复活。然而，这些决议未得到执行。中共主力去到农村，随即靠非无产阶级分子，其中包括社会关系中异常落后的分子人为地扩大党组织。长期内战和后来的抗日战争以及共产党人根据地的分散——凡此种种均加强了地方

的分立倾向和中央的集权意图。中共党内宗派斗争的特点是派别众多而且十分稳定。派别众多而稳定使分立主义问题特别引人注目。30——40年代宗派斗争的加剧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央领导为何向往高度集中权力。助长这种意向的重要原因是，在多年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共产党开始具有军事化组织特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史表明，在前资本主义环境对中共压力强大的情况下，在中国社会缺乏民主传统，构成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的绝大多数民众绝对贫困化、受压制、不识字、武装游击斗争形式占优势的情况下，马列主义政党的形成过程是十分复杂的。由于落后结构的影响，尽管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给予巨大援助，目的在于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使它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最强有力的队伍，中国共产党在所研究的时期依然获得了一系列东方式传统组织的特征：成分为贫苦农民，以宗派关系、同乡关系为基础的中央领导有无限的权威。

因此在中共的组织建设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与当代东方和非洲劳动人民的先进政党的形成性质相同之点。然而，中共与这些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共从产生的最初时刻起，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在中共领导中一直有人深刻理解，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各国人民需要与苏维埃国家在组织上互相影响。不言而喻，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党的建设中的有害过程对共产党员世界观的影响。然而，中共组织发展中的复杂情况和矛盾现象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倾向追随者在党内巩固阵地造成了机会。

三 社会环境与中国革命 运动中的思想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关于马克思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初知识于19世纪末叶传入中国。这些知识是片断的、矛盾的，仅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极狭窄范

国内为人所知。当时在中国民主主义者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在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学说中尚无任何突出之处。只是由于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得以较快进行。从1917年10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全文或部分翻译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9部著作，用中文出版了列宁的第一批11种著作。在十月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危机加剧了，知识界的思想政治分化加紧了，苏维埃政权拥护者大增，科学社会主义拥护者也随之大增。列宁对制订中国革命的理论作出了主要的贡献。列宁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的实质归结如下：若不推翻外来帝国主义在工业落后的东方各国（半宗法制和宗法制农民构成其居民的主要部分）的统治，这些国家劳苦大众的社会解放是难以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在党的队伍中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别的思想前提。丝毫不贬低这一派别出现和发展的内在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的意义，然而应该承认，在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地上获得较快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共产国际和苏维埃国家对中国革命的国际理论援助和实际援助。

当然，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中包括伟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传播，视为直线前进的过程，那就完全错了。在所考察的整个时期中国都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某些不同意共产国际观点的中共领袖的行为亦妨碍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广泛传播。当然，上述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缺点妨碍中共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削弱了马列主义派别的地位，并促使党内出现的各种思想动荡。轻率地破坏旧事物，不重视对已出现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行动哲学”，开始在中共党内占上风。主要由于参加实际军事工作而产生影响的实践家、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人在党内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共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派别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布尔什维克派拥护者与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和派别的代表之间存在尖锐的思想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左倾观点在各国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东方共产党人中，印度革命家罗易最清楚、最系统地提出了左倾宗派主义的理论。“罗易观点”归结如下：在印度、中国及其他某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占优势的是资本主义关系，被剥削民众未染上也不可能染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不起革命作用。因此必须放弃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宣布社会主义革命方针，而社会主义革命将顺便解决全国性的民主任务。同时，罗易明显表现出民族主义立场，过分强调东方革命过程对世界革命的意义，断言西方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东方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程度和力量。罗易观点为积极参加共产国际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熟知。罗易对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生发表过演说，1927年他担任过共产国际驻中共的正式代表。当然，将中共党内左倾的任何表现都归结为罗易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意识中的反映那就简单化了。然而，罗易思想由于已被系统化，无疑助长了左倾观点和左倾观念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发展。

1926——1927年，得到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支持的托洛茨基提出了自己的中国革命理论。其实，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他以前关于东方的错误观点的发展。他曾认为东方是一个正在进行“疯狂的工业化”过程的地区，而这一过程似乎正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将殖民地卷入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共产国际对华方针的其他反对者，否认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和反封建性质，否认农民斗争的重要性，将革命过程的民族民主阶段的全部意义仅仅归结为必须消除国家海关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同时错误地认为1926年广州“三·二〇事件”（蒋介石的不流血军事政变）是资产阶级离开革命。托洛茨基反对派开始坚持分裂国共统一战线，坚持共产党人离开国民政府和在国内

建立苏维埃政权。许多中共工作人员赞同他们的观点，尤其赞同对“三·二〇事件”的评价。中共党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表现相当积极。他们的观点在共产党人某些派别中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是在下述情况下形成的：当时恰好在中国社会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和假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在中共建立时，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无政府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首先在学生中有很大声望。20年代入党的大量中共党员早先曾经是无政府主义的积极拥护者（邓中夏、李立三、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陈延年等）。陈独秀和李大钊也未能避免克鲁泡特金的影响。章太炎、陈天华、邹容、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中国发展的“东方道路”理论家梁漱溟、中国马尔萨斯主义者顾孟余、彭一湖、中国青年党党员（国家主义派）等等这样一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在20——4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有一定的声望。非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观点对中共队伍中在各种形势逼迫下走上革命斗争道路的许多急进分子的处世态度也产生过影响。康德、卢梭、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罗素、基德及其他西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理论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也相当广泛。欧洲、日本和美国各左翼政党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共未来的党员产生了某种影响。

因此，在所考察的时期，对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的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观念的整个总和。实际上中共所有党员或多或少都亲身体验到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社会观点的影响。中共党内组织思想教育工作的弱点不能不削弱中国许多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抵制社会环境对思想的直接影响的能力。

中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特点

尤其在20年代，许多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

非马克思主义学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情况助长了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对中共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起初是通过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中国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论述而被中国人民接受的，这种情形更加严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自然未能向中国读者提供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概念。

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及中国其他马克思学说的最早拥护者的著作有一系列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而且恰恰是李大钊，尤其是陈独秀对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年革命家产生过最大的影响。例如，毛泽东并不讳言，陈独秀对他产生了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印象，而且陈独秀的信念给他以“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共产国际的文献和资料的中译本有不少往往歪曲了原作的意义。

在综合评价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文译文时，可以断定，其中除最重要的列宁主义原理外还保留着并且在某些方面还加强了罗易的某些左倾宗派主义观点。后者尤其明显表现在《补充提纲》的中译本中。看来《补充提纲》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比列宁的提纲更加流行。

并非偶然的是1950年，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张仲实和曹葆华译自20年代俄文本的罗易提纲仍带着它特有的全部左倾“痕迹”编入解放社作为干部学习材料而出版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953年再版）。列宁起草并在二大通过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根本没有编入该书。斯林的著作却与列宁的《初稿》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报告》同时编入了。

由于20——30年代对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普遍研究不足，某些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具体结论当作教条，预先决定了许多政治观点不正确。这种情况是促使中国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因。总而言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任何曲解都促使

各个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在中共党内产生和发展，助长了党内的思想政治斗争并使之尖锐化。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是极其矛盾的。各种非无产阶级势力（他们构成中共群众基础的主要部分）的特殊利益和社会感情在曾经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施加过压力的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类似的思想。这种情况逐渐巩固了相应的利益和感情，使之形成特殊势力。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和中共为总结世界革命经验的独立的理论工作不足，对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又快又好地理解马克思学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党内无可避免地出现各种非无产阶级派别。

同时，民族主义这一主要倾向使所有这些派别互相接近了。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和民族解放性质使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共的影响加强了。民族革命过程的长期发展和中共（或它的某些领导人）为确立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而经常进行的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斗争，导致中国民族复兴和自强的目标对许多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逐渐绝对化，把实现党的最高纲领的遥远前景日益溶化在这些目标之中。共同的民族主义倾向为持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之间的妥协创造了条件，为他们的联合打下了基础。

结 论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民族民主进程的发展创造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十月革命后民族革命运动的激进化导致该国社会生活中出现新的因素——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依靠第三国际的理论援助和实际援助为建立真正无产阶级的、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政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然而，由于（比西方）特殊的历史条件（主要产生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发达，产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的环境对上层建筑的所有要素，其中包括对政治组织的强大压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过程是异常复杂的。何况业已开

始的、受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所制约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引起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大高涨。此种情绪确实席卷了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中开始表现出政治积极性的其他阶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阶级感情的成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整个东方一样，中国“有历史根源”的民族主义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基本构成成分。中国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正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经济市场的发展从19世纪后半叶起逐步把中国引入西方的经济圈和思想境界。年轻的、抱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掌握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反映了与中国相比更为先进的社会关系水平，这是合乎规律的。因此，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制度中占优势的情况下，而且甚至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先进阶层尚未来得及“改造”西方的、对他们而言是新的学说的情况下发展的。

社会环境曾在社会心理、日常意识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给中共以影响。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前资本主义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和资本主义的居民集团为数众多的代表加入共产党而使情况复杂起来。

在所考察的时期，中共党内相应存在着形成社会阶级实质和思想政治实质各不相同的党内派别和在党内发生原则性思想政治斗争的客观条件和客观前提。在共产国际的全面支持下，中共党内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其思想对革命的胜利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与此同时，流氓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的、宗法制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和观念在共产党内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

同时也有条件抑制稳定的、有明确界线的思想派别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过程，其中主要的是：经济地位普遍不稳定，旧的阶级和阶层解体而新的阶级和阶层未完全形成、个人社

会利益和社会感情相对不定形、中国经济上和政治上四分五裂、连续不断的战争、在中共党内同在国内其他政治组织中一样，思想政治斗争形态不发达、党内缺乏自由、公开的争论，党内的派别统治，以及持各种非无产阶级观点的人共同的民族主义倾向。此外，正如格尔布拉斯正确地指出：“在20——40年代中国残酷的国内斗争和反帝斗争（斗争的结果在千百万人民的生活中发生了历史性的进步）的整个时期并未有过类似于俄国1905年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各个思想派别的不同意见就会在中国所有阶级和阶层的群众运动过程中经受检验，此种检验将使参与各种事件的人们彼此‘划清界限’，从而获得阶级意识并明确阶级立场。”

中共党内马列主义派别的形式和发展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彻底的革命家同共产国际、俄共（布）和苏联合作的深度和持久性。中共削弱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对党内的马列主义派别产生了消极影响，使它失去了创造性地掌握国际革命经验的机会。与此同时，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情绪重新滋长起来。

对20——40年代中共党内思想状况起过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心理、政治组织和政治思想诸因素的分析，使人特别清楚地看到列宁党的和我国的国际主义援助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有多么伟大的意义。

译自 A·B·潘佐夫：《20——40年代中国
革命运动中的思想斗争史略》

郭兴仁 摘译

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对 取消派的斗争

卡尔·拉狄克

一

1908年的形势十分明朗：1905年革命以沙皇政府的胜利宣告结束，革命军队被击溃，其余部开始重新整顿，被迫转入地下。当时，摆在议事日程上的，不仅仅是关于革命失败的原因问题，而且是关于时局的性质问题。

最初在中央全会上、后来转到党报上进行的那场争论，显然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争论。比如，究竟是工商业资产阶级掌权，还是仅仅部分金融资产阶级和农业资本家掌权这个问题，争论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中，包含着一个有关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假如由于工农被击败或正是由于工农被击败而终于使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掌权的话，那很明显，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解决。准确回答如下问题，即革命前什么阶级掌权和革命后该什么阶级掌权这个问题，这是关系到未来革命的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未来历史发展的社会内容的大事。

怎样认识这场不仅仅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而且在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和反对派（当时称作召回派）之间展开的争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谈谈中国当前的阶级关系问题。

南京政府战胜了人民群众，已成为地主、商业资本和部分工业资本的统治机关。中国资产阶级的任何新阶层都没有真正掌

权，何况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尚未决裂。如果看不到统治集团中各阶层之间的关系较之革命前发生的变化，那是错误的。比如说，孙传芳的政权纯粹是由为地主、商业资本所扶持的残暴的军人直接掌握的政权，而南京政府则不完全这样，它在很大程度上受银行资本、工业资本和部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制约，这是无可非议的。这如同看不到斯托雷平政府和1905年前的沙皇政府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完全错误的。毫无疑问，当代农业资本主义和财政资本，乃至反映十月党人意志的工业资本对斯托雷平政府的影响，远超过对诸如戈列梅金政府的影响。但是，假如看不到南京政府比之张学良、阎锡山和冯玉祥更缺乏既有的社会基础这一点，还会犯更严重的错误。最关键的问题是南京政府对地主的利益所采取的态度。南京政府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不得不镇压农民运动，不得不与试图领导农民运动的工人阶级决裂。我们一直这样认为：在中国，地主的利益与商业资本、财政-工业资本的利益的结合程度，比之在其他任何姗姗来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情况更为严重。即使在1905年的俄国，城市资产阶级是通过抵押银行系统与地主阶级发生关系的，它反对无偿剥夺地主。但在中国，所有资本家通常是地主，所有地主在不同程度上是商人、资本家。

在评价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动力时，我的错误在于不太了解地主的压迫与商业资本主义的压迫，只有在保存封建残余的条件下才能自行结合，因此我就认为农民群众中的主要倾向具有较严重的当代资本主义性质。

但是，商业资本不是特殊的历史形态，它不可能形成一个发展生产的特殊时期，因为在封建主义还未消灭，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形成的条件下，商业资本才能起到它在中国所起到的那种重大作用。

夸大农民资本主义倾向这一错误，会导致过低估计农民运动，过低估计农民运动的民主主义性质。但当前不容置疑的是，

除这一错误之外，低估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各方面的结合也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由于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未能使中共对国民党的背叛事先采取防范措施，也未能彻底弄清国民党死心塌地急剧倒向地主反革命方面的真正原因。

实际上，革命因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之间的不协调而没有终止，这决定了中国未来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

南京政府并没有解放农民群众，也没有改善农民群众的境况，甚至不准备真正使农村资产阶级的特殊阶层形成，它本应保护这一阶层的利益，反对半封建地主的利益，但无力采取任何断然措施推动生产力发展，因此，我们前年只看到中国反革命的嚣张气焰，而见不到生产力高涨的势头。相反，局势稍稍动荡之后，农业危机以及与其关联的工业危机和经济总危机越来越严重。

反革命派总是获得胜利，他们不是宣布革命任务（尽管这是历史为各个战斗阶级所提出的部分任务）业已完成，就是施行某项措施。在法国，反革命派取得了胜利，但封建主义被粉碎了；反革命虽给予地主以补偿，但并没有确立封建制度。在德国，1848年取胜的反革命派，居然以其独特的方式着手解决统一国家的任务。即使是斯托雷平反革命派也不是一味杀人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解决土地问题，把农村分化为分得田庄而得到满足的富农和仍在继续战斗的贫农中农群众两部分。斯托雷平反革命力量在于农村中那一部分人得到了满足，而革命力量的基础在于农村中大多数人还没有土地。

中国反革命派丝毫也不想使广大农民群众摆脱地主剥削和商业高利贷剥削这一不堪忍受的枷锁，这就决定了它的灭亡。农业停滞不前，工业肯定不会有重大发展，而这说明统一国家的手段只会削弱，不会强化。

中国反革命派既无力解决土地问题，又无力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因为只有与国际帝国主义展开斗争，才能解决统一国家的

任务。

所以，共产国际断定，中国革命没有完全失败，因为中国革命的无论哪个任务都未得到解决。这是根据对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但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假如说中国资产阶级业已壮大并同地主阶级联合起来这一事实不是暂时现象，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特点，那么断言革命所面临的仍然是特殊的民主主义任务，特殊的民主主义时期——这一说法是否切合实际呢？众所周知，托洛茨基维护这一观点，因而他要求取消“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口号。

我和其他许多同志（1927年尚属反对派的同志）曾毫不迟疑地反对托洛茨基于1928年初提出的这一观点。

当时，我们与托洛茨基还未决裂，但我们断定，托洛茨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在重弹反列宁主义学说的老调，根本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孟什维主义的特点之一，即主要论调之一，是把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孟什维主义由此得出结论：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得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托洛茨基虽反对最后这个结论，但他认为，凡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这种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列宁则从土地问题上，从为争取农民摆脱封建压迫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压迫而进行斗争中，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从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历史道路而进行的斗争中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只要解放农民的问题一天不解决，只要这个问题作为主要问题摆在历史舞台上，我们所进行的革命始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一边，这也不会使革命失去其民主主义性质。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本身不决定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当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形势把社会主义问题，也就是改造问题，即不是摧毁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的问题而是摧毁

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革命才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截然分开的，问题正在于转变，也就是说，使一种革命转变为另一种革命。

谁都无法预料，中国革命将在什么样的国际条件下发展起来，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工农群众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刻。倘若这一时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到来，倘若这一时刻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十分稳固的时期到来，这种转变则会大大加快，因为一旦中国发生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欧洲无产阶级和苏联无产阶级就能给予中国无产阶级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目前，谁也无法估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速度。

但不容置疑的是，当前中国革命已着手解决民主主义任务，即着手解决解放农民的问题。中国革命是从民主主义革命起步的。

二

托洛茨基所设想的似乎比较急进的中国革命前景致使他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明显地说明：正是这种不考虑阶级关系的脱离实际的口头急进主义最终会导致真正的机会主义，因而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也势必会直接导致取消主义。

1928年初，托洛茨基主张中国必须取消民主专政的口号，必须提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但几个月后，他在1928年9月4日的信中却提出了中国必须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

大多数俄国托洛茨基分子认为，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所提出的取消民主专政这一观点，是比较急进的观点。他们对立宪会议的口号大惑不解，不明白取消民主专政和召开立宪会议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很不理解，坚信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立宪会议这两个口号显然是矛盾的，是根本对立的。这被视为严重的错误。

托洛茨基为何要自行取消中国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布尔什维克口号呢？他所以取消民主专政的口号，是因为他断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完成。但说穿了，他是想以他这一论断说明：蒋介石完成了革命，而不是背叛革命。这正是蒋介石为表白自己所要说的话。托洛茨基绝口不谈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完成这一论断中所得出的结论，只谈“斯托雷平式的蒋介石政权”，也就是只谈南京政府仅仅局部地解决了革命任务。

但正如我们所知和事实所表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完成这一论断显然是毫无根据的。1928年秋，托洛茨基曾预言蒋介石政权相当稳定，这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据我们所知，蒋介石集团一直忙于战争，在国内既要镇压日渐壮大的农民运动，又要对付其他军阀集团；蒋介石政权实际上无力解决统一国家并使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可又不能为使中国有条件逐步发展资本主义而与帝国主义订立妥协性协定。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业已结束，我们所面临的只是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假如从他的角度看，很明显：资产阶级政权既已稳定，就应当成立某种代议机关，即统治和管理国家的机关，也就是协调各统治阶级利益和欺骗人民的机关，总之是类似议会的机关。但从另一角度看，既然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不知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到来，工人政党就应当在资产阶级政权业已稳定的形式下设法走出地下，夺取民主权利。

托洛茨基对于立宪会议问题是怎样考虑的呢？在他看来，这不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因而工人阶级只能通过重新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来夺取政权。这只能要求统治阶级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中国托派分子在1929年11月16日致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们完全赞同立宪会议的口号，但不知道由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统治阶级还是人民自己？”他们这样提问极端幼稚，但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口号的内涵。中国托派的这种提法与布尔什维克的提法毫无共同之处，凡是略知俄国

革命史和布尔什维克党党史者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1905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并没有专门提出立宪会议的口号，而提出了推翻沙皇制度、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他们把临时革命政府设想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这个政府理应召开立宪会议。

1915年，列宁预感到即将发生新的革命战斗，便制定了无产阶级策略，他写道：“立宪会议的口号，作为一个独立口号提出，是不正确的，因为现时的全部问题在于由谁来召集这个会议。自由派还在1905年就接受了这个口号，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个口号解释为沙皇召集并与沙皇协商的会议。最正确的口号应该是‘三条鲸鱼’（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口号，加上号召工人在争取社会主义、争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各交战国政府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实行国际团结。”^①

1917年，列宁也没有自动提出立宪会议的口号。他在《四月提纲》中写道：“我攻击临时政府，是因为它没有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没有确定立即召开，也没有确定一个大概的日期，只是用许诺敷衍了事。我曾一再证明，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设有保障的，是不可能成功的。”^②

假如布尔什维克提出立宪会议的口号，则不会避而不答由谁召集这个会议的问题。然而，托洛茨基在给中国托派的回信中，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试图回避中国托派向他提出的这个有损其名誉的问题。他在1929年12月28日的回信中写道：“力量大为削弱、处于秘密斗争状态的政党的政治任务，不仅仅在于鼓动工人，而且还要鼓动城乡广大底层群众去反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只是资产阶级独裁，而不是地主独裁？——作者）。同时，在这种形势下，提出通俗易懂的立宪会议这一口号，是极有好处的。应当围绕立宪会议的口号进行不懈的宣传，但这必须与民主（1）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卷第380页。

②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卷第17页。

革命的其他口号，如把土地转给贫苦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取国家独立，实现各民族自决权等口号结合起来进行。另外，还应向无产阶级先进阶层进行宣传，极力向他们解释清楚，立宪会议的道路只有靠人民群众的暴动，打倒掠夺者、军阀并夺取政权来实现。发动胜利的工农革命政府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因为它将领导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可见，问题就在于民主革命。共产党应当提出把土地转给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争取国家独立的要求。工农群众要在纯粹的民主主义口号下动员起来，但同时，要向无产阶级先进阶层说明：第一，立宪会议只有靠暴动才能争取到；第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才能领导起义的人民。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府，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这个政府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斗争中不起任何作用，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在群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从民主革命中变戏法似地变出来的。托洛茨基为推脱罪责，认为人们把他的口号与共产国际所提出的口号区别开来是毫无根据的。他本应把群众性口号用于民主革命时期，可他脑子里突然冒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宣称民主革命时期业已结束。但是，这一口号究竟说明什么呢？只要研究一下1925年革命期间曾忠实执行孟什维克策略，而今又在中国忠实推行托洛茨基主义的陈独秀的高论，即可一目了然。

三

陈独秀在中国大革命中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凡是仔细读过他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同志，或关注中共自1925年“五卅”运动至1927年“四一六”反革命政变期间发展的同志，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起到了孟什维克的作用。但是，要完全弄清陈独秀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就得研究他自1922年起发表在中

共刊物上的文章。现在，真相大白，陈独秀不是由于某种革命形势的影响，不是不由自主地执行了孟什维克政策，他的全部活动是以孟什维克思想体系为基础的。只要看一看他的这些文章，就足以使一个从未读过俄国孟什维克著作，根本不了解俄国工人运动各派斗争进程的人，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提纲有个大概的了解。

陈独秀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截然分开，认为这是两个彼此分离、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应支持资产阶级，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将获得若干民主自由并稍稍改善境界。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才能为自身利益而斗争，且靠无产阶级专政来获取自身利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他看来，起作用的仅仅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只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领导，但不能指靠的政治因素。农民落后而分散的群众，是中世纪的残余，一般说来，他们参加运动，只能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行动。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应采取什么态度呢？他有两种可能的无产阶级政策方案：无产阶级要么不干预先进资产阶级充分的政治行动自由，只管自身的直接利益——缩短工时，提高工资；要么加入资产阶级组织，绝对服从该组织。

陈独秀心底里主张第一种政策方案，即主张使他与俄国典型“经济主义者”相近的政策方案。如同在库斯柯娃和普罗柯波维奇时一样，他想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听之任之，认为无产阶级的作用就在于不干预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认为他的宗旨是反对加入国民党，但他不是从竭力使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角度，而是从教条的经济主义者理论的角度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最好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当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加入了国民党的时候，陈独秀无可奈何地说：“加入就加入吧”，言外之意是，一加入国民党，就谈不上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按照列宁的思想是，组成共产党（当时所指的不是业已形成的群众性共产党，而是指彼

此互不协调的知识分子党员和工人党员)的分子应当加入国民党以便随着工农运动的增长,采取适当的政策使这一运动转入独立革命斗争的轨道。对此,陈独秀一无所知,对这一辩证的思想非但不懂,而且认为这是无法实现的思想,因为他只会脱离实际地设想种种小资产阶级政策,即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考虑问题:要么独立自主的政党,要么服从国民党。

在所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一开始总是跟随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派别,随后为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通过斗争成为独立的力量。这种历史进程对陈独秀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他对共产党的独立性的看法足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历史性失败的时刻,他试图征得国民党本身的同意,使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当他的政策即蓬勃发展的群众性工农革命务必服从国民党领袖领导这一政策遭到破产的时候,陈独秀请汪精卫帮助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让汪出面力争共产国际允许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

在陈独秀看来,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好比夫妇双方经协商到民事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终究是件令人痛心的事。

显而易见,陈独秀的理论不是他个人的创造发明。他的理论代表一批生活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策源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陈独秀和已故李大钊及大学里的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向往西方,渴求中国文明进步,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资产阶级启蒙派的作用。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他们极少从中国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考虑,不妨举一个普通的例子:陈独秀曾拥护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世界大战,以使中国通过这场血腥屠杀接近欧洲“文化”。直到凡尔赛战胜国把山东割给日本,并表明将怎样对待中国“盟友”的时候,陈独秀才同进步的中国大学生一道开始寻找更为急进的政治方向。欧洲社会民主党已完全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的俘虏,它不可能是吸引陈独秀及其战友的中心。只有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

运动反对凡尔赛和约。于是，陈独秀转向了苏联，转向了共产主义。他自称共产主义者，团结一批青年，树起共产主义旗帜，开始组织大学生共产主义小组，而后是工人共产主义小组。但是，他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执行的却是他自己的政策，也就是蹩脚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体系。这种蹩脚的孟什维主义便成了毒害中国革命青年干部的毒草。只有为数不多的青年，通过他们所掌握的西语或俄语，才能直接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可见，这种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中纯粹是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体系。由于运动处于幼稚阶段，加上陈独秀享有崇高的声望，大家不可能马上反对他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共只是从1925年才开始参加群众运动，因此在这一革命阶段，群众运动难以造就足够的先进工人干部——通过自身实践和阶级斗争，很快明了陈独秀学说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利益是根本不一致的。到1927年，当大家才明白这一点时，中国革命已遭受重大失败。

陈独秀沉默数月后，试图改变原先的方针，结果他从托洛茨基的观点中找到了新的方针。

托洛茨基宣称资产阶级革命业已结束，这确切反映了陈独秀所拥护的那种观点。这一观点对陈独秀来说是颗定心丸。他觉得，何必苦苦寻求发动农民运动的途径和学习领导农民运动呢？在秘密组织中，何必为未来革命斗争锻造战斗武器呢！目前，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而无产阶级则会日渐壮大，不定哪天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言而喻，届时陈独秀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很明显，陈独秀热烈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召开立宪会议是无产阶级关注的中心。陈独秀认为，要想推翻南京政府或其他各省政府的政权，就得和城乡广大贫苦群众建立联系，就得靠战斗最炽烈的地区进行作出重大牺牲的游击战。而召开立宪会议，只要在知识分子中间大力宣传这一口号，无须作出任何重大的牺牲，也无须同人民群众建立真正的联系。国民党左派也会要求召开某

种形式的立宪会议。陈独秀在12月28日致共产国际政治局书记处的信中旗帜鲜明地表示：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得出的。

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取消中国革命的论调。然而，中国革命现在还存在，且在空前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着，它正在造就一批新的、与陈独秀孟什维主义一刀两断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托派分子曾提醒托洛茨基，陈独秀并没有克服自身的机会主义。而托洛茨基（当时，他除与这些托派分子联系外，显然与陈独秀已经取得联系）慰告他们说，他已经知道：陈独秀“通过总结革命经验已大大接近我们的立场。这只能欢迎。”

在托洛茨基看来，陈独秀等人历史上的一切往事似乎并不存在。他认为，关于陈独秀孟什维主义代表中国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阶段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在该阶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只是找到了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政策的方式。他觉得，陈独秀的整个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它导致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了历史性失败，但陈独秀承认了错误，所以一切就该勾销。

如果说可以把执行了将近10年的整个政治路线称之为错误的话，那末，陈独秀至今仍不明白他的错误是什么。陈独秀始终认为，错误在于加入国民党，而不是他处于国民党内时不善于建立独立自主的党，不善于乘留在国民党内时把工农集合在共产党的周围。现在即中国革命失败后，正如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八月联盟时期导致托洛茨基政治上接近孟什维克派的情形一样，托洛茨基正以比之工农民主专政更为动听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类词句帮助中国孟什维主义掩饰自己的政策。他们彼此接近，是完全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

可见，当前对托洛茨基和托派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对那些满口允诺在未来革命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引诱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放弃夺取领导权的派别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场斗争应当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因为不通过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难以成熟，难以学会领导工农群众，难以在争取国家民主主义利益的斗争中学会当旗手。民主政治，绝不象社会民主党所说的那样，是无产阶级借以取胜的唯一基础，但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只能随同争取实现工农一切民主主义要求的斗争进行。只有当工农在争取实现民主主义要求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时候，只有当工人和受苦受难的广大农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时候，才能在革命日益发展、变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下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战斗。现在，谁不会教导工人为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谁就休想领导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专政而斗争。

俄国孟什维克总是信誓旦旦地说，要实现社会主义专政，唐恩^①想必现在正在签署各种关于必须为社会主义专政而斗争的宣言。但一旦社会主义专政被历史事件提上日程时，孟什维克便成为社会主义专政的敌人。正因为孟什维克采取这种敌视态度，所以当工农群众为民主主义专政而斗争时，他们并没有站在工农一边。这种敌视态度势必导致孟什维克与工农群众决裂，当工农群众经过争取民主主义专政的斗争，进而争取社会主义专政时，孟什维克也势必被抛到敌人一边。陈独秀主义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不可能有别的命运。

当然，在中国托洛茨基分子中也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是在争论（关于无产阶级民主派应在什么形势下脱离小资产阶级的争论）时期离开党的。这些人将寻找回归党的道路，但是，党对陈独秀学说和托洛茨基学说的斗争越不留情，党以列宁学说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越深刻，他们找到回归党的道路也就越快。

译自《中国问题》第3期第10—20页

吴永清 译

^① 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又名古尔维奇，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译者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

共产党与国民党

杰柳辛、科斯佳耶娃

20年代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仅是由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特殊性 & 社会政治力量的复杂斗争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已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共两党之间相互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国共两党的合作已成为革命运动强大的催化剂。但是，合作本身并不是持久的、稳固的。两党的最终目标及其对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手段所抱的态度不同，因而两党对联盟的性质以及各党在联盟中所处地位的概念也不同。合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时而缓和，时而加剧，终至破裂。

合作应当成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但在国共两党关于建立合作的谈判开始之前，两党的领导人彼此态度冷淡。在共产党人心目中，国民党只是由一群追求私利的乌七八糟的不讲道义的政客和功名心重的将军组成的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孙中山——为自由独立的中国不屈不挠奋斗的战士的形象高于所有的人。国民党作为政党不存在，而只有一个领袖——孙中山，这种看法是很平常的。

这种看法是以某些事实作根据的，但从整体来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国民党作为中国第一个政党，就其组织和工作方法而论，显然不同于西欧的资产阶级政党，本质上更不同于无产阶级类型的政党。国民党毕竟表现出一个政党所具有的全部特点，即这个政党抱有一定的宗旨，奉行自己的原则，其党员是受纪律约束的，虽然不象在共产党内那样严格。在国民党内，人们不总

是完全同意自己领袖的见解和信念，但从整体上说都追随他。孙中山擅长调停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冲突和争论，他找到了解决争论的折衷方法，但同时清楚地看到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国家民族解放以及根据智慧和正义原则改造国家的伟大目标。

1921年已联合成党的中国共产党人，刚开始时并不想同国民党联盟。他们从一开始就否定同代表非无产阶级阶层利益的任何政党和组织合作的一切可能性。他们企图同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友好联系，但是他们的协作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对革命活动的目的与任务的概念原来是极不同的。

20年代初已熟悉中国政治局势的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得出了结论：各革命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是适宜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2年7月）的宣言中，已含有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宣言谈到：“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其纲领如下：

-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 （六）工人和农人，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和市议会中应获得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应绝对的自由；
- （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1. 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

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实业工人等；

2. 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

3. 废除厘金^①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所得税；

4. 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5. 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6. 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②

这是广泛的一般民主主义的纲领，纲领的某些要求与孙中山所提出的任务相符合，因此为同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建立联盟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同意关于同国民党建立合作时，表示反对共产党员作为特别党员加入国民党。

刚刚建立起来的共产党还很弱小，在工人和农民运动中还没有扎下根，因此不可能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的突击力量。只有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才可能起这种作用。根据这些看法，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密切的合作。共产国际的指示遭到了那些拒绝把国民党当作政党的中共党员们的极端反对，如果要他们承认国民党，那么只承认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孙中山没有立即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可是在他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共产党员必须按这些条件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履行其义务，即承认“三民主义”为其纲领，并完全服从领袖，在国民党内例行一种手续，每个新党员都要宣誓效忠领袖，即效忠孙中山，而且还要按上手印。

孙中山坚决拒绝同中国共产党作为平等伙伴在共同制定协议的基础上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同意中国共产党作为独立

^① 地方当局征收的在中国境内转运商品的过境税。

^②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上海1951年版，第81—83页。

的政党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而存在。由于向共产党人让步，他免除了共产党员履行加入国民党的封建手续。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根据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召开的临时会议上及后来在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共产党员按孙中山所提出的条件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坚决主张，在热烈而尖锐的争论之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克服了不愿以特别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办法同国民党建立合作的思想。

孙中山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的、并被共产党领导人所接受的合作形式，从一开始就包藏了冲突的危险性。这种合作的形式使共产党员很苦恼，他们很难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孙中山的原则协调一致。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抱敌视态度并把共产党员视为对自己地位威胁的国民党右派也不满意这种合作形式。他们的不隐瞒自己的愤慨，因为在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保存了自己独立政党。他们企图说服孙中山改变主意，迫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但是，孙中山作为有卓见的政治家懂得按他的条件所缔结的“不相称的婚姻”的全部利益，正因为如此，他才获得了苏俄大量的军事政治援助。

在这之前，因孙中山的不彻底性和倾向于同军阀联合并企图讨好帝国主义者而对他加以批评的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成了孙中山的同盟者，并承认其权威。1922年9月，《向导》周刊登载了蔡和森的一篇文章。该文就孙中山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声明发表了批评意见。作者劝告国民党领袖丢掉关于同军阀调和的幻想，同时强调指出，只有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带来胜利，革命党应该同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蔡和森表示不赞同孙中山借外资以开发中国实业，因为帝国主义者要求“以他们本身的利益为准标”。

当国民党领袖们就临城案件^①向驻北京列强公使团致电，请

^① 1923年5月6日，在津浦铁路临城车站附近，土匪以暴力劫车，抓走外国乘客作为人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利用这一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对警察和铁路建立外国监督的要求。

求参加调解的时候，《向导》周刊对国民党领袖们提出了指责，声称国民党“不明白中国最大仇敌的真性质”。^①

共产党代表被孙中山吸收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起草改组党的纲领和章程。按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国民党改组前，就其社会成份而论，是个杂牌的政党。国民党的一多半党员是知识界的代表——国会议员、律师、新闻记者、教员、官吏和军人等，华侨及广东工人约占20—30%，小资本家约占10%，无职业者约占10%。根据这些统计，蔡和森得出结论，“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②在国民党党员中间，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界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但是国民党反映了全民族的利益，不是个别阶级的利益。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由于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竭力加强党的人民性，使之接近工农大众，成为工农大众利益的表达者和保卫者，因为工农大众是民族的极大多数。由于支持孙中山关于组建国民革命党的计划，共产党员指出，不应完全局限于军事行动而忽视民众，否则国民党尽了革命力量，但民众却把它忘了。《向导》周刊指出，“在双十节那一天，全国各处的庆祝大会中间，简直没有一个人提及孙中山的功绩。这便证明国民党与群众早隔离了。”^③《向导》周刊把孙中山及其政党的声望低落解释为在民众中间宣传工作不够，所以民众不了解孙中山反对军阀的斗争是为全国人民利益的革命，而认为是“南北之争”。

为了获得民心，国民党的领袖们应当对人民的贫困状况公开表示同情，支持工人罢工，支持人民出来反对当局的专横与不法行为，支持争民权、争民主、争自由、裁军、承认苏俄。按共产党员的意见，只有同民众接近才能把国民党引上“新路”。对于

① 孙铎：《临城案件与国民党》，载《向导》1923年，第28期，第206页。

② 只眼：《国民党是什么》，载《向导》1922年，第2期，第16页。

③ 张国焘：《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载《向导》1922年，第10期，第86—81页。

这一点，国民党应当“对令平民不安的事件有反应，可是国民党没有这样的纲领”，因为国民党今天联张作霖，明天联段祺瑞，

“国民党除了与军阀周旋以外，简直没有别的当前奋斗方略，怪不得民众难以发现国民党是代表民众利益奋斗的政党”。^①

由于基本上承认军事斗争方式的必要性，所以中国共产党坚决劝告国民党对政治工作要特别加以注意，政治工作是唤醒群众觉悟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一种手段。

中国共产党人呼吁国民党支持工人运动。《向导》周刊写道：“在我们看来，中国国民党或者还未见到中国劳动群众觉醒的重要，并且我们确信国民党领袖不会有反对中国工人的行动。如果如此，其结果将是国民党领袖失掉在国家独立的争斗中最有力的份子之信心”。^②共产党人同时建议了解谁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在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划定明确的界限，认清取媚军阀之政策的错误。^③

陈独秀写道：“国民党诸君！保障民族民权是国民党人唯一的使命，要奉行这个使命，第一要认清最违反这个使命的敌人是谁；第二要将奉行这个使命的基础建设在每个民众革命的行动上面，勿失去一个参加民众运动的机会，万不可单单建设在军事行动上面。”^④

因此，在加入同国民党的联盟时，中国共产党说明了自己的独立性，表明了自己对国民党领袖的政治活动的批评态度，力求“使国民党向左转”。

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目的明确地争取使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全民性，并使运动摆脱南方数省的狭小范围，使国民运动变为带有共同目标和任务的全国一切进步力量的联合运动。

① 张国焘：《革命党的“否认”病》，载《向导》1922年第15期，第118页。

② 孙铎：《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载《向导》1922年第11期，第89页。

③ 陈独秀：《革命与反革命》，载《向导》1923年第16期，第130页。

④ 陈独秀：《反动政局与各党派》，载《向导》1923年第16期，第130页。

陈独秀抱怨中国社会各阶层是一盘散沙，彼此冷淡，漠不关心。例如，工人举行罢工，别人都袖手旁观；学生请愿被打，别人置之不理；一省人民起来反抗，别省人都“隔岸观火”。他号召结束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为了共同的目标把大家的努力集合起来。陈独秀高呼：“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②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那个时期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和演说中得到了反映。决议的出发点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但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同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胜利都是有利害关系的。这将奠定他们协调行动的基础。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合理性时，共产国际认为需要强调指出，“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国民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③

实现这一条带有极大的复杂性。很难想象，怎样才能在具体情况下使服从于国民党的政纲并行不悖，同时又不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加入国民党而又不与它合并。实际上，国民党只有采纳包括国共两党总纲的条件下，这才是可能的。

解决划分国共两党之间势力范围的问题是复杂的。蔡和森及其支持者赞成国民党只限于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工作，而

^① 陈独秀：《怎么打倒军阀》，载《向导》1923年第21期，第153—154页。

^② 《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在中国的运用）》，莫斯科，1934年版。

^③ 同上，第112页。

不在工农群众中从事工作。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劳工运动方面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不把这项工作移交国民党处理。”^①

另一些共产党员认为，由于加入国民党，他们应当利用其组织在工农中间进行群众宣传工作。按李大钊的意见，国民党的旗帜应当在全国土地上飘扬，“进行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斗争的工人、学生、农民和商人都应当看到它”。国民党应当成为全国的政党，各地都应当建立国民党组织。

如果国民党仅限于网罗非劳动居民阶层的党员，那么无论在地理方面或社会方面扩大国民党活动的任务自然不能顺利地解决。顺便说一下，这可能促使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对共产党自身不利，因为这可能使他们在国民党内部的工作复杂化，难于进行工作）。因此，共产党员提出了把国民党变成保卫劳动人民利益的全民政党的宗旨，在筹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他们声明了这一点。在《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②一文中，瞿秋白号召商人、农民、工人、教员把国民党视为自己的政党而加入它。瞿秋白把中国复兴的希望与改组国民党成为人民的政党联系起来了。

1924年1月举行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主要任务是党的改组和通过党的新纲领文件。在孙中山的压力下，代表大会不顾右派的反对，同意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准许他们参加国民党的队伍。起草国民党新纲领时，考虑到了共产国际关于“三民主义”精确定义的建议。代表大会把许多共产党人推选进了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在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机构时，许多部门，首先是工农部门的职位授予了共产党人，从而使他们有可能对工会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影响。

国民党右派以怀疑目光注视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积极活

^①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历史》，载《中国问题》1929年第1期，第5页。

^② 巨缘（瞿秋白）：《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载《向导》1923年第49期，第373—374页。

动，并极力设法加以限制。1924年6月，国民党右派企图说服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以及孙中山本人，但都是徒劳的。国民党右派借口说，既然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留在共产党内，共产党必须解散。国民党右派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以失败告终。

在同国民党右派的一些争论中，共产党员捍卫了自己在工农中间工作的权利及其在国民党内的阶级利益，^①国民党右派及支持孙中山的将军们，仍抱着武器万能的传统观点。对于他们来说，力量是以军队的数量来计算的，军队的重要价值在于枪杆子决定一切。他们不重视工农运动，更不重视政治斗争中的工农运动。他们需要军队绝对服从，而不需要人民的爱戴与信任。共产党员所实行的提高群众政治积极性的路线使他们惊慌与痛恨。自然，共产党员也担心军队势力的加强，因为怕出现新军阀，所以他们把提高工农的积极性看成是可以建立革命所必需的力量均势的对抗。

1924年夏秋季，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甚至提出了关于同国民党断绝关系和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和彭述之针对国民党单方面军事行动所写的文章，就是企图停止合作的反映。^②

但这是国民党右派求之不得的。在他们中间传播了关于孙中山打算加入共产国际的谣言。他们在孙中山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并且责备他姑息共产党员。他们竭尽全力来削弱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工作方式与方法的影响，使其服从自己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旨在夺取国民党内指挥地位的政策建立在对国民党党员划分为左右派的基础上（国民党本身反对这种划分的合法性，因为他们在这中间识破分裂国民党的意图）。工人、

^① 参见陈独秀：《我们的回答》，载《向导》，1924年第83期，第673—678页。

^② 详见格鲁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载《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年版。

农民、知识分子和急进分子被列入左派，而军人、官僚、政客和资本家被列入右派。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知识界的革命分子被列入中派。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内暂时彼此可以和睦共处的派系有五个。但是，将来在左派与右派之间分清界限是不可避免的。左派主张采用革命的斗争方法，而右派则主张采用妥协的斗争方法。左派真诚地渴望行动合乎民族的特性，并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斗争中力求依靠群众。右派只关心国民党的速胜和自己的前程。他们渴望同列强与军阀妥协，并依靠武力与谋略为自己获得“某种政权”。左派乃是真的国民党真的国民主义者，右派则抛弃了国民主义。陈独秀指出，右派“实际上可以说不算是国民党了”。^①他反对人们把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当作是左派与右派之间分水岭的猜测。

陈独秀在1924年9月的另一篇文章^②中，把国民党分成三派：右派、左派和中派。他认为左派是革命的，代表工人、手工业者、农民、部分商人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中派是妥协的，代表工商界和部分小资产阶级。右派是由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密切联系的大商人（华侨、地主、军人、政客和买办）构成的。右派是彻底反革命的。这一派国民党员丧失了自己从前多多少少有过的一点革命性，他们害怕工农运动的高涨，竭力削弱反帝斗争。因此左派必然要对他们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指出了关于同国民党断绝关系的意见的错误。由于承认国民党是中国国民运动（但不是所有运动）的重要工具，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责成共产党员同国民党左派联盟，同时揭露国民党破坏革命利益的错误活动。因此在帮助国民党时，共产党员保留捍卫自己立场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号召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公开说明

^① 陈独秀：《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载《向导》1924年第62期，第495页。

^② 见前引陈独秀：《我们的回答》，第673—678页。

党的独立自主的路线，揭露国民党的错误，发动工农群众起来反抗破坏他们利益的行动。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要求工人农民的阶级性的职业组织不依国民党为转移，这时工农组织对革命的帮助才能更加有效。农民和工人应放弃加入国民党，而不与国民党的组织混淆。“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①代表大会的一些决议明白地表示了巨大的独立性倾向，同时还表现出有意公开宣布限制国民党的活动，以及规定出两党的“势力范围”。

国民党内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冲突，由于共产国际代表们的作用以及孙中山个人的威望才未形成公开的冲突。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不同派系的矛盾上善于随机应变，并以灵活的策略消除其矛盾，因为他认为同中国，共产党联盟也就是同苏俄联盟，这对于国民党是有好处的，也是必需的。孙中山“以自己的黑尔库力士^②的身躯”挡住和掩护了聚集在国民党队伍内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孙中山既善于宽容人，又能克制别人的激情，抑制即将迸发的强烈的感情，因此他才保持和领导了一个政党。他一句话就确定了全部决议的精神。在中国，人们没有枉说：“国民党即孙中山，他要一去世，中国的革命也就要停止了。”

孙中山既是革命之父，又是革命之子，中国进步活动家们的全部希望都是同他发生密切联系的。1925年8月，他的逝世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孙中山的逝世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从而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左派。在国民党内，许多人过于依赖一个人的意志，当孙中山不在的时候，就暴露出了他所创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1981年版，第95页。

^②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译者

立的组织的脆弱性。对他的不合逻辑和自相矛盾的观点及其两面倒的理论概念加以评论和解释的时代开始了。

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同为继承孙中山的思想遗产而斗争交织在一起。国民党右派从孙中山主义中丢掉了他的革命内容。他们时时刻刻警惕地监视共产党员的“言行”，共产党员关于中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谈话使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人物忿怒与痛恨。国民党右派按照自己的立场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当他们看到有关苏俄的胜利和消灭地主资产阶级压迫的时候，他们不能不考虑自己未来的命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景使他们不快，也使他们恐惧。在孙中山生前，他们没有掩饰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反感，但那时不能让他们放任。在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开始肯定地说，共产党人的利益不符合国家利益，而符合共产国际的计划，

“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目标是根本相左的。从他们的声明里得出的结论是，孙中山同苏俄的联盟及其同共产党人的合作是暂时的策略上的步骤。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人的做法不同，国民党右派利用了国民党创始人的反帝声明。他们歪曲孙中山关于为国家统一而奋斗的革命主张，完全否定了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必要性，同时他们大量援引孙中山对阶级斗争学说抱过否定态度的言论。

国民党的右派、左派以及共产党员，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都发誓保持和发展他的革命精神，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内容插进了这些誓言中。陈独秀在追悼孙中山的文章中表示，如果反革命分子脱离国民党队伍，“不但无损于国民党之统一，而且这班反革命的分子脱离一次，国民党的数量质量均进步一次，在社会上的声望便增高一次。”^①陈独秀在谴责关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必然分裂的预言时强调指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仍旧活在国民党内并未曾死，只有在中国没有了革命的国民党，那时孙中山才真是死了。^②

① 陈独秀：《悼孙中山先生！》，载《向导》，1925年第106期，第881页。

② 同上，第882页。

因此，中国共产党赞成让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即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强地位并尽力设法限制其活动的那些人退出去。同时，共产党人也力求防止国民党分裂，因为他们明白分裂对于他们是非常不利的。他们要求遵守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奠定的革命原则，履行孙中山临终时的遗嘱。他们自己代表工人和农民答应支持孙中山所开创的国民党为民族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致国民党的唁电中表示，相信在孙中山死后，“伟大的集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将更为有力。”^①

中国共产党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安，因为孙中山的位置将由继任者所取代，而这个继任者在把已故领袖拥有的全部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之后，就将“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再也不去重视孙中山的遗嘱了。共产党人认为转向集体领导是在国民党内保留自己的地位和继续共同革命斗争的可靠保证。

中国共产党力求加强对国民党的政治影响，成为它的大脑中枢及其思想的发动机，不让国民党的革命精神熄灭，并使国民党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共产党人把另一种希望寄托在支持同他们以及同苏联顾问密切联系的那些国民党左派活动家身上。蔡和森写道：“国民党最大多数党员之左倾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②按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左派的必要条件至少有四个：一、彻底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军阀、买办阶级；二、恪守孙中山的方针——巩固中国人民同苏俄的联盟；三、坚决同一切反革命分子断绝关系；四、遵行保护革命中坚势力的工农群众利益之政纲。蔡和森表示，“这四点也就是中山主义最重要的内容”。^③

同时，蔡和森预先声明，国民党左化决不是同化于共产主

① 《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载《1925年》导向第17期，第890页。

② 蔡和森：《何谓国民党左派？》，载《向导》1925年第113期，第1045页。

③ 同上。

义，只是同化于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中山主义。他表示，“中山主义与共产主义显然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标志；不过共产主义者愿意帮助中山主义之实现。共产主义者既无赤化国民党的奢望，更无赤化国民党的妄想。”^①他请国民党人确信，共产党人连想也不许想这个，只想帮助国民党，并且希望全体国民党人成为左派，在国民党内不再有其他派别。

实践证明，并非被共产党人列入左派的所有国民党人都准备履行蔡和森四个条件。在左派同右派（左右派之间是有条件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左派在思想上与右派比与共产党人更为接近。在国民党领导人中间与其说因思想矛盾，不如说因个人意气、功名和威望而经常发生摩擦与冲突，这些摩擦与冲突可能加剧，也可能由于上层的勾结、联合、相互让步和妥协改组而言归于好。

然而，共产党人在高度评价国民党人献身于革命事业时，与其说是以实际情况作为出发点，不如说是以所希望的情况作为出发点。他们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认为国民党接近平民的倾向是明显的，也是必然的，因而有产者的代表们退出了党。但是，并非所有代表都远离了国民党了。在国民党内，右派们成立了各种派别。如“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辛亥同志俱乐部”、“孙文主义学会”，以及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示背道而驰的其他派别。共产党人声明被开除国民党的人所加入的这些派别是非法的，因此要求把他们从国民党内开除出去。但是，他们仍留在国民党内，继续进行反共反苏的宣传。他们有自己的章程和地方组织，并企图通过这些地方组织扩展其势力，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势力。

1925年8月，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杀害。廖仲恺的死，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左派中间失去了最可靠的朋友，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变得困难了，虽然这一点还没有

^① 同上。

马上表现出来。

戴季陶在捍卫“三民主义”纯洁性的口号下，出来反对共产党人。戴季陶在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里，批评共产党人企图以阶级斗争来代替民族斗争。他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因为共产党人破坏孙中山的原则，他们的活动有损国民革命。国民党领袖表面上谴责了戴季陶，但是不像共产党人谴责戴季陶那样严厉，共产党人谴责戴季陶为英国和张作霖服务，并变成了反革命分子。陈独秀指责戴季陶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缺乏信心，向反动的资产阶级靠拢，并暗中破坏反帝斗争。

如果共产党人坚决要求把右派从国民党内开除出去，那么国民党右派势必反其道而行之。国民党右派提出自己的要求，其理由是，既然共产党人要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对孙中山的学说始终不渝。按国民党右派的意见，真正的国民党员势必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同时，在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之后，国民党人还有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友党与之合作的可能性。他们把国民党内部纷争的罪责推到共产党人身上。在击退来自右面的攻击之后，共产党人声明，他们绝不再同反革命分子合作，右派就是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员有独立的组织，有自己的纲领和章程，这并不妨碍他们同国民党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合作。共产党员忠实于自己的党并不构成合作的障碍。但对反革命分子来说，中国共产党则永远不会成为友党。中国共产党人是根据孙中山的决定而加入国民党的，所以国民党右派既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也反对孙中山本人。

在五卅事件后，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加强了，而且也活跃起来了，这些行动表现在他们不与广州国民党大本营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往来。他们批评广州政府同共产党人合作以及同苏俄的关系。

国民党右派由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转到了对国民党左派的批评上，他们指控国民党左派纵容共产党员抓权。当时的左派领袖

包括蒋介石和汪精卫。1925年冬，国民党右派聚集北京西山，孙中山的灵柩就停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召开了西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从国民党领导中驱逐共产党员、驱逐苏联顾问以及撤销汪精卫一切职务并开除其国民党籍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把西山会议看作是旨在破坏革命政府威信的新的反动行动。

共产党人保护了蒋介石，使其免受国民党右派的攻击。瞿秋白在答复指控蒋介石犯有各种罪行的国民党右派时写道，“至于蒋介石及其他人，大概可能是因尊重人民的意志、肃清国内反革命军阀分子、停止为军队征集脚夫和强迫供给军队粮食、废除苛捐杂税而被列入右派所指控的罪行录中。”^①

由于力图使西山会议派——最无廉耻的反动派孤立起来，中国共产党以陈独秀的口头声明回答了西山会议派的攻击，陈独秀说，中国共产党将和国民党左派结成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国民党内或党外，同时也准备和国民党右派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如果他们还没有转到公开反动派的阵营的话。”^②

张国焘在致国民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中声明，作为破坏国民党章程的西山会议的决议案是非法的。他指出，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不足法定人数，而会议参加者们却把这些会议称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他要求正式撤销西山会议派的党内一切职务，至少给予党籍处分。

张国焘说，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领导机关的工作是孙中山允许的，而且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注意到共产党员们都是赤胆忠心为着民族革命事业。张国焘写道：“我们是为革命而加入国民党的，既没有变国民党为共产党的野心，也没有垄断国民党党务的阴谋。”^③

① 瞿秋白：《政论集》，莫斯科1979年版。

② 陈独秀：《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载《向导》，1925年第139期，第267页。

③ 张国焘：《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载《向导》，1925年第1期，第1270页。

张国焘质问道：“我们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才加入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同志手握手来革命，哪有反去包办革命工作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响不带有进攻性质，而带有防守性质。因为这些问题应由最高机关——国民党代表大会处理，所以强调西山会议派行为的非法性。

国民党领导人不听共产党人的劝告，他们不去中断同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右派的一切关系，却同他们开始谈判，讨论关于如何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领导中的代表权问题，以及争论双方和解的条件。同时也不考虑共产党员所占的阶级比例。国民党员（无论右派还是左派）都以自己的理由为指南。他们对造成分歧和争论的原因的分析，与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是不一致的。

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作开始之前，国民党左派依靠共产党人的支持，才得以压制右派，并保证了自己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的优势。代表大会的成份反映了这种情况。左翼和共产党人的代表168名^①，中间派的代表65名，右翼代表45名。共产党人认为，9/1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②

中国共产党开始觉得，关于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领导权的意见，已经占了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确信，由于达到了谴责右派的目的，所以他们保证了自己对国民党的监督。而实际上，代表大会参加者的成份不能客观说明在国民革命阵营中政治力量的实际关系。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所通过的决议，甚至在广东境内都没有实行。这在被军队和地主阴谋破坏的农民问题上特别明显可见。国民党政府能够巩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与其说应归功于农民运动（尽管农民运动具有重大的作用），不如说应归功于对其敌人的军事优势。国民党的军事活动家们利用群

① 原文误为198名。——译者

② 谭平山：《中国革命党宣言草案》，莫斯科1929年版，第22页。

众运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的军事胜利促进了农民群众的斗争。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不论通过了一些什么样的好决议，但是最后都归功于军事。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欢迎。按他们的意见，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由于这次代表大会才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敌人破坏代表大会的工作和阻挠代表大会召开的企图被粉碎了。《向导》周刊认为，从今以后，在国民党内的摩擦结束了。^①在代表大会上西山会议派受到了谴责，其中几个人被开除出党的领导机关。在关于共产党员的党员资格问题上，代表大会证明了孙中山的决定没有错。

看来，共产党人可以放心了。在代表大会上，他们的策略的成功是很明显的。他们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内的代表人数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作了一些关于把国民党改造为群众性的强大政党的计划，以便“钳制”军队。他们还考虑修改章程（把它搞得更严些），并在章程内规定不仅个别一些人而且整个组织都可以加入国民党。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计划是，使国民党由一个政党变为参加革命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这样一来，共产党就可以作为唯一团结的、有良好组织性的和有严格纪律性的一支力量而出现于统一战线内，这自然使它有可能决定统一战线的政策了。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不具有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 and 没有能力建立捍卫本阶级利益的政党的这一看法，成了这种思想的基础。但这一思想没有反映出真实的情况，自然，也不可能实现。指望与资产阶级和地主有密切联系并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右翼不战而拱手把国民党送给共产党人是很困难的。

谭平山阐明了国民党新改组计划的实质。他写道：“为了使

^① 张国焘：《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教训》，载《向导》1926年，第1329页。

国民党成为一个广泛的组织，为了使每个愿为民族革命和国民党纲领奋斗的阶级都有可能参加国民党，它的组织章程应该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党章应该改成类似英国工党的党章，使无党派人士和团体有可能参加国民党。这种组织形式有以下优点：

一、国民党会变成一个联合一切阶级的真正群众性的党，从而能够结束军事独裁并阻止新的独裁产生；

二、一切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进步资产阶级分子可以无顾虑地加入国民党，而工人和农民也能以整个组织的形式入党（例如工会、农会等等可以与国民党联合）。这样一来，这些分子脱离本阶级的危险性就不存在了；

三、属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个别成员或整个组织，除了国民党的总纲外，还有本阶级单独的阶级纲领。一方面，可以缓和、甚至也许可以避免由于国民党员各种成份的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特别是无产者，能以统一战线的形式为全民族的利益而斗争，同时还能维护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不至受国民党组织形式的阻碍。党章的修改可以巩固各阶级的统一战线。”^①

共产党在制定其计划时所持的出发点是：在第一第二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间隔时期，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已开始占优势，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社会成份的变化。因此，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国民党内已开始起比较重要的作用。由于同无产阶级一起采取行动，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可能使资产阶级分子中立化，并防止资产阶级转到敌人的阵营中去。

共产党同时坚决批驳了关于共产党想“赤化国民党”的诽谤性的连续不断的反动宣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自己的计划中忽视了军队。他们以为处于广州国民党政府支配下的武装力量，将完全服从于政府，而且

^① 谭平山：《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29—30页。

毫不犹豫地和毫不动摇地执行政府的命令。实际生活很快证明他们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中国从来不懂得民主制。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不是能够博得民心的和获得多数选票的人，而是拥有军事实力的人。政治斗争中的胜利者不是由选票的数量，而是由枪杆子的数量决定的。由于过高估计组织松懈的和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所以造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队上层分子于1926年3月第一次激烈反对共产党人，使他们措手不及，束手无策，迫使他们让出在国民党内所获得的位置。那个被共产党人认为是左派的将军发动了政变。国民党领导对蒋介石非法行动的态度表明，实际上真正的政权属于谁。由于没有能力惩治这位将军，所以国民党的领导人不得不满足他的要求，如果国民党的领导人全然不重说一下西山会议情况的话，那么他们就与西山会议派基本上相同了。《向导》周刊写道：“西山会议议案的精神亦可以说有部分的实现了”。^①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地位被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面临两种选择：是向国民党右派让步；还是退出国民党。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无罪的。由于留在国民党内，他们才能在国民革命阵营中保持继续工作的可能性；退出国民党，就等于退出比赛场了。共产党人由于同国民党不妥协而破裂吃了苦头。陈独秀的公式是“让步，但不退出；工作，但不把一切都抓在自己的手里”，虽说这是动摇的和不彻底的，但在复杂的情况下又是最可以接受的公式。

1926年5月，在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公开操纵下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西山会议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共产党人的活动受到了间接的谴责。他们在广东开展农民和工人运动的努力被称之为“幼稚性的错误”、政治上的“遗

^① 乐生：《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载《向导》1926年，第157期，第1531页。

毒”。这次全会的决议较之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后退了一步。蒋介石真正主持国民党后，对共产党人试图发动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采取了否定态度。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意味着新的领导一笔勾销原来的方针，从而采取遏止和限制国内的群众运动方针，并认为原来的方针是民族斗争的障碍。

国共合作是以共产党人巨大让步的代价保全住的。共产党人活动的范围被大大缩小了，他们在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重要职位也被剥夺了。他们在国民党内所占的职位不得超过 $1/3$ ，而且不得担任中央部长，因而他们对国民党政治的影响受到了限制。共产党员处在了从属的地位。蒋介石以暴力方法迫使共产党人放弃自己急进要求的挑衅行动，使国民党右派活动家们增强了信心。国民党右派知道这件事具有怎样的后果，而且影响到共产党人今后的前途。因此，暂时保留他们在农民和工人中间进行群众宣传工作的可能性，但这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基本上是蒋介石）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暂时被迫退却的共产党员没有放松自己的努力。他们仍继续执行自己的方针，扩大工农运动，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并仍以国民党的名义采取行动。共产党员没有停止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还象从前一样，他们力求证明国民党右派不仅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也反对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在其宣言中划清了要同共产党人和苏俄断绝关系的西山会议派与国民党新领袖之间的界线，并相信国民党新领袖将坚决遵循孙中山的遗嘱。在1926年3月20日以后，共产党人仍把国民党领导人说成是左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共产党人之所以谴责西山会议派，是因为那些人禁止散发蒋介石和汪精卫演说的小册子。因此共产党员把批判火力指向那些不停地叫嚣“国

民党赤化”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孙科提出了关于禁止共产党员在宣传中把国民党员分为右派和左派的决议案，与此同时，他还谴责陈独秀企图挑拨和分裂国民党。全体会议的参加者否决了孙科（顺便说一下，他被列入左派之内）的提案，然而，全体会议讨论的事实本身证明，在3月20日事件后，国民党右派耀武扬威，更加活跃起来了。

最有代表性的是：在全会前夕以及在全会期间，在广州谣传，全会将通过关于实行共产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准备举行罢工和发动起义的决议；还谣传说，将没收银行的全部存款。右派势力竭力扩大城市的紧张气氛，唆使社会舆论反对中国共产党。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致国民党书，再次谈到统一战线使帝国主义遭到巨大的打击，“一方面解放中国民族，另一方面即为完成世界革命”。^①中国共产党表示愿意加强同国民党的合作，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中国共产党答应完全支持国民党实现其历史使命。合作的形式是次要的，主要的任务是保持合作。中国共产党使国民党员注意到由于协同动作而获得的胜利。破坏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只能对国民革命的敌人有利。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书中表示，担心国民党的领导人将成为国民革命敌人的倾轧与阴谋的牺牲品。在这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吾两党之共同职任，即在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其内部，反抗以至于推翻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②

为了清除疑虑，中国共产党建议共同讨论关于实现联盟形式的问题，以便加强革命力量统一战线的团结。中国共产党预先表示赞同不论什么样的决议，从而使国民党相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将严格遵守该党的纪律。陈独秀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中表示，在3月20日事件中，若证明是共产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

①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载《向导》，1926年，第157期第1525页。

② 同上。

便应该受惩戒。陈独秀请蒋介石把自己不愿说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他究竟怀疑谁企图发起倒蒋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向蒋介石表示：“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哪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阴谋的人，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①陈独秀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他认为对所发生的事件负有罪责的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军官，众所周知这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抱敌视态度，而且同在上海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分子保持联系。

陈独秀在信中同时否认蒋介石觊觎国民党的唯一领袖孙中山的职位，并表示，实际上的领袖、理论上的领袖和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孙中山，目前在党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人能替代他。

陈独秀同时认为，共产党员除“共信”三民主义外，也应该容许有各阶级的“别信”，因为国民党不是单纯一个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所以各阶级都有权遵循自己的原则。“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②

陈独秀认为，蒋介石重复戴季陶提出的除信仰孙中山学说外，禁止信仰其他任何学说的要求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况且戴季陶的要求，是与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对共产党员的工作所做的高度评价相抵触的。

为了保护本党同志，陈独秀声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没有从事秘密活动，而是公开进行工作，并且严格遵守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纲。他提醒蒋介石自己说过的话：“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三民主义”的口号。

陈独秀企图说服拼命独揽大权的蒋介石，这是徒劳的。蒋介石

^①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载《向导》1926年，第157期，第1527页。

^② 同上，第1529页。

石的野心可能被陈独秀关于国民党内目前还无人配做孙中山继任者的声明触犯了。当时蒋介石还不敢同共产党完全破裂，因为共产党人的背后有苏联的军事援助。他只是要“压住”共产党人，“使他们的热情变冷淡”，并利用他们的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足够了。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后，共产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但是，为了解决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决定成立一个由国民党5人、共产党3人组成的联席会议。这实际上意味着国民党的领导人在开始寻求同共产党合作的新方法。关于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不适宜性和无益性的意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内开始出现了。这个问题已被提交1926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

由于基本上看清国内政治形势有利于革命，所以中共中央全会认为蒋介石是“右派”，认为他3月20日的行动是反革命的。同时，全会不同意共产党员主张退出国民党的观点，全会强调指出，国民党的发展和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全会批评了那些认为共产党可以单独领导无产阶级，并率领被压迫的人民大众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人。

关于夺取国民党垄断的政权的观点被认为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现实的，是宗派主义的，它潜藏着共产党与无产阶级脱离城乡小资产阶级和使领导权完全转移到大资产阶级手中的危险性。

七月全会提出了扩大左派，把中间派吸引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以及对右派公开斗争的任务。全会在党的面前提出了使国民党变为广泛组织的目标，以便吸收革命小资产阶级参加到党的队伍里来。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力争修改国民党党章和放宽目前的惩戒标准是必要的。

北伐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这

一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仍怀有同国民党改善关系的思想。诚然，国民党在该战线中会起怎样的作用是不清楚的：在统一战线内，国民党作为政党不知是将被溶合还是被消灭，或是作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组织而依然存在。

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人都希望快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以对抗国民党。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期望恢复1926年3月20日在国民党内失去的地位。不管怎样，在重新加紧准备北伐的时候，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表现出共产党员们对国民党领导的不信任。

在北伐时期，当国民革命军开始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共产党员们经常提醒建立遏止军人政权的民众组织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掩饰自己的担心，在北伐进程中，军人将在国民党内占上风，并把胜利果实攫为己有。他们悲观的预言终于应验了，虽然在北伐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开展群众运动竭尽最大的努力。

当蒋介石以形成国民革命的两个中心来对抗武汉政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对蒋介石公开敌视的态度。共产党人引用孙中山的话说，孙中山的目标是党管理国家，而不是军事独裁。由于同武汉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又把深化阶级斗争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并迫使国民政府制定改善劳动者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法律。由于力求克服国民党左派的惰性及其不愿采取急进的强制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所表现出的踌躇和谨慎态度，共产党员们对国民党左派施加了压力。他们充满了急躁情绪。在他们看来，大家都促进实现革命的“大跃进”，可是国民党员们却慢慢腾腾的在拖时间，按国民党员的看法，革命到时候自会转到更高阶段上去的。按共产党人的看法，虽然已经到了革命的十月，但国民党员仍停留在二月。

还在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企图说服国民党左派必须制定明确的社会政治纲领，他们认为国民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纲带有抽象性质，与其说是政纲，不如说是党纲。^①

共产党人认为，在新的政纲中必须注意保障民众的利益（如关于工人最低工资之规定；关于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之保障；解散压迫农民之军队及民团；严禁对于农民之高利贷超过若干数以上；给商人以某些权利等具体办法）。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政府新政纲的希望不具有急进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问题方面提出了很简单的提案。

符合共产国际代表观点的并为了工农群众的利益而利用国民政府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策，并非全体共产党员都赞成。

有左倾情绪的共产党员提出了彻底抛弃国民党的要求，他们把国民党称之为“腐烂的尸体”。他们甚至还准备同国民党左派决裂，因为国民党左派在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上表现出了不彻底性。与其尽可能把大多数国民党左派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如扩大自己对国民政府的影响，实际上，某些共产党员提出了打倒国民政府的口号。中共中央严厉谴责了对于革命顺利开展有极端危险的左倾路线。

但是，保持同国民党左派联盟的方针，并不意味着同意他们的做法，他们的做法似乎是过于软弱和温和了，而且是妥协主义的。为了迫使他们采取满足共产党所提出的工人和农民的要求，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对武汉政府施加压力。

按《向导》周刊的意见，威胁革命联合战线有两个主要因素：一、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和挑拨；二、革命战线内部之妥协的非革命的分子日趋反动。^②妥协倾向表现在不愿满足工农的利益和企图限制他们的斗争上，归根到底，这削弱了国民党。《向

^① 参见陈独秀：《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载《向导》，1926年，第176期，第1817页。

^② 彭述之：《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载《向导》，1927年，第185期，第1982页。

导》周刊强调指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怎样巩固革命联合战线的问题”。每个革命者都应担负起责任，正如《向导》表示的那样：“我们应极力防止敌人象英国帝国主义那样的挑拨威胁和利诱的阴谋。”^①

用什么来巩固统一战线呢？“唯一的即是革命的策略，孙中山先生所遗留下来及国民党几次大会所决定的革命策略，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彻底消灭军阀，彻底拥护工农利益，与苏俄结成永久亲密的联盟，消灭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廉洁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国民政府，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抗租的绝对自由。中国一切被剥削的和被压迫的民众应站在这些革命的策略上团结起来。”^②

然而，共产党人对武汉国民党人所施加的压力，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相反，在国民党人中间更增加了对共产党人的不满情绪。一些将军和军官之所以拥护武汉政府，是因为他们同地主息息相关，对地主利益的任何侵犯都被看成是敌意的，或是“反革命的”。武汉国民党左派不愿同军队反目，他们甚至以失信于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为代价来保持同军队的良好关系。与此同时，左派也不希望断绝同共产党的联盟。实际上，反对共同敌人——蒋介石的斗争，使武汉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极为休戚相关。此外，国民党人担心同共产党人的破裂，将引起同苏联关系的恶化，那时候他们将处于孤立的状态。

1927年3月，在武汉举行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蒋介石拒绝参加全会的工作。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提高党权，以及反对蒋介石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的倾向等决议。全会在关于各革命力量团结的另一决议中，规定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政府领导机关的工作，如实现该决议，就意味着放弃蒋介石1926年3月强行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活动的政策。

① 见前引彭述之：《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第1963页。

② 同上。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举行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联席会议的决议案，以便讨论关于共同领导工农运动、关于少数民族、关于共同政治责任即共产党代表参加国民政府，以及合作的形式等问题。这些决议的通过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向左转的表现，也可以看作是向蒋介石分子的挑战。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文件虽说不彻底，但仍遭到国民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痛恨。这些文件被认为是向共产党人的重大让步，是在共产党的要求面前投降。国民党右派认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或宣言都带有煽动性质，因为这些决议和宣言促使农民燃起反对农村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烈火。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之间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是土地问题，这个事实证明了蒋介石分子是作为地主和与地主阶级休戚相关的军官阶层利益的表达者出来发言的，而且也证明了这些将军和军官们以及各级官吏向何处去。国民党左派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地主的利益，主要是中小地主的利益。不能说国民党左派不忧虑农民的状况及其未来的命运。他们也主张改善农民的命运，但不主张以急进的和彻底的消灭地主阶级为代价来改善农民的命运。政治上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缺乏自己的固定立场和经常摇摆不定是国民党左派的特点。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国民党左派主要是在共产党人的压力下，才对蒋介石公开挑战。这一段时期，他们就投到右派方面，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中同右派联合起来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觉得，他们（正是因为自己的软弱性）才有这个意志薄弱的不坚定的但忠实的同路人。此外，国民党左派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表述者，因而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应当反对封建制度。然而他们同地主的社会与血统关系或是全然被忽略了，或是没有信以为真。加之，中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也和国民党左派一样，愿意支持农民

们不过分的要求，何况没收地主土地和分田地的口号在农民群众中还不受欢迎。

对此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家们从来没有以纲领性口号约束自己，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有责任严格履行诺言。中国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使他们养成政治上的圆滑性，习惯于磨平棱角。他们惯于今天说明一样，明天做另一样。蒋介石和汪精卫是这类政客学校教育出来的最好的代表人物。对于他们来说，背弃自己的誓言和保证毫不费力。同盟者的背叛行为从来不被认为是大罪过。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在政治特征上的差别不是那么大的，所以这使得不同的活动家们便于从一个派系转到另一派系去。使他们大家联合起来的共同点是民族主义，在这里，尽管他们对选择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方式与方法存在某些微细的差异。

反动派的宣传同时指责武汉国民党员“随着共产党人的笛声跳舞”，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声称，他们“毁灭了党”。相反，共产党员们却谈到了国民党在同蒋介石分裂之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3月致国民党的公开信中指出：“我们认识三民主义的革命的国民党，非他国纯资产阶级的落后的国民党可比，尤其是带社会主义性的民主主义，实有与本党长久合作之可能。”^① 中国共产党指出了蒋介石企图离间两党的关系和要求取缔共产党员活动的阴谋。诚然，蒋介石仍继续被称作同志，这可以解释为希望同他和解。但是，这个希望在蒋介石1927年4月举行反革命政变之后，被彻底地埋葬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制定适合于新的军事政治形势的新路线问题。武汉革命阵营也面临着两个强大的敌人：即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军阀和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南京国民党。此外，出来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还有南方和西南的将

^①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载《向导》，1927年，第192期，第2076页。

领们。

武汉的局势之所以变得复杂和困难，是因为那些承认武汉政权的军事将领不可靠。国民党员们之所以不敢支持农民群众，是因为他们要维护地主的利益。

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中国共产党陷于复杂的境地。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这种抉择是相当难的：独立采取行动吗？然而对于这一点来说，无论力量还是经验它都没有；保持合作吗？然而因此又必须付出极昂贵的代价——失掉自己阶级的脸面。要知道，国民党左派已经表现出对于工农的利益漠不关心，所以也不会去满足他们的要求。

是排除万难而前进，还是妥协？谁都不能对这个难题提示正确的答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意见分歧扩大了。胜利冲昏头脑变为束手无策。这些争论带有很尖锐的性质。开始追究负责人，回顾过去，回忆共产党所走过的全部道路，分析错误和缺点。总而言之，重新认识自己全部活动的过程是令人痛苦的，然而却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分析不是处在脱离现实生活的平静环境中，而是处在如火如荼的事件中心里进行的。时间紧迫，不允许犹豫和空谈哲理。正因为这种情况，所以有可能导致新的错误和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4月27日在汉口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上代表们谈到了同国民党新分歧的根源是土地问题和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大家讲述了一些理由：即中国共产党应把农民中的全部工作交给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自己只致力于无产阶级工作。大家争论较为重要的问题是：或者保持同国民党的同盟而放弃土地革命，或者冒失去同盟者的友谊的危险而实行土地革命。有些人还要求使国民党丢开政权而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这些争论是公开进行的，自然，在武汉国民党的领袖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为了使他们安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保证说，要

继续同国民党合作。

《向导》周刊强调指出了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在革命联合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同时在该杂志上所刊登的一些文章贯穿了一个思想：国民党的支柱是工人和农民，因而国民党不应该依靠资产阶级。

但是，当将军们在武汉政府所辖境内发动叛乱的时候，国民党的领袖们没有请求人民群众帮助，却宁愿以让步的方法来调解冲突。共产党人在这里一筹莫展，因为害怕同国民党的关系更加紧张。

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4日在致国民党的公开信^①中，希望从造成的这种局势中找到出路。公开信指出，中国革命正在经历一个危急的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必定遇到许多难关，并且要克服许多困难问题。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醒觉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国民党革命的农民政策已经促起农民群众之奋起，实施这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革命的将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靠贵党在此时期之坚决的行动。”^②

其次，公开信企图让国民党的领袖们放心。它肯定说，并非所有军人都反对土地改革。

公开信还谈到，将领们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领袖”。公开信作出结论说，只是最少数的反动分子反对农民，但他们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他们有反革命的行动，不难一鼓荡平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在选择道路上打消一切顾虑，因为“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公开书》，载《向导》，1927年，第197期，第2151—2152页。

^② 同上，第2151页。

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反动的军阀已经公开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变，长沙的政变可十足的表明这一点）。他们已经向工农运动宣战了。他们的屠杀工农群众，和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李济琛一模一样。他们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他们侮蔑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威权。”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呼吁国民党，希望其领袖们宣布立即讨伐反革命的叛乱者。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①对国民党领袖们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国民党领袖们非常清楚自己权限所及的范围，因为将领们握有实力，而武汉政府没有实力。他们坚决反对关于攻打长沙的建议，他们宁愿失去工农群众的信任和尊敬，也不愿失去将领和军官们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公开信中，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武汉国民党领袖们的革命性上，寄托在他们为保卫农民的利益而采取坚决的行动上。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发表了告全国农民群众书，愤怒地谴责了湖南军阀的反革命进攻。呼吁书号召湖南农民手执武器反对反革命的叛乱者。中国共产党认为应当开始组织农村自治政府及土地委员会，没收地主土地，但是对于革命军的官兵及其家属的“土地和财产”不得侵犯。呼吁书的结尾是：恢复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湖南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农民群众书^②的内容，清楚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陷于最复杂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懂得，而且这两个文件也表明必须赶快采取坚决的行动，以便控制局势；另一方面，令他们最为担忧的是同国民党关

^① 同上，第2151—2152页。

^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农民群众》，载《向导》，1927年，第197期，第2150—2151页。

系的破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不拥有自己独立指挥的武装力量。说服士兵群众和下级军官拒绝执行叛变革命的指挥官的命令，缺乏现实的可能性。不是他们控制了事件，而是事件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性上，但是国民党左派辜负了他们的希望。他们呼吁国民党左派考虑国民革命的命运，但是很少采取行动。共产党人已不再能控制事件的进程。将领们成了局势的主宰者。共产党人强调指出，“许克祥是蒋介石第二”，巩固胜利需要扑灭长沙的反革命叛乱。^①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国民党人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行动方针。1927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自己打算同许克祥和谈，并且指出，它主张限制群众性的运动。^②武汉国民党左派的态度最明确地反映在汪精卫的意见中：“共产党员建议我们同群众一起前进，但是这些群众在哪里？所赞誉的上海工人或广东、湖南农民的力量在哪里？没有这种力量。你看，蒋介石没有群众却稳步在前进，而他们建议我们和群众一起前进，但这意味着去反对军队。不，我们没有群众也要前进，而且和军队一起前进。”^③

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强调指出，“给农民分拨土地的政策，应当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进行”。

1927年7月，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宣布同中国共产党脱离联盟关系。

为了挽救危机，陈独秀呼吁汪精卫及其他领袖清除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把忠于国民党传统和孙中山精神的革命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陈独秀强调指出，如果武汉国民党想顺利地对抗蒋介石，那么就应当“把反共斗争的建议抛到一边去”。陈独秀企图使国民党人相信，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决

^① 瞿秋白：《长沙政变与郑州开封的克服》，载《向导》，1927年，第197期，第2152—2155页。

^② 《帝国主义时代东方史概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320页。

^③ 转引自米夫：《中国革命》，莫斯科1932年版，第132—133页。

不意味着走上近似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写道：“中国的国民革命，在社会的客观条件上，固然不会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不是无产阶级单独的革命，而必然是工农中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革命。”^①

按陈独秀的看法，左派国民党危机的出路在于：“不是投降资产阶级，也不是投降无产阶级，而只是实现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②陈独秀认定了这不但是左派国民党眼前的出路，而且也是中国国民革命眼前的出路。

张国焘随声附和，写道：“我们以为救中国的惟一方法：有遵守孙总理的遗训，团结真正革命势力，领导农工商学兵士结合巩固的革命联盟”。^③

关于维持和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瞿秋白谈到：“现在革命的利益，是要工农商学兵广大的群众结合巩固的有力的革命联盟，我们在战场上在革命斗争之中，所流的血，所受的牺牲，是为着什么！”^④

这个问题在蔡和森文章里也涉及到了，他写道：“革命势力的联合便是国家统一的动力。要求国家统一必须先求革命势力联合。”“共产党人不是为自己的或阶级的利益不愿退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而是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不能退出此战线。”^⑤

虽然在国共两党领导人之间对此存在意见分歧，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著名领导人仍向国民党呼吁巩固团结。他们在文章中

^① 陈独秀：《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载《向导》，1927年，第200期第2199页。

^② 同上。

^③ 张国焘：《革命势力联合与时局》，载《向导》，1927年，第200期，第2201页。

^④ 瞿秋白：《革命失败之责任问题》，载《向导》，1927年，第200期，第2203页。

^⑤ 蔡和森：《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载《向导》，1927年，第200期，第2203—2204页。

都谈到了共产党人在保持同左派国民党团结方面的利害关系，他们回忆了在广州时期的合作以及保持团结对于国民革命命运的重要性。

在这危急的日子里，《向导》所登载的一些文章都强调指出，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在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中是利害一致的。共产党人以为还没有完全绝望，还可以把斗争的锋芒转向革命的共同敌人——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注意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与反对蒋介石分子的组织是不相容的，反共宣传使反帝反军阀的战线削弱了，危害这条战线的不是来自共产党人，也不是来自莫斯科，就连蒋介石的和外国的报纸都说，危害这条战线的是来自蒋介石和国民党左派内的走狗。

然而，大势已定。武汉国民党的领袖们已加紧准备同共产党人断绝联盟关系。武汉国民党领袖千方百计接近那些怀有强烈反共反苏情绪的、并对工农群众不满的高级将领。

中共中央在确信左派国民党对保持统一战线的呼吁不予理睬后，决定放弃自己对武汉革命中心的领导作用的主张，并声明自己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8日的决议谈到，“因为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反帝的联盟，自然，领导权归它”。^①

1927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对政局的宣言，宣言强调指出了革命危急存亡的问题。由于号召拥护革命的工人、农民及一切平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了所经受的危机的严重性，并阐明了自己的政策。

宣言指出，革命胜利的原因，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而主要在于工农群众的努力和各种被压迫阶级的坚固的革命联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重要意义，因为有三大政策，革命才获得了伟

^① 《中国共产党1927年八月会议》，载《中国问题资料》，1927年，第8期，第30页。

大的胜利。

接着谈到，革命的胜利首先对农民、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以及小商人是有利害关系的。至于资产阶级，则宁愿成为帝国主义的奴才，却不肯牺牲“一个大钱”来改善工农的生活。

宣言还谈到，由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所宣布的抵抗反动派进攻的政策符合工农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了合作，并通过了参加国民政府的决议。“然而最近几个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如果国民党中央真能依据民众运动，那么千余万有组织的农民，二百八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必定要成为国民革命之极巩固的基础。那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必定要受着致命的打击，而不能复活。然而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不愿意如此！国民党中央与垂死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关系，却比他与新兴的革命力量的关系更加密切些；因此，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领导权又落在反动军人之手。”^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责国民党领袖在5月间放任反动派“自由的准备进攻革命”，公开的反攻工农运动。

现在已到了国民党选择道路的最后时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仍旧是不肯决然的同着革命前进，仍旧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③为此宣言指责国民党领袖以自己的政策来帮助反动派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国民党领袖们的这种政策使国民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载《向导》，1927年，第201期，第221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2216页。

革命陷于毁灭，使武汉同化于南京。

由于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迄今尚未解决，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中国共产党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中国共产党反对这种政策，“因为对于他，民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①

宣言还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从国民政府中撤回自己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心继续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一切封建余孽。中国共产党在宣言中还谈到，力求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

宣言强调指出，“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了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草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此草案，愿与全国一切革命分子商榷而实行之。该草案没有越出以前国民党原则范围以外的要求。^③

1927年7月14日《真理报》刊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其中一项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平民’的方式，即工农和城市贫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采取革命行动，来继续进行争取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并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④

① 见前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第2216页。

② 同上，第2217页。

③ 《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载《向导》，1927年，第201期，第2217—2219页。

④ 见前引：《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在中国的运用）》。

1927年7月18日出版的这期《向导》周刊，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和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在这之前三天，即7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正式宣布了和中国共产党决裂。当天，在武汉开始大肆破坏工农组织，搜捕共产党员以及对共产党同情的国民党左派。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责共产党人企图夺取国民党的政权并以号召经济上没收地主的土地去代替政治上没收地主土地的号召，即破坏国民党的决议，以此作为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13日声明的答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这些行动看作是共产党一意孤行和不希望同国民党合作的证明。^①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由于想表明自己对国民党的信任，向汪精卫介绍了他所接到的指示。指示说“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2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②这一情况加速了不可避免的结局。

该指示同时建议把隐藏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的反动分子开除出去，并成立革命法庭来惩办反革命分子。这些指示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是做不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可能把这些指示付诸实践。但是，共产国际的电报使汪精卫惊慌失措。据蔡和森证实，“汪精卫刚一得知这件事，他就到唐生智那里去了，并开始叫喊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想要推翻和消灭国民党，国民党的全部军队也都要实行共产主义革命。”^③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

① 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1965年版，第472页。

② 《斯大林全集》，北京1954年版，第10卷，第31页。

③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历史》，载《中国问题》，1929年第1期，第59页；汪精卫1927年11月在广州演讲时说，电报中所包含的指示使他最感到惊讶：第一、不根据政府的命令，从下到上没收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第二、为了避免官兵的反抗，不触动他们的土地；第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在执委会内扩大工农领袖的人数；第四、把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武装起来；第五、为了审判反对共产党的军人，组织革命法庭。（参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479页。）

领导人企图利用让步和政治策略在武汉巩固起来，并保存同左派国民党的联盟，防止民族民主革命中心的崩溃，结果就没有成功。让步以及同国民党领袖妥协的政策也挽救不了这种局面。不可能说较为坚定的进攻的政策就可以帮助他们。这种可能性多半是没有的，因为他们的力量很弱。

国民党比较容易地把共产党人从马鞍上打下来，这证明共产党人社会基础的不巩固性及其力量的软弱性。关于革命的同路人脱离革命越多，革命阵营变得越强有力，革命的发展程度也越高的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使共产党人陷入窘境。

革命采取的不是民众运动的形式，而是军事行动的形式去反对蒋介石的军队。决定革命命运的不是群众的力量，而是枪杆子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企图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燃起土地革命的烈火，结果是徒劳的。

后来，在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认清了保存和巩固广泛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对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的联合力量的重要性。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他强调指出，国民党是两个党派中的最重要的党。他说，要想进行抗日战争就不能没有国民党，正是该党实行指导抗日战争的，因为它有两个伟大领袖——孙中山和蒋介石，在进行战争中，起领导及核心作用的是国民党。①

译自杰柳辛、科斯涅耶娃：《1925—1927年
中国大革命（问题与评价）》，莫斯科1985
年版，第153—187页。

曾宪权 译

① 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

国外对五卅运动的研究

董进泉 王建华 谈春兰

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已经过去整整六十年了。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五卅运动日益受到国外史学界重视。本文拟就六十年来国外史学界研究五卅运动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观点，作一个扼要的介绍。

基本情况

国外五卅运动研究大体可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国外对五卅运动的研究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例如日本各报刊杂志在五卅运动时期虽然发表过不下50篇文章，但都是评论性分析性文章。直至1949年前，除了铃江言一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一书简明地谈到了五卅运动外，几乎没有其他研究文章。在欧美各国，大多是见闻录、回忆录或政论著作。作者中许多人曾在中国任职或同官方有种种联系。其它有关租界问题、劳工问题的著作，如科特纳夫的《上海的自治与中国人》、梅朋和J.傅立德的《上海法租界史》、雷麦的《中国抵货运动研究》等，也涉及到五卅运动。在苏联，大致分两类。一类是五卅时期和以后不久发表的政论文章，如魏金斯基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红色工会国际代表黑勒的《中国工人运动》、《民族运动和工人阶级》，米夫的《上海事件的教训》、《中国革命》，苏联第一个工会代表团的访华

报告《反帝斗争中的中国工人阶级》等。作者大多是和中国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活动家，或直接参加过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另一类是中国现代史的一般历史著作，对五卅运动和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的叙述相当肤浅。

苏联对五卅运动坚决支持，无论政治著作还是历史研究著作，都作了高度评价。至于欧美各国，大多数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如《中国年鉴》主编伍德黑德宣称五卅运动“不可理解”，是“突如其来的人为的工潮”。意大利律师穆索扬言上海学生参加运动是“失去理智”。美国亚细亚协会秘书诺顿为英国在华利益辩护，达罗克等人则否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叫嚷“用武力解决问题”。也有一些著作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如安德森认为五卅运动唤醒了受尽凌辱的中国人，从此中国人迅速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卅事件本身比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更重要”。特别是斯诺夫人韦尔斯的《中国劳工运动》，是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劳工问题的西文著作。此书广泛引用了作者访问延安时采访刘少奇等工人运动领袖的谈话记录，因而至今对五卅运动乃至整个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1949年以后的第二个时期，随着新中国成立和国际威望迅速提高，国外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五卅运动也日益受到重视，但各国的研究规模和水平仍然很不平衡。

日本从1949年起到60年代，对五卅运动的研究大致停留在概论或通史水平上，发展速度不快。盐胁幸四郎在1949年出版了《中国劳工运动史（上）（下）》后，这方面的研究曾一度停顿。60年代，岛一郎发表了《1918——1925年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一）（二）》，向山宽夫发表了《中国的反帝运动（上）（下）》。这些著作的特点是对五卅运动的全部发展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但缺乏深入研究。日本史学家对五卅运动史的专题研究，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新村恭发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和五卅运动》一文，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成

长过程，打破了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劳工运动史研究长停滞不前的局面。由此开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有关五卅运动的专题著作，如小杉修二的《上海工团联合会和劳工运动》、《五卅运动考察》、《戴季陶主义考察》，藤井升山的《中国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从五卅到三一八》，天野元之助的《五卅事件中的上海》，佐藤明子的《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妇女》，高纲博文的《上海公共租界和五卅惨案》，江田宪治的《上海五卅运动和劳工运动》。此外，中村三登志的《中国劳工运动画史》也涉及到五卅运动。目前，日本已成立了中国劳工运动史研究会。

这一时期欧美各国对五卅运动的研究也有了较大发展。但70年代中期以前，欧美学者大体上是在一般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和外交史等著作中对五卅运动加以阐述和研究的。70年代中期开始，欧美各国对五卅运动也开始了专题研究，1975年澳大利亚学者里格比发表了博士论文《五卅运动概要》，接着，他又在这一著作基础上写成了《五卅运动：事件和主题》一书。另外，新加坡顾鸿庭的《都市群众运动：上海的五卅运动》和美国学者克利福德的《1925年的上海：都市爱国运动与抵制外国人的特权》也相继发表。

在苏联，这一时期对五卅运动的研究比其他国家更加充分一些。60年代以前，这种研究是在一般历史著作或其他专题研究著作中进行的。60年代初开始，五卅运动的专题研究著作有卡尔图诺娃的《工人阶级在1925年上海工商学三罢中的领导作用》、《上海总工会在1925年6月至8月的活动》和由阿卡托娃主编的苏联第一部中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集《中国工人运动，1924——1927年中国革命》。70年代以后，苏联刊物上又先后发表了卡尔图诺娃的《1925年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1925——1927年中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1925——1927年革命高潮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问题上的政策》、阿卡托娃的《民族因素在1925——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卡列金娜的《奉系军阀和五卅

运动》、З.И.格鲁宁和М.Ф.尤里耶夫的《关于1925——1927年中国革命问题》等文章。此外，《1925——1927年中国革命》、《中国现代史》等著作对五卅运动也作了比以往充分得多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从60年代末起，苏联对五卅运动的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许多问题上同我国史学界的观点严重对立。

日本在研究五卅运动中提出的主要观点

一、五卅运动的起因及背景

日本学者对五卅运动的研究大多以邓中夏的《中国工人运动简史》为蓝本，在五卅运动起因问题上基本上持相同观点，一般都认为导致五卅运动发生的间接原因，是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损害了中国主权；直接原因是工部局的四提案，而日、英方面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则是运动爆发的导火线。如新村恭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和五卅运动》中指出，引起五卅运动的“主要原因是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次要原因在于工部局的四提案”。小杉修二在《五卅运动的考察》中也指出，五卅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租界里‘外国政府’的存在以及‘损害中国主权、打击民族企业的‘工部局四提案’的提出”。高纲博文基本上持同样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共产党利用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和中国民众之间激烈的矛盾，在公共租界进行以学生为主体的街头示威，是点燃五卅运动导火线的火神”。中村三登志在《中国劳工运动画史》中指出，五卅运动的“主要原因当然是英日的残暴行为激起了中国国民的愤慨”，5月30日事件以后发生的大规模罢工行动“大半是由于5月30日英国巡官在南京路上开枪引起的”。

关于五卅运动的背景，日本学者在研究中涉及不多，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有两名学者论述到这个问题。由于研究侧重点不同，观点也有所不同。小杉修二是从“南北对峙”的政治结构方面研究五卅运动的，因此他认为五卅运动是在“民主与反民主、

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相当鲜明的南北两个政府争夺“正统的统治权”的背景下发生的。江田宪治是从劳工运动的角度研究五卅运动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次全国党代会上已提出了国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并作出了以工人斗争为先锋开展民族运动的决定，因此“五卅运动是中共四大理论的实践场所”。

二、五卅运动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

在五卅运动中，究竟有哪些方面的力量起了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的观点较分散。新村恭认为，“到上海总工会成立为止，即5月30日前，罢工斗争都是工人自身成长的表现”。小杉修二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他在《上海工团联合会和劳工运动》一文中反驳说：“5月30日以前的运动是国共合作及其推动下的反帝运动”，强调了国共合作的作用。而江田宪治在《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劳工运动》一文中则认为，“工人方面的自发罢工和共产党着手组织与领导上海总工会是分不开的”。他强调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的作用。

至于总工会成立以后的罢工运动由共产党领导这一点，日本学者的看法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但对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则观点有所不同。小杉修二、江田宪治在他们的文章中对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一概持否定态度，认为总商会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了罢工运动。而新村恭却认为对总商会的作用不能全盘否定。他认为，“从运动的全过程来看，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并没有和帝国主义及军阀结成明确的政治同盟，相反，在一定范围内，他们始终对帝国主义有要求，这种要求对唤起五卅运动起了一定作用”。他用总商会反对工部局四提案以及争取关税自主权等例子，来证明他的上述观点。新村恭还对中国学者黄逸峰在《五卅运动中的大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65年3月）一文中认为总商会从一开始就起了买办作用、反革命作用的评价持反对意

见，指出这一评价是“片面的，非历史的”。

三、对上海工团联合会的评价

日本学者大部分接受了邓中夏的观点，认为工团联合会是“流氓工会”、“招牌工会”。如铃江言一在《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中对工团联合会的评价是：“他们的活动在整体上破坏了政治斗争……他们没有把工人大众放在第一位，因此在五卅运动中他们被工人们抛弃了”。藤井高美在《中国革命史》中也写道，工团联合会的“领导者大多数是接近国民党右派的保守的工联主义者……由于破坏了政治斗争，五卅运动开始后不久即被工人们抛弃了”。新村恭的评价最尖锐，他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五卅运动》中写道：“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领导的上海工团联合会是在帝国主义保护下存在的”。

小杉修二对上述观点表示反感。他发表了《上海工团联合会和劳工运动》一文，通过对工团联合会成立初期的性质及其在各个阶段的具体活动的考察，指出“在各个阶段不同的政治形势下，政治斗争的方式也应该不同”，工团联合会在五卅运动的政治形势下没有采取相应措施，但“由于这一点而批评以前采取的相应办法是‘破坏政治斗争’、只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他认为“上海工团联合会是上海劳工运动中一个有力的组织”，是“劳工统一战线”。他还强调指出，如果认为工团联合会是邓中夏、张国焘断定的“反共男女劳工同盟”、“招牌工会”、“工贼工会”的话，那就忽视了劳工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了。

四、五卅运动的性质

所有研究五卅运动的日本学者都确认五卅运动是工人运动，同时也是民族运动。小杉修二认为“五卅运动是在南北政府对抗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运动”，新村恭认为“五卅运动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最早的全国性反帝运动”，高纲博文认为“五卅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后期群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典型”，江田宪治认为五卅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后又一个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盐协幸四郎、木村三登志等学者都是把五卅运动作为反帝民族运动来叙述。

五、五卅运动的意义

关于五卅运动的意义，日本学者都有评价，并且在内容方面也大同小异。把新村、小杉、江田等主要研究五卅运动的学者的评价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1.促进了工人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完成了阶级的形成；2.五卅运动直接接触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表明工人阶级已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3.五卅运动引起阶级分化，充分暴露了各个阶级的阶级性及其斗争方向；4.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炼锻，壮大了党的队伍；5.运动表明帝国主义的武装已镇压不了觉醒的中国人民，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全面后退的开始；6.为大革命和北伐奠定了基础。

六、五卅运动失利的原因

新村恭指出：“上海五卅运动的最大不足是农民没有发动起来，没有结成有力的工农联盟”。江田宪治除同意以上观点外，他还特别指出：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背叛了运动”。

苏联在五卅运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

一、关于五卅运动和中国革命史分期

60年代以前，苏联史学家对中国革命史的分期没有统一意见。大多数人采取了我国史学界的观点，认为1924年1月统一战线和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是革命的开始；也有一些人认为五卅运

动是革命的开始。两者有一点是一致的：五卅运动是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始直到1966年，阿卡托娃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仍然采取1924—1927年分期。

大约从60年代末起，苏联史学界否定了1924—1927年分期说，一致认为五卅运动是大革命的开始。197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1917—1927）》说，五卅运动是“1925—1927年民族革命的最初事件”。卡尔图诺娃的《1925年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说，五卅运动“开始了中国民族革命斗争的新阶段”。她对这种改变作解释说：“50年代时苏联历史著作追随中国史学重复了这种（指按革命战争分期——作者注）中国革命分期。60年代起，苏联历史学家把这种分期作为不科学的分期抛弃了。苏联史学界公认五卅运动是1925—1927年革命的开始”。阿卡托娃也一变原来的观点，在《民族因素在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一文中说：“这次革命由五卅运动开始。必须指出，确立1925年5月30日为革命开始的日期还在那些暴风雨般的事件当时就进入了苏联史学。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苏联历史学家迁就对中国史学的醉心，非批判地接受了按所谓国内革命战争的中国史分期，并为1924年的哪一历史时刻可以合理地认为是革命的开始而‘伤脑筋’，现在全体苏联历史学家都认为上海无产阶级的发动是革命的开始。”

二、关于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苏联史学界基本上一致承认工人阶级在上海三罢时期起了领导作用，而否定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起领导作用。卡尔图诺娃就写过《工人阶级在1925年上海工商学三罢中的领导作用》（1960年）一文。她在《1925年6—8月上海总工会的活动》一文中也强调了“总工会在总罢工中的领导作用”。格鲁宁和尤里耶夫在《关于1925—1927年中国革命问题》中同样认为，中共在上海三罢中“实际上实现了上海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部分地实现了

组织领导。”

但苏联史学家否定五卅运动时期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作用。上引格鲁宁和尤里耶夫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时期实际上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第一次严重冲突。党在短时期内（大约两个月）部分地领导了运动，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整个说来失败了。”阿卡托娃的《民族因素在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一文说：中国无产阶级在1925—1927年“对革命领导权提出了严肃的申请”。

由此出发，苏联史学界否定了当时我党中央认为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全国革命领导者的观点。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卡尔图诺娃的《1925—1927年革命中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中。1925年10月，我党在北京举行的扩大中央全会分析了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和党的策略。全会决议认为五卅运动第一次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工人阶级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作者认为，这种评价是没有充分理由地把工人阶级在上海三罢中的作用扩大到了全国工人阶级，很可能没有考虑到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根据是《共产国际》1925年第11期上登载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一文。据考证，该文是参加全会的魏金斯基的报告摘要，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开封军事顾问组的意见。卡尔图诺娃认为，无论是魏的报告还是上述文章，都“没有说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是革命领导者”。但同一期《共产国际》紧接着魏金斯基的文章之后刊登的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L.黑勒的《中国工人运动》一文，却多次说工人阶级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工会坚定领导下的200万工业工人是整个革命运动的核心，是它的领导者”。这一点又怎么解释呢？卡尔图诺娃认为，这“与其说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时期和以后的实际成就，不如说主要具有宣传性”。她还说，10月全会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领导者和主要动力，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者，工人阶级应当同城市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民族革命的领袖是共产

党，没有提到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这说明全会“在分析正在发展着的国民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时犯了不准确的错误。它夸大了工人阶级的作用和实际力量。”正是过高估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使陈独秀有可能在10月全会时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合理的”。

阿卡托娃的《民族因素在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一文则说，被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客观上关心彻底的反帝斗争，这决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一定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陈独秀和彭述之提出的工人阶级具有“天然领导权”的理论是“非辩证地、教条主义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她声称，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肯定工人阶级作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同陈独秀的上述观点接近，实质上“彻底否定了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并且是在资产阶级排挤工人阶级而日益确立其领导者的作用的紧要历史时刻”。

三、关于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60年代以前，苏联史学界相重视大革命时期我国工人运动中的阶级因素。60年代以后，则大谈中国工人阶级的“弱点”。阿卡托娃的《民族因素在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一文说，苏联史学在60年代以前“一定程度上过高估计了1925—1927年革命时期中国工人斗争和组织中的阶级因素”，后来则为了“揭露”所谓中国现状的历史根源而强调中国工人阶级的“弱点”，这是“苏联史学家对中国工人阶级评价的两个极端”，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弱点绝对化“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无论是忽视还是强调这种弱点，“在确定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意义和具体历史作用时都是错误的”，都没有揭示决定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全部因素。阿卡托娃说，这两个极端的原因是“没有充分注意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强大因素，如对外国压迫的愤怒情绪”，中国无产阶级在捍卫（甚至提出）自身阶级要求上的软弱和不够坚

决，同解放斗争中惊人有力的民族正气结合着。”

由此可见，从6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史学对我国大革命时期、包括五卅运动研究的特点是强调民族因素的作用，认为民族因素在1925—1927年革命中是“决定全民族斗争主要内容并支配其他一切方面的因素”，在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具有首要意义。格鲁宁和尤里耶夫在《关于1925—1927年中国革命》中说，“五卅运动基本上是中国人民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列强殖民政策的愤怒情绪自发爆发的表现。”

阿卡托娃的《民族因素在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一文，详细地论述了民族因素在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作用。作者原来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是它的社会优点，但在这篇文章中则强调这种优点首先表现在无产阶级的反帝政治斗争上。她认为苏联史学界夸大或忽视中国工人阶级的弱点，是由于忽视了工人运动中的民族因素。因此，她特别注意“民族因素在工人运动历史发展中的优先作用的表现及其对阶级斗争本身的影响”。作者的基本观点如下：

1.大革命时期“民族因素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对阶级因素无疑占优势”，对工人运动“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

2.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优点首先不是集中，而是反帝政治斗争，即民族因素。中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不仅由阶级成熟程度决定，而且民族因素起着巨大作用，它客观上决定了工人阶级斗争主要是反帝的倾向，促使工人阶级的社会优点，如高度集中表现了出来。在决定中国工人战斗性、团结和重大革命积极性的条件中，“在促使中国无产阶级社会政治作用加强的国内因素中，民族因素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工人阶级斗争的反帝倾向“不仅决定了它的胜利，而且决定了它的社会政治意义”。

3.民族因素提高了外资工业中工人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意义。外资工业中工人直接的阶级敌人是外国企业主，阶级斗争同时是民族斗争，其特点是非常容易变成政治斗争，因为外资

企业中工人那怕是争取纯粹实际要求的斗争客观上也是反帝斗争。外国企业主和中国工人的关系虽然是极端的对抗关系，但工人首先把这种劳资关系本质理解为民族奴役，这种争取实际要求的斗争虽然是阶级斗争，但“民族因素在其中居于首位。民族因素大大超过了阶级意识”。外资压迫不仅加强了工人的民族感，而且使这种民族感具有社会色彩，使工人成为解放斗争先锋队。中国社会的任何其他社会集团都没有遭到如此直接而残酷的压迫，在这方面，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是密切联系和相渗透的。直接受外资剥削的工人斗争中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的结合，“提高了这部分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意义”。而反对中国企业主的斗争却“没有这种社会政治意义”，因为它还“不反映主要的、主导的社会矛盾”。

4. “中国工人阶级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超过了争取实际经济要求的斗争”。因为外国企业中的任何罢工客观上具有反帝性质，经济斗争很容易迅速转变成争取一般民主、要求民族解放的斗争。工人很容易“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当前斗争阶段无法达到的口号下奋起斗争。而纯粹工人的具体要求则退居次要地位。”5月30日罢工把取消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作为主要要求，直到8月中间才向外国企业主提出了可以达到的具体经济要求。

5. 民族因素决定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上必然在阶级觉悟形成以前投入民族解放斗争。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不充分，由于“民族因素在这两个阶级斗争中对社会因素占优势”，必然地产生了实现反帝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这两个阶级都是新的正在形成中的进步阶级，它们年轻，不成熟，都没有民族解放和自身阶级形成的独立力量，从而“使它们在历史上必然形成联盟。民族解放的共同要求为它们结成统一战线创造了基础。”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反帝倾向，使得中国有可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列宁的反帝统一战线观点。

6.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夸大工人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因素而低估了民族因素。作者说,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明显夸大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成熟程度和一般政治觉悟,夸大了工人阶级迅速确立领导权的能力”,“这种夸大的基础是对民族压迫因素估计不足”,它在大革命失败后导致了中共领导“左”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作者还说,“中共领导人夸大无产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因素而贬低民族因素,造成了对利用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及其对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估计不足。”

7.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罢工的关系。作者认为,在中国,工人不可能靠自己的积蓄、其他企业、城市和国际工人阶级的援助长期罢工,“任何罢工斗争都需要有资产阶级的某种拨款”。资产阶级越是感到罢工对外国竞争者有害而对自己直接有利,就越是乐于付出这笔费用。中国企业主在五卅运动中往往自己下令停工,甚至向本企业罢工工人发工资,总商会在停止罢市后还继续资助罢工工人。但罢工者提出了当时不能实现的广泛的民族解放口号而使罢工陷入困境,从而使上海资产阶级感到用于维持罢工工人的费用是累赘,“资产阶级因不能补偿它的损失而对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缺乏物质关心,对上海罢工起着不利影响”。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没有随着革命阵营力量的改组而改变,“在罢工末期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孤立和资产阶级同盟者的疏远”。

四、关于五卅运动时期党内的路线斗争

6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史学家认为陈独秀在五卅运动中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例如,卡尔图诺娃的《上海总工会在1925年6—8月的活动》一文说,五卅运动时期农民问题在《向导》中提得很胆怯,“这种缺点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的观点决定的”。

60年代末起,苏联史学界在五卅运动研究中出现了否定陈独

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强调“左”的错误趋势。具体表现如下：

1. 否定当时我党内部有两条路线的争论。

据记载，中共中央在5月28日会议上讨论了党的策略，蔡和森同志主张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变成政治斗争，使工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具有明确的反帝性质，并建议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支持沪西罢工工人。李立三在关于蔡和森的一篇回忆中说，陈独秀反对蔡和森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是不能实现的，示威游行不会超过三、五百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在谈到这次会议时也说，蔡和森主张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变成大规模的反帝运动，而陈独秀反对。但格鲁宁和尤里耶夫在《关于1925—1927年中国革命问题》中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为文件证据所证实”，并指责我国党史著作“故意回避详细研究党的领导在五卅运动时期的政策”。不过，苏联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至今尚不统一。例如在格鲁宁和尤里耶夫的文章之后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革命》一书不仅叙述了蔡和森的意见和李立三回忆录提到的陈独秀的反对意见，而且引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关于蔡和森反驳陈独秀的引文。

格鲁宁和尤里耶夫还认为，中共中央6月5日告人民书指出了应当使五卅运动变成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陈独秀在同一期《向导》上也强调了斗争的长期性。告人民书只提出了反帝口号，没有提出中国无产阶级任何独立的阶级要求，陈独秀的文章也没有提到这种要求。他们还说，“激烈批判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从事件一开始就是党刊的主题之一；在这方面，定期在党刊上发表言论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意见完全一致”。他们认为，五卅运动后期，中共中央用“决不妥协！”的口号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叛卖”立场和“妥协”立场，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都“宣传了这一口号”。

2. 认为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策略越来越“左”。理由是：

1. 中共在五卅运动中夸大了工人阶级的作用和力量，夸大了迅速确立领导权的能力。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2. 格鲁宁和尤里耶夫的文章说，中共在五卅运动初期提出了当时条件下“无法实现的激进口号和要求”，如把立即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当作主要口号。它作为宣传口号是完全正确合理的，但“作为行动口号，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并使党陷入了困境”。

3. 中共在五卅运动中没有及时改变策略。格鲁宁和尤里耶夫说，6月5日告人民书没有指出运动初期和以后的步骤和阶段，没有指出能够组织运动使之走上明确轨道的具体政治和经济要求，实际上只限于号召宣传和组织群众。五卅运动引起的高潮，要求进一步说明党的策略，而党在运动高潮时（6月）没有公开提出符合新形势的正式政治纲领。下一期《向导》在6月5日告人民书后两周（6月20日）才出版，新的告人民书40天后（7月16日）才发表，“党中央显然没有立即对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作出评价，没有下决心提出明确的政治路线，而限于局部的策略决定”。卡尔图诺娃也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中说，三罢结束后，“虽然情况改变了，但中共没有缩小斗争的任务和目标，没有制定新的政策。……显然，忙于当前事务，不善于从暴风雨般的事件中分清主要事件，是中共中央不能对以前制定的方针作出修正的原因。”她还认为7月10日告人民书“仍然叙述了中共客观上无力领导的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4. 陈独秀在五卅运动末期同李立三一样是“左”的代表。格鲁宁和尤里耶夫的文章在谈到陈独秀和瞿秋白都宣传了“决不妥协”的口号时说，“不难发现一个突出的倾向：上海的局势变得越坏，党刊的言论听起来越不妥协，中共领导越来越加快‘左’倾。这种情况继续到1925年8月初能够靠工人阶级本身力量继续斗争的最后希望彻底破灭为止。假如得不到共产国际停止罢工的

建议，还不知道这种倾向将伊于胡底”。他们还说，中共中央在通过并执行“煞车”计划时，并不是没有斗争的，“一部分工人和中共领导人产生了绝望情绪”，这推动他们去寻找“摆脱艰难复杂的局势的‘崇高的’‘革命的’出路，直到武装起义”，李立三就是如此，陈独秀也倾向于这一点。卡尔图诺娃在上述文章中也说，“一部分领导人（陈独秀、李立三等）认为可以通过武装起义道路来解决”危机。

5. 中共从五卅运动中得出了“左”的结论。卡尔图诺娃在《1925—1927年中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一文中谈到1925年10月扩大中央全会时说，共产国际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同农民联盟，争取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并认为这是长远的前景，而“贯穿当时中共文件的红线是这样一种思想：工人阶级已经是革命的领导者。中共中央在五卅运动以后的政策和策略是从工人阶级似乎已经确立了领导权的前提出发的。”

五、关于五卅运动时期的统一战线问题

苏联史学界原来认为，中共在“三罢”一开始“执行了后来以‘又联合又斗争’闻名的策略”。并肯定当时中共认为反帝政治斗争和民族运动中的统一战线不能限制和阻止工人的经济要求，党坚定地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反对戴季陶的理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民族斗争偷换阶级斗争的企图，这些也是正确的（卡尔图诺娃：《上海总工会在1925年6—8月的活动》）。他们还肯定上海大资产阶级出卖了民族利益。但60年代下半期起，苏联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声称五卅运动时期中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执行了“左倾宗派主义”政策。归纳起来，他们主要提出了下列论点：

1. 中共在五卅运动中把统一战线理解为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前引格鲁宁和尤里耶夫的文章说，1925年夏，“中共领导已

不满足于原来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不满足于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6月5日告人民书及其它文件“对能够参加统一战线的政党仅仅具体列举了中国共产党，而丝毫没有提到国民党，仿佛它根本不存在似的”，6月7日的《向导》在发表共产国际关于青岛、上海事件的呼吁书时省略了提到国民党的一切地方。五卅运动引起了统一战线的新形式，而“中共实际上仅仅把统一战线策略归结为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贯穿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全部策略决定的是力图脱离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不要‘吓跑’它。因此，党实际上采取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方针。”卡尔图诺娃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中也说，10月扩大中央全会在总结五卅运动经验时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同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没有提到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丝毫没有提到国民党”，没有对国民党在革命中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评价。”

2. 扬言中共对资产阶级采取了矛盾的立场。

格鲁宁和尤里耶夫的文章说，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采取了矛盾的立场，一方面力求吸引资产阶级支持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宣传工作和具体策略决定的重点放在反对资产阶级上，“资产阶级与其说被看做同盟者，不如说被看做无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敌人”。198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1917—1927年）》说得更为清楚：“中共中央执委会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表示希望吸引它参加反帝运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是中共刊物及其文件激烈批判的主要对象。实质上党的领导人认为只能同小资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并把大资产阶级看做无产阶级的敌人。这表明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低估了资产阶级作为反帝斗争同盟者的意义。这种‘左的’宗派主义倾向自然加强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上海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先锋作用的不满情绪。”

8. 否定十三条和复市资产阶级出卖工人阶级。

过去，在苏联史学中占优势的观点，是对上海总商会的十三条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大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出卖了革命，同时高度赞扬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直到1968年，尤里耶夫在《1925—1927年中国革命》中还说，十七条“决不是过分的”。但格鲁宁和尤里耶夫的《关于1925—1927年中国问题》一文在一个注解中否定了这种观点，说尤里耶夫对十七条的上述评价是因为“相信了邓中夏的说法：资产阶级起着‘叛卖’作用，为此必须用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对抗总商会的十三”。他们还说，中共把十七条和十三条的对立当作对资产阶级的毁灭性批判的主要方向，瞿秋白在6月22日发表的文章说十七条是革命的。十三条是妥协的，大资产阶级在运动一开始就出卖了革命。瞿秋白后来的言论和陈独秀、郑超麟等人的文章发挥了同样的论点。后来这种论点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由此转入了中国的一切党史著作。“中共中央用‘决不妥协！’的口号对抗资产阶级的‘叛卖’立场和‘妥协’立场。这听起来非常‘革命’，但在当时力量配备下实际上却事先注定了整个运动的失败。”

格鲁宁和尤里耶夫实际上也否定了复市是大资产阶级的出卖。他们说：商人复市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最后拒绝参加反帝斗争。资产阶级继续资助外国企业工人的罢工，用以作为向帝国主义列强施加压力来取得同总商会的要求的精神一致的某些让步。但中共领导却把复市评价为卖国和从背后打击无产阶级。从6月下半月起，中共的宣传“越来越把锋芒对准了大（实际上是整个）资产阶级，认为它是帝国主义的仆从和民族的敌人。虞洽卿为首的总商会受到了主要打击，但其他资产阶级政治集团——曾琦为首的‘醒狮派’国家主义集团，梁启超、胡适为首的自由派教授，右翼国民党人戴季陶等人也陷入了中共批评的火力。”

但是，在这问题上，苏联史学界也还有不同意见。例如，1978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革命史》就说：“复市是抛下上海无产阶级同强大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单独斗争

的资产阶级对民族运动的出卖。因此不见得可以认为工商学联合会在为商人停止罢市辩护的呼吁书上签字是正确的。联合会领导人显然希望造成保持统一的外观。实际上这却助长了对为了私利而出卖民族运动的大资产阶级保持幻想。”

4. 认为中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的政策使资产阶级离开革命。例如，上面已经提到，《中国现代史（1917—1927）》就说，中共在五卅时期的“左”的宗派主义加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的不满。卡尔图诺娃也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中国工人阶级》中说，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高潮及其经济要求，工会的不断活动和经济罢工，引起了阶级分化和国民党右翼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离开革命。

欧美和其他各国对五卅运动的研究

欧美各国也有自己的特点，如比较重视五卅运动的外交方面，采用社会史方法研究劳工史等。近年来，欧美学者对五卅运动的研究逐步深入。1980年，澳大利亚学者R.W.里格比发表了《五卅运动：事件和主题》一书，这是国外第一部论述五卅运动的专著。

一、关于五卅运动的背景

欧美学者一般认为五卅运动是一次必然发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或反帝民族运动，但在论述其背景时侧重点有所不同。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J.谢诺在《1919年至1927年中国劳工运动》的著作中，把五卅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强调中国的内在因素。他认为，从1923年底起，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了“新的平衡”，五卅运动正是这种平衡的“第一个戏剧性结果”，它不但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对外国列强的敌对情

绪的增长”，还反映了中国人民“通过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种种可能性”。

美国西北大学J.E.谢里登的《中国的解体：1912年至1949年中国史上的民国时期》，基本上也持这一观点，称五卅运动是“五四运动的重演”。不过，与五四时期相比，由于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人民觉悟的提高，五卅运动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和更有效的组织”，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仇恨也“更深”。

另一个美国学者N.R.克利福德认为上述变化还不足以引起“五卅革命”。他在那本被列入“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计划”的著作中写道，不但应看到中国内部出现的“迥然有别于旧民族主义”的激进的新民族主义，而且应承认帝国主义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内外交困的英、美政府已准备在“不放弃特权的条件下逐步改变对华政策”。他接着说，公共租界的外国人似乎不识时务，不但对“变化了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视而不见，反而不合时宜地坚持“没有必要改变政策”。克利福德认为，五卅运动正是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展开的。

二、关于五卅运动的领导权

欧美学者对这个问题说法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以谢诺为代表，认为五卅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谢诺在上述著作中写道，在中共中央召开的5月28日紧急会议上，“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大胆路线压倒了陈独秀的犹豫不定”，决定举行五卅示威，激发全国人民“同外国列强展开全面斗争”；纵观1921年至1927年的工人运动，工会领袖“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谢诺最近又重申了这一看法，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由城市工会、学生会和商界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①美国学者C.布兰特在《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中也强调说，中共的领导和组织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他明确写道，“如果说有什么党派领导运动的话，这个

^① 谢诺：《1915—1949年中国劳工运动》。

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华裔联邦德国学者郭恒禹在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表明了这种看法。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共两党都是领导者，例如克利福德在上述著作中称，领导城市民族主义的是“既联合又争夺的”国共两党，站在其对立面的的是“勾心斗角的反动政客和军阀”。新加坡南洋大学的顾鸿庭先生实际上也持这一观点。他认为，五卅运动是由“改组后的国民党”派遣大量“干部”发动的，但他同时也承认，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为中共在五卅运动中领导群众发挥了巨大作用”。^①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例如里格比在其专著述写道，中共“在运动的前5个月有号召力”，当工商学联合会破裂后，中共也及时调整策略“继续掌握着工人群众”，但随着运动在全国的蓬勃开展，中共对群众运动的控制“越来越表现出局限性”。再如，研究两次国共合作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范·斯拉克教授在《敌和友：中共党史上的统一战线》一书中也认为，中共领导下的总工会虽在开始时“英明地驾驭了五卅运动”，但后来的群众运动发展得实在太猛了，以致“中共无法把握”。

三、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地位

欧美学者对这个问题著述较多，这同西方史学界中社会史方法的兴起和欧洲中心论的衰落是分不开的。谢诺的《1919年至1927年的中国劳工运动》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此书用两章篇幅分别论述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而主要论述的就是工人阶级的作用，目的是“把传统的汉学同现代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用社会史方法开创“现代中国研究中的法国学派”。

谢诺列举大量事实，论证了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他指出：“以十七条为政治纲领”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是在总工

^① 顾鸿庭：《都市群众运动：上海的五卅运动》。

会的推动下成立的，而“工”字雄据该联合会名称之首，说明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统一战线中“各种势力的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工人纠察队始终站在运动前列，发挥了“1919年以前不可能发挥的“政治作用；总工会不但接待了苏联工会代表团，而且与政府公开讨论劳工立法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工人的代言人”；当事态表明运动已明显不能取胜时，总工会及时提出谈判条件，使运动“从以政治目的为主转移到以实现经济要求为主”。总之，1926年至1927年间，中国工人阶级已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①

谢诺的观点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但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例如顾鸿庭坚持认为，应当对“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的说法提出某些“保留意见”。他在提交第七届国际亚洲历史学家大会的论文中写道：“事实上，正如中国当时的许多群众运动一样，工人阶级似乎只起到半被动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干部’团体”。顾鸿庭接着解释说，所谓“干部”团体，即国民党改组后为控制群众而派遣的“大量群众运动干部”。这些人抓住顾正红事件这样一件“小事”，把它发展成一次大的行动，不但顾正红成了烈士，而且罢工四起、示威不断，罢工终于从经济斗争变成了反日反军阀的政治斗争。五卅事件再次为“干部”提供了发动反帝运动的良机，他们很快组织起工会，并利用上海人民对租界的不满，使“反日运动顺利变成了反英运动”……由此可见，“干部”完全支配和领导了运动，而劳工的作用只是“半被动”的。②

应当指出以下两点：一，顾鸿庭所说的“干部”一词是含义不清的，他有时说“国民党群众运动干部”，有时说“中共劳工运动干部”，有时则笼统地说“宣传干部”；二，顾鸿庭多处引用了近年来台湾出版的中外文资料，如马超俊的《中国劳工运动

① 谢诺：《1915年—1949年中国劳工运动》。

② 顾鸿庭：《都市群众运动：上海的五卅运动》。

史》，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以及丁纪平的《中国近七十年教育纪事》等，因此，顾鸿庭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学术界的观点。

四、五卅运动与中共发展的关系

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教科书”性质的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数从不同侧面强调五卅运动对中共发展的意义，其中重要的有：美国学者J.P.哈里森在《通向政权的长征：1921年至1972年中共党史》一书中说，中共通过五卅运动，成功地把当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这对于中共的组织和策略有着重大意义”；谢诺也持同一看法，他在《1919—1927年中国劳工运动》中说“中国无产阶级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有了自己的政党”；法国学者J.吉尔耶马在《1921年至1949年中共党史》一书中则认为，中共党员人数从四大时的980人，一年半后迅速增至3万人，这种发展速度显然与五卅运动分不开；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院长L.比昂科在其《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可以公正地认为五卅运动标志着真正革命时期的开端”，因为从此以后，“中共走上了舞台”。有趣的是，作者还把中国1925—1927年与1949年的关系，比作俄国1905年与1917年的关系。

五、五卅运动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从外交史角度探讨五卅运动的发生、发展、结果和影响，历来为欧美各国学者所重视。随着有关国家外交档案的解密，这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广泛和深入，近年来，更出现了象克利福德的《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与抵制外国人的特权》这样的专题著作。

欧美学者普遍认为，五卅运动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促使外国人重新审议对华方针。早在1926年，A.科特纳夫在叙述中国民族

主义对租界法律和行政结构的影响时就说过，“1925年不仅标志着中外关系新时期的开端，而且标志着外人在华管理方式的新开端”。^①20年后，J.T.普拉特在其外交回忆录中也写道：五卅运动爆发后，许多外交官不止一次向英国外交部提出，“如果想恢复远东的秩序和稳定，必须为中外关系寻找新的基础”。^②D.博格在《1925—1928年的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中，认为五卅运动使中国人在关税会议上取得了“政治”胜利，因为如果没有五卅运动，外国列强也许会拒绝进行讨论，并且就“远远超出华盛顿会议的义务的问题”达成协议。

克利福德的观点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专著中认为，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外关系的真正转折点”，并从四个方面归纳了运动对中外关系的影响：第一，推动了外国列强开始修改19世纪以来的不平等条约，至少“使修改条约问题变得更加迫切”，有力地提醒“外国人于1922年在华盛顿作出的、迄今仍未履行的一系列承诺”；第二，直接影响了上海租界有关问题的解决，如撤消了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和交易所注册案，收回了会审公廨，在工部局设华董席位，赔款7.5万美元等；第三，极大鼓舞了中国民众，因为“从中国历史上看，公众舆论第一次对外交政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指总商会提出的十三条成为“谈判基础”）；第四，对外国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影响，使其认识到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已极大发展。作者强调指出，虽然五卅运动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结束，但它是促使英、美改变对华政策的催化剂，它迎来了汉口英租界的收回，促进了英美之间于1926年底互递“圣诞信息”（外交文书），决定从中国“有秩序地撤退”。总之，五卅运动是“中国从外交猎物争取成为外交主体的漫长而痛苦的道路上的重要的一步”，它宣告了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外国特权“再也不是永恒的了”。

① 科特纳夫：《中国的自治和中国人》第116页。

② 普拉特：《战争和中国政治》第202页。

六、五卅运动失败的原因

谢诺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他认为，除了军阀的镇压、大资产阶级的出卖、北京政府的无能和洋人的软硬兼施外，还有工人运动本身“政治策略上”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广大农民和农村自始至终没有介入运动，就上海而言，“最多不过由罢工者在回乡时作些募捐和宣传”，就全国而言，运动也只在城市无产阶级、学生、中小资产阶级中进行，“在农村影响甚小”，即使在省港大罢工时，也未能“充分利用农民运动的潜在力量”；第二，从五卅运动起，“中国劳工运动似乎未能正确解决与资产阶级联合后出现的矛盾”，因此无法阻止统一战线的破裂，而1926年，“作为工会领袖的共产党人无疑对资产阶级采取了让步政策”，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工农联盟。谢诺强调说，上述不足是“生搬硬套西方经验的结果”，而那种认为工业城市是斗争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战场的理论，显然“不符合1919年至1927年的（中国）国情”。^①

谢诺在另一篇论述《1919—1949年中国劳工运动》的论文中，把工人的政治作用同中国的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他写道，根据中国的国情，由于“前工业社会限制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能量”，革命的胜利“主要是通过发动农民而取得的”。

除谢诺外，还有部分学者试图从其他方面寻找五卅运动失败的原因。特别是研究中苏关系史的学者，一般都把失败原因同斯大林的政治战略和共产国际的活动联系起来，甚至还以此出发去探讨日后的中苏关系。^②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不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强调五卅运动“未能达到初期的目标”，并尽量回避“失败”这样的字

① 谢诺：《1919年—1927年中国劳工运动》。

②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

眼。例如克利福德在其著作中认为，瞿秋白所说的“五卅事件的解决方式对中国来说是个失败”未免夸大其辞，因为五卅运动不仅造就了一批共产党领导人，而且五卅经验日后也得到了运用。谢里登在《中国的解体：1912至1949中国史上的民国时期》中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根据运动的初期目标，五卅运动“不算成功”。但他立即强调指出，中共从1000人猛增至3万人，这却是很大的成功。里格比在其专著中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虽然运动“在低潮中结束”，但是“没有哪一天可以真正看作运动的结束”。

七、对五卅运动的评价

这里着重讲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W.里格比的《五卅运动：事件和主题》这本专著对五卅运动的评价。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理查德·W.里格比是第一个全面研究五卅运动的西方学者。他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系，由于对中国现代史的强烈兴趣，先后攻读了中文和日文，并化了7年时间广泛收集中、日、英文资料。1975年，他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提交了题为《五卅运动概要》的博士论文，成了当时尚不多见的专门研究五卅运动的学者之一。5年后，他又在论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并吸收了克利福德、T.A.克里默等人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研究五卅运动的专著《五卅运动：事件和主题》，从而把国外对五卅运动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正如许多书评者指出的那样，它填补了一个“研究空白”，它与克利福德的著作“将为西方学者和学生提供更充分的理解”。^①

这本书包括前言、上海的五卅运动、全国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与中国人、五卅运动与外国人、结果和发展等六章，还包括五卅运动大事记、五卅运动期间的童工改革和阻力、文献汇编等三个附录和详尽的书目和索引。此书的特点是广泛考察了五卅运动

^① 参见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1983年，第56卷，第318—321页。

本身及五卅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结局，详细叙述了劳工境况，尤其是对比了外商工厂和华商工厂，还讨论了五卅运动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工商学各界的反映、商界的内部纷争，以及运动对国共两党、外国列强、中国各界人士的影响。

里格比明确地谈到了对五卅运动的评价。他认为五卅运动标志着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新时期的开端，把中外人士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虽然五卅运动在低潮中结束，而且运动初期的目标实现甚少，但从长远来看，“没有哪一天可以真正看作运动的结束”，因此，“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是孤立地研究事件，而是把五卅运动作为一种开端”。作者认为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是：

第一，五卅运动有教育作用。首先，它使“迄今陌生的‘帝国主义’一词在中国家喻户晓”，使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城市人民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了种种不幸，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才能最终摆脱不幸。其次，虽然帝国主义只作出微不足道的让步，但是已证明五卅运动“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惧”。作者强调说“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正是这种恐惧反过来使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使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并非不可战胜”，这一事实所包含的“心理解放”已深入社会各阶层；

第二，五卅运动有着巨大的组织作用。作者赞同1926—1927年《中国年鉴》所说，“上海劳工的工会化，中国的工会化，将成为五卅事件所引起的罢工的突出结果”。不过，作者进一步指出，五卅运动的功绩不仅在于使有组织的劳工大规模走上政治舞台，而且在于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使它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从而不再依附于国民党，这一点“虽然在当时不很明朗，但从长远来看极为重要”，因为随着有组织的劳工的成长，随着中共的壮大，才有可能最终达到五卅运动提出的目标；

第三，五卅运动使外国人改变了对华态度，推动了英、美等国采取新的对华方针。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观点大致与克利福德

相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里格比还对比了国共两党的五卅运动研究状况，从而论证了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作者指出，中共历史学家（例如邓中夏）一般都认为五卅运动是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开端，强调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对巩固革命根据地和推动北伐的重要性。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部分浮雕，也证明了“中共领导人赋予五卅运动以重要地位”。与此相反，除郭化伦外，国民党历史学家大半注重1927年以后的历史，即便偶尔提到五卅运动，通常也只占很小篇幅，而且不把它作为“革命的开端或前奏”。汤良礼的《中国革命秘史》虽承认上海的枪声使中国民族主义浪潮日趋高涨，但痛惜五卅运动帮了中共的大忙；马超俊虽提到新兴的工人阶级“构成了国民运动的先锋和推进北伐的最重要因素”，但忽儿说总工会是在中共诱惑下成立的，忽儿说劳工运动是国民党领导的，难以自圆其说，“令人失望”。里格比诙谐地写道，国民党历史学家在五卅运动研究中的沉默，反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五卅运动的支配地位以及五卅运动对中共发展的意义。

附：

国外研究五卅运动书目 (按出版年月为序)

日文分部：

1. 铃江言一：《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满铁调查部，1929年。
2. 盐协幸四郎：《中国劳工运动史》，白杨社，1949年。
3. 橘朴：《中国革命史论》，日本评论社，1950年。
4. 白井胜美：《五卅事件和日本》，载《亚细亚研究》，第1卷，4号，1957年。
5. 岛一郎：《1918——1925年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一）（二）》，载
• 264 •

- 《同志社大学经济史论丛》，第14卷，5号；第15卷，1号，1965年
6. 卫藤沈吉：《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
 7. 中西功：《中国革命和毛泽东》，青木书店，1969年
 8. 向山宽夫：《中国的反帝运动》上、下册，载《国学院法学》，第6卷，1号、2号，1969年。
 9. 山田辰雄：《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的汪精卫路线以及蒋介石路线》，载《法学研究》，第42卷，12号1969年。
 10. 西村成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帝国主义统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形成》，载《历史评论》，第257号，1971年
 11. 新村恭：《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和五卅运动》，载《历史评论》，1970年。
 12. 藤井升三：《中国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从五卅到三·一八》，载野村浩一、小林弘二编：《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动态》，亚洲经济研究所，1972年。
 13. 小杉修二：《戴季陶主义的考察》，载《历史评论》，1973年，8月号。
 14. 小杉修二：《上海工团联合会和上海劳工运动》，载《历史学研究》，第393号，1973年。
 15. 小杉修二：《五卅运动的考察》，载野泽丰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青木书店，1974年。
 16. 菊池贵晴：《中国国民党的基本构造——抵制外货的研究》，汲古书院，1974年。
 17. 天野元之助：《五卅事件的上海》，载《社会经济史学》，第39卷，5号，1974年。
 18. 西村成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民族运动》，载《日本史研究》，第151号，1975年。
 19. 古厩忠夫：《中国资产阶级潮流下的劳工运动》，载《中国近代史研究会通信》，第5号，1977年。
 20. 小杉修二：《反帝革命中的中国国民党》，载野泽丰、田中正俊编：《讲座中国近代史》，1978年。
 21. 中村三登志：《中国劳工运动画史》，亚纪书房，1978年。

22. 佐藤明子：《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妇女》，载《史海》，1980年，6月号。
23. 江田宪治：《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劳工运动》，载《东洋史研究》，第40卷，2号，1981年。
24. 高纲博文：《上海公共租界和五卅惨案》，载《樱信论丛》，1983年，第3号。
25. 高纲博文：《五卅运动研究的动向》，载《中国劳动运动史研究》，第13号，1983年。

俄文部分：

1. П. 米夫：《上海事件的教训》，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
(Миф. Уроки Шанхайских событий, М.—Л. 1926.)
2. П. 米夫：《中国革命》，莫斯科，1932年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1932.)
3. Г. Н. 魏金斯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载《共产国际》，1925年，第11期 (Г. Н. Войтин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итая и тактика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партии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25. №11.)
4. Л. 黑勒：《中国工人运动》，载《共产国际》，1925年，第11期 (Л. Геллер,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Китая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25. №11)
5. Л. 黑勒：《民族运动和工人阶级》，莫斯科，1926年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 «Рабочий Китай», М. 1926)
6. 《反帝斗争的中国工人 (第一个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报告)》，莫斯科，1927年 (Рабочий Китай в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Отчет первой профсоюзной делегации СССР в Китай, М., 1927)
7. 《1924—1927年国际工人运动》，莫斯科，1928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за 1924—1927 гг. М. 1928)
8. 《共产国际在殖民地民族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 (以中国为例)》，莫斯科，1934年 (Стратегия и тактика Коминтерн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а примере Китая, М., 1934)
9. А. И. 卡尔图诺娃：《工人阶级在1925年上海工商学三罢中的领导作用》，载《革命斗争史》，莫斯科，1960年 (А. И. Картунова, • 266 •

- Руководящая роль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о всеобщей забастовке рабочих, торговцев и студентов Шанхая 1925г. — В кн.: «Из истор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ы», М., 1960)。
10. А.И.卡尔图诺娃: «上海总工会1925年6—8月的活动», 载《东方学问题》, 1960年第2期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Шанха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офсоюзов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25 года —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60 №2)。
 11. 阿卡托娃主编: «中国工人运动。1924—1927年中国革命 (工会运动文献及其他资料集)», 莫斯科, 1966年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Революция 1924-1927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профсоюз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и друг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М. 1966)。
 12. «十月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工人运动», 载《列宁格勒大学学报》, 语言、历史、文学版, 1957年, 第20期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в первом десятилетии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я. — «Вестник ЛГУ», серия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Вып. 4. 1957. №20)。
 13. «现代国外东方各国史学 (中国)», 莫斯科, 1963年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стран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Востока. Китай. М. 1963)。
 14. 尤里耶夫: «1925—1927年中国革命», 莫斯科, 1951年 (М.ф. Юрьев.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 годов. М., 1951)。
 15. Г.魏金斯基: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 载《中国问题》, 1930年, 第4期 (Г.Войтинский.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ошибках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партии в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я», 1930, №4)。
 16. А.И.卡尔图诺娃: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载《现代史》, 1967年, 第6期 (А.И.Каргунова.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17-1925 гг.) —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67, №6)。
 - 16a. Е.Ф.科瓦廖夫: «1917—1934年中国革命运动», 莫斯科, 1968年 (Е.Ф.Ковале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17-1931 М., 1968)。

17. А. И. 卡尔图诺娃: «1925年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 载
《苏共党史问题》, 1975年, 第8期(Китай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движении «30 Мая» 1925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75, №8)。
18. А. И. 卡尔图诺娃: «1925—1927年革命高潮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问
题上的政策», 同上, 1979年, 第12期(Политика КПК в рабочем
вопросе в период подъема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79 №12)。
19. А. И. 卡尔图诺娃: «1925—1927年中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 同上,
1977年, 第5期(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в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5—
1927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77, №5)。
20. М. Ф. 尤里耶夫: «1925—1927年中国革命», 莫斯科, 1968年(Рев-
олюция 1925—1927гг. в Китае, М., 1968)。
21. В. И. 格鲁宁、М. 尤里耶夫: «关于1925—1927年中国革命问题», 载
《远东问题》, 1975年, 第2期(К вопросу о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
ции 1925—1927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5 №2)。
22. Т. Н. 阿卡托娃: «民族因素在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载《1925—1927年中国革命(论文集)》, 莫斯科, 1978年(Т. П.
Акатова. Рол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фактора в рабочем движении Кит-
ая 1919—1927. —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гг. в Китае» М., 1978)。
23. Е. С. 卡列金娜: «奉系军阀和五卅运动», 同上(Е. С. Каретина.
Мукденские милитаристы и движение «30 Мая» — В кн. Револю-
ция 1925—1927гг. в Китае, М., 1978)。
24. А. Г. 克雷莫夫: «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中国的思想斗争, 同上
(А. Г. Крымов.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Китае в период дви-
жения «30 Мая» 1925гг., — В кн. 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гг. в
Китае М., 1978)。
25. «中国现代史(1917—1927)», 莫斯科, 1983年版(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1917—1927. М., 1983), 第3章, 第1节。
26. «1925—1927年中国革命», 莫斯科, 1978年版(Революция
1925-1927гг. в Китае, М., 1978), 第2章第1节。

27. В.И. 格鲁宁：《格里戈里·魏金斯基(1885—1953)》，载《参加中国革命的著名苏联共产党人》，莫斯科，1970年(Григорий Войтинский(1885—1953).—Вк.: Видные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участников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79)。

西文部分：

1. 科特纳夫：《上海：会审公廨和工部局》(A. Kotenev, Shanghai: 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上海，1925年。
2. 红色工会国际：《中国工人运动和革命》(Red International of Trade Union, Arbeiterbewegung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柏林，1925年。
3. “外交官”：《中国的形势》(“Diplomat”, The Situation in China)，载1925年《帝国评论》(Empire Review)。
4. 罗斯：《中国的意向》(A. Rose, The Mind of China)，载1925年《英国国际事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 马隆：《新中国：调查报告。第一部分：政治形势；第二部分：劳工状况和劳工组织》(C. Malone, New China: 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Part I,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Part II, Labor Conditions and Labour Organizations)，伦敦，1926年。
6. 穆素：《中国和中国入》(C. D. Musso, La Cina ed i Cinesi)，米兰，1926年。
7. 达罗克：《中国、外国列强与“不平等”条约》(J. Darrock, China, the Foreign Power and the “Unequal” Treaties)，上海，1927年。
8. 科特纳夫：《上海的自治与中国人》(A. Kotenev, Shanghai: Its Municipality and the Chinese)，上海，1927年。
9. 曼：《中国见闻》(T. Mann, What I Saw in China) 伦敦，1927年。
10. 诺顿：《中国与列强》(H. K. Norton, China and the Powers)，纽约，1927年。

11. 安得生:《中国的人道与劳工:1923年至1926年工业调查和调查结果》(D.A.M.Anderson,Humanity and Labour in China:an industrial visit and its sequel (1923—1926)), 伦敦1928年版。
12. 安特生:《龙和洋鬼子》(J.G.Andersson,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 波士顿, 1928年。
13. 步济时:《北京的行会》(J.S.Burgess,The Guilds of Peking), 哥伦比亚大学, 1928年。
14. 欧文·查普曼:《1926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H.Owen Chapman,The Chinese Revolution), 伦敦, 1928年。
15. 吉尔伯特:《不平等条约:中国和外国》(R.Cilbert,The Unequal Treaties:China and the Foreigner), 伦敦, 1929年。
16. 梅朋和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C.B.Maybon et J.Fredet,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caise de Changhai), 巴黎, 1929年。
17. 皮尔斯:《日中两国的棉纺业》(A.S.Pearse The Cotton Industry of Japan and China), 曼彻斯特, 1929年。
18. 罗任延(音):《中国内部的革命》(Lo Ren-yen, China's Revolution from the Inside), 纽约, 1930年。
19.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R.Feetham,Report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上海, 1931年。
20. 科特纳夫:《新灯代替了旧灯》(A.Kotenev,New Lamps for Old), 上海, 1931年。
21. 马士:《中国的行会》(H.B.Morse,The Guilds of China), 伦敦, 1932年。
22. 索克斯:《亚洲的导火线》(C.Sokolsky,The Tinder Box o Asia), 纽约, 1932年。
23. 浦纳德:《1917年至1931年的中国外交》(R.T.Pollar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21), 纽约, 1933年。
24. 雷麦:《中国抵货运动研究》(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 巴尔的摩, 1933年。

25. 雷麦:《外国人在华投资》(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纽约, 1933年。
26. 王西明:《中国的女工和童工》(Wang Simine, Le travail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en Chine), 巴黎, 1933年。
27. 娄全华(音):《面临中国劳工问题》(Lowe Chuan-hua, Facing Labour Issues in China), 伦敦, 1934年。
28. 伍德海:《远东报界历险记》(H.G.W. Woodhead, Adventures in Far Eastern Journalism), 东京, 1935。
29. 米夫:《为了强大而自由的中国》(P. Mif, Pour un Chine forte et libre), 巴黎, 1936年。
30. 米夫:《英勇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年》(Heroic China—15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纽约, 1937年。
31.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H.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斯坦福大学1938年第1版, 1951年修订版, 1961年第2版。
32. 豪泽:《上海:被出卖的城市》(E.O. Hauser., Shanghai, City for Sale), 纽约, 1940年。
33. 欣德:《上海的社会问题和工业问题》(E. Hinder, Social and Industrial Problems of Shanghai), 纽约, 1942。
34. 普拉特:《战争和中国政治》(J.T. Pratt, War and Politics in China), 伦敦, 1943年。
35. 许立德:《在华四十年》(M. Hewlett, Forty Years in China), 伦敦, 1943年。
36. 韦尔斯:《中国劳工运动》(N. Wales,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纽约, 1945年。
37. 博格:《1925年至1928年的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D.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25—1928), 纽约, 1947年。
37. 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题》(I. Epstein, Labor Problems in Nationalist China), 纽约, 1949年。

39. 艾尔斯: 《上海劳工与五卅运动》 (W. Ayers, Shanghai Labour and the May 30th Movement), 载《哈佛大学中国集刊》 (Harvard papers on China), 1951年, 第5卷。
40. 布洛菲尔德: 《红色中国的回顾》 (J. Blofeld, Red China in Perspective), 伦敦, 1951年。
41. 菲什尔: 《在华治外法权的终结》 (W. Fishel,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加利福尼亚大学, 1952年。
42. 罗兹·墨菲: 《上海——现代中国的关键》 (Rhoades Murphy, Shanghai-Key to Modern China) 哈佛大学, 1953年。
43. 艾伦和唐尼索恩: 《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西方企业》 (G. C. Allen and A. Donnithorne, 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伦敦, 1954年。
44. 韦慕廷等: 《关于1918年至1927年的共产主义, 民族主义和苏联在华顾问文献》 (C. Martin Wilbur and J. Lien How, 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哥伦比亚大学, 1956年。
45. 尤丁和诺思: 《1920年至1927年的苏俄与东方》 (X. J. Eudin and R.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斯坦福大学, 1957年。
46. 周策纵: 《五四运动》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哈佛大学1960年版, 1980年再版。
47. 谢诺: 《1919年至1927年中国劳工运动》 (J. Chesneaux, Le mouvement ouvrier chinois de 1919 à 1927), 巴黎1962年。
48. 帕尔: 《上海传奇》 (J. Pal, Shanghai Saga), 伦敦, 1963年。
49. 诺思: 《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 (R.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斯坦福大学, 1963年。
50. 周策纵: 《五四运动研究指南》 (Chow Tse-tsung,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哈佛大学, 1963年。
51. 入江昭: 《帝国主义以后, 寻求远东新秩序》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 East), 哈佛大学, 1965年。
52. 谢诺: 《1919年至1927年的中国工会》(J. Chesneaux, Les syndicats chinois, 1919-1927), 巴黎和海牙, 1965年。
 53. 谢里登: 《中国的军阀: 冯玉祥传》(J.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斯坦福大学, 1966年。
 54. 布兰特: 《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C. Brandt,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纽约, 1966年。
 55. 布尔曼、霍华德: 《民国人物传记辞典》(H. C. Boorman and R. C. Howar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哥伦比亚大学, 1967年。
 56. 陈志让: 《毛和中国革命》(J. Chen,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牛津大学, 1967年。
 57. 梁奥嘉: 《巴金和他的著作》(O. Lang, Ba Chin and his Writings), 哈佛大学, 1967年。
 58. 范·斯拉克: 《敌和友: 中共党史上的统一战线》(L.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斯坦福大学, 1967年。
 59. 谢诺: 《1919年至1927年的中国劳工运动》(J.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1919-1927), 赖特(H. M. Wright)译, 斯坦福大学, 1968年版。
 60. 海伦·斯诺: 《中国劳工运动》(H. Snow,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纽约1970年重印本。
 61. 郝延平: 《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 连结东方和西方的桥梁》(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哈佛大学, 1970年。
 62. 加勒特: 《中国社会改革家: 1895年至1926年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S. S. C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China: the Chinese Y M C A 1895-1926), 哈佛大学, 1970年。
 63. 夏: 《现代中国小说史》(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耶鲁大学, 1971年第2版。

64. 路易斯：《1919年至1939年英国的远东战略》（W. 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牛津大学，1971年。
65. 毕仰高：《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年至1949年）》（L.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贝尔（M. Bell）译，斯坦福大学，1971年。
66. 甘威尔：《通向中国之路》（M. N. Gamewell, The Gateway to China），台北1972年重印本。
67. 哈里森：《通向政权的长征：1921—1972年中共党史》（J. P. Ha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72），纽约1972年版，伦敦1973年版。
68. 吉尔耶马：《1921年至1949年的中共党史》（J. Guillermez,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49），德斯特内（A. Destenay）译，纽约，1972年版。
69. 克拉克：《1925至1927年的英国和中国革命》（P. G. Clark, Brita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7），加利福尼亚大学，1973年。
70. 顾鸿庭（音）：《1923年至1927年华南的城市群众政治：实例研究》（Ku Hung-ting, Urban Mass Politics in the Southern China, 1923—1927: Some case studies），俄亥俄大学，1973年。
71. 威尔逊：《1924年至1928年的英国和国民党：关于英中双方官方政策和看法的相互影响》（D. C. Wilson, Britain and the Kuomintang, 1924—1928: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Official Policies and Perceptions of Britain and China），伦敦大学，1973年博士论文。
72. 麦奎尔金：《1919年至1927年苏联的对华态度》（D. K. Mcquillin, Soviet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1919—1927），肯特州立大学，1973年。
73. 克里默：《上海学生和五卅运动》（T. A. Creamer, Shanghai Students and 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弗吉尼亚大学，1975年硕士论文。
74. 里格比：《五卅运动概要》（R. W. Rigby, The May Thirtieth

- Movement: An Outline),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5年博士论文。
75. 谢里登:《中国的解体:1912年至1949年中国史上的民国时期》(J.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纽约, 1975年。
76. 蔡文伯(音):《探求新中国:1921年至1974年中共历史、思想及领导述略, 附文件选》(Chai Winberg, *The Search for a New China: a capsule history, ideology, and leadership of the CCP (1921—1974) with selected documents*), 纽约, 1975年。
77. 费维恺:《20世纪初外国人在华机构》(A. Feuerwerker,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密西根大学, 1976年。
78. 克利福德:《1925年的上海:都市民族主义与抵制外国人的特权》(N. R. Clifford, *Shanghai, 1925. Urban Nationalism and the Defence of Foreign Privilege*), 密西根大学, 1979年。
79. 顾鸿庭(音):《都市群众运动:上海的五卅运动》(Ku Hungting *Urban Mass Movement. 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in Shanghai*), 载《近代亚洲研究》杂志(*Modern Asian Studies*), 1979年第13卷。
80. 郭恒禹:《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24年至1927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Kuo Heng-yu, *Die Komintern u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die Einheitsfront Zwischen der KP Chinas und der Kuomintang 1924—1927*), 帕德博恩, 1979年。
81. 里格比:《五卅运动:事件和主题》(R. W. Rigby, *The May 30 Movement. Events and Themes*),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80年。
82. 单明(音):《中国劳工运动(1895—1949年)中文史料评价》(原书译名)(*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895—1949*), 斯坦福大学, 1981年。
83. 谢诺:《1915年至1949年中国劳工运动》(J.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5-1949*), 载《国际社会科学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1983年, 第58卷。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6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1991年第1期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十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厚安
责任校对：刘佐汉
封面设计：王 鹿
版式设计：王丹丹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十六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兵 书 告 庄 经 销
太 阳 宫 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折页223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004-0793-9/K·99 定价：4.55元